

史魂

上海十大史学家

SHIHUN

姜义华 主编

SHANGHAISHIDASHIXUEJIA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十大史学家

姜义华 主编

谨以此书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姜义华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4

ISBN 7-5326-0936-7

Ⅰ.史…　Ⅱ.姜…　Ⅲ.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Ⅳ.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7542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装帧设计　姜　明

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1　字数362500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5326-0936-7/K·128

定价：26.00元

序

上海市历史学会,原名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于1952年1月28日,到今天,整整五十年了。而其开始筹备,则要更早一些,首次筹备会是在1949年12月11日举行的,那时的名称是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

为了隆重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本届理事会于去年商定,选择长时间活跃于上海史学界、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吕思勉、李平心、李亚农、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陈旭麓、程应镠、谭其骧、魏建猷十位前辈学者,通过撰写他们简要的学术传记,展现他们的精神,表彰他们的成就,附录上海市历史学会大事记,将上海市历史学会发展成长的风雨历程,将上海市历史学家的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展现于人们之前。

上海市历史学会作为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之时,不仅荟集了定居于上海的众多史学名家,而且吸收了南京、杭州等地一批著名史学家为会员或理事。除去上述十位史家外,顾颉刚、夏鼐、胡厚宣、柳翼谋、徐森玉、陈衡哲、陈乐素、陈恭禄、陈乃乾、罗尔纲、王造时、张元济、邱汉生、顾廷龙等人,都曾经是上海市史学会成员,都对上海史学的繁荣作出过引人注目的贡献。他们中间一部分后来移居北京,一部分留居外地,一部分从事其他工作;金兆梓、姚舜钦、董每戡、林举岱、耿淡如、章巽等在史学会活动中也都相当活跃。限于篇幅,对这些史学大家都

未能立传。对于仍然健在、继续在史学园地耕耘的吴泽、蔡尚思、杨宽、田汝康等，这次也未撰传。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弥补这一缺陷，为他们一一作传。

本书题名《史魂》，首先因为历史研究贵在有魂。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搜集和罗列各类奇闻逸事或无数孤立的各种事实，最为重要的，是要寻找出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纷繁复杂甚至矛盾百出的各种历史现象如何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构成一个统一的过程，揭示它们背后所隐藏着的客观规律。前辈学者们的研究实践表明，他们所留下的最有价值、最能给人们的启迪的成果，正是那些能够透过现象而洞见本质、能够根据事实而揭示其内在规律的论著。视野愈见开阔，资料功夫愈是札实，愈善于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聚焦同一问题，就愈能发现问题的症结。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便是这样一些论著。

题名《史魂》，还因为要治史，史家自身必须有魂，这就是历史学家关注国家命运，置身于民族振兴的民众洪流，因而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矢志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将以自己劳动的成果，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提供精神的与智力的有力支持。为此，他们不仅要挺身而出，与国内外各种伪造历史、歪曲历史者正面交锋，而且常常不得不承受国内外曾肆虐一时的各种"左"的思潮巨大压力。而史魂，在这个时刻便更加显示出其可尊可贵。

以《史魂》为书名，还有一层意思，这就是表明历史学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要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同样贵在有魂。这就是，学会需要有一大批献身于史学事业的史学家为其领军人物及其骨干，需要众多热心学会活动、忠诚于史学研究、教育、传播事业的会员为其基础，更

需要在学会活动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始终不渝地坚持包含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在内的学术自由,以使历史学和社会大变革、社会大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失去这一灵魂,学术团体便会只剩下一副躯壳。上海市历史学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当继承与发扬老一辈史学家的优良传统,继续在历史科学高峰上攀登,努力使历史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以历史的真理与睿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宏大事业。

最后,应当特别申明:这部著作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谨此表示感谢。

姜义华
2002年1月28日

《史魂》编委会

主　编

姜义华

副主编

李伟国　王家范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克梅　王家范　王鹤鸣　冯绍霆　许纪霖
李伟国　姜义华　葛剑雄　熊月之

目录

识大而不遗细 泛览而会其通
——吕思勉传

张耕华

一、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1884 年 2 月 27 日（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故居。①

吕先生的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早先，常州还没有新式学校，六岁起，吕先生便随从延聘在家的教师同邑薛念辛、魏少泉先生读书。九岁那年，父亲授江浦县学教谕，全家随往江浦，至十四岁返回常州。其后，因家中经济拮据而不再延师教学，改由父亲自己教授，父亲无暇时，则由母亲、姐姐帮助讲解。所以，吕先生在童年时真正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也只有三年的时间。稍后，常州有了新式学校，但科举时代的人，对于新学校的外文、科学技术等科目均不重视，加之家境不佳，吕先生少时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他后来回忆说："于外文，仅能和文汉



吕思勉先生

读;于新科学,则仅数学、形学,…… 略有所知而已”,②曾跟常州府中的徐异(点撰)师学数学,“自加减乘除讫小代数二次方,仅一星期而毕”。③

十六岁时,吕先生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名义上算是一名县学生,实际上还是科举的初级阶段。从此之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开始系统地自学文史。吕家是书香门第,世代读书仕宦,家中藏书甚富,这为他自学文史提供了条件。吕先生的祖父母、父母、姐姐以及姑母等亲戚朋友,对于旧学都有相当的造诣,擅长作诗填词,家人小聚,亲友往来,常要出题赋诗,互相唱和。这种家学渊源和熏陶,④无疑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童年时的旧式教育,虽无外文和新学科目,但对传统学术的学习、训练却是系统和全面的,学习的范围涉及经学、小学、目录学、文学和史学等各个方面。

经书和子书,本是旧时私塾的日课,吕先生在六岁时,由私塾老师的指导,“诵四子书,日授十行,行十七字”。小学是阅读古书的基础,童年时曾得到同邑丁桂征(同绍)先生的指教,丁氏是吕母从姊的丈夫,经学名家,对小学深有研究。吕先生作了一篇经学方面的考据文章,拿去给丁先生看,丁先生指出文章中许多外行的地方,并向他讲解了经学的治学门径,劝读《说文》及其注疏。经丁先生的指导,他又把《段注说文》、《十三经注疏》读了一遍。同时,又读了《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

史书的阅读,约在八、九岁时。先是母亲、姐姐为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约讲解到楚汉之际,便自己会看了。父亲又取来《日知录》、

《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书，。让他随意翻阅，“亦觉甚有兴味”。私塾老师教读《通鉴辑览》，涉及历代治乱兴亡的事，更是读得津津有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或是照录，或是点读，最初都当作文章来读。他后来说：“故于史部之事，少时颇亲”，[5]十五、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迄尾”。先后自读了正续《资治通鉴》、《明纪》、《三通考辑要》、《文献通考》等史书。这时，父亲还指导他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也是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授子弟的一种老方法，即在其初读书时，通读一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部书，吕先生读得很认真，且做了不少读书札记，经、史、子三部分全部读完，集部只读了一半，然收获颇大。

大约到十六、七岁时，对传统学术的各个门类，吕先生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和学习，这无疑为他日后的文史研究作好了准备。他说：对于经学小学，少时“亦曾泛览，略有所得。但至后来，仅成为予治古史之工具耳”；“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目录学的学习。则从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以了解中国古代学问的源

① 1987年12月31日，吕思勉故居被列入第二批常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常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1998年12月动工修复常州吕思勉故居东宅的第一、二、三进平房。东宅的第四进的三间楼房及东宅三、四进间东侧厢等尚未修缮。故居的西宅犹待恢复，待整个工程完成，可见吕思勉故居之全貌。“史学家吕思勉故居”标牌挂在十子街旧宅大门东侧的墙上。

②《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

③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④ 吕先生曾抄录了大姐、大姑母、伯祖母及常州女诗人的诗作，并加评语，说“吾常多才媛”。

⑤《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流派别以及各种重要著述的内容概要，实际上就是在读书前，先浏览一部学术史，这于治学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我的学问，之所以不十分固陋，于这一点极有关系"。此外，早年读书时还特别留意进行文史写作方面的训练，如读《三通考辑要》时，将其与原书比照对读，以发觉辑本的不完备；读《古文辞类纂》和《续古文辞类纂》，特别留意其圈点，以体会良好圈点的重要；阅读时都要求随时作好史札和笔记等。幼时所作的史札、史论，有读《通鉴》论十一本、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札记六本以及读《昭明文选》的笔记等，这些史札和史论都经父亲和老师的批改、圈点，并写有评语。有一篇题为《蜀事杂论》的札记，写孔明与刘备之关系，其中写道："人皆以孔明与先主有君臣之知，惑于鱼水之言耳。先主东征，孔明叹曰：法孝直若在，必能使主上无行，就使东征，必不覆败。夫古之位臣者，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而可以谓之大臣也。今戎国之大事，而不能一言，尚可谓之臣乎？法孝直之能制先主何也。曰先帝取蜀皆法孝直之功也。挟其恩怨以制之，其气固足以摄之矣。且法孝直浮诞谲觚之人也。睹先之失计，必又有笑以制之矣。孔明则不能也。故曰：谲谏易，忠谏难"。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能从蜀国君臣关系中引出"谲谏易，忠谏难"的结论，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札记旁还留有当年老师审阅时写下的"确有见地"、"论虽刻而奇"等批语。

在现代史学家中，吕先生是少数几位靠自学而成名家的史学家之一。少时的学习，除了私塾教师的指点和父母师友的帮助之外，主要是靠自学，对学问的领会理解，治学的路数揣摩，都颇得要领，虽"坐塾问学"也不过如此。不过，自学也有其难以避免的缺陷，吕先生后来回忆说：少时由于没有得到名师的指导，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正是出于这一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吕先生一生的学术著述，

多是为青年学生所写的，为他们指点门径，建立阶梯，使初学者能引以为据，循序渐进，由此登堂入室，走上治学的道路。

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吕先生对新书籍新报刊的接触阅读却甚早。早年，吕先生的父亲在上海盛宣怀府第坐馆教授，常在上海买些新书寄回常州。约十一二岁时，吕先生先后读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王韬的《普法战记》、黄公度的《日本国志》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而且对东西方各国的近代民主政体、科学文化、经济发展也有了初步的了解。[⑥]

报刊杂志中读得最多的是《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时务报》由梁启超主笔，其富有感情的文笔和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最获青年学子的欢迎，吕先生后来回忆说："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该报又载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尤多时论政事，与吕先生当时所向往的经济之学相契合，是吕先生案头必读的刊物。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刊有

⑥《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刊于《蒿庐问学记》。

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文章，也是吕先生喜欢阅读的杂志。他还喜欢阅读章太炎的国学著作、严复的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译著，在议论方面受他俩的影响很深。青少年时代的这一段读书经历，给吕先生一生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他曾说："我和这三位先生（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虽无雅故，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受其牖启之处实不少。而尤其是康、梁两位先生，这或者我在理性方面，最于梁先生为近，而在感情方面，我也是一个空想的大同主义者罢？"吕先生自言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三次变化。童年时最信儒家的学说，向往社会大同。对于康梁的大同及张三世之说，深加钦佩。他说：少年时的读书学习得益于父母师友，而在学问宗旨上，"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我的感情是强烈的，而我的见解，亦尚通达，所以于两先生的议论，最为投契"。"此时，所笃信而想往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以为人莫不欲善，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大同而后已"，"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⑦新书新报的阅读和对康梁学说的信服，对吕先生的治学路向有极大的影响。清季民初的时局，激发了吕先生的爱国爱民族的心情和要求改革的愿望，他兼读新旧之书，深知要谈政治谈改革，必须尊崇科学、尊崇由科学产生的新技术，单读旧书是不中用的。⑧他的学问以传统的国学为基础，而最终没有走传统史学的旧路，实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二、不欲作官　专意治史

1905 年，吕先生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时仅二十二岁。最初在常

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由该校创办人朱少堂先生托人前来延请，执教国文与历史课。这一年，曾任京师大学堂、奉天大学堂正教习的元史专家屠寄返里小住，被邀请在城内铁市巷"读书阅报社"讲元史，吕先生前去听课。屠寄的讲学使吕先生受益非浅，他后来说："亲炙而受其益的，则为丁桂征、屠敬山两先生"。⑨受屠寄的启发，吕先生读了《辽史》、《金史》、《元史》，并将其他诸史补读。到二十三岁时，他已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他说："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⑩

在当代史学家中，能够真正通读二十四史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以致传为美谈，被后辈学者视为史学界的传奇人物，而吕先生则是公认的读过遍数最多的一位。吕先生自十六岁就开始读正史，先从"前四史"开始，他说："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史》、《金史》、《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

⑦《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⑧《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刊于《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2月。

⑨《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⑩《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11]中年以后，他对正史的考订钩稽又花费过不少功夫。吕先生所读的二十四史，都是一些价廉易得的普通版本，但全书从头到尾都用红笔加了圈点或符号，如人名加【 】，有用的重要史料圈点，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据黄永年先生的估计，对于二十四史，吕先生至少读过四遍以上，这种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12]

1907年，吕先生经人介绍，到苏州东吴大学教授国文与历史。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条件甚好，薪水也不低，但吕先生总觉得气味不相投，至6月暑假，便辞职回到常州。这年秋天，新创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开学，监督（校长）屠元博是屠寄的长子，特地聘请吕先生去该校任职，讲授历史和地理课。吕先生在府中任教二年余，深受学生的爱戴。在当年的常州府中学堂里，吕先生是最年轻的老师，钱宾四先生进校时则是最年轻的学生，老师对学生深为奖掖，而学生在治学上也深受老师的影响。钱先生有一段回忆文字，从中可见吕先生当年的风貌："除监督元博师外，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课。闻诚之师曾亲受业敬山太老师之门。诚之师长余可十二岁，则初来任教当是二十五岁，在诸师中最为年轻。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羼入，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

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须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粘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像诚之师之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13]钱先生成名后，常与吕先生通信论学，切磋学术，互相补益。师生俩情深谊笃，成为现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10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南通国文专修馆，由屠寄任馆长，以培养办理公文的专业人才。当时，能够教授公文写作的老师很少，屠寄邀请吕先生去帮助任课，吕先生参照《奏摺条件辑览》为教材，讲授公文奏议的写作。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吕先生从南通回到常州，他后来回忆说："辛亥革命起，予

⑪《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⑫ 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刊于《蒿庐问学记》。

⑬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往来苏常宁沪者半年，此时为予入政界与否之关键，如欲入政界，觅一官职之机会甚多。若不乐作官，亦可以学者的资格，加入政党为政客。予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予亦甚不以为然，遂与政治卒无所与。”他自恃自己的个性不适宜做官，“予自问性最懒惰，因懒惰故，凡事皆立于旁观地位，止于表示赞否而已，不肯身当其任，生平不欲作官，亦不肯加入政党，此亦其大原因”。他又说：“章行严君尝曰：‘人之有才，如货物焉。货物当致之需用之处，人才亦宜自度所宜。有宜实行者，有宜以言论倡导者。予自审不能实行，故遂不躬与革命之役也。’此言予颇善之，故尝自期，与趋事赴功，予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作幕僚而不可以作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而有所怀亦什之九不能下笔，此当自咎，不可以咎当世也。”⑭吕先生之所以不入政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极看不惯当年政界的习气，他说：今也举朝皆侥幸之士，自郡县至乡曲皆侥幸之士，议论侥幸之士所唱也，事权侥幸之士所掌也。事有便其私图者，一人唱议于前，千百人附于后，不旋踵而见诸施行，则皆入此曹之手。岂无真以为利国福民而赞其议者，及其为之，见可以自便其私图，则折而入之矣。有一二善者，亦无如何矣。自变法以来，何一事非如此者耶？是以苞苴盛而政事益坏，朋党成而是非益淆。⑮他认为做官或进入政界就应该效力于社会，批评当时社会流俗，把做官进入政界当作一种混饭吃的工具或途径。

1912 年，吕先生应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校长杨秉诠的邀请来到上海，在该校教授应用写作、商业经济、商业地理等课程。其中商业经济和商业地理课程，因为没有适用的教材，由吕先生参考日文教科书教授。1914 年，商业学校停办，吕先生经沈颐介绍，进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在书局任职期间，他写了许多通俗性的历史、地理读物。有《苏

秦张仪》、《关岳合传》、《国耻小史》、《中国地理大势》等。这些通俗读物,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书局连续再版,至1928年,《苏秦张仪》发行了九版,《关岳合传》发行了十版,《中国地理大势》发行了七版,《国耻小史》发行了十二版。

1918年秋,政府在沈阳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吕先生的内姊夫杨成能介绍他前去教授国文和历史。此时,吕先生正对书局的工作"颇觉乏味"而意欲"远游",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职务。然而,沈阳高师因草创不久,人事关系纷纭不定,远游的计划未能实现。1919年,经谢观的介绍,吕先生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谢家世代行医,谢氏继承祖业,自幼熟诵中国医学典籍,其时正在商务印书馆筹划编写《中国医学词典》一书,而且又急于成书。于是,就邀请吕先生入馆一起编纂。吕先生的舅家世业儒医,外祖父程柚谷为常州名医,舅舅程均甫、程少农,均工医,且治验颇多。⑯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从小就阅读过许多医书典籍,对于中国医书的源流派别,主要医籍的内容、价值,都有相当的了解。这时,他为了写作《中国医籍源流考》,对中国医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充分利用涵芬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

⑭《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⑮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⑯ 吕思勉:《窖藏与文物》,刊于1940年《宇宙风》第23期。

属的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广泛地阅读了许多古典医籍,尤其是一些当时十分罕见的典籍。大约化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最后完成了五万余字的《中国医籍源流考》。这一篇长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书目录学,而是以古典医籍为纲的中国医学史。作者从整个祖国文化形成和发展趋向的高度来观察医学和医籍的历程,因此得出许多特立独行的见解。⑰

1920 年 1 月,沈阳高师仍来延聘,吕先生也“仍乐远行”,就应聘去该校任教。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社会上除旧布新的改革思潮风起云涌,置身于文化改革的浪潮中,吕先生在学校尝试教学上的革新。那时,他每周任课十小时,科目有国文、文字学、历史等。在国文课上,吕先生提倡学生多自习,第一至第三周安排二小时讲解范文,第四周以二小时命题作文,其余三小时悉听学生自行阅读,特别提议学生多读新出的杂志书籍,他对学生说:“欲读何书,即读何书,如有意思自欲发表,即于此时间内作论文札记,教员不加干涉。”在沈阳高师教课时,他还为国文史地部编写了《中国历史讲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史学界掀起了一些史学问题的大讨论。1920 年 1 月至 2 月,《建设杂志》展开了一次有关中国古代有无井田制的辩论,吕先生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论货币与井田——给廖仲恺、朱执信的公开信》,这一篇公开信,长达七千余字,是吕先生第一次以史学家的立场参与的学术讨论。

在沈阳期间,他在历年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他的成名作《白话本国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的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全书约六十万字,分四册,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1923 年 9 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以来被用作大学的教

本，并作为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对史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与当时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白话本国史》的内容、体例和写法都有很大的创新。这可以概括为三点：一、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上古史方面，如认为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牺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进入农耕时代，用群婚制解释“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用没有财产“所有权”解释“饥即求食，饱即弃余”等，这在以前出版的书中，都还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二、开示研究的门径，提供必要的历史常识和前人重要的研究成果。书中除了有重要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外，又有前人和作者必要的考证和议论，介绍进一步阅读的著作，引据的资料都注明书名和篇名卷次。读者若能按图索骥、一一翻检，这部书虽不过六十多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三、着重讲究条理系统，注意社会历史变迁进化方面的论述。如书中设有“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和“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等节，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的变迁，首先是由于贵族的侵占自私，井田制的破坏和商业的发达，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最终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贵族的阶

⑰ 胡道静：《读吕诚之师〈医籍知津〉》，刊于《蒿庐问学记》。《中国医籍源流考》又名《医籍知津》。

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是“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由此，作者把这看作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一种大变迁，看作是三代以前与秦汉以后社会的一大界限。这确实是当时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抓住关键的创新见解。《白话本国史》的中国历史分期也极有特色，作者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六个时期来叙述。他认为，春秋战国是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大变迁的时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变革的一大界限。而秦汉以后直到清朝海禁大开之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不能前进，其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这一种历史分期，对以后的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18]史学家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吕先生的这部通史评价极高，他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正如有学者所说，与同时代其他几位史学家相比，吕先生既没有受过现代高等学府的教育，也没有负笈海外、系统学习西方学术的机会 。[19]这对于吕先生的治学，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不过，从小养成的对新书籍新学问的偏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失。对于新学问新方法，吕先生特别注意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他对斯宾塞《群学肄言》、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甄克思《社会通诠》、恩格斯《马尔克》、马尔萨斯《人口论》、Robert Flint《历史哲学概论》、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等都作过仔细的阅读和研究。正如严耕望先生所

说，“吕思勉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的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事实上，非但不保守，而且还颇得风气之先。回顾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史学，受西方学术影响最大的，一是唯物史观，二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大约在二十年代前后，吕先生就接触了马克思的学说，在沈阳高等师范期间所写的《沈游通信》、《南归杂记》和所作的题为《士之阶级》的演讲，都用到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并把它视为思想“指针”。他的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等，都明显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吕著中国通史》因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被禁印。不过，吕先生之服膺唯物史观，一是由于唯物史观与他素来信服、向往的社会大同理想相符合；二是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方法与他关注国计民生、着眼社会下层的考察视角相一致。正是这种学术思想上的自然契合，其著述中各种理论的运用，绝少生搬硬套和感情用事，平心静气，[20]与同时代的一些史学家截然不同。

⑱ 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刊于《蒿庐问学记》。

⑲ 虞云国：《论吕思勉的新史学》，刊于《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2月。

⑳ 王家范：《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之先生史识感言》，刊于《东方文化》1998年5月。

三、任教光华　潜心著述

1925年，吕先生在沪江大学执教，沪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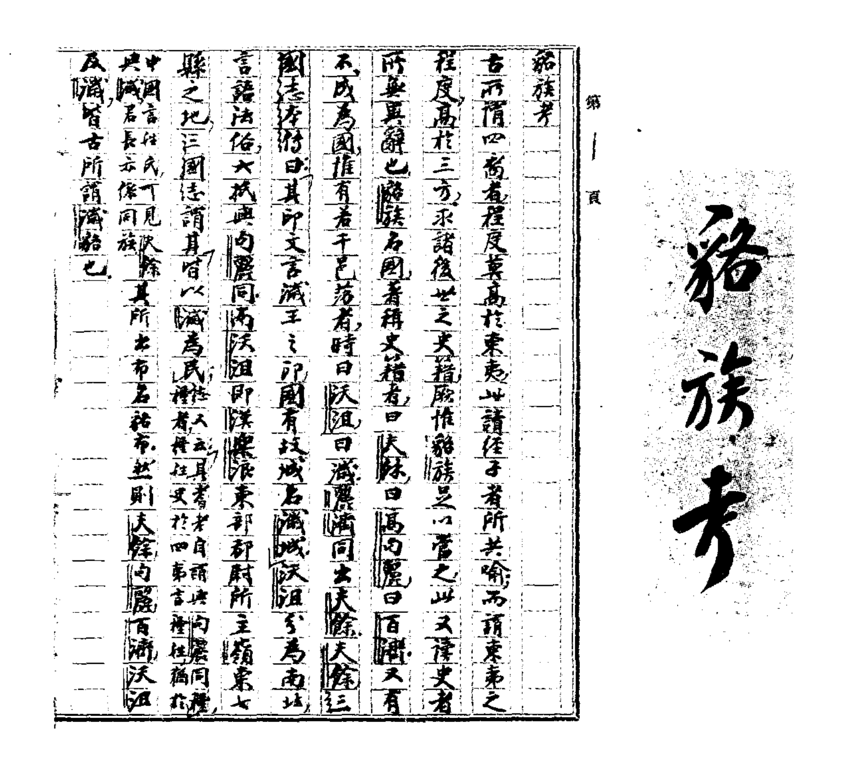
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风远胜于从前的东吴大学，但在教会学校中，吕先生“总觉气味不甚相投”。当时，上海光华大学新建，常州府中学堂的同事童伯章，时任光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再三请吕先生去光华大学任教。1926 年 9 月，吕先生进入光华大学，从此他与光华终身厮守，直到 1951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为止。

光华大学初创之时，没有历史系，吕先生即在国文系任教，所教的也多是历史学的课程。不久学校设立历史系，吕先生任系主任，主持系里的教学工作。他拟定了一份历史系课程计划书，计划书的第一段阐述了课程设置的宗旨：“吾国史学夙称发达，惟现今学问观点不同，一切旧籍均应用新方法整理，而非略知旧时史学门径，则整理之工作，亦无才从施。至于通知外国史事大概，明了现今世变之所由来，进而精研西籍，更求深造，亦今日学者所应有事也。本系之设，虽未敢侈语高深，要求先立平实之基，为进求高深之渐，求精确而勿流于琐碎，务创获而勿涉于奇邪，凡我同学宜共勉焉。”计划书详细地列出了通史、文化史、断代史、国别史、专史、史学理论与方法、史籍研究等七类课程。规定其中的中国通史、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中国近世史、中国现代史、历史研究法为本系必修科目，其余科目，临时酌开。在光华大学，吕先生先后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文字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孔子大同释义、《史通》选读、《文史通义》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等。

自 1926 年吕先生任教光华大学到 1937 年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是吕先生一家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也是他学术著述的大丰收时期。这期间，他完成的著作有《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说文解字文考》、《宋代文学》、《经子解题》、《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

《中国婚姻制度小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等十余本，涉及的范围有文字学、文学史、民族史、思想史、社会史等。

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有《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和《说文解字文考》四本专著。《中国文字变迁考》论述了中国文字变迁之理，文字的创造，以及古文籀篆、隶书、正书、行草等字体的发生和演变的经过，并提出了很多看法。《字例略说》侧重于"条例"的分析。吕先生认为，旧书"论六书之说，为汉代研究文字之学者所创。字例实当别立。六书中惟象形为文，指事为字"。作者自谓"及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论文字之增减变迁，自问亦足观览"。《说文解字文考》考释《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文字，通过对文字"象形之迹"的考索，阐述文字的源流。《章句论》论述的是古书的句法符号和篇章编次。作者认为，通常所说古人的所谓"章句"即类似后世的传注，这实际上还不是"章句"一词的本意，"章句二字之本义，盖即今之画段点句。引而申之，则凡今所谓符号者，亦皆谓之章句，盖以偏名为全名"。只是中国旧有的符号，多经钞写、印刷时逐渐遗失，结果使古书意义隐晦不明。《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和《章句论》，分别于 1926、1927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入《国学小丛书》出版单行本。书出版后，吕先生曾对《中国文字变迁考》和《字例略说》作过较大的修订增补。对于古书的句法符号和篇章编次的研究，吕先生颇为自信，他说"前人虽略引端倪，从未畅论。拙作出版后，亦未见有续论者；至少值得一览也"。[21]晚年，他又着手《章句论》的修订增补，已搜集摘录了一大包材料，其中有他历年收集的文字学及斯大林论语言文字的理论材料，可惜未能完成。《说文解字文考》因印刷上的困难，一直未能刊印。1983 年夏，女儿吕翼仁化了数月时间，以毛笔将父亲的遗稿全文抄写誊清，影印出



吕思勉手迹

版。1985 年 6 月，以上四种文字学专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汇编成《文字学四种》新版印行。

吕先生早年对中国古典文学极为爱好，且擅长作文，二十岁时参加乡试，连续三场考试，代朋友作文十四篇。他曾说：“予于文学，天分颇佳。生平并无师承，皆读书而自之。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诗少好宋诗，中年后也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予于文学，未尝用功，然嗜好颇笃。”㉒三十年代，他的《宋代文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宋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独特地位，各种文体都

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名家辈出，精品甚多。吕先生从古文、骈文、诗、词曲、小说五个方面论述宋代文学的总貌，除了说明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外，还对宋代一些名家的生平作了介绍评述，每一位还附有一两篇名作。该书篇幅不多，文字简练，但对一代文学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㉓他对中国文学史有很深的研究，即使是一些非常专门的研究领域，也能发现一些他人不易体会到的现象，如《两晋南北朝史》的文学一节，讲六朝文学的特色是"贵自然"。文史学家章培恒先生受这一看法启发并加以阐发，写了《试论六朝文学的主流》一文，称"吕先生对于六朝文学有很深刻的认识。……在几十年前就指出六朝文学所追求的是华美与自然的结合，实在不能不使人深为钦佩。"㉔

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吕先生是较早注意到西方社会学的价值、并提倡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他曾说："近代的西人，足迹所至既广，他们又能尊重科学，为好奇心所驱迫，对于各种蛮族的风尚，都能尽量加以研究，这个对于史学的裨益，实非浅鲜。""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

㉑《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㉒《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㉓ 吕思勉：《论学集林》出版说明。

㉔ 章培恒：《试论六朝文学的主流》，刊于《蒿庐问学记》。

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为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所以，“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他认为，现代史学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事实不重要，而是任何事实都只有放在一定的环境状况中才有意义，我们才能对它有确实的了解。而要求状况，则必须“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和事是山崩，不知风化，绝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25]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吕先生的史学著作特别关注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早期的研究成果是完成于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初时定名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修订后改题为《中国社会史》），全书设有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十八个专题，自古至今作了系统而概括的论述。书中“宗族”一节追溯家族制度的根源及其变迁，论及宗族、姓氏、谱牒的源流，继嗣之法、大小宗法、异姓为后、财产之制，妇女的地位等。“婚姻”一节除了叙述婚姻的起源流变以外，主要论述了古代同姓不婚之制，婚年迟早的变迁，婚姻的结合、离异、婚令、婚仪、夫妇关系、蓄妾起源、嫡庶之分等内容。“阶级”一节专论我国的阶级起源、种类及其变迁，作者认为我国古代之最早的阶级分野是国人、野人，国人为征服之族，野人为所征服之族，国内的人民，则因职业的不同，分为士、农、工、商。其后，社会组织日益复杂，等级愈趋繁复，

又有君子、贵族、平民、奴婢、豪族、游侠、门阀士族等不同的阶级区别。这部六十余万字著作是吕先生早年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及其演变的主要著述。其中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五篇,于1929年,由上海中山书局以单行本出版。1936年4月,上海龙虎书局将五种制度小史增订为合订本再版,改称为《史学丛书》。1985年,《中国社会史》改名为《中国制度史》,收入了除《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外的四本小史及其他未刊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中国阶级制度小史》则于1997年收入《吕思勉遗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吕先生还出版了两部思想史的专著《理学纲要》和《先秦学术概论》,这两部书原先都是二十年代在沪江大学的授课讲义,三十年代初,经过修订改写,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初版发行。《理学纲要》叙述理学的源流派别和诸多理学大家的思想学说,以便于初学者把握宋明理学的大概。《先秦学术概论》全面分析先秦学派的源流,除道、儒、法、名、墨、阴阳等六家以外,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数术、方技、小说家、杂家。着重分析各派源流、学术思

㉕《社会学是史学的根基》、《史学四种》。

想、重要著作及其真伪。其中颇有真知灼见。如许多学者都认为现存的《尉缭子》和《六韬》为伪书，不敢引用，吕先生却认为两书"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现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书的残简，足证其论断的准确。[26]作者对这两部著作，都有自己的评判，他认为：近人论理学之作，语多隔膜，此书（《理学纲要》）自谓能得其真。惟只及哲学，未及理学之政治社会方面为阙点。近来论先秦学术者，多侧重哲学方面，此书（《先秦学术概论》）独注重社会政治方面，此点可取。[27]

与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家相比，吕先生的传统国学基础极为厚实，但他治史的宗旨和立场却没有受到这种知识背景的束缚，而富有批判精神。他认为：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读了历史，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才会有革命的思想。[28]正是本着这样的观念，他对传统历史总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和立场。1935 年，吕先生在光华大学作了数次《中国政治思想史》演讲，其中有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评，他说：对于先秦诸子，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大家都是抱好感的，都是称颂的多，批评的少；就是批评的，也往往没有真能发见其短处。其实，先秦诸子的学说如真行于世，只怕会弄得更糟，因为这些思想都是行不通的。他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大都只是一些实际政务的意见。由于没有比较，或者是周边民族的文明程度较低，前人不屑加以比较。结果，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产生疑问，有的只是实际政务的意见。[29]

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吕先生还完成了两部民族史的著作，《中国民族史》于 1934 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作者自评"此书考古处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全，论汉族一篇，后来见解已改变"。[30]《中国民族演进史》是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基本知识丛书之一，1935 年初版发行。此书为中等学生所写，内容上除侧重于民族史上的基本知识，多

指示读书的方法外，还阐述了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是当时很受青年学生欢迎的一本民族史方面的通俗读物。

史学与史籍方面的著述有《经子解题》和《史通评》。《经子解题》专门论述经学、子部要籍的著述，该书平实通达而又精义迭出。如认为诸子的年代只可断其大略，不可凿求其确；认为"诸子可分家而不可分人"等，都显示了作者经学方面的深厚功力。该书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史通评》是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用现代史学观点来对《史通》各篇加以评议、推论，并附有考据辨证。虽是论述刘知几的史学观，但也包含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心得，如对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评价褒贬、古代史书编撰体例的比较、官修私修的利弊分析、古代史学发展的大势，史书编撰中的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补注、序传等问题，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吕先生对《史通》的评价甚高，很想写一部《史通评校》，因一直未能得到诸种善本校勘而作罢，就客观方面的条件而言，吕先生的治学条件是相当简陋的。

㉖ 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刊于《蒿庐问学记》。

㉗《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㉘《历史研究法》。

㉙《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下）。

㉚《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四、书生报国　一片冰心

1937 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将吕先生家的安定生活完全破坏。

光华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因经费拮据,有时连支付教师的薪水都发生困难。起初是年年拖欠,后来干脆每年只发九个月的教薪。吕先生原来的教薪是二百四十元,女儿在校任助教,月薪是六十元。自 1937 年起,国难期间薪水按对折支付,父女俩每月薪水加在一起只有一百五十元。当时的上海,正是米珠薪桂物价飞腾,家里的日常开销由勉强敷衍一下子陷入到穷于应付。

更糟糕的是生活上的不安定。光华大学自创办起就多灾多难,初时校舍尚未建成,租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834 – 836 号为校舍,大西路的校舍建成(今中山西路中国纺织大学所在地)后,学生才迁入上课。然而,仅仅安顿几年,一・二八事变后,学校又只得借用愚园路岐山村为临时校舍,到 1933 年夏季战事停止,再迁回原址。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校舍处于战火地带,学生上课颇不安全,大学部再迁至爱文义路卡德路(今北京西路)的国光中学,后又借白克路(今凤阳路)660 号为校舍。1937 年 11 月,光华大学校舍全部被日军炮火焚毁。就这样,吕先生的家也随着校舍的不断迁移而一再搬迁,仅 1937 至 1942 年的五年间,吕家就搬过三次。虽几次迁居,一家三口始终挤在一个房间里,一大一小两张板床,一大一小两张书桌,一张小方桌,两架白木书架,几只凳子,这就是吕先生一家的全部家具。

生活是愈来愈艰苦,但精神上却始终是昂扬高涨。吕先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女儿吕翼仁说他是“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的人”。生活稍有安顿,他便开始了史学研究工作。到三十年代末,吕先生的

第二部通史著作《吕著中国通史》已经完成，这是一部专供大学文科学生学习阅读的通史著作。当时流行的各种通史著作，因缺乏系统和连贯，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历史知识。而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文科的学生，正需要增加各方面有系统有条理的历史知识，以适应进一步的钻研的需要。为此，他编写的这部中国通史，不采用一般的通史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十八个门类，系统地叙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历史演变，下册按历史顺序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这样的安排，既注重社会文化现象，不至于遗漏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也避免了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教学相重复的毛病。

作者编写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中国历代的社会改革思潮有两种，一种是儒家的主张，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达到“大同”，进入“太平世”，其具体的措施是恢复井田，平均地权；另一种是法家的主张，采取节制资本，盐铁官营，控制民间商业借贷的办法。但这两种主张都没有能够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历史的经验向我们启示：中国今日的社会改革，应着重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社会经济的改革尤以农业为首要，农业生产虽然已由粗耕型进入到精耕型，但土地私有和小农制的存在，阻碍了我国农业的进步，唯一的出路是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上，他认为应该发扬我国古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深入人心，相信自古以来的“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必将待时势的来到而见之于行动，并用“大器晚成”这句成语来预祝中国的光明前途。

《吕著中国通史》的上册于 1940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下册于 1944 年初版发行。吕先生自评“此书下册仅资料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



吕思勉与女儿吕翼仁

了，余尚足供参考”。[31]1992 年 8 月，《吕著中国通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发行。

中年以后，吕先生便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写作计划，总结自己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以个人的精力，撰写六部断代史，即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这一写作计划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在 1941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与同类著作相比，《先秦史》在选择重点和分析问题上慧眼卓识，很有特色，显示了作者敏锐的综合和解剖的能力。该书的前半部分，叙述政治史方面的内容，以重要的政治事件为主线，来贯穿先秦政治的发展演变。后半部分叙述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着重分析社会组织、农工商业、衣食住行、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现象，追溯它起源和流变，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对于这部著作，吕先生自己的评价是：此书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民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32]

七·七事变以后，原先由顾颉刚先生在北京主持的《古史辨》编撰和出版工作发生了困难，印好的《古史辨》第六册只能送到上海发行。于是，《古史辨》的第七册的编撰及出版事宜也就转移至上海，由吕先生与童书业先生编著。《古史辨》第七册，是这一套书中分量最大的一册，全书约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本，其中三分之一的校样是吕先生一个人独力校阅的，三分之二的校样也是他参与校阅。顾先生对这一

册书的评价甚高，他说：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33]当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刊物《齐鲁学报》也在上海编辑出版，吕先生受顾先生的委托负责主编。《齐鲁学报》在上海共出了二期，吕先生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论文，如《汉人訾产杂论》、《秦汉移民论》、《道教起源杂考》等都送入该刊物上发表，是当时“孤岛”上唯一有质量的文史研究刊物，后来因日军侵入上海租界而停刊。

租界成为孤岛之后，光华大学仍在租界内借校舍继续上课，为了生活，吕先生还在沪江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课。这时，他除了去学校上课外，“不但足迹未出从前所谓租界，亦且未过苏州河一步”。孤岛时期，是吕先生一生中生活最为艰苦的时期，也是他写作和教学最为勤奋、忙碌的时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间情况，极为沈闷，物价飞腾，生活殊为不易，……弟偷息此间，只觉苟安可愧耳。平心论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如弟者即到后方，亦无裨益。尚不如致力于素来所致力之事，于社会或有小补。”抱着书生报国之志，吕先生写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和论文，他非常留意时局，关心着

㉛《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㉜《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㉝ 顾颉刚：《我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总序)第一册。

祖国的命运，用笔名写了一系列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日寇在沦陷区里的暴行文章。1940 年前后，学生范泉先生在上海租界内的一家抗日报纸编副刊，向吕先生组稿。那时正是战争年代，写抗日文章是相当危险的，汪伪的报刊曾以优厚的稿酬向他约稿，还通过他人来向他游说，他都以"忙于为开明书店订约写书"的话来搪塞。但范泉先生每次去约稿，吕先生总是一口答应，并说："即使没有稿费，我也写！"他用"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化名，写了许多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

常州沦陷时，吕家的房子（即故居西宅）在日寇轰炸常州火车站时震坏了，亲戚们都到乡下去避难。不久，避难的亲戚写信至上海，要吕先生赶快回去修理已经震坍的房屋。当时，常州城门口还有日本兵把守，行人进出，得向日本兵脱帽鞠躬，吕先生坚决不肯回去，他对家人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这样，吕家的房子由倒坍而完全败坏，木料等全被盗卖，家里的什物也被窃盗一空，但吕先生处之泰然。不久，一些不愿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教师，在常州乡下游击区筹办学校，吕先生的老同事张元白，得悉光华大学停办，邀请吕先生父女俩一起到青云中学任教。吕先生认为"乡间的学校，宗旨尚属纯正"。而这时常州守城门的日本兵已经撤走了。于是，他与家人商定回常州乡下教书。

1942 年，吕先生回到常州，分别在城外湖塘桥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任课。两处相距二十余里，来回奔波，势必难以胜任，于是，学校请人用竹轿接送，抬了几次，因为要价太高，且也找不到轿夫，吕先生主动提出改用独轮小车接送，为了照顾车夫，他只有一半的路程坐车，一半的路程自己步行。后来干脆住在辅华中学的宿舍里，宿舍很小，且四人合居，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大家轮流使用，每逢

四、五、六三个晚上，吕先生因没有桌子而不能伏案研学，又怕影响他人学习，只能在外“闲荡”。[34]

生活虽然艰难，办学的条件也很差，但吕先生讲课仍十分认真。1942至1943年，他在青云中学、辅华中学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等课程，每周任课十余个课时。吕先生是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结合得很好的典范，他不少学术著作的初稿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加强研究，修改讲稿，使之逐渐成为高质量的著作。同时，他又把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反馈到教学中去，深入浅出，逐渐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所以，即使是战争年代的乡间学校，他的历史、国文课的教学仍然是高水平、高质量的。黄永年先生珍藏了一本当年听吕先生讲国文课的笔记，现已整理成《〈古文观止〉评讲录》一文刊出，从中可见当年高二学生国文教学的水平和吕先生国文课的精彩之处。除了上课之外，吕先生还安排时间与学生随意谈话，定期举行学术演讲，精心殚力培养学生，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35]

吕先生的第二部断代史《秦汉史》，在孤

㉞《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㉟ 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刊于《蒿庐问学记》。吕思勉《〈古文观止〉评讲录》，刊于《论学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岛时期已经完成，因战争年代，此书直到 1947 年才出版。回常州之后，吕先生又开始着手第三部断代史《两晋南北朝史》的撰写，这一部断代史，是吕先生四部断代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全书 110 万字），也是他写得最艰苦的一部。起初，在湖塘桥青云中学教书，住在学校附近的顾姓居民家里，课余时，便在顾家写书。开明书店为支持吕先生的写作计划，每月预支千元的稿酬，等全书完成后再行结算。这在当时，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也使吕先生的写作计划得以完成。他为了要按期交稿，每天规定定稿两千字。《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每天定稿两千字是极不容易的。1943 年，他辞去教职后，隐姓埋名在家里专心著述。学生谢叔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年暑假，一天午后我到翼仁师家西宅菜地里玩，见菜地旁有二间简陋的小屋，老先生正赤着膊，带着太阳罩，伏案著书，当时我看了深为感动：如此酷暑，没有电扇，仅有芭蕉扇一把取凉。老先生这种艰苦治学的毅力和精神，确如他自己的诗句'行吾心所安，屋漏庶无愧'。他当时正在著述《两晋南北朝史》。"[36]

就史书的编制体例而言，吕先生一向认为通史体例远比旧式的史钞为优。二十年代初，他写《白话本国史》，就采用通史的体例。然而，中年以及晚年所写的这几部规模巨大的断代史，何以不采用通史体例呢？这为一些学者所不理解，认为它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者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则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37]其实，吕先生之所以采取这种体例，是经过一番比较考虑的，他认为："……当时运用这种通史体例写作大部头断代史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还需要作一番努力才可能用这种体例写出令人满意的大部头著作。……必须拥有详确的史料，对各方面的历史发

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才有可能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真正贯通起来。由于前人对各个时期各方面的史料没有作过细密的整理和考核，我们今天要在短时期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是困难的，要加以融会贯通就更难办到。”[38]因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而不能采取更理想的通史体例，这也体现了他治学上实事求是的精神。

严耕望先生对吕先生的这几部断代史著作很推崇，他说：吕先生的这几部断代史，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几十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查核。……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中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立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实在令人惊服。[39]

1940年初，吕先生还写过一本历史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当时，杨宽先生正在江苏北部游击区做宣传抗日工作，为发展游击

㊱《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㊲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㊳ 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

㊴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区的文化事业，创办了江苏文化社，邀请吕先生为文化社写通俗读物。《三国史话》作为文化社丛书之一，1943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40]书中着重叙述了“赤壁之战的真相”、“替魏延辨诬”、“替魏武帝辨诬”等内容。《三国史话》和《三国史话之余》后均收入《论学集林》，于 1987 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后，由范泉先生建议，吕先生写了《历史研究法》一书，交永祥印书馆刊印出版。这是一本系统论述历史学及其研究方法的专著，是他在史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经验总结。1981 年，《历史研究法》收入吕思勉《史学四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淡于名利　尽粹史学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吕先生偕女儿回到上海。光华大学复校后，起先仍在汉口路的证券大楼上课，光华校舍已在战争中夷为平地，作为战时损失的补偿，教育部将虹口区欧阳路上日人在战时设立的两所日本学校拨充为光华大学部暨附属中学的校舍。于是，吕先生一家也迁往欧阳路的学校宿舍。

在现代史学史上，一生淡于名利，吕先生恐怕是最突出的一个。吕先生把名利视为学者的大忌，他曾撰文呼吁有志于学术者：“绝去名利之念”，做一个真正的学者。而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和祥瑞。[41]严耕望先生生前未有与吕先生谋面的机会，但他对吕先生的想象却相当真切，他说：“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华，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

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㊷

摒弃了名利之念，省去各种不必要的无聊应酬，从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史学研究与写作上。自少时起，吕先生就学写读史札记，成年后更订立了严格的工作计划，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等文献，将辑录的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一百多万字。1937 年，部分札记汇成《燕石札记》出版。五十年代初，华师大校长孟宪承先生为编写《中国教育史》常有教育史方面的史料问题向吕先生请教。为协助《中国教育史》的编写，吕先生对这方面史料作过一番考订，写了许多札记，将其中的一部分及其他札记编成一册，取名为《燕石续札》。这时，吕先生又重阅自己的《先秦史》、《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将有独到之处摘录为札记，可惜这些摘录未能完篇，现仅剩名目三百余条。

1958 年 1 月，遗稿《燕石续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印行。1982 年 8 月，《吕思勉读史札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

㊵ 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3 年版。

㊶《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

㊷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吕思勉《先秦史》等断代史著作

书约九十万字，共五百二十六篇，是吕先生读书札记最丰富的结集。这些读史札记，有些是史实的考证，有些是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札记都曾一再补充修改。这种治学的方法，承继于前辈乾嘉学者的传统，但是乾嘉学者以考证为目的，而吕先生则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札记写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他在大量的史实的考证的基础上，进而探索"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变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那些有系统、有分量、有见解的论文、著作，就是在这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和撰写札记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大量的实事求是的考证，进而对历史进行融会贯通的分析，这使得他的著作扎实而精确，对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叙述，以及对历史的总体特征、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的把握上，都能发表出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严耕望先生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

前辈史学四大家。”又说他们四位的治学“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43]吕先生的史学特色是广博周赡,融会贯通。他曾说:“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44]学界名宿徐哲东先生称吕先生的治学特色是“识大而不遗细,泛览而会其通,务求是而不囿于成说,尚核实亦不涉于烦琐,此其为学之方也。达人情,明时变,故善言经世。洞幽赜,晰条理,故善籀旨例。平心气,审名理,故善于评论,此其为学之绩也。于群经小学,诸史百家,靡不究贯,亦取异域之说相检度,此其为学之区域也。执德契于道,立行依于儒,而言治则尚法,此其为学之要归也。吾观其所著书,闳雅似顾亭林,渊博似钱晓征,论证似戴东原,辩达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吕思勉复信说:“过蒙奖借,虽非弟所克当,而无一语非弟所蕲向……[45]

1951年,教育部决定以光华、大夏两大学为基础,成立华东师范大学。9月,光华大学召开最后一次校董事会,吕思勉作为光华大学校董之一任代校长,为学生毕业文凭签字盖印,处理完学校的结尾工作。10月,

[43]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序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44]《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45]《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光华并入华东师大，吕思勉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在华东师大的历史系，起先他教授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和历史文选，课虽不忙，“杂务校中亦不以相烦，惟学生国文程度太低，甚为难教耳”。1954 年，他计划以“中国史籍读法”为题给毕业班作几次讲演，但开学不久，他即患病。在家养病时，他将“所拟讲演之语，病闲后曾写出崖略，仅就涉想所及，既未能精密构思，亦未能详细参考，所说极为浅近，似无一顾之价值。但为初学计，作者虽诒浅陋之讥，读者或有亲切之感”。[46]《中国史籍读法》是吕先生最后的一篇讲稿，也是他在课堂讲授的最后一门课，这时，他已七十一岁，自他 1905 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学堂，至今已整整五十年。

四十年代末，吕先生便着手《隋唐五代史》的写作。《隋唐五代史》的体例与前三部断代史一致，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史，叙述了隋代的兴亡，唐代的兴起、繁荣以及安史之乱以后的衰败。下册是“典章经制”的叙述，门类上与前三部断代史基本相同，又根据隋唐历史的特点，对有些专题作了更详细的分析，如“选举”分上下两节，上节讲科举之制，下节专讲选官之制。“赋税”也分上下两节，上节叙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演变及其利弊，又涉及役法、差法等；下节叙述山泽、盐铁、酒禁、茶税、市税及其他苛税。又专设隋唐五代宗教一章，分三节，诸教情状一节述隋唐五代时的佛教、道教、火祆、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传播发展的情况；限制宗教政令一节述宗教兴盛后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政府沙汰限制之政；杂迷信一节述当时流行的禄命之说、龟卜之说、望气之说、相术、巫术、图谶等。到 1953 年，《隋唐五代史》的著述完成，这是吕先生所写的最后一本断代史，也是他写得最慢，而且最终没能看到出版的一部书。

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的史料准备早

已进行，吕先生平时非常注意搜集史料，在阅读宋辽金元明诸史时，对其中有用的史料的页码作了摘录，这些史料页码的摘录都已分别好门类，如宋史页码摘录有宫室、器用、宗族、风俗、社会、封建政体、宗教、移民、户口、阶级、妇女、财政、伦理、实业、赋税、钱币、度量衡、交通、饮食、服饰、兵制、刑法、外交、选举、经籍、礼乐、史学、学术、美术、纪年、历法、地理等，每一门类之下，用特殊的符号列出史料的出处。有些零星史料则直接抄录下来，在纸角上标明它类别，以便日后归类。可惜的是他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只写到隋唐五代而止，遂成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

㊻《史学四种》。

吕先生晚年体衰多病，他自知已不能工作，便把在师大的住房还给了学校，回常州故居养病。1955 年年底，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将复兴西路 271 号二楼的一套寓所，配给吕先生一家居住，并于农历春节前迁入了新居。迁入新居后，吕先生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很想在有限的年月里，将未完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1956 年 5 月，他抱着病躯再回常州旧居，“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将待整理的札记、手稿，挑选出来，捆扎打包，交轮船公司托运至上海。7

月8日，吕先生返回上海，病情稍为稳定，他就开始了研究工作。

1957年的10月，《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出版社的编辑送来书稿属校。写好多年的书稿有望出版，吕先生异常兴奋，书稿也校得特别仔细，特别勤快，他顾不得自己的病躯，也顾不得休息，自10月4日到8日，一直抱病在校阅《隋唐五代史》，8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他自言此时病状与往日不同。9日清晨，请医生来会诊后，由救护车送至华东医院抢救，至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七十四岁。四年后，妻子虞菱病逝于沪寓，享年七十七岁，夫妇俩合葬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墓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1959年，遗著《隋唐五代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一百余万字，未刊总论，部分章节略作了删改。五十年代末，顾颉刚先生倡议整理吕先生遗稿，请杨宽先生负责遗稿的整理工作。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发起，约请杨宽、唐长孺、汤志钧、李永圻、吕翼仁、陈向平、胡道静、杨友仁等先生组成吕思勉遗著整理小组，但整理费用由家属负担。至1963年，已整理好《文字学四种》、《史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书稿，因“文革”的影响，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1992年，李永圻先生编成的《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由上海书店出版，该书主要依据吕先生的日记、书信、随笔、诗词、文章以及其他各种传记资料，是介绍吕先生生平、学术、思想、道德等方面的一本重要著述。近年来，已整理出版的吕先生的史学论著，有《吕著中国近代史》和《吕思勉遗文集》，前者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五种，除《日俄战争》曾于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外，其余均是未刊稿。后者约一百余万字，分上下两册，包括《蒿庐论学丛稿》、《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中国文化史六讲》、《大同释义》、《中国阶级制度小史》、《本国史

答问》、《蒿庐札记》、《蒿庐诗稿》、《蒿庐文稿》等，收录了散见于二十世纪初至五十年代各种报刊杂志上的重要论文及许多未刊稿。两书均在 1997 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斯人已逝，著述永存。谨录钱宾四先生的一段文字，为本文的结语：

……一批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志士，肯为国家民族作百年久远的深思，作真知灼见的独行。不追随虚誉，不憧憬实利，牺牲着小己可有之名位，而真为国家民族作创新文化的一块奠基石。[47]

[47]《钱宾四先生全集》(丙编 44)第 376 页。

吕思勉主要论著

《白话本国史》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90年编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影印出版。

《吕著中国通史》

上册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44年开明书店出版。1992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重印。

《吕著中国近代史》

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

《中国制度史》

1985年5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二版重印。

《吕思勉遗文集》(上、下册)

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上册收《蒿庐丛稿》,下册收《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中国文化史六讲》、《大同释义》、《中国阶级制度小史》、《本国史答问》、《蒿庐札记》等。

《史学四种》

1981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1945年永祥印书馆出版的《历史研究法》、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通评》及《中国史籍读法》、《文史通义评》的未刊稿。

《先秦学术概论》

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6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又收入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民国丛书》第四编。

《经子解题》

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1991年编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学者讲坛丛

书》新版发行,1995 年 3 月编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新版重印。

《理学纲要》

193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1988 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又收入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二编,1996 年 3 月北京东方出版社新版重印。

《中国民族史》

1934 年 4 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7 年 1 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1996 年 3 月北京东方出版社新版重印,又收入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一编。

《中国民族演进史》

1935 年 12 月上海亚细亚书局初版。

《文字学四种》

1985 年 6 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收 192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文字变迁考》的修订本、192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章句论》的修订本和 192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字例略说》的修订本,以及《说文解字文考》的未刊稿。《中国文字变迁考》又收入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一编。

《先秦史》

1947 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 年 2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秦汉史》

1947 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 年 2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两晋南北朝史》

1948 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 年 8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隋唐五代史》

1959 年 9 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84 年 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增加

未刊的总论。

《论学集林》

1987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收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经子解题》、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宋代文学》、1943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的《三国史话》以及未刊稿《史籍与史学》、《蒿庐论学丛稿》、《三国史话之余》、《蒿庐札记》等。

《吕思勉读史札记》

1982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燕石札记》、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燕石续札》以及未刊札记四百余篇。

《国耻小史》

1917年2月中华书局初版，收入《通俗教育读物》，1925年6月第十二版，1936年12月第二十四版，1941年续印。

《中国地理大势》

1917年中华书局初版，收入《通俗教育丛书》，1928年第七版。

《关岳合传》

1916年中华书局初版，收入《学生丛书》，1929年4月第十版。

《苏秦张仪》

1915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又收入《学生丛书》，1924年4月第六版，1928年10月第九版。

《吕思勉说"史"》

1999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不屈的史魂

——李平心传

胡逢祥

在中国当代史家中，李平心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人物。作为学者，他不仅精通历史学，还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可说是社会科学领域难得的“全才”，这在同行中是十分少见的。作为一个爱国人士，他毕生追求光明，不屈不挠，民主革命时期，就以笔作剑，积极投身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事业，虽历尽危难，二度入狱，濒死者数，而志不稍挫。建国以后，其学术上探索真理的勇锐之气，依然一如当年。“文革”初期，当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气焰熏灼、横施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之时，犹奋不顾身，与之展开公开的抗争，以致身遭迫害，含恨而死。观其一生文章志节，真足有令人感念不已者。

一、走唯物史观指引的学术道路

李平心，原名循钺，又名圣悦，笔名李鼎声、邵翰齐、万流、青之、倩



李平心先生

之等。1907 年 3 月 4 日生于江西南昌。早年在南昌市千家后巷私塾和模范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22 年考入南昌心远中学,一年后辍学在家自修。1925 年 2 月赴南京继续补习自修。不久,五卅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在这场反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力量,以及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残忍血腥行为,给年轻的平心以极大的思想震撼。后来,他曾多次在有关文章中谈到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五卅运动第一次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由通都大邑传遍穷乡僻壤,千百万民众由此卷入民族解放的巨潮中。那无数参加反帝的基本群众,同时也就是反封建的主力部队。五卅运动用空前的紧张程度与速度把千百万群众训练出来了,这件事对于民族革命运动该有何等重大的实践意义。"①这一深切的认识,显然也包含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

就在这年 8 月,平心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原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1922 年秋由东南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首任校长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这使它从一开始就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保持了密切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蒋光慈、恽代英、萧楚女及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先后到校讲演或任教,宣传社会进步学说,在国内爱国青年和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使之成为当时东南一带传播革命火种的"重镇"。特别是该校的社会学系,公开"对马克思学说作系统的讲授,并以讲学与行动相结合,在当时中国大学中更属创举,因此颇具号召力,

大学部学生中，社会学系竟占十分之六”。[2]平心进校之时，因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大学学生积极参与反帝斗争，遭到英帝国主义忌恨，原校舍被租界当局封占，不得已只能暂借闸北青云路师寿坊石库门民居上课，条件十分简陋。据云当时整个学校无校门、无大礼堂、无图书馆、无运动场，但却充满着一派革命朝气。学生可以自由订阅《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社会进化史》（蔡和森著）、《现代社会学》（李达著）、《科学社会主义》（熊得山著）等进步书刊。社会学系开设了社会科学、社会进化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讲授社会科学史、国际共运史、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并允许各种观点展开自由辩论。教学之余，学校还鼓励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如担任全国和上海市学联以及济难会等团体工作，举办平民或工人夜校，上街宣传革命，组织人员配合工人纠察队工作等。[3]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学生的阅历和社会活动能力。就在这种氛围下，平心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系统学习，并尝试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考察社会问题，写下了《现代妇女与现代家庭制度》等论文，对当时社会压迫妇女等种种不良制度作了

① 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年版，第441－442页。

② 周启新：《上海大学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81年第一辑（总第3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③ 参见薛尚实：《回忆上海大学》，《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8年第二辑（总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鞭挞，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要求改造社会的宏愿。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平心开始受到校内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教育，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月，平心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社会学和哲学教员，兼为浙江第六中学教员。并与曹亮一起编辑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同年2月，在当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平心也因在浙江遭到反动派通缉，随王观澜至乡间避难。6月，他自临海潜归上海，先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从事宣传工作和工运，旋至泉漳中学任教员兼训导主任，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为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在党内公布了由立夫起草的《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要求各级组织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据此，平心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一文，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策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方案等意见。他认为，"近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虽然还保持着它主要的历史的特点"，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渐遭破坏，"使农村的经济组织和土地关系成为畸形的状态，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的压迫只有一天一天的加紧，农民所受的经济痛苦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农业资本的集中、利贷资本的发达，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土地问题已经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它，当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改变关系"。而为了破坏旧土地制度和建设新制度，"中国共产党应当去领导农人、工人实行民众式的暴动"。中国的农民应以贫农、小农为中心，同时推动破产的中农加入革命，以"结成一条强固的阶级战线，破坏地主豪绅的暴力机

关，歼灭一切的反动势力”。[4]该文虽因受到《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影响，在某些具体政策的掌握上存在着一些“左”的倾向，但却反映出他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已对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和主要特点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在此期间，他还拿起文艺创作的武器，和反动派展开了斗争，呼吁“今后的文艺作者打起精神来描写一般被压迫的人类”，写出“有生命力带有创作性”的作品。[5]并于1928年2月加入了由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发起成立的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创作发表了以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巴里亚的胜利》（1928.3），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作了热情的描写。

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平心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半年后，始经保释回南昌乡下。次年1月，赴福建泉州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不久，因遭当地反动势力逼迫，离泉州至厦门鼓浪屿暂住。6月，返归上海。旋复移居苏州，在苏州中学、东吴大学等校代课。直到1930年5月才重回上海。这以后，他先在中共上海市法兰区区委书记李克农手下担任宣传工作，继至党中央

④ 该文原载1928年1－3月《布尔什维克》第15、16、18、19期，署名星月。此引自《平心文集》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100－101页。

⑤ 李圣悦：《〈惨雾〉的描写方法及其作风》（1927.6），《平心文集》卷一第79、71页。

领导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担任秘书，参与起草文件、翻译及联络等工作。1931 年 1 月 17 日，“苏准会”负责人林育南等七人在上海三马路 222 号(现汉口路 666 号)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问题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公共租界探捕与国民党市警察局联合组成的行动队逮捕。以后二天，又有三十来人相继被便衣特务拘捕，“苏准会”遭到严重破坏。2 月 7 日，林育南等二十四人在上海龙华被害。平心本人虽因闻讯后及时躲避而幸免于难，但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难能的是，在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变后，平心并没有胆怯地从人生舞台上退缩，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沉与颓废，而是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片挚情与坚强毅力，刻苦自励，继续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和各项社会进步事业。应当指出，在大革命失败至此的三、四年中，尽管他一直居无定所，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却始终没有放松对学术事业的追求。期间，他曾利用各种工作的间隙，翻译出版了《政治思想史大纲》、《社会主义词典》(均为 1930 年启智书局版)等进步书籍。1929 年 6 月自厦门回上海后，又与上海光华书局订约，独力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此译本后虽因故未能出版，但经此过程，却使他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领会，从而为其日后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0 年 6 月，平心出版了他个人撰写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他多年从事社会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总结。书中，他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经典著作的观点，对社会学

的性质、研究对象与方法，以及人类社会的特征、结构、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和阶级、国家、家族等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以唯物史观建设现代社会学的学术取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它的科学体系。他强调，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社会学应"从物质的活动现象中找出支配人心和一切社会生活的史的法则，换言之，是要从社会的流动进程中寻求说明物质现象和一切社会生活形态的关系的因果律"。在理论上，它既反对"观念论"，"同时也反对那把物质现象和历史事态看作固定的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定命论"。其研究方法，不仅是归纳、演绎等一般逻辑方法（技术的方法），更强调现实的方法（原则的方法），具体来说，也就是历史辩证法。因为它所考察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发生的劳动关系（广义的）和反映这互动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6]包括各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原因，人与人、物与物和人与物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运动的轨迹和趋势等基本问题，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些具体而零碎的婚姻、家庭、互助问题上。以后，他又撰文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指导下之社会学与其他社

⑥ 李圣悦：《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四版，第21－22、23－24页。

会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后者"不能具体地理解在人类社会底发展过程中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结构，更不能理解各种社会形态都有它们底特殊的发展规律，于是把一切的社会都当作抽象的无差别的生活关系处理。"其结果，势必导致"承认现存的社会是始终不变的"，甚至成为一种反对社会变革的理论。而唯物史观则始终认定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或社会形态都有其具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如此才能对于社会各时期的变动本质有深切的认识。其次，流俗的社会学往往只注意事物外在的因果关系，"把各种互相作用的要素——社会的、自然的和心理的诸要素——依据机械的相等的原则去考察，而并不深入到社会内部的统一关系，找求社会自己运动底内在根据"，这就大大阻碍了他们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深度。唯物史观则要求从全部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相互关联中去发现社会构造的内在法则，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揭示物质基础对人类社会变化进步的支配作用。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注重现实的科学，尤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起到自觉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使之真正成为"指示社会变革底历史轨辙和实践方法"。⑦

以后，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革命理性，促使平心从社会学的研究起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现实斗争需要，逐步把学术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东北地区，并逐步向关内进逼。面对空前加剧的民族危机，平心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潮。事变的当月，他就与友人王宣化等在上海创办《现实周刊》，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不久，又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活动，停职专事研究和写作，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世界知识》、《大众生活》、《大陆》等杂志上发表了

大量有关时事政治、文史哲学和青年修养的文章。并积极响应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撰写了《论联合战线》、《对于全民抗敌战线的研究》等文，从理论上深入剖析时局的演变，强调"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火急的问题，是怎样赶快实现全国救亡的总动员，怎样建立起一致抗敌的人民国防阵线"，[8]以便"集合全民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反抗民族最大的敌人——远东帝国主义和受它嗾使的汉奸势力"。这一民族联合战线应当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它不仅有社会下层民众的广泛基础，而且要团结一切包括上层社会在内的其他阶层中可能和愿意抗日的人们。其运作的目标，是把抗日放在整个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来加以了解和推进，直至彻底完成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9]他的这些文章，行文流畅，说理透彻，颇得时人好评，邹韬奋即称："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擅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理论或复杂的内容，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10]

1935年5月起，平心开始负责编辑《读书与出版》。该刊以引导读者正确选择和阅读健康书籍为基本宗旨，认为"只有当读书

⑦ 平心：《俗流的社会学批判》，《平心文集》卷一第68－69、65页。

⑧ 邵翰齐：《论联合战线》（1936.1），见同上第353页。

⑨ 平心：《对于全民抗敌战线的研究》（1936.11），见同上第355－375页。

⑩ 落霞：《社会科学研究法》，见1936年6月7日香港《生活日报》。

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衣淡饭，出版事业完全对老底子被称为文盲的人公开着，然后我们才有勇气说中国有了坚实的文化”。[11]在刊物上，他一再强调，图书的编著和出版固应注重大众化，但同时又不能落到低级庸俗的路上，通俗化决不等于卑俗化，形式上的通俗化应与内容上的严正化“天然地统一起来”，“我们不但需要人人读得懂的作品，而且也需要人人看了有益的作品，更需要小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品”。[12]而要使大众真正享受“科学的合时的文化之阳光”，图书出版界就必须“否决那毒害他们的奴隶文化与顺民文化”，[13]为他们接受科学的新知和进步思想创造有利的条件。

同年 11 月，生活书店出版了由他编辑的《全国总书目》，这是一部在现代中国目录学史上有着相当影响的书目工具书。书中收录 1912 －1935年间全国出版的书目约二万种，较全面地总结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书籍出版和流通信息。该书的“编例”颇具特色，在图书分类上，其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杜威十进制等分类法，建立了全新的分类体系，即按照现代学术自身系统的特点，将书籍分为总目、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社会科学（指内容兼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者）、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十大类。各大类下复分若干门类及子目、细目，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势和图书出版现状。所收书目，还按不同读者群的需要，标以记号，以便选择。如初级读物前加梅花 *，高级专门读物前加星花★，世界名著前加●，书中内容存在问题者前加▲等。而该书的整个编纂程序，也体现了相当的科学性。首先，所有收录的书目，都经过严格的核实，方法是向各地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研究学会、书局等进行调查并索取相关的出版书目；并规定，凡“滑头书店”刊行之黑幕书、诲淫书、低级趣味读物及宣传迷信之书概不收录；为了保证分类的精

确，对于那些内容不明的图书，平心总要千方百计地找来翻阅后才下结论。其次，对于翻译著作，除一部分已知的书目外，一般都要借助外国原版书目及各种书目提要（Bibliography）反复核对；遇原作者不明或有其他疑问者，则尽可能找到原书，加以核正。这就大大提高了其知识上的可靠性。在这项工作完成的时候，平心曾自谦地表示，这只是"在传播新文化的艰苦道途中，站在拉纤者的地位，献出一点微薄的助力"。并热切地希望全国文化界的正直人士起来反对"一切僵尸式的文化逆转运动"，多创作一些适合时代需要的良好读物和介绍国外有价值的名著，同时也希望读者提高鉴别能力，"用审慎的态度选择那值得一读的读物"，"赞助我们所当赞助的——进步的全新的文化"。[14]这就表明，他之关注出版事业乃至对于书目学的钻研，始终都是站在推进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高度上加以把握的。

在此期间，平心还把相当的精力投入了国际问题的研究。1934年，他在《世界的新生》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站在一个历史的大转弯点，同时临到了一个大灾难的前夜，因为世界是安放在装好了引线的炸药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洗地球怕是不远的事……拯

⑪ 李平心：《从文盲谈到所谓读书界》，原载1935年5月18日《读书与出版》创刊号，引自《平心文集》卷一第195页。

⑫ 李平心：《通俗化和卑俗化》（1935.8.16），《平心文集》卷一第206页。

⑬ 平心：《等不得——一个迫切的大众文化问题》，《平心文集》卷一第216页。

⑭ 平心：《一件小工作的结束——写在〈生活全国总书目〉的前面》，《平心文集》卷一第209、211页。

救世界、报复帝国主义残杀的唯一方法，是团聚大众的战斗力量，实行坚决的长期的抗争，由民族的自卫战发展成为消灭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由黑暗转向新生的“分娩的痛楚痉挛”中，“我们更需要对现代世界的特质有着正确的全盘的理解，不要为世界的外表装潢所迷惑，而应该将我们的眼力透入于世界机构的内层，这样才会增强我们替新世界接生的能力”。[15]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摆脱各种唯心论和多元论的偏见，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国际问题，因为“一切国际事件和国际问题底发生，都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这种物质基础，就断乎不能认清一切国际问题底真实原因和各种国际现象的真实规律”。与此同时，针对有人把庸俗经济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他还指出，决不能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分析问题时，“只要抬出一般的经济的必然性来说明就够了。我们虽然反对多元论因素论的见解，但决不否认国际的政治、文化、军事等分子能够在国际生活过程中表现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注意，“经济的法则并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中直接显示出来的，它有时简直隐藏得不易为人看见，倘使我们机械地引用经济关系直接决定国际政治的见解来说明国际问题，常常会陷在极大的错误中”。[16]至于人的意志作用，同样也不能忽视。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考察国际关系，他认为当时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对立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间，以及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等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相互交织和影响，且处于不断流变和相互转移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形势下，表现出不同的主次作用，必须辩证地加以看待。这些论述，对于帮助一般读者正确把握科学的治学方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以致他在这方面的论著如《社会科学研究法》(1936)出版不久，

就遭到了政府的重点查禁。[17]

平心对国际问题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苏联问题，代表作有《苏联论》、《苏联宪法的改革》等。目的在于向国内公众介绍苏联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建设情况，为中国革命及其今后的改造方向提供借鉴。二是德国问题，以《德国论》为代表。主要是对希特勒纳粹德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对内实行法西斯独裁和对外积极推行武力扩张政策的剖析。认为“德国纳粹统治者现在是陷在极大的矛盾痛苦中，为要解除国内危机，他们不得不疯狂地备战，而备战的结果又不断加深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德国黑暗政权恐怕很快就要在这种矛盾中下葬的”。[18]三是国际外交问题，重点是日苏关系和德苏关系，代表作有《苏联的外交和国际联盟》、《论日苏关系》、《中东路问题之纵断的考察》、《最近日苏关系》和《德苏邦交之一大裂痕》等。在这些论文中，他对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外交策略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指出，十月革命以后，尽管苏维埃政权一直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敌视、包围乃至武装干涉，但由于它坚持实行灵活的外交，争得了和平建设的时间，终于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三十年代中期，当东西两大战

⑮ 同上第220、218页。

⑯ 平心：《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论》(1936.4－5)，同上第289、290－291页。

⑰ 桂遵义、周朝民：《平心传略》，见《平心文集》卷一。

⑱ 邵翰齐：《德国论》，原载1936年1月1日《世界知识》卷三第8期，见同上第277页。

争策源地形成，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希望德、日把战火引向苏联之时，其在外交上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用缔结不侵犯条约、互助公约等方式来防止，至少是要延迟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紧紧抓住目前国际间的矛盾，分散资本主义营垒反苏维埃的联合阵容，至少使多数国家保持中立，以削减资本主义包围苏联的威胁”，[19]同时积极加强国防战备，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它之签署《法苏不侵犯条约》和伦敦多边不侵犯条约、在解决中东路问题上对日本的一再退让姿态，以及加入国际联盟等，都体现了这一战略特征。对于日本军国主义配合对外侵略扩张的外交策略，平心作了更为深入的揭露。他认为，日本自侵占我国东北后，已成为远东国际关系的聚焦点，一方面它必然要与苏联发生更为直接的冲突，同时也会因其独占中国的行为损及其他在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引起他们的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采取的策略是：看准社会主义苏联当时在国际上比较孤立且东西受敌的处境，不断向其发出外交或边境挑衅，这样，既得巩固和扩大其在“满”蒙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利益，又可“利用反苏的挑衅来转移其他帝国主义的目标，并猎取列强的谅解与同情，表示侵华不过是准备攻击苏联的阵地。这一点很可以拆散英美等列强对日的联合战线之缔结”。并强调，苏联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日本则是企图武力灭亡中国的元凶，“日本向苏联的进攻以及苏联对日本的回答都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命运，同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民众回答暴敌的民族抗斗又牵涉到苏联。因为这原故，我们对于日苏间的关系就不得不付与最大的关心”。[20]这些见解，应当说是相当有见地的。

1936年，平心参加了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等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并在其会刊《中国农村》上发表文章，探讨乡村救亡运动的方针和路线。是秋，出任上海《自修大学》双周刊主编。这是一

本面向社会大众和青年宣传抗日救亡与进步思想、传授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刊物。其第一期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于1937年1月，内设“一叶评论”、“时论专辑”、“两周漫谈”、“百科全书知识速修班”、“文学研究”、“知识往来”、“书刊介绍”、“问题解答”等专栏。刊物发行后，很快就因触犯国民党当局的“忌讳”而被列入了黑名单。为了避免被查封，当时有人曾劝平心亲自去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头面人物潘公展求情。对此，平心断然表示了拒绝，他拍着桌子说：“要封就封，我决不去见潘求情！”㉑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自修大学》停办。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平心与全国人民一起踏上了伟大而艰难的抗日和民主建国之路。

二、让史学的智慧之光烛照社会与人生的未来

1938年初，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平心长途跋涉，赶到已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的勷勤大学任教，讲授世界近代史。其秋，返回上海养病。病愈旋即恢复写作，投入到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时上海已沦入敌手，唯迫于国际形势，日寇尚不敢直接

⑲ 邵翰齐：《苏联的外交和国际联盟》，原载1934年9月16日《世界知识》卷一第1期，见同上第229页。

⑳ 邵翰齐：《最近的日苏关系》(1936.3)，见同上第264、262页。

㉑ 事见李平心档案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人员登记表》自述。

进占租界地区，这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敌伪沦陷区的一个特殊“孤岛”。然而就在这片小小的“孤岛”之上，各种进步力量、社会团体、爱国青年和民众仍然无畏无惧地奏起了一曲曲抗日救亡的时代强音。

在“孤岛”从事斗争的数年间，平心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始终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当时，上海邻近地区的一些学校如苏州东吴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常州中学等都因战乱而不断迁入“孤岛”，使这里的大中类型学校一时骤增至三百三十四所，学生人数多达三十三万余。针对这些情况，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为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和民众，培养积蓄抗日的骨干力量，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四补校”）的名义，举办了《现代知识讲座》，聘请陈望道、周谷城等进步学者担任教师。平心也应邀讲授哲学，倾心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在王任叔主持的《民族公论》、梅益主编的《求知文丛》以及《上海周报》、《学习半月刊》等刊物上撰文讨论时局，反复申论当前中国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阶级领导和支持的，它或者是在工农联盟的战线之下进行，或者是在工农、资产阶级、地主结成的统一战线之下进行，为要彻底坚持战争，工农必然成为中坚力量。这种战争在政治上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击破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建立完整的民族统一国家和民主政治制度。在国际的革命任务上，这种战争是要削弱整个的帝国主义体系，召唤国际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增强世界的反帝统一战线”。认为，日后抗战胜利在中国出现的“将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新式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22]以求从理论上帮助人们提高对抗战及其前途的认识。特别是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

事变”后，平心怀着极为愤慨的心情，接连发表了《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开辟我们的新言路》等文，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无可争辩的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破坏大局、坚持独裁和反对民主的卑劣行径。指出：此次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内亲日反共派蓄谋已久的，这些人本来就缺乏抗日到底的信心，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战中力量日益壮大和威信的不断提高会危及其独裁统治，于是“不能不布置和施展毒辣卑鄙的反共阴谋，不能不用尽力气分裂国共合作。然而，倘只有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事情还不十分严重。问题是在于亲英美派中的顽固分子也参加了反共的预谋与合唱。尽管他们在利害上和亲日派还有矛盾，但在反共一点上刚好被亲日派觑中了弱点，加以利用。他们钻进了亲日派安排好的恶毒圈套，客观上当然也就是中了日本以华制华的狡计”。然而，他们的阴谋一旦败露，立即就会遭到“愚民”的反对，历史已经证明，“凡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党派和军队，其向前迈进，是‘防’不了，也‘止’不住的”。[23]现在，尽管“亲日派与反动派是要把中国拖回黑暗的明季，但中国人民与中共却是要使中国进入灿烂的明天”，形

㉒ 倩之:《论两种战争》，原载1940年12月10日《求知文丛》九、十合辑，《平心文集》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130页。

㉓ 青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1941.4.10)，同上第290、272页。

势何去何从，相信“历史不久就会给予爽利的回答”！[24]

这一时期，平心在学术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近现代史所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事实上，平心对历史学的关注，自三十年代初即已开始。在1930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中，他就认定社会学与历史学同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立足点，前者旨在解释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普通形态、作用、关系、变迁，并探明其彼此依存的一般定律；后者则要通过各种具体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排比，说明一定时间与空间段的社会生活历程，故“就供给社会全部生活的演进的材料而言，历史学的研究是必需的；就确立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而言，社会学又是必要的”，[25]两者间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使他的历史研究实践，自始就表现出某种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形态学理论）与历史学自觉结合的学术特征。

与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和大学历史系普遍热衷于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讨论不同，平心的历史研究，一开始就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领域。1933年起，他先后在这方面发表了多部论著，系统阐述了对该时期中国历史演变及其总体趋势的认识。其中《中国近代史》出版于1933年，署名李鼎声，全书分十八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迄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是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作。《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1940年由香港国泰公司出版。全书分两编，序编四章，专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编八章，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论述自太平天国运动至抗战时期（1940年初）民主宪政运动的演进过程，内容涉及各时期的民主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文化运动、民众运动、民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以及制宪史与宪法评述等。《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初版于1941年8月，

署名青之。是一部讨论抗日及民主建国前途的时论与史论。书中《新中国的道路》一章,系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展开的理论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的论述,不仅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行为,驳斥了他们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说,还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包括国民党方面为"剪除异己"制定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当时海内外有关民主区和国统区的报道和评论等。该书出版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租界"沦陷,在日伪查禁反日书籍的重压下被迫毁版。[26]还有一部现代人物专论《论鲁迅思想》,其内容曾连载于1939－1940年《求知文丛》,1941年2月由心声阁出版单行本,再版时改名《人民文豪鲁迅》。这是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最精辟地研究鲁迅或作为思想家鲁迅的专著"。[27]全书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深入考察了鲁迅紧随时代革命潮流的奔涌,从一个进化论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确信"惟有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历程,认为"这位巨人的战斗不屈和前进不息的不朽精神,使他不断反映着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进步。他

㉔ 青之:《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1941.3.15),同上第270－271页。

㉕ 见《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第7页。

㉖ 此书另有1950年7月重刊本,副题改为《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书中删去了原有的少许篇目,另增入《论中国现代革命》一文作为新版代序,文字也有些技术上的更动。

㉗ 罗竹风:《一生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写在〈平心文集〉前头》,见《平心文集》卷一。另据桂遵义、周朝民《平心传略》,1956年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曾向人推荐此书,称之为"了解鲁迅、研究鲁迅的第一本著作"。



李平心早期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

的思想有流变，有增益，然而在其中却贯串着一根坚韧的赤线，这就是战斗的现实主义。”[28]

平心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倾其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战斗时代里，其中有苦痛的教训，有血渍的经验，有波涛万状的社会斗争，有头绪纷繁的历史矛盾。它们都在环绕着我们，要求我们找出它们的规律，而这无数的规律正是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所不可少的”。作为一个文化战士，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把真理从黑暗的重围中夺取过来，转变为大众的武装力量”的历史使命，并表示：“在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痛苦的交替过程中，我是愿意献出绵薄的力量，来传播历史的语言与真理的声音的。我不会唱歌，但只知道运用一点学来的历史解剖知识，来剖析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问题。”[29]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使平心的近现代史论著表现出以下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在史实的叙述上，特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宏观趋势。强调："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30]据此，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上，他一改当时不少人将界限划在明末清初的做法，较早提出了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观点，认为"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并吸取了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的成果，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做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此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并未把中国直接引向一般的资本主义形态，而"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31]中国近现代史的研

[28] 见《平心文集》卷二第440页。

[29] 平心：《论新中国·初版自序》，上海群众联合出版社1950年重刊本。

[30]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绪论》，光明书局1933年版第2页。

[31]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虽不始于李平心，如在他之前，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在《近代支那史》中，即从鸦片战争前后西力东渐和清朝衰落等历史现象着眼，主张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但就其对此期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认识而言，毕竟未达到如此深入准确的地步。

究，首先就应揭示这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中国和被压迫人民“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的历史过程。同样，在史料的取舍裁剪上，也当注重“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等”，“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我们在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32]

其次是注重史论结合。在他看来，理想的史著既非干枯史料的机械排比，也不应以社评式的史论为满足，而当“叙事与分析并重”，于“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33]同时，理论的分析也应切忌脱离史实的教条主义做法，指出：“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34]有鉴于此，他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因而不仅在当时显得观点新颖，有的还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肯定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地位，还对它的性质和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虽是农民战争中产生的政权形

式，且未形成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但从整个运动所触及的历史内容看，“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古旧的农民战争，开辟了反封建、反帝革命斗争的新路，因此可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至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乃在其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太弱，使参加这场反清起义的农民群众无法得到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市民集群或劳工集群的领导”，以致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与散漫性，“因此，太平天国在政策上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阶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的力量。在论及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特征时，他还提出：“中国现代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变政运动都脱离不了外来的影响。太平天国是采取基督教义作为革命旗帜，戊戌变法是模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制运动，辛亥革命是学习

㉜ 上引均见《中国近代史》第4－5页、“凡例”。

㉝ 同上“凡例”。

㉞ 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自序》，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年版。

法国革命创立民主共和，而五四运动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复杂，来得重大……一方面是世界革命运动，它带给中国以新的世界观与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明，它带给中国以物质科学与自由思想。五四运动汲取了这两种外来潮流，因此在内容上表现得非常斑驳。当然，不能认为五四运动完全是由于外来影响造成的，没有中国内在的物质力量与革命力量之发展，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启蒙运动。”㉟这些结论，都是极具说服力的。其余如对捻军起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论述，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三是富有现实感。他曾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㊱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㊲为此，他不但始终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周围最现实的历史事变，如五卅运动、大革命、十年内战等，即使是对刚发生不久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和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过程，也在当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就作了及时报道和论述。在四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以及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等作了清晰的叙述，其中有些论述还显得相当详细，这在当时战事倥偬、资料采集困难的情况下委实是很不容易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进国内的民主宪政运动，平心还对法律学进行了一番钻研，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与民主宪政》、《论民主宪政运动》、《由宪政运动回忆孙中山先生》、《宪政正反辨》、《民主宪政的基本问题》、

《〈五五宪法草案〉评议》等文，认真考察了中外宪政运动的历史，比较了各国宪法的有关条例，对实施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乃至保证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法条款，一一提出了详细意见和论证，并在《中国现代史初编》中作了具有法律专业水准的充分阐述。这些，对于帮助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而引导他们走向追求光明的进步道路，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同时，平心还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展开了辛勤的学术耕耘。1938 年，他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期间，就编成《近代世界史讲义》一部，回沪后，复据以修改成《各国革命史讲话》，由光明书局出版（1946 年再版时更名为《各国革命史》）。全书分九章论述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历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及尼德兰、英、美、法、德、俄、土耳其等国革命，附编部分对产业革命也作了相应介绍。其《自序》谓："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它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励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

㉟ 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第 145 - 146、155 - 156、282 - 283 页。

㊱ 同上"卷头例言"。

㊲ 平心:《论新中国·初版自序》。

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过去革命的必要。固然，我们要着重地研究中国的革命传统，但是外国革命历史同样也能给我们以许多珍贵的启示与教训。因此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革命，对于了解推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实有重大的帮助。"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书中"尽可能依据新的史观给每个革命以系统的讲解，特别注重历次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使读者对各国革命史获得相当明晰的记忆与理解"。[38]次年，他又完成了三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该书虽未正式出版，[39]但从后来陆续见诸刊物的《各国异教社会主义的源流》、《英国农民战争前后的异教社会思想》、《波希米亚(Bohemia，今捷克之一部分)的异教社会主义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异教社会主义》(以上几篇均刊于 1947 年 3 - 6 月《读书与出版》)、《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相关论文中，我们仍可窥见其大致的面貌。在这些文章中，平心系统考察了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中世纪后期农民战争中显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近代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既指出了其在人类社会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也分析了它对后世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宽广的知识背景。

诚然，因受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史著也不免存在一些自身的弱点，如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史事方面，不少地方尚显得比较原则化而削弱了个性；同时，战乱年代资料搜集的困难，也使其论述往往囿于政治、军事、文化范围，而未能对一般社会经济生活情况作出更为具体深入的描述。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平心的这些史学活动，已使他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这使原先在"孤

岛"的进步人士处境日益险恶。次年12月，平心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被日寇拘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以致留下了宿疾头昏病。后经地下党等各方人士营救，始被保释出狱，在友人亦幻法师的掩护下迁居上海法藏寺。居寺期间，他以大量的精力投入了古籍和佛典的阅读研究，并完成了百余万字的《中国通史》初稿（此稿后散失）。

抗战胜利后，平心迁出法藏寺，重新公开活跃在思想战线的舞台上。其时，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其独裁统治，正阴谋发动反共内战。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围绕着抗战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步和反动、黑暗与光明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为了促进民主建国和反对独裁、内战，1945年12月，他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一时期，平心不仅积极为《周报》、《文汇报》、《民主》等进步报刊撰文，接连发表了《战后的萧条与安定民主》、《以团结克服分裂》、《尊重民意与发扬民力》、《论党争与统一》等文，并将之汇辑成《从胜利到民主》一书出版；还通过学联、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联谊会等群众团体四出宣讲，或赴苏州、

㊳ 平心：《各国革命史·自序》，1946年3月新一版。

㊴ 据李平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人员登记表》自述，此书初与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订约撰写，完成后未印。建国后交光明书局排印，旋因故决定暂缓出版。其《欧洲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文"后记"亦称："解放前曾写了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大约30多万字，当时上卷（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已经排好，没有出版。解放后，屡拟修订出版，苦于夙疾频发，搜集材料不足（解放前曾因生活极不安定，书籍散失甚多），未能如愿。"（见1959年8月15日《华东师大学报》一期）

南京等地高校进行演说和举行学生座谈，为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喊。

1946年6、7月，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并加强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等因此惨遭杀害。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在此后三年间，平心不得不时常转移住所。就在这种居无定处、个人生活极不安宁的困难条件下，他仍坚持用笔战斗，写下了《由美军在华暴行论及中国学生运动》、《血光照彻自由华》、《论二九惨案》等时论，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专制统治，斥责"凡靠流他人之血来维持吃人体制的任何势力，他的暴虐决不是证明他强而有力，而是证明他萎弱无力。惟其萎弱无力，才乞灵于杀戮与横暴"。故对人民来说，"唯有不趋附的持久抗争，不退缩的坚决行动，才能争取民主，获致和平。对于罪恶势力的任何幻想、任何妥协，都是有害于历史行进的。"[40]1947年春，正当内战激烈进行之际，平心还针对施复亮等民主人士提出以"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解决国事争端的主张，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的长文，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局势。他指出：作为当时国共两党以外一种政治力量，"第三方面"自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与理由。但是，必须明白，"'第三方面'并不是超然的'第三种人'"，它所奉行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中间路线"，如果它所要求的是民主、和平、独立、统一和进步，那么，便不只是符合"中间派"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也"符合一切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它不能被指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人民渴望和平，但面对那些一再撕毁停战协定的好战分子，"'第三方面'是不应企图用幻想的和平，来打消现实的战争的"，而只有通过广大民众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动摇维持内战的社会基础与政治支柱"。实际上，所谓"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第三方面'生存和发

展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民的进步要求，而不断向前开路。人民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专制旧中国的否定，是民主新中国的产生。”因此，它应当勇敢地站出来反映人民的这种愿望和心声，哪怕这样做要冒被当局指为“赤化”和“做共产党尾巴”的危险。[41]这些明快而犀利的文字，就像黎明前黑暗中闪烁的星火，为正在同黑暗进行抗争的人们增添了勇气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其历史价值是永存的。

三、求真归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平心应邀出任《文汇报》特约主笔。他满怀胜利的喜悦，以火热的激情，挥笔写下了《上海解放的意义》、《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建国的力量》等文章，表达了自己对即将开始的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热切期望和祝愿。不久，又赴杭州和香港等地讲学。1951年底，因病辞去《文汇报》职务。经短期治疗休养后，于次年8月应聘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开始专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55年起，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史学会副会长。

⑩ 平心：《血光照彻自由华》，《平心文集》卷二第526、529～530页。

⑪ 见《平心文集》卷二第564、566、578、576、587页。

和平建设的环境，使平心得以全身心地投入了其所酷爱的学术事业。平时，即使在起居饮食间，他也从不忘思考学术问题。为了及时记录思考所得或进行资料摘录，他还特地在自己的居室里，自书房到卧室，从书案到床头，甚至沙发、茶几、厨房、厕所等处，都存放了铅笔和专置纸片的盒子，以备随时取用。他的不少论文素材及观点，正是通过这种不辞辛劳、铢积寸累的方式形成的。平心的个人生活十分简朴，但在购买图书资料时，却出手阔绰。他家中"几乎全是高大的书架，装满了各种图书，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42]据其生前同事回忆，平时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去书店购回大批书籍，仅这项开支，有时竟使这位"高收入"的二级教授（"文革"前其月薪为三百四十元）也出现了"财政赤字"，不过他却依然乐此不疲。

此时平心史学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没有继续朝着原先自己最为熟悉的中国近现代史方向拓展，而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逐步把研究重心转向了古代史领域，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据其自述，他之着手研治古代史，远因可追溯到抗战胜利前夕，当时认识到"要掌握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第一手资料，必须钻研甲骨文、金石文、训诂音韵学等"，又因学术界有人"嘲笑左派学者不通旧学，非常激愤，更加使我迫切地感到钻研古典和地下史料的必要"。[43]近因则是"最近几年研究甲骨文和金石文的空气非常稀薄。大家忙于学习新知识和新理论，没有多余的兴趣探索古人的语言化石，古文字学领域暂时显得荒凉寂寞，本来是很可理解的。但是我以为古文字学不受到重视，甚至遭到严重的误解和歧视，未尝不是许多甲骨文学者和金石文学者裹足不前、荒弃旧业的重要原因。我国古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因此所蒙受的损失，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结算一下的"。并指出："近来人们都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所以空疏无

力，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掌握史料，而停留在不着边际的臆测和泛论上。机械地搬用现成的公式和概念来硬套，比起辛勤地通过大量史料的分析和概括来探索历史本来面目，寻求历史内在规律，自然省力得多，但这与科学研究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打破障碍古史研究的教条主义，除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具体地结合生动丰富的史料而外，并没有别的捷径。凡是把史料和理论机械地割裂开来，空谈理论至上、方法第一的堂皇主张，无论怎样缘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藻，都是和真正的科学历史主义毫不相干的，这不过是生硬可笑的唯心主义化装。不经过蜂酿蜜式的细致劳作，用科学方法处理大量史料，就谈不到起码的历史研究，更谈不到史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这段话发表的时间是**1956**年**8**月，其时，文化学术界刚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运动中的某些"左"的做法颇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平心出来讲这番话，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且表明他此时已对建国以后我国历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某些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倾向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因此，

㊷ 罗竹风：《一生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㊸ 李平心：《整风思想总结》，见李平心档案。

尽管他自认古史研究本非所长，却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对改变“我国古史研究的空疏浮浅和古文字研究的荒凉寂寞”现状有所裨补。[44]

平心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方面。

其对甲骨、金文的接触，当始于抗战胜利前夕。[45]此后，陆陆续续写下了约三十万字的笔记心得。这些文字，内容“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字考释，包括单字疏证和成语解诂；另一部分是史实探讨，包括文物制度和方国族姓的考索与一般史料的诠释”。[46]1947年，他曾整理出一篇《伊尹、迟任、老彭新考》的论文，原拟在《新东方》杂志发表，旋因故未刊。1949年3月发表于《新中学》杂志的《古典疑义新解八则》也属这方面的内容。建国以后，经数年摸索，并与郭沫若、于省吾等古文字学名家时相往还商榷，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渐感成熟。1956年和1958年发表的《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与《甲骨文金石文劄记》（一、二），可说是其这方面学术积累较为集中的体现。前者包括七篇考释文字，后者包括九篇考释，内容由文字释读及于先秦人物、制度、民族、史事等。这些考释，力图突破旧说，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提出补充或商榷。其自述称，“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有时发现个别的考证与论点和各家有雷同之处，我都毫不吝惜地予以删削。但如果提出了更有力的凭据，足以补充和证实各家之说，这一类偶有与他人雷同的论文，也酌量保留。”[47]并公开恳请读者一旦发现前人或“他书有同样考释”，能及时告知。[48]可见著述态度之严谨。在治古文字学的方法上，他十分注意把训诂学、文法学、音韵学和古史知识结合起来，去分析字形、字义及其包含的史实。故其考释虽不必尽确，却能自成一说，时有创获。如郭沫若读其《〈者汈钟铭考释〉读后记》文稿，即采纳了其中某些意见。[49]其《释兕》一文的观点亦颇获于省吾的赞

成。[50]

在先秦古文献的研究方面，他先后发表了《古典疑义新解八则》、《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释》、《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内容和制作时代》、《略说〈周易〉与〈诗经〉的关系》、《〈诗经〉新解》等文。主张古书的校勘训解，应取谨慎态度，"单凭字形的疑似，书文的类比，或者仅仅为了解诂的便利，校勘的顺畅，就揣测某些字句讹误衍夺，遽为迻改删补，那是很容易失真的。有些我们揣测为讹误衍夺的古文，未必真不合原本；只因我们不能理解原文，所以产生了错觉疑误。今天我们猜测为讹误衍夺的地方，也许明天发现了新的地下材料，足证原文不错，那时就会把我们的猜测完全推翻，我们会后悔自己做了一些冒险而徒劳的工作。"所以，"不论是校勘还是训诂，遇到某些无法作出确凿判断的问题，宁可阙疑，让后人依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新取得的研究成果去探讨，去解决。"[51]特别是《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释》一文，较好地体现了这种治学精神。该文不仅较完整地归纳了顾颉刚校释《尚书·大诰》方法特点，还对顾氏的训诂校释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纠正，其中不少观点已为后人所采纳。至于他对《周易》所

㊹ 李平心:《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自序》,《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第4期。

㊺ 1956年6月，李平心在所作《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自序》中说："最近十余年来，为了研究古代史，我挤出时间断续学习甲骨文和金石文，解放前后积累了一些不成熟的考释论文。"由此上推，其初习当在1943年居法藏寺以后。

㊻ 李平心:《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自序》,《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第4期。

㊼ 李平心:《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自序》,《李平心史论集》第134页。

㊽ 李平心:《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附记》,原载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见同上第175页。

㊾ 李平心《〈者氵刀钟铭考释〉读后记》称，该文写好后，"曾寄沫若先生请益。他虚心地采纳了我的一些浅见，认为可以发表"。(见《李平心史论集》第281页)

㊿ 见《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释冗》附记。

51 李平心:《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释》,《平心文集》卷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36页。

作的不少判断，因囿于当时见闻，则存在不少附会，如说“《周易》不是一部寻常的卜筮书，而是用谐讔文体和卜筮形式写成的特殊史书，其中包含了许多春秋史事，更可证明它的成书很晚”。[52]证据显然不足，这也是应当指出的。

平心考释古文字和古文献，目的在于研治古史，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单纯地排比史料的文献主义。史料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原始图录，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显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依靠唯物史观的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叫大量史料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服务，使过去的——例如古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尽可能地再现，也只有这样，才能求出历史运动的本来轨迹。”[53]因此，他不仅在古文字的考释中努力把握史实背景资料，更注重将这些文字资料用于考史，先后写作了《伊尹、迟任、老彭新考》、《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从姚坯与商国的关系看殷代社会性质》、《商代彗星的发现》、《文史拾荒录》等论著。其《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据历年积累的甲骨、金文资料，结合传世文献，通过“貟与贲”、“嗞与嗞人”、“寘与楚”、“新眚与新造”等考证，对殷周时期的贡赋、奴隶来源及其生活状况作了实证性的考察，为研究殷周社会史提供了不少可信的原始资料。而《商代彗星的发现》一文，则据卜辞提出了我国商代已有彗星实测和记载的看法，这对研究殷代文化和古史年代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平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看起来虽不如其对近现代史的研究来得系统，但其中透出的勇于求真和创新精神依然是十分鲜明的。

四、疾风知劲草　烈火见真金

古代史的研究，虽然从内容看与时事隔得较远，却并不表明平心

的学术活动从此便与现实日渐疏离。恰恰相反，他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状态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期间，他对生产力问题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对于经济学理论，平心一直相当留意。还在三十年代，就撰写过《现代学生与经济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际经济研究法》等文章。1956 年，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及时提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针。平心对此深感鼓舞，当年，就为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同学作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术报告。然而在此后的实际操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受到了"左"的思潮的不断干扰。1957 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逐步得到了加强。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主观上虽是想推进生产的发展，但由于不顾我国社会生产力现状的实际，浮夸冒进，反而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平心心有所感，于 1959 年接连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三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文。

[52] 李平心:《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内容和制作时代》,同上第 268 页。

[53] 李平心:《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自序》,《李平心史论集》第 133 页。

在这些论文中，他针对当时理论界和某些实际工作部门只讲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问题的倾向，再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原理，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单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必须结合生产关系性质，同时分析和综括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性质，并且进一步研究生产力性质与生产关系性质彼此间的区别点与会合点。"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表现在生产关系性质上，还表现在生产力性质方面，"离开了生产关系，单纯追求生产力，那是极端错误的唯生产力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到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而忘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变化规律，忘记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性质的矛盾与联结，那又走到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54]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社会生产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发展因素，除了与生产关系间矛盾运动的作用外，"还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从其在社会与自然间的可变关系中展开的运动去考察，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形式进行，它主要反映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包括活动交换与产品交换）的历史形式进行，它主要反映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前者以生产工具为主体，是人所创造所使用运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力和自然客观力量转化为社会生产的主观力量。后者以人为主体，是由人们发挥出来施展在物质生产上的实力和人类主观力量转化为社会生产的客观力量。在这些论文中，他还详细分析了生产力的诸因素及其矛盾运动的过程，强调"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在一定限度内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性质外，同时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与自己的运动；那种以为生产力完全受生产关系规定的见解是不正确的"。[55]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是服从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的，生产关系

只有在它和这种规律相适合而不是相抵触的时候，才能够对生产力起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不能超过这种规律的活动范围来推动生产力前进。”[56]

这些论文的发表，立即在学术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本来，对学术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很正常的事，可在当时，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尽管平心的理论探索，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重视，以便科学地认识和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然而，某些带有“左”的思维定势的人却并不这么看，他们纷纷指责平心“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甚至说他“断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差别”，是“脱离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并把他对生产力发展诸因素的分析上纲定性为“资产阶级因素论”。[57]面对沉重的压力，平心没有退缩。他表示：“为了拥护党的百家争鸣政策，辨明学术是非，每一个舍不得同‘字面’分离的真理追求者还是要写，而且要多多地写。”[58]两年之内，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先后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十七篇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他坚持认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的作用，无论如何强大，必须经常通过生产力

⑭ 李平心：《论生产力性质》，原载《学术月刊》1959年第6期，《平心文集》卷三第462、468页。

⑮ 李平心：《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原载《新建设》1959年第10期，《平心文集》卷三第495、500页。

⑯ 李平心：《再论生产力性质》，原载《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同上第476页。

⑰ 转引自李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载《新建设》1960年第6期，见同上第510、514页。

⑱ 李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原载《学术月刊》1960年第7期，同上第529页。

的自身矛盾和自己运动而起作用。它们决不能代替和完全控制生产力的自己增长,不能完全规定生产力的量的变化性(具体的规模与速度等)和质的多样性,不能源源不绝地提供生产力以补偿自己消耗和增大自己积累的物质力量。"[59]所以,"离开了生产力自身的矛盾,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60]这种生产力内部的矛盾,实际上包括了物质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结构与运动之间,量与质之间,劳动生产率与生产需要、生活需要之间,各种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之间,新旧劳动资料性能之间,以及各个生产领域与生产部门之间生产力水平的矛盾等。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力二重性"的社会劳动力量和物质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矛盾推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动力,使生产力具备了"相对独立增长的可能性"。如其每次增长都须生产关系的推动,每次变化都要受生产关系的控制,则"非但生产关系要疲于奔命。而且生产力会完全变成为受生产关系支配的被动东西"。[61]应当说,这些论述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且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可惜在当时竟遭不少人的误解。"文革"初期,更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生产力论"的帽子,成为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是他始所未料的。

1965年11月10日,经江青、张春桥一手策划,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由此揭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动乱序幕。该文不顾事实,肆意对《海瑞罢官》及其作者乱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做法,引起了平心极大的反感。为了伸张学术正义,自1966年初起,他通过学术座谈会和报刊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漫谈清官》(1966.1.20)、《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1966.2.3)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1966.3.31)等文中,他

对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清官”提出了两条标准，即历史科学标准和政治标准，认为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批判历代封建统治者宣扬的“清官”思想也不能取代对作为具体历史人物的“循吏”、“清官”的科学评价，如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将一切为剥削阶级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一概抹杀”。历史上的“清官”和其他帝王将相虽不会轻易改变他们的阶级属性，但并不能由此全盘否定其中某些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情况之下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只要他们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社会促进作用，就必须有批判地、有分析地作恰当的估价”。不然，“就要犯‘左’倾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直斥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62]

这些闪耀着科学理性的言论，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大为恼怒。为了摧残士林正

[59] 平心：《关于生产力二重性等问题的概括说明》，见1961年2月13日《光明日报》。

[60] 李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平心文集》卷三第514页。

[61] 李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同上第552页。

[62] 李平心：《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原载1966年3月31日《文汇报》，《平心文集》卷三第560、564、561、562、563、569页。



李平心手迹

气，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姚文元不仅自己披挂上阵，挥舞秃笔写了《欢迎"破门而出"》的短文横加诬蔑，还指使手下的"市委写作组"成员，以"康立"、"伍丁"等笔名于4月间在《文汇报》接连抛出《平心先生对谁发火》、《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对他进行围攻，诬指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严酷的现实，使平心既感困惑，又觉痛心，他曾忧愤地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63]

"五一六通知"以后，随着"文革"动乱的加剧，对平心的批判日趋升级。6月11日，《文汇报》二版发表的社论对李平心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作了公开点名批判，指责他们施放大批毒草，"反共反人民"，充当"资本主义复辟的开路先锋"。校内也随之对其展开了有组织的大批判，并责令他到校观看大字报。这一切，都使平心深感委屈不平。15日，《文汇报》以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报道了华东师大文科各系开展大批判的情况，再次斥其为"反共成性的反动知识分子"。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生性刚直的平心不愿低头屈服，而是抱着"宁作玉碎，不为瓦全"之志，决定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就在当天——1966

年6月15日,这位才华横溢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于寓所含恨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九岁。

按照当时的情形,平心的死,自然被视为"畏罪自杀"。在他死后第五天,即1966年6月20日,《文汇报》发表了经张春桥一手修改的大批判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该文次日又转载于《解放日报》),以示对他的"盖棺定论"。然而历史的真相是遮不住的,试想,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屡经刀锯斧钺的威胁、连死都不怕的人,难道还会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吓死吗?记得平心曾说过:"不管刀斧是多么凶残,言路是如何狭窄,我们却有不少骨头挺硬的民族先烈在不断用悲壮慷慨的言词,突破那可诅咒的大寂寞,或为民请命,或为国攻暴,真是不计成败利钝,不避刀斧鼎镬。诚如欧阳修所说:'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尚能生存于天地间,而不沦灭得无声无臭,就靠了这种壮烈的牺牲精神在不绝和奴气与鬼气搏斗,保持了民族的火种。"[64]平心的死,正可以看作是这种精神的实践。

1978年10月,随着"文革"结束后各项

[63] 引自高治《震动全国的大冤案》,见1978年12月29日《文汇报》。

[64] 平心:《论新中国·初版自序》。

拨乱反正措施的落实,平心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他的学术成就重新得到了肯定。在华东师范大学为他举行的骨灰安放和追悼仪式上,许多人望着平心神态憨厚的遗像,在追祭这位现代新文化战士的英灵时,回顾其艰难坎坷和刚直不阿的一生,禁不住唏嘘泪下,感慨万千。

李平心主要论著

一、著作类:

《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署名李圣悦)	1930 年光华书局
《中国近代史》(署名李鼎声)	1933 年光明书局
《社会科学辞典》	1933 年光明书局
《青年的修养与训练》	1934 年生活书店
《生活全国总书目》	1935 年生活书店
《社会科学研究法》	1936 年生活书店
《社会科学论文选集》(与寒松等合著)	1936 年生活书店
《生活与思想之路》	1937 年生活书店
《抗敌战略论》	1937 年光明书局
《国际问题研究法》(《世界知识丛书》之六)	1937 年生活书店
《民族统一战线论》	1938 年广州战时出版社
《各国革命史讲义》(1946 年新版改名《各国革命史》)	1939 年光明书局
《社会哲学研究》	1939 年生活书店
《中国现代史初编》	1940 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
《论鲁迅思想》(再版后改名《人民文豪鲁迅》)	1941 年心声阁出版社
《论新中国》	1941 年群众联合出版社
《从胜利到民主》	1946 年明华出版社
《控诉书》	1947 年朝华出版社
《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	1947 年香港知识出版社
《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沈志远合著)	1951 年展望周刊社编印

《国际主义基本知识》	1954 年新知识出版社
《李平心史论集》(袁英光、桂遵义编选)	1980 年人民出版社
《平心文集》(罗竹风主编,三卷)	1985－1992 年华东师大出版社

二、译作类:

《政治思想史大纲》	1930 年启智书局
《社会主义词典》(署名李圣悦)	1930 年启智书局
《英国教育制度》	1932 年商务印书馆
《现代语词典》(署名李鼎声)	1933 年光明书局
《集团经济》	1933 年生活书店

马克思主义古史专家

——李亚农传*

何泉达

一

李亚农，一名旦丘，1906 年 6 月 26 日生于四川江津县。1916 年，随三哥李初梨求学日本。

在日本，李亚农小学既成，即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继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1927 年卒业后就读京都帝国大学部学习哲学，并于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支部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河上肇主讲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经济学课程。

河上肇，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积极宣传者，对《资本论》有很深研究，所著《贫乏谈》、《社会问题管见》、《社会问题研究》、《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变革》、《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等，在充满追求与希望的中国留学生中影响很大。李亚农不仅爱读，而且与沈起予诸人组织了"社会

科学研究会”,团结进步学生,共同研究。

这时,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时期。伴随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对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和日本主义思潮的理论斗争,还涌现了除河上肇之外的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对刊载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学说的书报,同样积极传阅,还秘密收集日共传单。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处于危机中的日本,军部势力大为抬头。它们鼓吹的“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的日本精神论,影响了政府,致使政府于当年冬发动凡与“皇道主义”意识形态有违即予检举的全国性行动,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李亚农等三十多位中国留学生因此被捕。

艰难的监狱生活,使体质本不是很好的李亚农每况愈下,导致三年后在狱中闹病时饮食不进。这时,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的于百溪得以将李亚农保释。岁值 1931 年。

出狱后,几经辗转,在友人帮助下,李亚农取道神户,搭乘邮船,启程回国。

二

1933 年,回到上海的李亚农,已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他通过京都帝国大学校友沈尹默介绍,前往北方谋生,任职北平中法大学哲学教师。

沈尹默,1920 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进修。次年回国,任北平大学文科教授,兼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教授。1928 年,任河北省

教育厅厅长。1930年，改任北平大学校长，旋辞职，到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孔德图书馆馆长。

李亚农有这样一位丰富经历的学长引荐，在北平的教书生涯大体顺利，且相继任教于北平大学和北平其他学校。日后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写道："余返国后执教鞭于北平各大学者约四年余"。①

1937年，李亚农重返上海，并改名旦丘。

旦，姬旦之名，爵为上公，采邑在周，故称周公。武王伐纣，周公辅政，显大家风范，是后世为政者楷模。丘，终生倡导周公礼乐制度的圣人——孔子之名。李亚农将旦与丘缀合为新名，表明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将作一番大事业。面对这位踌躇满志又志在高远的年轻人，沈尹默将他延揽进了自己主持的孔德图书馆。

坐落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丽园九号的孔德图书馆，是法国人出钱办的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以后委员会又成立孔德研究所，所长仍为沈尹默。

进馆之后，李亚农在浏览版本目录类书籍之余，又涉猎甲骨文、金文。不想一头扎

* 本文写作多有参照《史林》编辑部：《光辉的一生——李亚农同志传略》（载《史林》1986年第3期）一文，特予说明。

① 《铁云藏龟零拾·序》。

了进去。1962 年，他述及往事时慨叹道："抗战前，本来是喜欢搞一点甲骨文、金文什么的，打算在认识几个契文、金文之后，然后在这些最古老的文字中去研究一点古代社会情况。谁知道一钻进这些甲骨、鼎彝堆中，便乐而忘返，竟把古代社会的研究置诸脑后，研究起中国古代文字学本身来了。"②

这样，从 1937 年开始，李亚农利用孔德图书馆的资料，先后写了四本古文字学著作和一些单篇。

第一本著作是《铁云藏龟零拾》，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二种，1939 年 5 月，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

初，晚清翰林院编修、赏戴二品顶戴的王懿荣最先发现中药材"龙骨"上的印痕是文字，于是四下收购，得一千五百余片。③经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是殷商时代文字。这一发现，直接导致对安阳殷墟的发掘，从而把中国信史提早一千多年。遗憾的是，王懿荣未能和他的同辈与后人一同分享殷墟开发的喜悦，便在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于庚子乱中投井而死。

王懿荣死后，大部分甲骨由其子卖给生前好友刘鹗，计一千余片；赠天津新学书院二十五片；另一部分，在王氏后人手中，其中四百余片归王福重，一百余片归王福庄。

刘鹗得手一千余片甲骨后，又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1903 年，从已获得的五千余片甲骨中，精选一千零八十八片墨拓，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惜庚子乱后，刘鹗被人指控发国难财，远谪边地，于 1909 年客死乌鲁木齐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所藏甲骨多有散失。

其后，曾任刘家塾师的罗振玉，从刘氏赠送的未著录甲骨中精选数十板，为之影印，定名《铁云藏龟之余》，于 1915 年 1 月刊行。

1938年夏，上海孔德图书馆获得一批会稽吴振平旧藏甲骨龟片，沈尹默、金祖同、李亚农考证为刘鹗旧物，其中虽有一部分为《铁云藏龟》著录，但大多数未经著录，于是选其九十三板，“始屏除百虑，复专心致志于古文字之探讨”，[④]写成《考释》，与墨拓合为一册，略加按语，编为《铁云藏龟零拾》刊行。

此书的刊行引起圈内同仁注意。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在致杨树达的信中特为提及，并给予一定评介。郭氏说：“近年关于契文新著，就所见者，有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李旦丘《铁云藏龟零拾》及金祖同《殷契遗珠》诸作，想已见及，唐读‘叀’若‘叀’为‘惠’，释为‘维’，作词解，为一创获。李亦颇有新解。金书则集日本藏契之大成，于资料增益不鲜。”[⑤]

第二本著作是《殷契摭佚》，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三种，1941年1月出版。

“契”者，用刀雕刻。殷墟所见，无论卜甲，还是卜骨上的文字，多是契刻而成，所以刘铁云早在1903年于《铁云藏龟·序》中就说，甲骨刻痕，是“殷人刀笔文字”。也有学者称之为“契文”或“骨刻文”。李亚农将是书题名“殷契”，即取“殷人刀笔文字”之意。

② 《欣然斋史论集·总序》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③ 刘鹗：《铁云藏龟·自序》。

④ 《铁云藏龟零拾·序》。

⑤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第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书成，由孔德图书馆出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北京来薰阁书店发行。写作之念发轫于1939年春，某书商携带罗振玉所藏甲骨墨拓千余片来孔德图书馆求售。沈尹默当时把它买了下来，并交李亚农深究。但李亚农没有即刻进行，而是稍后。他说："入秋以后，余始选其文句之较完整者与乎文字之较值注意者见一百一十八片，编为是篇。非敢自谓有以贡献于契林，不过保存古代文化之微意云尔。"⑥

本书撰写体例全仿《铁云藏龟零拾》，拓片分为：一、祭祀，二、贞夕贞旬，三、用牲，四、田猎，五、征伐，六、杂卜。

这种条理事类与通常的六分方法小有不同。通常分类是：

一、祭祀　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等；

二、天象　风、雨、启、水及天变等；

三、年成　年成与农业等；

四、征伐　对战争与边鄙的侵犯等；

五、王事　王之田猎、游止、疾、梦、生子等；

六、卜旬　来旬今夕的卜问。

由此可见，李亚农问学之道，不愿落入窠臼。

第三本著作是《金文研究》，孔德研究所（此时孔德图书馆已改为研究所）丛刊之四，1941年7月出版，来薰阁书店发行。

李亚农在这部书的《跋》中写道："从去年（按：指1939年）十月起，我开始了金文的研究。到今年七月底，大概把上海书肆中所能购买到的金文文献通通看了一遍，间或也得到一些心得。入秋以来，乘着金风送爽，灯火可亲的时候，才提起笔来写。把半年来往还于心中的一些思想写出来，于是乎成功了这薄薄的一本小册子。"

李亚农在这本金文著作中，"大胆的来了一个新的企图：即追求文字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更进一步而穷其历史的发展"这样做，是在探

索新的蹊径，所以李亚农预感"或许又有人要讥之为'奇特之士'了。"

但他认为，"墨守成规，每易获谨严之誉，欲求进步，辄难免奇特之讥。"所以快言快语道："余虽不敏，也是以追求学术的进步为己任的。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可接受者无不乐于接受；至其错误，却决不愿盲从。在方法上，也不愿为旧法所囿。不管人家怎样说，宗旨总是如此。知我罪我，任之而已。"⑦

这时的李亚农，正以郭沫若为楷模，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金文研究的指导，他说："本书所征引的学说，差不多都出自郭鼎堂先生。鼎堂是著者的同乡前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规模之宏伟，在中国金文学史上，诚所谓迈古迢今。一千年来，金文学家辛勤研究的成果，不消说是摄取在大系之中的，而鼎堂自身创获之丰，又有远迈前人者在。因此，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大概都是利用他的著作。他给了我不少的便利和暗示，这是我应向这位前辈致谢的。"⑧

第四本著作《殷契摭佚续编》，署名李亚农，完成于1941年，也为孔德研究所期间著作。此书甲骨文拓片来源有二：一、取自画

⑥ 《殷契摭佚·序》。

⑦ 《金文研究·跋》。

⑧ 《金文研究·跋》。

家顾青瑶所藏1910年前后出土的甲骨而为孔德研究所在1940年所收购;二、孔德图书馆向上海古董商收购的"近年(按指1940年前后)出土之物"。全书共收甲骨三百四十九片。

《殷契摭佚续编》既成,"因抗日战争日趋紧张,太平洋事变继之爆发,遂无法付印",李亚农"乃托友人代为保存",[9]走出书斋,奔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亚农重返上海,"于友人家中寻得旧稿,经此长期战祸,居然未毁于兵燹"。[10]于是,分请郭沫若及柳诒徵同时题签。[11]1950年9月,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成书。内容也分为:一、祭祀,二、用牲,三、食货,四、田游,五、征伐,六、天象,七、贞夕贞旬,八、杂卜。

这之后,李亚农又于1951年,在《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上发表了《殷契杂释》学术单篇。

李亚农在上海孔德研究所的五、六年间,在完成以上四本古文字学著作同时,对于研究古文字学方法,阐述了自己观点。1940年4月,他在第三辑《学术》上用李旦丘署名发表题为《古代文字学的方法论》一文,表明:"科学的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必需的利器,同时也是批评研究成果的不可缺少的标准。没有正确的方法,则其研究的结果,不问可知。对于研究的方法没有理解,则其批评必为漫无标准的妄论无疑。这种情形,不单是在一般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范围内是如此,即在中国古代文字学的领域中亦然。"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申自己主张"不仅追求文字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更进一步而穷究其历史的发展"的观点。[12]大胆提出文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必须"打倒偶像。因为偶像的存在,足以妨碍学术的进步。……对于学术的先驱者,后来的人固然应该表示敬意,然而敬之必以其道。一味的盲从,这不但是侮辱了学术,并且使先驱者们苦心惨淡建立起来的学术的基础,也不能

得其应得的发展”。因此，李亚农认为，即使对古文字学权威罗振玉、王国维的学说，也不能视为“天经地义”。“后来的学者，倘若发现了他的错误而加以纠正，这不仅没有侮辱他，反而使其建立的基础，得以发扬光大。这才是尊师之道”。“千万不要忘记西哲的一句名言，即：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李亚农四十年代的这一思想，为他在1950年代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大胆提出不同见解，导了先声。

1941年底，李亚农在投笔从戎之前，除从事学术著述外，为不拂朋友请托，偶尔也涉足文艺园地。

1936年6月，李亚农接受《光明》半月刊沈起予的约请，用李宗文笔名在《光明》上发表了一篇文学评论：《高尔基的艺术与思想》。[13]这篇文章与周扬继1934年介绍苏联“国防文学”，并提出中国应该接过这个口号[14]后，对“国防文学”作进一步阐述的文章——《现阶段的文学》，发表在同期《光明》上。

《光明》是周扬、夏衍搞起来的左翼文学刊物，创刊于1936年6月10日，主编洪深、沈起予，实际挂帅夏衍。编辑部就在善钟路（今常熟路）沈起予的家。

⑨《殷契摭佚续编·自序》。

⑩《殷契摭佚续编·自序》。

⑪ 柳曾符：《甲骨文与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1999年8月31日。

⑫《金文研究·跋》。

⑬ 载《光明》第一卷第二号《追悼高尔基特辑》，1936年6月25日出版。

⑭ 周扬1934年介绍苏联国防文学文章题《国防文学》，署名“企”，载是年10月27日《大晚报·火炬》。

当时，一二九救亡运动兴起，上海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华北事件后扩大，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也自顾不暇，因此放松了对左翼文化的围剿。趁此机会，原“左联”的一些作家想找个有实力的书店，办一种有别于刚刚解散的“左联”那种关门办刊、出一二期就被封的杂志。夏衍找生活书店胡愈之，他们愿意承担，但怕出问题，只搞发行。讨论后找洪深公开出面。洪深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就由他挂名做主编兼发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浓，也出面主编。

《光明》的主要撰稿者有：洪深、舒群、沙汀、徐懋庸、周立波、任钧、杨骚、夏衍、何家槐、周扬、张庚、沈起予、罗烽、艾芜、郭沫若、臧克家、宋之的、关露、林林、章泯、尤兢（于伶）、凌鹤、王西彦、李兰、姚雪垠、孙陵、张若英（阿英）、陈荒煤、施谊、王任叔、欧阳山、柯灵等。

李亚农不在前“左联”队伍，发表他的文章，属于“左联”关门后一些作家开门办刊的姿态，所以不成为《光明》的主要撰稿人。但他的三哥李初梨，却是“左联”老将。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文科时，就参加了创造社。**1928** 年初回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沈起予、阳翰笙、李一氓等形成围绕在郭沫若身边，联合“太阳社”，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后期创造社蜀籍青年群。因此，李亚农能被约请为《光明》撰稿，不完全是《光明》的一种姿态，还应该看到李亚农与他们的某种联系，至少李亚农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与这个作家群有共鸣处。

但《光明》一创刊便卷入“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并开罪鲁迅。李亚农介入不深，他属于积极介绍苏联优秀文艺作品、揭露法西斯文化，开展文学评论与研究的作者。

《高尔基的艺术与思想》，在评述了高尔基文学创作的艰苦历程和作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后，李亚农论述了高尔基继承文学遗产和

积极展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并赞扬道:“苏联的大众的英雄主义,产生了积极的英雄的文学的典型。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在高尔基的言论里面,占着重要的位置。”

三

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后,李亚农对孔德研究所平静的书斋生活渐渐不习惯起来。1941年冬,他决定前往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寻找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哲学时的学长、1928年与李初梨同时回国同为“创造社”成员、时任中共华中党校副校长的彭康,要求留在新四军工作。对这件事,他后来回忆说:“抗战军兴,书斋中坐不安稳了,只好跑到新四军去跟着同志们打游击;光阴荏苒,一打就是十余年,手不握卷者也是十余年。”⑮

抵达苏北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的新四军军部后,陈毅代军长热情接待了这位留学日本、走出书斋的秀才。

当时,新四军在对敌作战中俘获不少日本战俘,需要有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国情的人去做宣传工作,军部于是决定委任李亚农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⑮《欣然斋史论集·总序》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在军部，李亚农负责对日俘工作。工作之余，常去华中局办的《新华报》社，找总编辑陈修良聊天，谈时事，谈重新入党。不久，经陈修良等介绍，回到了党内。这之后，在本职工作以外，他常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其中重要一事是参与决定"湖海艺文社"的成立。

停翅港地形复杂，能攻善守，因此附近村庄都是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驻地。相去军部驻地不远的卖饭曹村，方圆1.5平方公里，是知名文化人集居的文化村。那里住着钱杏邨夫妇、范长江、胡考、池宁、铁婴、天然、李明、徐雪寒、孙冶方（宋亮）。比邻文化村居住的是：新四军鲁艺工作团贺绿汀、行政学院车载、抗大华中总分校薛暮桥、《盐阜大众报》王阑西、苏北文协钱俊瑞以及吴蔷（吴强）、沈其震、骆耕漠、孙克定、林山等。当时，陈毅经常走访文化村，和这些文化名人聚会，吟诗、论文、下棋，又与他们共商抗日。

1942年10月27日，盐阜区首届参议会期间，为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讴歌抗战，巩固根据地，陈毅与黄源、范长江、钱杏邨、彭康等人，造访了当地进步士绅庞友兰、杨芷江，并倡议成立"湖海艺文社"。杨芷江、钱杏邨欣然命笔起草《艺文社缘起》，11月1日，陈毅约钱杏邨、李亚农、戴伯韬、王阑西及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乔耀汉、杨幼樵、计雨亭等讨论，《艺文社缘起》获通过，于是"湖海艺文社"在停翅港正式成立。

随着时局推进，为了有计划培训和训练大批能够胜任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和文化教育管理工作的干部，中共华中局在"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则下，于1945年决定，在华中党校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1946年初，为了加强临沂山东大学的领导和教学，彭康奉命率该校师生四百余人北上并入该校。华中建设大学校长于是由李亚农继任，张劲夫任副校长。

华中建设大学是短期训练班式的政治大学，贺希明、张劲夫、张茜、夏征农、戴伯韬、钱杏邨、孙冶方、范长江、车载、朱维基、黎冰鸿、黄源、陶官云等在校工作和执教。这时解放区的发展势头很快，形势对教育部门提出了向新型的正规化的教育方向发展的要求。

李亚农因应形势，对领导下的华中建设大学作了长远设想。他认为，学校拟办成一种正规大学，不仅要办文、理各科，还要办工学院，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和预科。

为了实现目标，李亚农把工作重点放在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上，他说："我要团结一批教授。要办好一个学校，没有一批教授不行。"那时有人若找不到他，办公室同志的回答往往是："到某某教授家里去找！"为了让教授安于教学，他又注意保持对教授较高的物质待遇，有些教授感到不安，找他谈心，主动要求降低待遇。他说："不能这样做。对你们应该照顾。你觉悟高是好的，但你如果要求减薪，人家就显得落后了。"

正当学校教育工作全面筹备之际，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建大不得不随部队转移。到达山东后，学校奉命把为数不多的学生分配到各机关、部队后，以教授为主的教职员队伍，由李亚农带队北上大连。

不久，解放军华东野战部队在豫东战役中歼灭了蒋军区寿年第7兵团，并在豫西、鲁中及鲁西南兖州、济宁以北地区整补，为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蓄积力量。在这个排山倒海胜利顷刻爆发前夕的战争间隙，中共华东局不失时机地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原来的一些教师为基础，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华东大学。韦悫任校长，张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长。李亚农则任华东研究院院长，并将他在东北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从大连召回华东解放区，为日后接管上海的科学文化事业积极作好准备。

这年，公历纪元1948。李亚农四十二岁。

四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在筹划建国方略时，考虑要有一个全国最高科学机构统一科学研究，同时决定了由郭沫若负总责。

5月27日，上海解放。此时，带一身硝烟的李亚农重返上海。不日，上海成立由他主管的接收中央研究院沪区办事处委员会，并吸收中央研究院的王家楫、吴学周和倪达书三人为委员。

10月19日，郭沫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受命中国科学院院长后，李亚农即被委派为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12月，中共科学院党组成立，李亚农又成为党组成员之一。自此，他在上海开始了与任职相关的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而履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旧有的科学文化机构实施接收。

1950年3月21日，他以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身分代表科学院，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化学、植物、动物和工学四个研究所以及医学和药学两个研究所筹备处，北平研究院在上海的生理学、药物两个研究所和物理学研究所的结晶学研究室；4月6日在南京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和社会、物理、气象、天文、地质五个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至此，原中研和北研的直属研究所接收完毕。

接收既毕，领导遂始。在这个新旧转换过程中，李亚农以其干练作风，敢于担当的气派，倾倒不少旧职人员。其中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在回忆录中曾对当时境况动情写道：

全国解放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合并改组为中国科学院，

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方面，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上海军管会派遣李亚农来接管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各所后，我在两件事上尝到了甜头。

第一件是修理温室。岳阳路 320 号内，有旧温室一栋，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旧物，年久失修，不能使用。上海解放前夕，因南京各所人员的家属来上海居住，加上上海各所人员的家属、儿童甚多，温室四周的玻璃破坏无遗。我曾数次招工估价想加以修理，但因物价一日数变，编好修理预算，送南京总办事处审批，待批准时，预算已不敷用。如此者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上海解放，这个温室不但没有修理，破坏的程度反而日甚一日。解放后，我向解放军上海军管当局科研单位领导李亚农请求修理，他立即应允，叫我招工估价，随即动工，不久竣工，即能使用。没有动公文，手续简便。

第二件是聘请殷宏章。殷宏章在印度新德里，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印专员二年，日久思归。他一面给北大去信，愿回北大教书，一面将有意回国的消息，透露给王伏雄（这是 1950 年的事，还在植物研究所时期中）。这件事，如果在解放以前按照中央研究院的规定，聘请研究员，必须提请院务会议讨论通过。事前须备文连同被邀聘人的履历和著作表向院长申请。院务会议不是经常举行的，年仅四五次。从提出邀聘的申请起，到决定聘否，往往需时月余，甚至半年。但聘殷事件则大不相同。我看到殷给王伏雄的信后，立即召集所务会议，通过聘殷为研究员。随即告知李亚农，李表示同意，于次日召集行政会议通过此案。会后电新德里，促殷来所。此事经过，前后不过三天，使我觉得非常痛快，不像解放前聘人那样拖泥带水，手续繁多。[16]

如果说，罗宗洛的回忆仅仅折射出李亚农对祖国自然科学事业的热爱之忱，那么，顾廷龙多次提起，“解放后上海图书馆的发展，当时的陈毅市长以及李亚农、徐森玉等均起过重要的作用”的话，[17]则反映了

李亚农将全身心血浸润于科学文化事业的情愫。

解放后的上海图书馆，正式开馆于 1952 年 7 月 22 日，但早在解放前夕，陈毅就指示：“要组织力量加强对上海的文物、图书的保护，因为上海也是书海。”

然而，1949 年 6 月 16 日由军管会市政教育处接管的上海市立图书馆，尽管前身已将江湾的上海市图书馆、南市文庙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福州路前工部局的公众图书馆，三馆合并，并且自 1950 年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其后人纷纷向新生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捐献私人藏书，如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常熟“铁琴铜剑楼”主瞿氏后人，领头将保存在上海的二千二百四十三册珍本捐出；被称“淮军藏书家”的刘体智，则捐书六万七千多册；南社领袖金山姚石子后人也将姚氏遗书近五万册悉数捐赠。可是上图的藏书总量仍然很少。何况馆址又在工部局公众图书馆福州路原址，环境局促。所以，李亚农认为，无论藏书量抑或设施，当时的上海市立图书馆，都远不能和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称，因此决定另行成立上海图书馆，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华东地区最大图书馆。

为此，于 1951 年初，成立了图书馆新馆筹备委员会。消息一经传出，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即致函陈毅：“闻上海市将办大规模之图书馆及博物馆，甚盛事也！”接着便荐人：“瞿济沧、凤起二先生，为铁琴铜剑楼后人，家学渊源，邃于版本目录之学。……际此图书馆将次建立之时，需才自必孔殷，敬代为介绍，盼能加以延揽，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推进，当可有很大帮助也。”郑振铎又致信李亚农和徐森玉，殷切期望对他们“加以延揽”。[18]

如同当初采纳罗宗洛意见，果断延聘殷宏章那样，在陈毅支持下，李亚农很快将瞿济沧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瞿凤起参加上

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整理工作。

在积极网罗人才同时，李亚农主持下的文管会又拨出专门经费收购、搜集图书，从而大大丰富了藏书。并于同年 2 月，将位于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处的原上海跑马总会大楼租定下来，作上海图书馆（当时还包括上海博物馆）馆舍。陈毅市长为之题写馆名。经过这番努力，上海图书馆在 1952 年开始时，形成了七十万册藏书规模。日后又得到进一步扩大。这些藏书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接收的敌产；二、藏书家们捐献的藏书；三、亚洲文会图书馆的外文藏书（1952 年 8 月，向市文化局申请接办获准。1955 年 2 月，上海图书馆正式接管）；四、徐家汇天主堂藏书（解放后藏书楼军管，后移交文化局，1956 年 11 月 12 日再移交上海图书馆）。此外，再加上收购的旧书，以及解放区出版的图书。

李亚农经常讲："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图书馆，不是藏书楼，应当让成千上万的人来看书，让图书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群众服务。"上海图书馆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大型图书馆，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而这个大

⑯《罗宗洛回忆录（续）》，《植物生理学通讯》第 36 卷，2000. No. 1。

⑰ 王世伟：《顾廷龙先生与上海图书馆》，《新民晚报》1999 年 8 月 21 日。

⑱ 郑重：《藏书五世的铁琴铜剑楼》，《文汇报》2000 年 4 月 13 日第 11 版。

型图书馆的基础，主要就是李亚农在陈毅市长领导下奠定的。

李亚农在主持上海科学机关工作后不久，经安排，将工作重点转向人文方面。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高教处副处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一行政角色的调整，使他在全力投身上海图书馆草创的同时，也倾注心力于上海博物馆的规划。

解放前，上海在虹口横浜桥有个规模不大的上海市博物馆。此外，还有属于法国人的震旦博物院和属于英国人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但这些博物馆虽有其名，藏品却单调，且大都偏于动植物标本，更鲜有精品。上乘文物，基本集于私藏家之手。

1949 年 5 月 28 日，解放上海的枪声刚停下，有人报告，海关码头仓库里一批珍贵文物正将装运起航。解放军立即前往封锁，然后，由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和华东局政治部共同进行清查，发现包括“牺尊”在内的一批“浑源铜器”和其他文物近百件。

这批“生坑货”造型奇特，纹饰绚丽，是上海雪田井斋古玩店老板张雪庚将十六万美元家产押上获得的。他打算运往美国出手。报关时，国民党官员索贿甚高，没能即刻成交。不久消息传出，文化界杨宽等人撰文披露，引起社会公愤，遂将这批文物暂且置放海关仓库。

上海一解放，李亚农在具体负责接管上述三个博物馆时也验收了这批文物。并建议择新址筹建上海博物馆，以便妥善保藏这批国宝及其他藏品。1951 年 2 月，经多方遴选，最后决定南京路的跑马厅大楼，作为上博和上图的馆址。

关于办博物馆的原则，李亚农对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的杨宽说：“博物馆的人员，我不安排，由你安排，否则你无法工作，经费也由你主管，我只管原则方针，相信你会管好的，你要大胆工作。”

就这样，在李亚农的直接支持下，文管会不仅截留了大批几乎流

往海外的珍贵文物，保留了一大批外国人办的汉学研究所保存的中国文物（如孔德研究所的甲骨文和安特生收集的仰韶时期彩陶等），还在解放时期文物价格低廉情况下，收购到大量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一些著名的收藏家也主动捐献出收藏的大量文物，如“铁琴铜剑楼”主瞿氏后人瞿凤起，向文管会古物整理处捐献了汉、晋、六朝、唐、宋铜镜四十二枚。这样，包括“攀古楼”主清咸丰朝军机大臣潘祖荫孙媳潘达于，捐献的举世闻名的“大盂鼎”（1959年调北京）、“大克鼎”在内，极大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

当然，成就的取得并不一帆风顺。如当时有些干部不懂文物意义，对大量收购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不理解，说：“这些是什么东西？破铜烂铁！”认为在解放初期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不应该花钱买“文物”。有些干部还流言：“这是搞古董。”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使具体做收购、保藏文物工作的同志很为难。

李亚农是专家，是内行。他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和做法，他对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说：“你不要怕，陈老总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搜集，散失了就太可惜了。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

李亚农是位善于接受挑战的领导者。上图和上博的开创，他有功于斯，但不邀功于斯。当新的担子摆在面前时，他又无怨地把它担当起来。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史学会）由郭沫若委托周谷城筹划，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52年，当时推李亚农为会长，周谷城任副会长。他很好地行使了职权，团结了五十多位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史学研究工作者或教学工作者，使当时的上海史学会仅次于北京史学会。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时，李亚农又出



李亚农《西周与东周》等著作

任主任。1959 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改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亚农任所长。

从上海历史研究所开始筹备时起，他从筹建方针到人员，都十分关心，他说："办历史所，一定要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要滥竽充数的人。"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应当按计划、有专题，踏踏实实地去搞。他认为，办个有三、四十人的小所就可以，照日本人的办法，二十个人就可以办一个所，一个研究员带二三名助手，就可以有成品，故人不在多而在精。每个研究人员进来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择。办好历史所的方针有两条：一是要搜集人才，一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图书资料室。此外，他还提出要出研究集刊，以发表学术成果，造就科研人才。

李亚农讲的这几条，说明他深切了解办好一个科研机构的规律。之所以有这样认识，是基于他对科学、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在治所方面，李亚农首先要求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刻苦钻研，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中去。

一次，历史所几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去看望他，他逐个问了姓名、年龄。当他得知这些同志都没有超过四十岁时，说："好，你们每天夜里不过十二点不要睡觉，要发奋努力，刻苦钻研，坚持不懈。"

同时，李亚农又认为，要给知识分子以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安下心来。并以列宁如下名言，作为自己主张的根据：

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个亿，却可能造成用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损失。⑲

李亚农要求科研机关不仅要配给科研人员比较宽敞、安静的住宅，而且在科研机关内一定要大搞绿化，留有较大空地，因为新鲜空气对脑力劳动太重要了。他屡次说，这不是我的意见，是列宁的主张。

对科研人员，李亚农还主张排除对他们的一切干扰，让他们静心研究。有一个插曲，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态度。就在李亚农任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曾有人议论某研究人员上班坐在写字台旁，手捧小茶壶，眼望窗外，不干事。群众对此有意见。一次，所领导人向李亚农反映这事，李亚农说："你管他干什么？他在思考问题嘛！"

⑲《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

五

解放前，李亚农在上海曾写下四本古文字研究著作，他的本意是想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替中国历史发展划出一个大体框框。但这一宏愿由于戎马生涯的开始，未能实现。

新中国建立，李亚农一面根据党的方针，整顿和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一面挤出时间，积极笔耕，以兑现夙愿。在这个过程中，他遇有不同学术观点，不予回避，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主张。这是李亚农做学问之所长。比如，在对待疑古学派学者否定《诗经·毛传》相关史料的价值问题上，就直指徐中舒的名篇——《豳风说》，[20]简明扼要地胪例九条理由，予以反驳。他说：

自疑古思想得势以来，《诗经·毛传》的命运也不甚佳。著者曾经引用《周南·关雎》中的两节来说明周族的婚姻制度。据《毛传》，这是文王的后妃'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尤在进贤'。换一句话说，就是文王的后妃在替他找小老婆。当时就有好几位朋友好意地忠告著者，不可根据《毛传》的说法来讲'后妃之德'，因为这首诗是情诗。但著者在感谢朋友们的好意之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及至大家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著者也找了些胡适的著作来看，始知首倡情诗之说者为胡适。但彻底地把《毛传》的史料价值取消掉了的，既不是郑樵朱熹等人，也不是胡适，更不是其他任何人，而是徐中舒先生的《豳风说》。徐中舒先生是我们中国的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著者亦曾根据他的见解来讨论过殷代的历史。他这篇否认《毛传》的史料价值的《豳风说》十分有名，史学界有不少朋友几乎认为它已成定论，可是我们却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不好的。尽管徐先生旁征博引，吓倒了许多人，我们

为了恢复《毛传》的史料价值，还是不能不对《豳风说》的论点提出我们的反对意见。[21]

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又不泥于前人，是李亚农问学特点。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郭沫若评论"是一篇轰动了全学术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为圭臬"。[22]该文首倡从宗法制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点。文章还断论殷代没有宗法制。

对这样一位方家的名篇，李亚农没有因此拜倒。他在充分尊重王国维成就后，明确指出文章的不足。李亚农说：

王氏说殷人没有宗法，这是对的，但他认为殷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这就错了。殷人之所以没有宗法，并不是因为他们无嫡庶之制，而是因为他们之进入奴隶制阶段为时已久，氏族制时代的种种制度湮灭殆尽的缘故。其次，王氏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他认为宗法是从继统法产生出来的。其实正相反，继统法才是从这宗法产生出来的。周人灭殷之际，周人还停留在氏族制社会末期，私有财产刚刚出现，家长奴役制已经开始，儿子继承财产的父系制已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承财产，确定财产的继承者，于是产生了宗法制

⑳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册。

㉑ 《欣然斋史论集》第857－8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㉒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度和执行这一制度的氏族机构。后来周人为了统治殷族，就把这些执行氏族制度的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关。换言之，就是把宗统变成了君统，把这宗法变成了天子诸侯的继统法。王氏由于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遂作出本末倒置的结论。[23]

每当李亚农踏入学术的羊肠小道，便十分注意放开眼界开扩思路，勇敢挑战传统的思维定势。

1950年代，中国史学界仍习惯于单纯依靠文献资料，对民族学资料重视不够，甚至持异议。针对这种情况，李亚农在所著《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中，援引刘尧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24]资料时指出：

拿中国现代的少数民族情况和古史作比较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是极正常、极普通的研究方法，因为谁都知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其情况是大致相同的……因而根据明清以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的进程来和古史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在方法论上是无可非议的。[25]

李亚农并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中收录的清代地主刘宇清总结其祖先统治经验的两篇短文，视作“宝贵无比的两篇文献”。[26]

直言不讳，是李亚农坦荡对待学术研究的品质。但直言中有时或显粗枝大叶，恰如他给自己的画像：

本来就只有一点既不渊、也不博的可怜的学问，再加以长期的荒疏，即过去仔细看过的书籍，也必有误记、忘记之处。写起东西来就难免有几条小辫子给人抓着，时常供给人们一点讪笑的材料，也是意料中事。不过著者在这一点上，颇有勇气；笑骂由他笑骂，文章我自写之，著作依然是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了。每逢给人骂得面红耳赤之

时,便常以敝同乡苏东坡的故事来聊以自慰。

坡公写诗,往往误用典故,如:以长桑君为仓公,以摸金校尉为摸金中郎,或者以葱为韭之类。谁知当时有一位伟大的、谨严而又渊博的学者,其名曰严有翼,竟能把坡公的错误,一一指摘出来,攻击得他体无完肤。渊博则渊博矣!谨严则谨严矣!可是千载之后,中国人民仍然只知道有一个错误百出的苏东坡,并不知道宋朝还有一个伟大的学者——严有翼其人了。坡公的长处,在于他的绝代才华,而其毛病在于他的粗枝大叶,更严重的是在于他的"想当然耳"。

著者比他晚生几千年,偏偏走上了同样摇笔杆子的道路;在写作的本领上,我和我的老乡,虽悬殊于才华,却相怜于同病。[27]

然而,粗枝大叶毕竟不是美德,何况由此引出的是非,也不像坡公写诗误用典故那般轻松。比如1950年代导致郭沫若与杨树达龃龉的公开化,就是一例。

杨树达在专业上和郭沫若有相同处,学术声望,则杨树达称第一。陈寅恪曾说:"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今读是篇(指《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笔者注),益信其言之不诬也。"[28]

㉓《欣然斋史论集》第1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㉔ 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㉕《欣然斋史论集》第10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㉖《欣然斋史论集》第9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㉗《欣然斋史论集·总序》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㉘《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1942.12.25)。见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编:《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第1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5月版。

陈寅恪说这番话生怕被误认为有阿谀嫌疑，尚作声明道："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29]

正因为杨树达在训诂学上居独占鳌头地位，所以在1940年代初，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能说出"觉可商榷处颇多"[30]的话。而郭沫若则对杨树达的学识深表敬意。1940年12月25日，他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31]

但随着郭沫若受命中科院院长之后，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中科院审查。郭沫若且在1953年8月致杨树达的函中，对杨树达颇作宽慰文字："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32]

这样的姿态，终究引出一场风波，直至惊动毛泽东。1955年2月14日，杨树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庼甲文说》自序，信中批评中科院审查书稿有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语并予回复。信的全文是："遇夫先生：二月十四日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此复。顺祝健康！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33]而这场风波与李亚农也有关。

1950年末，杨树达的《金文说》脱稿，李亚农审查之，评价不高。唐兰也颇置微词。此后，中科院又让不懂学术者审查杨树达的其他著作。这使杨树达不能容忍。他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

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34]

由于毛泽东的回信,郭沫若与杨树达的纠葛由是缓解。但此事留在杨树达记忆中的关联者,印象很不佳,甚至联系到了个人的学术品质上。

郭沫若曾致函杨树达对董作宾提出批评,与前此对董的评价判若二人,杨树达对此很不以为然。杨树达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35]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6]现在,“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37]“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

这里,杨树达虽没有点出“可为之助者”乃何许人氏,但所指清楚。

其实,郭沫若和李亚农在一些学术问题上,虽有用非学术方法进行干预的可能,但不能简单牵扯学术品质。

陈寅恪对中科院不满意,曾说:“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39]

原因何在?

一定程度上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于实际,却以个别言论权衡一切所至

㉙《陈寅恪致杨树达》(1942.8.20)。见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编:《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第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5月版。

㉚《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1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㉛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第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㉜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第5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

㉞《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4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㉟ 笔者查得,1933年郭沫若在所著《卜辞通纂》的《序文》中曰:“余为此书,初有意于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继得董氏来书言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之作,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以求之,体例

也。此风既倡，大多数人言必马恩列斯，而且急功心情迫切。李亚农就说："我们在建立了人民的政权的今天，就必须马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来教育人民。"[40]因此，所谓郭沫若的"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云云，李亚农的审杨树达《金文说》而予"妄评"之类，总体看，是社会问题。其间，抑或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朴素情感，导致对经典作家词句囫囵吞枣的因素。

遗憾的是，正由于形成如此大氛围，李亚农等当年积极投入的中国古史分期大讨论，也不免带有"绝不重视史学"的色彩。所以，这场讨论尽管被誉称中国古代史研究开出的五朵金花之一，但在顾准看来，无非是"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而已。[41]

顾准甚至在 **1974** 年 **8** 月，深深感叹："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42]

可怜什么？可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却使人昭昭。

中国古代史分期，完整表述，就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讨论焦点是，中国有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所定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它们的分期。

由于这个问题在解放后，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命题挂钩，所以，对中国古代历史是否也适合这个社会形态顺序，没有公开异议，只是对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界线在哪里，产生了激烈争论。并结出所谓"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和"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的"三论五说"硕果。

其实，马克思对任何地区任何社会是否必然经历奴隶社会，自己的把握不是很准。因为马克思知道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表述社会经济形态

演进的几个阶段时，在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之前，加上了亚细亚的。[43]并且在亚细亚之后，不用“奴隶”一词，而用“古代”一词，使“古代”一词，既包括奴隶制，又涵盖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

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范畴，恩格斯做了小部分工作，他说：“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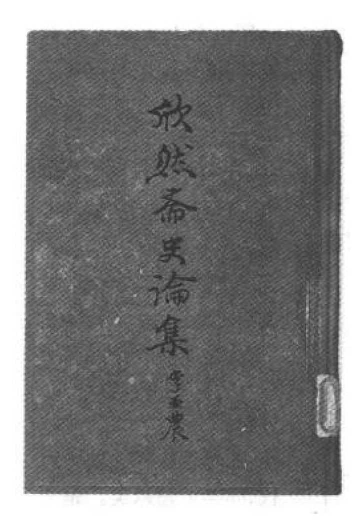
列宁则退回到马克思立场，他很审慎。列宁说：奴隶占有制社会，在“整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都经历了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45]

但一到斯大林，就不给“亚细亚的”留余地。斯大林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46]

不过，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在1938年作出的。及至晚年，斯大林对此似有重新考虑迹象。据原中科院副院长张稼夫回忆：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到达离莫斯科还有三站的地方，忽然传来斯大林逝世

綦密。贞人本董氏所揭发，坑位一项尤非身亲发掘者不能为。文虽尚未见，知必大有可观。故兹亦不复论列。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及《甲骨年表》，均有益之作也。怀疑甲骨者之口已被闭执，即骨董趣味之刘罗时代，亦早见超越矣。”是书《后记》复云：“本书录就，已先后付印，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敬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而使余尤私自庆幸者，在所见多相暗合，亦有余期其然而苦无实证者，已有董氏由坑位贞人等证实之。余读此文之快味，固有在寻常欣赏之上也……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

㊱《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3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李亚农的《欣然斋史论集》

消息。张稼夫说：

后来了解到，斯大林在逝世前，对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访问，已经作了指示，要苏联科学院热情接待，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如对历史分期等问题，不要争论等等。[47]

可惜，中国的历史学家，既没有敏感到斯大林这一态度的变化；也漠视 1899 年 3 月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揭开克里特文明，从而使马克思依照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古代史学水平立论相关学说的论据黯然失色，却照旧为奴隶制与封建制在中国的断代，作论战。

当然，这个争论近似多余。但略去曾经发生的一页，似乎苍白，何况李亚农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发表了当时看来是相当有分量的“论断”。故特作各要点的归纳：

1. 商代是奴隶制社会

关于殷商社会性质讨论，概括起来，有四说：一、原始社会末期说；二、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说；三、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说；四、奴隶社会说。

李亚农通过对殷代的物质文化特征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和主要生产者的身分地位进行分析，认为殷代的直接生产者“众”和“民”是可以“像牲畜一样地来屠杀的”奴隶，从而得出殷代是奴隶社会的结论。[48]

2. 商代的物质文化特征和生产力水平，有了突破的萌芽

随着古史分期讨论开展，标志商代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工具的性质，自然成为商代社会性质论争的焦点之一。多数认为商代虽然是青铜时代，但农业生产工具仍以木、石、蚌器为主。另一种意见认为，商代农业中已经使用青铜工具甚至铁器。

李亚农虽然承认殷人在农业生产上还普遍使用石器，但认为少数富裕的自耕农已使用"带有青铜尖的木犁来耕耘土地，不是不可能的。少数奴隶主更进一步使用带有青铜尖的、用家畜拖拉的木犁来大规模耕种土地，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应当说是"合于逻辑的"。[49]

3. 商代主要生产者是奴隶

正确认识商代生产劳动主要担当者的身分，是判断商代社会性质的关键。李亚农同意郭沫若对"众"和"众人"的解释。他针对胡厚宣在《殷非奴隶社会论》中根据《尚书·盘庚》篇的"众"可以参与迁都之议而推论他们不是奴隶的意见，说：《盘庚》篇的"众"的确不是奴隶，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由殷王下令集体耕作的"众"也不是奴隶。"道理很简单，同是奴、仆、臣、妾四字，只要你用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它就会有不同的涵义"。[50]

[37]《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3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38]《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3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39] 杨树达说："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详《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3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40]《欣然斋史论集·总序》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41]《顾准文集》第28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42]《顾准文集》第28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版。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45]《列宁全集》第37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46]《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第64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1月版。

4. 商代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是私有

从土地所有制形态探讨商代社会性质，是解放后一些史学工作者以马、恩关于农村公社理论为指导，把古史分期讨论向前推进一步的新课题。

尽管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不承认商代存在土地私有权，但李亚农对此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提示，货币是跟土地私有权同时出现的，对土地的完全而自由的所有权，就是表示可以出售它。商代既然已经有了金属货币，则土地的买卖和抵押是应有的历史事实。[51]

5. 周族在灭商前所处的社会是氏族制阶段

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后，学界对殷周之际社会性质的认识，一直纷纭。一说原始公社末期，奴隶社会开始；一说殷周都是奴隶社会；一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李亚农认为，周族到了古公亶父时才开始筑城郭、宗庙、宫室而居。按照恩格斯关于从野蛮到文明的说法："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52]可见周族在古公时代才开始脱离野蛮阶段而转入文明。关于文王的一些故事，说明他还是没有脱离生产的一个氏族酋长；那时的社会仍停留在家长奴役制阶段，其特征就是奴隶生产尚未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奴隶只是主人的助手。李亚农还认为，《尚书·无逸》中周公谆谆告诫周族子孙不要脱离生产、追求享受，其口气决不像习惯于奴隶制度的奴隶主。《诗经·豳风·七月》据《毛传》说是周公陈述先公先王的王业的诗篇。诗中说："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只有在氏族组织中，才

有可能把打猎到的大猪作为团体公有,小猪作为个人私有。诗里又说:“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说明氏族的脐带在当时还是紧密地把氏族成员维系着的。[53]

6. 周灭商没有发生社会制度的变革

武王克商的性质是什么?西周封建论者认为,这是社会制度变革的标志。西周奴隶社会论者认为,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的周族,不可能跳过奴隶制阶段而“跃变”到封建社会。因此,武王克商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内部的政权更迭,不是社会制度的变革。

李亚农说,奴隶社会的解体,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奴隶来源的枯竭。周族在灭殷之后,所遇到的并不是这种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奴役了整个的殷族,有了大规模使用奴隶来组织集体劳动的有利条件。在这样实行奴隶制生产最有利的时期,已经开始尝到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力的滋味的周族,是不会主动地废除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采用封建制的。[54]

7. 西周的分封是利用“同姓”奴役和统治殷人

西周初年的分封制是古史分期的一个重大问题。不同的看法,鲜明区分了西周封

㊼ 张稼夫:《我与中国科学院》,见《中国科学院编年史》。

㊽《欣然斋史论集》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㊾《欣然斋史论集》第4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㊿《欣然斋史论集》第4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51]《欣然斋史论集》第4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

[53]《欣然斋史论集》第2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54]《欣然斋史论集》第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建论和西周奴隶论的界限。

李亚农不同意把西周分封说成是封建制，但也不同意郭沫若和侯外庐把西周"封建"解释成军事殖民制度。他认为，古希腊因为地寡人稠，工商业高度发展，才不得不向外殖民，开拓市场；周初的情况却不然。周人是农耕民族，无须为商品开拓市场；其次，周族人口并不多，犯不着跑到远离岐下的东方去殖民。因此，周人的"封诸侯，建同姓"，并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奴役和统治殷人。[55]

8. 西周灭殷之后在保存宗法制度同时，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西周封建论者一般认为宗法制和封建制有密切联系，甚至把这宗法制度看作是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宗法制度"实际上是父系家长制的产物，是氏族社会的残迹，因此它并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相反，与奴隶制结合在一起。

李亚农说，周族在灭殷时，还处于家长奴役制时代，个体家族虽然已经出现，血缘关系还没有完全瓦解。在灭殷之后，他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统治和镇压，必须加强族人的团结和联系。于是，周族创造了一系列的加强氏族组织的办法，而他们的宗法制度也就被保留下来了。但是周人带来的自由的农村公社成员是少数，而与这些农村公社成员并存的奴隶倒占绝大多数。因而周族在灭殷之后，尽管一方面保存了宗法制度，而另一方面他们还是进入了奴隶制社会。[56]

9. 世上没有井田制

中国古代有无井田制，自先秦以来就聚讼纷纭。讨论西周土地制度，当然也要涉及到这个问题。

李亚农对井田制采取否定态度。他说，孟子认为周初实行过井田制的根据是《诗经·大田》里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但《大田》本身就有力地否认了孟子说法。《大田》篇中主人翁的排场说明他是地位

很高的奴隶主。“我私”是指这位奴隶主的私田，“我公田”则是指这位奴隶主的氏族所公有或国家机关的田地。这两个“我”字，和自耕百亩之田的农民都丝毫没有关系。[57]

10. 西周“庶人”和“民”，是直接生产劳动者，他们绝大多数应是沦为奴隶的殷人

在如何认识西周主要生产者身分问题上，主西周奴隶社会论者有三种看法：一、典型奴隶社会奴隶；二、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农村公社成员；三、介乎两者间，既有大量的典型奴隶又有村社成员转化而成的集体奴隶。

李亚农观点和郭沫若基本一致。他不同意奴隶大都从事家内服役，不是生产劳动的直接担当者的说法。李亚农说，《大盂鼎》记载周天子赏赐盂“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嗣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这将近两千的奴隶搁在家里做什么？让他们游手好闲吃白饭吗？这不大合理。何况铭文上写得清楚，这些奴隶是跟疆土同时赏赐的。李亚农还对有争论的《周颂 · 噫嘻》篇进行分析。《噫嘻》篇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李亚农认为，这耕作的两万人假若是周人，他们可能是氏族成员。但周族灭殷的时

⑤《欣然斋史论集》第8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⑥《欣然斋史论集》第2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⑦《欣然斋史论集》第88－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侯，人口总数大概只有六七万左右，而成王所分得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万三千人，平时从事劳动生产的氏族成员亦不得超过四五千人。《噫嘻》中所描写的两万个农业劳动者肯定不会是周族的氏族成员，其中绝大多数应是沦为奴隶的殷人。[58]

11. 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说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里不鬻"的土地关系发生变化；"工商食官"传统被打破，城市日趋繁荣；政在私门，成为时风，"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各种思想和学派相互诘辩，百家争鸣，生动活泼。所有这些，显示春秋战国时代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什么？在古代史分期讨论中，各家意见很不一致。李亚农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开始。并对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说作了较详细阐述。

他认为，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中，生产工具的转变并不起决定作用。罗马奴隶制社会和后来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都使用铁制生产工具。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取决于农奴的出现。西周晚期，奴隶制度已发展到日暮途穷阶段。奴隶在长期残酷剥削下憎恶劳动，贪图怠惰。他们大量逃亡，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同时，由于周族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从战争中获得奴隶的最大来源开始断绝，这就造成奴隶来源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奴隶生产无利可图，奴隶主被迫把广大领地割成小块，租给以前的奴隶耕种，奴隶也逐渐转变为农奴。中国奴隶社会开始解体于周厉王前后，到春秋初期的齐桓公时代，这两百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春秋时代是诸侯割据的封建制社会，到秦统一全国后，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社会。[59]

12. 农村公社很早就瓦解，但残余留传二千年

在井田制与农村公社瓦解的争论中，李亚农把农村公社“死亡”的时间提得很早。认为早在西周，公社不单是在经济生活中丧失了重要性，而且在行政组织中也丧失了它原有的地位。但是他也承认，农村公社的残余，一直留传在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生活中。[60]

13. 作丘赋等，是打击封建领主的政策

春秋时代各国赋税制度相继改革。如何认识子产在郑国实行的“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以及“作丘赋”政策？主张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初年的李亚农，认为子产的“田有封洫”的政策削弱了封建领主对于土地所享有的绝对的权利，“庐井有伍”的政策废除了封建领主对于农民的兵役权，“丘赋”政策又把封建领主手中的武器统统收归国有。子产实行改革的结果，削弱了封建领主的独立性，使郑国出现了封建地主，同时又出现了自由农民。[61]

李亚农的以上各观点，基本集中于《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和《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中。这五部著作形成的大体情况和主要内容是：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初稿写成于

㊽《欣然斋史论集》第662－6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㊾《欣然斋史论集》第108－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㊿《欣然斋史论集》第919－9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61]《欣然斋史论集》第1014－10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版。

1952 年。此书为李亚农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开端。书中初步提出中国古代史分期大纲,提出许多重要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书稿写成,先由中科院上海办事处铅印,在上海史学会和同行中进行讨论。李亚农说:"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本著作,肯定有许多缺点、错误,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与会者或指出内容缺点,或指出材料错误,或予补充资料。根据这些意见,李亚农作了一次认真修改,才于 1954 年 5 月,正式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最重要观点是,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周宣王时代("宣王中兴")。 李亚农指出:"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在周灭殷之后,还存续了将近三百年。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春秋战国的封建制社会,又存续了五百余年,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62]

《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出版。距前一本书的出版只有四个月。"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根据春秋、战国以及汉初的文献来尽可能明确地叙述周族的氏族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是研究氏族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接触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影响。"[63]李亚农这本著作的理论贡献是,解放后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周礼》、《仪礼》、《礼记》和汉初的其他历史文献,剖析了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特征、渊源和作用。

《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6 月出版。中国史学界在大讨论基础上,大致取得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认识后,对殷代是初级还是高级奴隶制社会,又产生了分歧。李亚农写作此书目的,是想通过"把殷人的社会生活重建起来"的途径,给予回答。[64]

《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1 月出版。这部书是《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的补充,着重研究西周和东周两个历史

阶段的区别和不同特点，进一步说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具体过程。“其中所研究的问题，大概都在著者脑筋中盘桓了十五年乃至二十年以上的时间……例如：什么叫‘夏政’‘商政’，什么叫‘周索’‘戎索’；周宣王‘不籍千亩’和‘料民于太原’的真正涵义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在理解西周的社会性质上，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65]

《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5 月出版。本书距《西周与东周》的出版，相去约五年时间，所以有这么长间隔，是由于著者的健康日趋恶化，从而，自起稿到完稿，整整花了一年功夫。而在这一年之间，著者“几与阎王老子见面者，不止一次”。所以“此书之得以付印，可谓侥幸之极”。[66]

这本书创见颇多。他不仅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的观点，特别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对中国古代史上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提出了新见解。例如，他不仅论述了氏族公社制，还研究了奴隶社会里的村社制度，探讨了作为户口编制的基层组织——里和社的关系，逐一分析了农村公社中的社神、社宫、社祭、社供等民间团体及活动，论证了农村

[62]《欣然斋史论集》，第 20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9 月版。

[63]《欣然斋史论集》，第 22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9 月版。

[64]《欣然斋史论集》，第 3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9 月版。

[65]《欣然斋史论集》，第 60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9 月版。

[66]《欣然斋史论集》，第 87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 9 月版。

[67]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2 辑，1962 年 11 月出版。

[68]《中华文史论丛》第 2 辑，第 30 页“作者声明”。

公社的残骸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

李亚农的学问兴趣很广,除古文字学、中国古代史是他专长,他对哲学、美学、文学都有涉猎。他在古史研究告一段落后,又定出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计划,并在严重咯血情况下,写成一篇两万字长文——《论钱舜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67]评论元朝著名花鸟画家、"吴兴三绝"之一的钱舜举。这是遗作,它成为李亚农研究美术史的开篇和结尾。尽管如此,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美术史的高深造诣和艺术修养。李亚农本来是可能留下一部系统的中国美术史著作的,可是,他的健康状况太坏了。即如这篇论述钱舜举的文章,他本来准备"加上两节研究舜举的时代背景及其传记",但由于笔者在写作此文时,也"是在一段文章一口血的严重情况下写成的,若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实心有余而力不足"。[68]

李亚农自 1949 年到上海工作后不久就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后来又患了肺癌,常常边吐血边写作,氧气瓶和急救药不离身边。他的著作是在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过程中,以坚强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写出的。

从 1952 年开始写《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直到 1962 年 9 月 2 日下午 1 时 15 分病逝,十年间,李亚农写了五本系列性学术著作,字数约七十万。他的最后一篇文章的写成,距死亡仅五个月。生前,李亚农常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这样做,才不算白活一世。""要改变我们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倍努力,急起直追,不可有一点松懈。"

李亚农主要论著

论著	出处
《高尔基的艺术与思想》(署名李宗文)	《光明》第一卷第二号《追悼高尔基特辑》1936 年 6 月
《铁云藏龟零拾》(署名李旦丘)	孔德图书馆出版 1939 年 5 月
《古代文字学的方法论》(署名李旦丘)	《学术》第三辑 1940 年 4 月
《殷契摭佚》(署名李旦丘)	孔德图书馆出版 1941 年 1 月
《金文研究》(署名李旦丘等)	来薰阁书店出版 1941 年 1 月
《殷契摭佚续编》	中国科学院出版 1950 年 9 月
《殷契杂释》	《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 1951 年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5 月
《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9 月
《殷代社会生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6 月
《西周与东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1 月
《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5 月
《欣然斋史论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9 月
《论钱舜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中华文史论丛》第 2 辑 1962 年 11 月



『纵论古今 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

——周谷城传

武克全

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更是一位“纵论古今，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七十多年，以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著译十多部，论文三百余篇，文字三百多万。他是我国唯一的以个人之力编撰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部巨著的历史学家。

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思想活跃的学生时代

1898 年 9 月 13 日，周谷城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长乐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从七岁起，周谷城进入家乡周氏族立小学，农闲时在学校读书，农



周谷城先生

忙时回家作活，前后八年。戊戌变法之后，各地都在开设学堂，推行新学，但周氏族立小学旧势力很强，仍以旧学为主，故少年周谷城在这里初次接触的是经学、史书与集子。周家慈父严母，父亲四十八岁时就过世了，母亲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乡村妇女，但很有主见，虽然家境贫寒，仍坚持送周谷城上学读书。周母高寿，活到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过世。周谷城的倔强性格，很像他的母亲。

1913 年，周谷城十五岁，考入省城第一中学就读。当时，省立一中有许多“洋学”课程，如国文、历史、代数、物理、生物、地理、英文、图画等二十几门。对这些课程，少年周谷城都感到新奇，如饥似渴地学习，积累了不少知识。他尤其喜爱英文，读了好几本文法书籍，大胆模仿外国人说话，还组织了一个英语学会，自任会长。他的国文训练也很好，买了一套《十子全书》来读，其中有老子、庄子、韩非子、抱朴子等等，读出了很多新意。他还系统地读了《国语》、《国策》、《史记集解》等史书。周谷城读古籍，自己断句，不怕断错，并把不认识的字抄在本子上，作文时把这些字写进去，先生改他的作文，有时要查字典。有位国文老师袁六甲，出身进士，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也到第一中学教过国文课，他对周谷城有深刻的印象，后来曾对人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一中古文好的学生是周谷城。”

1917 年秋，周谷城于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他原想报考北京大学，学习政治学，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就考了食

宿免费的师范。但考试很不顺利。这一年，北京高师在湖南只招六名新生，却有一百五十人报名，发榜时他被列入“备取”之中。他没有气馁，自己出路费赶到北京，参加复试。结果，“正取”的六人只考上三人，而周谷城等三名备取生，由于拼命努力，全部被录取了。

北京高师英语部的条件比较优越，除学英语外，还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教育史等课程，这培育了周谷城在教育理论方面的素养。

五四时期的北京，更使青年周谷城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接触了各种新思想。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利用经常罢课的机会，阅读了很多关于各派政治思想的中外文书籍，如胡适、高一涵、李剑农等宣传科学民主思想的文章，恩格斯的《乌托邦与科学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面包掠取》和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等。对杜威来华访问时推崇的“我们时代的三位哲学家”——伯格森、罗素、詹姆士的著作，他也读了不少。此外对在校任教及由北京大学前来兼课的王桐龄、钱玄同、陈大齐、何炳松、朱希祖等人，周谷城都很佩服，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谷城读书，很重视独立思考，不盲从别人，认为读书破万卷，总会成一家之言。因为不满足于当时的社会学思想与心理学说，他曾阅读了十几种这方面的书籍。周谷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乐于参加学术争鸣，勇于发表意见。他接受了阶级分析方法后，组织三个同学，与清华学校的三个学生，开了一个辩论会，论题是“人类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层存在”。辩论时，请胡适等三人当评判员，自己担任正方主辩，进行了两个小时，结果正方失败，他心里很难过。

就在北京高师读书期间，周谷城在校内的《教育丛刊》上发表了第

一篇学术论文，名曰《论美育》。

任教于省立第一师范，从事湖南农民运动

周谷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1920年春，在离毕业还差半年时，他返回长沙，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担任师范部的英语教员，兼教伦理课。就在那里，他认识了当时任一师小学部主事的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友谊。

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期间，周谷城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书是通过当时通行的COD，即付款配货的办法，向日本的丸善株式会社购买的，一套是英文版，一套是德文版。通过对《资本论》的研读，他写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发表在长沙的报纸上。

1923年，周谷城的第一本译作《实验主义伦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生活系统》。对于《生活系统》这本书，他一直很看重，认为自己后来的治学就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在这本书里，周谷城把心理学上所谓的知、情、意三种精神状态看成是相别而又相继的过程，它们有各自的作用，并进而把这三种精神状态转化为治学的过程，即："较为偏重知的为逻辑与科学等；较为偏重情的为艺术与科学等；较为偏重意的为道德与宗教等。"他说："我写书和写文章，好像很杂：既要写历史，又写逻辑，又写美学。但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我的思想系统中非写这些不可；这一点，我在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活系统》一书已决定了。"①

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周谷城同毛泽东、何叔衡、徐特

立、夏明翰及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关系密切,有很多往来。他同徐特立、柳直荀等人一起组织了教育工作者协会,常常到船山学社(自修大学)讲授心理学。1926 年间,他先到广州,后到衡阳、长沙,分别在湖南省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顾问、讲师。1927 年春,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前往武汉,在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担任秘书和宣传工作,此时协会的秘书长是夏明翰。是年 4 月,他撰写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稿,后在武汉出版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

事隔数十年之后,当他大女儿咏湘入党时,周谷城向女婿洪廷彦坦陈了自己当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共产党纪律严明,入了党应该遵守纪律。当初何老头(何叔衡)指着我的鼻子说:周谷城硬不想入党!我说: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行,我这个人毛病多,我要是入党,三天就会开缺,倒不如在外面做点有益的事;请放心,我不会做对不住你们的事!"③事实证明,周谷城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27 年夏,宁汉分裂,湖南反动势力抬头。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迫害,周谷城离开武汉,前往上海。

① 周谷城:《我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文史知识》1983 年第 6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第 878 页;周谷城:《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③ 洪廷彦:《缅怀岳丈谷城师》,《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 201 页。

周谷城到达上海后，在这里居住了三年。因为谋生的需要，他先后在中国公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附中等校兼课，同时，替《民铎》、《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写稿、译书。还和许德珩、陈翰笙、章申府等朋友一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相约著书立说。三十年代上海租界的环境，周谷城养成了“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习惯，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云：“夷场小住且为家，洋服披开以当袈。”

1928 年，周谷城翻译了尼林的《文化之出路》（新宇宙书店出版）、亚诺得的《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春秋书局出版）、《苏联的新教育》、《苏联外交及其邻国》等书。1929 年，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远东图书公司）、《中国教育小史》（泰东书局）两本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多篇分析中国历史、教育的文章。例如，在《孔子的政治学说及演化》一文中，他以独到的见解，驳斥了戴季陶的所谓孔子至孙中山的“道统论”。④在《今日中国的教育》、《教育新论》、《教育与占有欲》、《教育界之党派观》、《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国家建设中之教育改革》、《官场似的教育界》、《论殖民地的教育》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教育与经济也相互联系，揭露了当时教育界派系林立、各占一方、把持校政、败坏校风的腐败现象，并指出，当时所谓的新教育，实质上是殖民地的教育。⑤由于这些文章切中时弊，得罪了当局，他后来无处发表文章，只得另谋出路。

1930 年 8 月，周谷城在上海参与发起成立了由邓演达为总干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于这件事，他后来回忆说：“大革命失败，邓先生到各国考察，拟另组新党。归国后，常嘱章伯钧同志约我为另组新党的发起人。有一次，三人畅谈此事至深夜……我答谓‘道德方面的支持我竭全力’，所以革命行动委员会所创办《行动杂志》第一期上，我有国

际经济论文一篇，足证心意。”[⑥]

大学教授，著书立说，投身爱国民主活动

1930 年秋，周谷城经人介绍，前往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是他大学教授生涯的开始，从此一面教书，一面著书立说，同时，投身爱国民主活动。

作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谷城聘请杨东莼讲唯物论，张粟原讲文化人类学，自己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为了让学生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又开设了英文史学名著选读，其中，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最后一章，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的导言等。周谷城的这些进步举动，在学校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却遭到学校当局的妒忌。1932 年淞沪战事爆发，上海的一批进步学生，为躲避战乱来到广州，周谷城以社会学系主任的身分全部接纳他们在社会学系借读。这引起了学校当局的仇视，他们散布谣言，说周谷城从上海带来了大批共产党，宣传赤化。并唆使组织所谓的“护校委员会”，对周谷城写匿名恐吓

④ 载《民铎》，1927 年第九卷第 1 号。

⑤ 这些文章，分别发表于 1927 - 1931 年的《教育杂志》、《社会与教育》等期刊。

⑥ 周谷城：《莫逆于心而共鸣》，《前进》1981 年第 11 期。

信，扬言要用手枪对付。恰在这时，上海暨南大学请他去任教，于是他便辞职回到了上海。[7]

三十年代初，周谷城重点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撰写了《中国社会史论》三卷，即《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状》，先后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同时，翻译了美国社会学家 Gillin 等著的《社会学大纲》、[8]《黑格尔逻辑学大纲》[9]以及《小逻辑》的一部分。

1932 年秋，周谷城受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邀请，到该校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在这里，他讲授比较逻辑、社会学名著选读，后来转向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不久，校长郑洪年被反动派赶走，新校长因周谷城支持进步学生，反对所谓"本位文化"，撤了他的系主任职务。当时，暨南大学文法学院都要教授中国通史，课多教师少，周谷城就在以前中国社会史论的基础上，搜集资料，编写《中国通史》。经过多年的努力，1939 年，《中国通史》上下两册由开明书局出版，共八十多万字。

《中国通史》，是周谷城作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著作，在迄今的中国通史著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章节体通史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叶，在周著《中国通史》出版前，中国通史的著作仅有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李泰芬的《中国史纲》三卷；王桐龄的《中国史》四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运用"历史完形论"这一史学理论，阐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谓历史完形论，就是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分析人类过去活动的全体诸因素"，[10]整体地把握历史的变迁。在《中国通史》中，周谷城历述中国从远古直至北伐战争的整个历史，将其分作"游牧部族定居时代"、"私有田制生成时代"、"封建势力结晶时代"、"封建势力持续时代"、"资本主义萌芽时代"五编；每一时代，都突出了经济制度的变革、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同时，又阐述了当时社会阶级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古史分期上，把西汉

末年的新莽元年(公元9年),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成为我国史学界古史分期说的一派。正因为《中国通史》的这些特点,它出版后很快被许多大学的进步教授用作教材。即便在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尤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本书的地位也未被取代。到1948年,该书重印十二次。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又多次重印,至今在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日本和美国仍经常被列为参考书。

《中国通史》出版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暨南大学校方也藉口该书有马克思主义嫌疑,不再让他开设中国通史课程,而要他改教世界史、世界史学史。周谷城对此满不在乎,认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了解它的过去与现状,不懂得世界史是不行的,应该两者结合起来研究。

1940年,周谷城的新著《中国政治史》在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继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新政治学》之后的中国政治学的又一奠基之作,也是比较早的客观评价洋务运动的代表著作之一。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中国知识界开始以进化、进步、学习西方等为标识的现代意识,研究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并围绕各种历史与现实问

⑦《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第878页。

⑧《社会学大纲》大东书局1933年出版。

⑨《黑格尔逻辑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

⑩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1983年。

题，进行了反复论辩。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史学在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在内的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大体已取得共识。周著《中国政治史》对洋务派的经济活动的分析，其认识已超过了梁启超所谓"烟消云散殆为昨梦"或"无一成效可睹"的片面评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上海"孤岛"沦陷，暨南大学迁往福建，周谷城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潜赴大后方。他在途经杭州时被日伪逮捕，拘禁了三十七天后获保释，后来辗转到了重庆。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在内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他先在陈望道为主任的新闻系任时事英语选读和文学院各系的选修课西洋通史教授，后在史地系开设西洋近古史。这时的复旦大学，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在任教。周谷城除与校内的许多教授保持经常的联系外，还和当时居住在重庆和北碚的一些进步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陶行知、翦伯赞等人保持着交往，一起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他曾协助陶行知、翦伯赞、邓初民等开办社会大学，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此同时，他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1943年翻译了《美国与战后新世界之关系》、《新英国与新世界之建设计划》两书，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在《新中华》、《宪政月刊》、《民主世界》、《东方杂志》、《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论证中国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引导青年为争取民主政治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旧址，周谷城担任历史系主任。此时历史系的教授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前往别处任教，为了充实师资力量，他聘请了周予同、胡厚宣、陈守实、蓝文征等教授来历史系任教，自己主教世界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

他与张志让、潘震亚、沈体兰、翦伯赞、李正文等人，发起成立了大学教授联谊会，在《大公报》上发表反对内战宣言，联同签名的有数十人。1947 年夏秋，因为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周谷城被学校当局解除了系主任职务。这之后，他除了继续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的活动外，以主要精力撰写《世界通史》。1949 年，他的三册叙述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历史的《世界通史》写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和国外同类著作相比，无论体系构成还是具体论断，都表现了作者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首先，这部通史根据世界历史发展自身的规律和协调性，改变了以往世界通史中"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看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11]在书中，周谷城不是简单地排列一个个国家发展演变的过程，而注重阐明国与国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情况和趋势。例如：第一册叙述了尼罗河流域、西亚、爱琴、中国、印度、中美六大文化区形成的历史过程，接着便分析"古文化之传播"。第二册把重点放在亚欧势力的往返及东西文化的交流上，认为十五世纪地理

⑪ 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世界通史》第一册，《弁言》第1页。

大发现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这三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互相并存，又互为消长，除相邻诸国存在的固有联系外，地理位置相隔较远的国家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接触和交流。其次，这部通史打破了先前世界通史几乎一以贯之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先前的世界通史，一般都从埃及开始叙述，接下去便是希腊、罗马，称之为“古典世界”，即便提及亚、非地区，也将之归为古典时代。周谷城自始至终明确表示反对“欧洲中心论”，指出欧洲在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后的两个世纪中确是世界发展的中心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历史从头至尾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在《世界通史》第一册中，他阐述了中国、印度等的古代东方文明各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它们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世界通史》第二册中，除叙述西欧不同势力之间的消长、兴盛与衰亡外，更重点论述了亚欧非三洲的相互关系，并将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西鲁士创建波斯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势力全盛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作了完整的正面叙述，证明了以基督教文明为世界中心全无根据。《世界通史》第三册，论述了十六世纪以来的二百多年中，欧洲政治变革、海外开拓及重商主义成功的全过程，同时叙述了东方重商主义失败的历史，进而叙述了重商主义下世界的变化及东西思想发展的状况，说明了即便在这一时代，也决不能以欧洲通史取代世界通史。第三，这部通史力求从世界历史发展本身的实际出发，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⑫例如，书中对于经济关系的变革、政治形态的发展、阶级斗争以及种族斗争、民族斗争、宗教斗争、国家斗争等，都努力按照其真实状况加以说明，避免用一个固定的公式去套用；同时强调，这些斗争并不是一切，通过斗争，各地区、各国家、各不同文明的人民有了更多的交流，人口迁徙，人种也产生混合，由此

达到新的融合与统一。第四，这部通史广泛用了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助于认识各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是中国历史学家贡献于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界的一部珍贵的科学著作，它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这部通史的第四册“平等世界之创造”，叙述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当时未及写出，后来作者一再想补写，但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上海解放前夕，1949 年 4 月 26 日，国民党军警大肆搜捕复旦进步师生，周谷城也遭逮捕，被关押于警备司令部。后经校方具结担保，他被交学校“管束”，直到 5 月 26 日上海解放，才获得自由。

⑫ 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弁言》第2页。

新复旦的推动者，坚持真理不怕压力

上海解放后，1949 年 7 月，周谷城被陈毅、粟裕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复旦大学教务长。是年 9 月，他以候补代表的身分，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筹



1985 年周谷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活动。从此，周谷城以满腔的热情，高度的责任心，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

在复旦大学教务长任内，周谷城藉院系调整之机，积极做各地一些著名学者的工作，邀请他们到复旦工作，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例如，浙江大学的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学者蔡尚思等，就在这时应邀来复旦工作，增强了复旦教学和科研的实力。周谷城着力整顿校风校纪，制定了一套考试章程，明确规定考试舞弊成绩作废。他动员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他的言辞曾激起了学生的高昂热情，一次曾有七百多位学生报名南下参军。他坚持上讲台，参与教学实践活动。复旦大学后来成为全国的名牌大学，周谷城当年的努力功不可没。

周谷城也为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了许多重要的创始工作。1951 年，他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之托，成立了中国新史学会上海分会（后易名为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之职。由于周谷城和周予同、李平心、金兆梓、谭其骧、吴泽、陈旭麓、魏建猷等一批史学家的倡导、努力，上海市历史学会一度相当活跃和繁荣，成为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团体。1956 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即上海社联）的筹备，1958 年 3 月该会成立时当选为副主席。

解放后，周谷城专门教授世界上古中古史，而学术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五十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了《中国奴隶社会论》⑬《奴隶社会

意识形态之研究》[14]等文章。1954 年,新知识出版社重印他的《中国通史》。1956 年,群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新著《古史零证》。1957 年,他对《中国通史》进行了修订,转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连续发表了《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5]《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6]《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7]《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评〈世界史简易丛编〉》[18]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关于创立"有机的统一整体"的世界史体系的思想。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关于历史哲学问题的两场大讨论中,更是表现了周谷城坚持真理,不怕政治压力的崇高操守,受到人们的敬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学校的有关系科中开设有形式逻辑课程。但是由于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逻辑学界出现了把形式逻辑辩证法化,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形式逻辑的危险倾向。周谷城虽然不是一名专业的逻辑学家,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自己逻辑学的深厚基础,挺身而出,在 1957 年《新建设》第六号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

⑬ 载《文汇报》1950 年 7 月 5 日。

⑭ 载《新中华》1950 年 8 月号。

⑮ 载《学术月刊》,1959 年第 12 期。

⑯ 载《文汇报》,1960 年 11 月 20 日。

⑰ 载《光明日报》,1961 年 2 月 7 日。

⑱ 载《文汇报》,1961 年 9 月 10 日。



周谷城与夫人李冰伯

法》一文，对形式逻辑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诸如形式逻辑的科学性质、作用、客观基础以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等，作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然而，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逻辑学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互关系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对周谷城观点的一场大批判。不少文章把他的看法视作为离经叛道，"违反经典作家的直接指示"，"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周谷城虽然深感"孤立"，但还是一再撰文答辩，相继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反复指出形式逻辑只是一门涉及推理正确性即有效性的工具科学，它不仅与形而上学不同，也与辩证法相异，明确而深刻地阐明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性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后来，这场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并得到他的支持和首肯，使这场争论事实上以周谷城观点的确立而告一段落。1962 年，他发表的这方面论文，以《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为书名，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的"讨论"，发端于周谷城 1961 至 1962 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发表于 1961 年 3 月 16 日《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一篇是发表于 1962 年 2 月 9 日《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一篇是发表于 1962 年 12 月号《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这三篇文章中，周谷城从史学、美学、艺术创作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如何认识时代与时代精神，如何正确认识科学、道德、艺术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

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支配一切理论与实践的“斗争哲学”的错误思潮。周谷城的这些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出的“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立即遭来了一场人多势众的围攻。文痞姚文元专门写了《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两文，在政治上讨伐周谷城，把他的观点斥之为“违反逻辑”、“违反历史进程”的唯心论，“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但是，周谷城毫无畏惧，孤军一人英勇奋战，在辩驳过程中又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论》一文，[19]直接反驳了姚文元把矛盾斗争绝对化的观点。在争论过程中，他坚持认为："不矛盾或无差别境界在自然界或社会中或历史上都有地位；""各时代的时代精神是统一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1964 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招待外宾时，见到正在受到“学术讨论”四面围攻的周谷城，非常关切地询问说："周谷老，受得了吗？精神还吃得消吗？"[20]对于这场“学术讨论”的走向，虽非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所能主导，但历史终于对周谷城作出了公允的评价。1980 年，他的这些文章被收入《史学与美学》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⑲《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论》，载《光明日报》1963 年 11 月 7 日。

⑳ 周谷城：《怀念周总理》，《光明日报》1979 年 3 月 3 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谷城首当其冲，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他不仅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并且受到各种人身侮辱和肉体摧残。在“文革”那样的逆境中，周谷城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消沉，而是以哲学家的睿智和历史学家的博大胸怀，看待眼前的纷扰和个人的不平常遭际。对于许多色厉内荏的“大批判”，他或者不予置理，或者厉声抗辩。在“牛棚”之中，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表现了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正直学者的风范。

肝胆相照的战友，鞠躬尽瘁的学者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周谷城年事已高，但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一面积极参与各种重要的国务活动，一面坚持不懈地为中国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为政治家，周谷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他晚年先后担任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以渊博的学识、坦诚的态度、诤友的胸怀，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他积极提议制订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市的基础教育，为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和监督提出许多意见，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担任全国人大领导职务期间，他不顾年老体衰，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还为推

进我国与各国议会间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和农工民主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加快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积极参政议政，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他始终关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重视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此筹建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还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直到病重期间，他还关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作为教授、学者，周谷城积极参加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以及上海社联、上海市历史学会等的恢复工作，继续担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联副主席，从 1988 年起担任上海社联名誉主席。他还是中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

周谷城对发展我国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热情不减当年。1982 年，他写了《办好历史系的几点意见》一文，对我国高等学校历史系建设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历史系可开设三门课程，即基础课、必须选修课和自由选修课；加强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扩大外文范围，提高史学的情报工作，历史系至少要开设英、俄、德、法、日五种外文；教师应把教学、科研、著作合理地结合在一起。[21]他仍然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并登坛授课，指导研究生，培养了“文革”后的我国第一批硕士、博士。他一生的教育论著，经由张兰馨等人选编为《周谷城教育文集》，1991 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史学研究方面，周谷城发表了《世界是多元的整体》、[22]《加强近现代史的研究》、[23]《世界史上现代化的加速发展》、[24]《把中国近代史放在世界现代化中去研究》、[25]《再谈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看法》[26]等

文章，对繁荣我国新时期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深刻的见解。1987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一书。

周谷城晚年特别关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力主推进中西文化交流。1982 年，他主持召开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倡导开展建国以来几乎空白的中国文化史研究；1984 年，主持创办了建国以来第一份以“中国文化”命名的刊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5 年主持召开世界文化研究学者讨论会，1986 年主持召开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1987 年主持编辑出版《世界文化丛书》。这些也都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了填补我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空白，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1984 年，他与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一起，致书教育部发起在东北师范大学等校建立埃及学、亚述学、爱琴文明学、希腊罗马文明学人才培养基地。这同样为建国以来第一次。

在文化问题上，周谷城反对全盘西化，也同样反对全盘东化或全盘中化。为此，他撰写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见和希望》、[27]《文化不是铁板一块》、[28]《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交流》[29]等文章。在《周谷城文化、艺术文集》自序中，精辟地表述了自己对文化问题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文化，无论是中国的或世界的，东方的或西方的，都只能是一个概括的、复杂的统一体，决不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东西。文化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双向交流。决不会由一方取对方而代之。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会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复归。我看这是机械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30]这可视作周谷城一生研究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研究哲学与美学心得的总结论。

1996 年 11 月 10 日，周谷城久病后在上海逝世，享年 99 岁。周谷

城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等，敬献了花篮，表示深切的哀悼。根据周谷城生前立下的遗嘱，在他的遗体火化时没有开追悼会，没有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留骨灰，为他送行的，只有与他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李冰伯和亲属，实现了作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宏愿。

㉑ 载《高教战线》1982年第4期。

㉒ 载《文汇报》，1988年3月6日。

㉓ 载《光明日报》，1988年6月15日。

㉔ 载《文汇报》，1989年1月31日。

㉕ 载《求索》，1989年第2期。

㉖ 载《文汇报》1990年10月3日。

㉗ 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4年第3期。

㉘ 载《中国文化报》，1986年7月9日。

㉙ 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

㉚ 张兰馨、袁云殊编：《周谷城文化、艺术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序第1页。

周谷城主要论著

《生活系统》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928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3册
《中国教育小史》	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
《农村社会新论》	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
《中国社会之结构》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77册
《中国社会之变化》又名《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论》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1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77册
《中国社会之现状》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77册
《社会学大纲》(译著)	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
《中国通史》上下册	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1948年再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民国丛书》第3编第62册
《中国政治史》	中华书局1940年,1982年再版
《中国史学之进化》	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
《世界通史》1-3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71册
《黑格尔逻辑学大纲》(译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
《古史零证》	上海群联书店1956年《周谷城史学论文集》1983年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三联书店1962年

《史学与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周谷城教育文集》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文章丹心共辉光
——周予同传

廖　梅

周予同，1898 年生于浙江瑞安，初名周毓懋，学名周蘧、周豫桐，曾用笔名天行。瑞安地处浙江东南沿海，距现今浙江省省会杭州四百七十公里，依山面海，风景优美，人文荟萃。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元代南戏鼻祖高则诚、清末古文经学大师孙诒让都是瑞安人。周予同少时就读于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入瑞安中学求学。1916 年，十八岁的周予同离开故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钱玄同的学生。1919 年，周予同参与组织“火烧赵家楼”行动。毕业后，于 1921 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1932 年离馆回乡探亲，任教温州十中。1933 年起，先后在安徽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40 年参与发起《史学季刊》。1943 年至 1950 年代初期，兼任开明书店编辑。1945 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1949 年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担任《辞海》副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主编。“文革”中受到冲击，被押至曲阜挖掘孔子坟墓。1981 年因



周予同先生

病去世。代表作有《经学历史》注释本、《中国现代教育史》、《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等。

冷静的经学史家

周予同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经学史家，他注重从社会、政治的变化中找寻经学嬗变的历史原因，为经学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留下了宝贵的成果。

辛亥革命以后，从洪宪皇帝到北洋军阀政府，都在鼓吹学校读经。同时，“打倒孔家店”，抨击纲常名教的呼声也越来越响。周予同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他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不去研究打倒和废弃的充分理由，显然不能证明孔子的思想已不适合现代的中国。因此，他决心揭开经学的真面目，“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枉费精神”。

1927 年，周予同拟订了系统研究的计划。首先酝酿撰写《孔学变迁史》一书，“详述孔子自身及其学说之扩大与变化，就历史上的研究以塞梁漱溟氏辈以孔教代表东方文化及晚近之孙中山先生孔子化之误谬思想”。梁漱溟自“五四”以后，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漱溟卅前文录》等著作里，屡次把孔子比作入世的佛祖，把陆王心学援禅入儒的所谓孔学说成东方文化的至善代表。而 1925 年孙中山去世以后，“举起左手驱逐共产派，举起右手打倒反动派”的所谓“戴季陶主义”的发明者戴季陶，接连刊布《三民主义之哲学的渊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论作，说三民主义乃“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因而孙中山是孔子“道统”的嫡传，其作用便是替蒋介石背叛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张目。周予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的上海，坚持要摒弃梁漱溟、戴季陶等的“误谬思想”，无疑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需要具有勇气。

作为钱玄同的学生，周予同对晚清经学的两大派——坚持古文经学的孙诒让、章炳麟一派和专主今文经学的廖平、康有为一派的学说，都有很深的了解。同时，他对“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从1926年起，直到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迫使这位爱国学者搁笔抗议时为止，周予同在经学史方面，共发表了六本著作：《经今古文学》（1926年初版，1933年重版），《经学历史》注释本（1928年，清末皮锡瑞原著），《朱熹》（1929年），《群经概论》（1933年），《孔子》（1934年），《汉学师承记选注》（1934年，清江藩原著）。同时，还有近二十篇论文杂著，主要如《经学史与经学的派别》，《“孝”与“生殖器崇拜”》，《纬书与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纬谶中的“皇”与“帝”》，《“汉学”与“宋学”》，《〈大学〉和〈礼运〉》，《〈孝经〉新论》，《〈春秋〉与〈春秋〉学》，等等。

一提起“经”，人们不免联想起封建古董。确实，自从西汉统治者把《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儒家著作，当做孔子的经书，治国的法典，立为官学那时起，它们就逐渐变成僵硬的东西。“经”的名目愈增愈多，由汉朝的“五经”，到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再到宋朝扩充为“十三经”。它们都是先秦乃至两汉的作品，或传巫术，讲礼仪，或论哲学，说历史，或为古代文件的汇编，或为两周诗歌的总集，还有“语录”和辞书。这些著作，内容庞杂，文字古奥，要强迫百千年后的青年们，当作宗教教条去死读硬记，已经很难。再要他们适应君主政治的不同需要，去寻章摘句，曲解附会，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传经的经师，解经的注疏，便愈来愈多，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叫做经学。

从汉初到清末，二千一百多年中，因为封建王朝的提倡和封建传统的因袭，经部书籍在数量上已达到吓人的地步，单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便总计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

清理这份庞大的经学遗产，无疑应该从材料入手。理由很清楚："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清朝的乾嘉考据学者们对经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的功夫主要花在搜集材料上，辑佚、校勘、训诂、考订，将大部分经学著作"是什么"的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清末的康有为、章炳麟，都程度不等地接受了进化论，原本可以系统地探讨封建经学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由于他们把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同政治上的党派分野纠缠在一起，结果都没有为后人整理出关于经学发展过程的较完备的材料。

所以尽管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若要研究经学的历史，依然非自己动手整理材料不可。周予同便是从这里做起。他以为，经学是封建时代统治学说的总称，但它决不是凝固的铁板，而是内部存在着不同学派的统一体，因此整理材料，首先应该注意经学的分派，求同，求异，决不能"混"。

关于经学的分派，清朝的考据学家一般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近人刘师培按照时代，分成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近儒四派。范文澜则分成汉学系、宋学系和新汉学系三个部分。周予同觉得都不尽妥善。他认为，清儒所谓的"汉学"，专指东汉古文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把经学史的首尾截去了；刘师培所说的两汉和近儒两派，都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学两派。而范老的汉学、新汉学系的说法，在周予同看来，也存在与刘说类似的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区分经学派别呢？周予同以为，封建经学的中心

人物是孔子;历代经学家的一切分歧和争论,焦点便是对于“在中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学术思想史上握绝大权威的经典和孔子”的见解完全相异。如果以此为标准,则繁重的经学,也不过可以归纳成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他说:“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周予同也指出,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与东汉原始的古文学有不同,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与西汉原始的今文学有不同,元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也有不同。六十年代初期,周先生又从详密性着眼,对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作了更细致分析。

既然孔子问题是经学各派分歧的焦点,研究孔子的真相,显然非常必要。孔子问题始终未曾得到解决的原因,周予同认为:“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由于“道统”、“学统”之类观念在作祟,致使拿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代替真正的客观的孔子的现象,在封建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上,变化得更厉害;所以,他很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中国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

正因如此,周予同同时研究了真、假两个孔子,“假的孔子正所以衬托出真的孔子的真实性”。他特别研究了两汉之际纬书中所描绘的

假的孔子。《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是这类题材所仅见的专篇;而《孔子》一书给予纬书材料的特殊注意,也使它现出与以往同类著作很不相同的色彩。这不免令人感到惊奇:从《孟子》起,在儒家著作里,假孔子的形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周予同偏偏选择鬼话连篇的谶纬里的孔圣人作为研究对象呢?

原来,周予同以为,在封建时代,孔子由人变成超人,变成救苦救难的神灵,其源盖出于谶纬。例如,孔子为黑帝精灵所"感生说",孔子接受天启为汉"制法"说,诸如此类的妖言怪语,都是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尊奉孔子为"玄圣素王"的根据,也都出现于纬书。既然归在孔子名下的经书,被封建统治阶级当作了宗教教义大全,那末在清算它的时候,就不能对从神学角度解经的材料置之不理。

但这还不是作者的全部意向。周予同毫不讳言,他所以挑出两汉纬谶中的假孔子形象来示众,还因为纬谶家们给孔子穿上奇装异服的伎俩,以后曾经不断被重复。"不信,在最近几年,孔子不是穿著不相称的'中山装'在摇摇摆摆的吓人吗?那么,现在发表这篇文章(《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引注),命意也不过是在看看两汉间孔子所穿著的怪装,好使刁黠的政客与忠厚的书生们清醒清醒点"。暴露古代神学的妖妄,也为了照出戴季陶辈制造现代迷信的丑态,这正是在实践作者当初要写《孔学变迁史》的初衷。

假孔子不足凭信,真孔子是个什么样子呢?周予同继续研究孔子的传记,研究孔子学说的各个侧面,利用他判断可信的材料,尽力描绘孔子的真相。他的结论是:这个孔子,既非今文经学家所尊的"素王",也非古文经学家所推重的专研名物训诂的学究,更非宋学家所刻画的那种头脑不清的哲学家,同时也不像康有为说的具有一种大同思想的乌托邦主义者,"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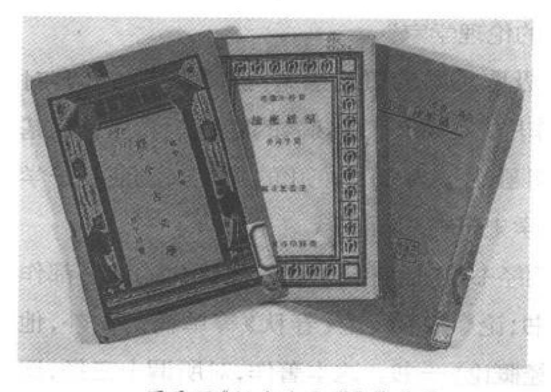
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

强调真假孔子的区别，吸取了梁启超的意见；强调孔子办教育对世卿贵族垄断政治的破坏作用，又吸取了章炳麟的意见。而注意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问题，注意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论证孔子学说的命运，则是周予同对经学史研究的新贡献。

周予同对宗教化的孔门经书，包括将孔子和六经神化的纬书都作了系统的分析。除了论纬书、论《孝经》、论《春秋》等单篇论文外，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群经概论》一书。这本著作，对所谓十三经，逐部就名称、作者、篇第、种类、内容和学派的源流演变，分别予以论述。写得浅显而又深入，生动而又准确，因而同《经今古文学》、《经学历史》注释本一样，虽然都写在几十年以前，却至今仍不失为了解中国经学史的较好的入门书。

通过对于“经书”内容的解剖，周予同揭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从汉朝以来，尽管历代封建帝王都在威胁利诱人们尊经读经，可是经的定义是什么？经的领域有多大？经的次第怎样排列？尤其是经学上一个根本问题——所谓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究竟如何？一句话，就是“治经”所必需的起码常识，在各派经学家中间，不仅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而且直到近代也仍在激烈的论难中。周予同指出，今古文经学对六经排列的次序不同，不仅反映了两派对经的性质认识不同，而且反映了两派对孔子的观念不同。

在神灵样的经书中间，《孝经》和《春秋》引起了周予同的很大兴味。所谓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屡见于两汉的纬书。汉朝的经学家或神学家，围绕它们制造了很多神话或鬼话，说它们是孔子接受天启，担负起为三百年后出现的汉朝预制根本大法的神圣使命，而起草的两部救世宝典——《春秋》讲政治，《孝经》讲道德，虽然一部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等著作

只有一万八千字，一部只有一千九百字，却囊括了从做儿子到做皇帝都必须照办的全部万古不变的道理。只要看看汉朝的历史，会解释《春秋》的可以做到宰相，而谥号加"孝"则是赠给死皇帝的最高荣誉，便可想见这两部经书在那时的威灵。但周予同对它们感兴趣的理由还不止于此。他指出，《春秋》只是部草创的编年史，同孔子有何关系还大有疑问；《孝经》则决不是孔子的著作，他不代表孔子的思想，只是后人冒用孔子名义编写的封建伦理教科书。它们在古代中国怎么会变成宪法，完全可以由宗法封建关系的历史演变中间得到解释。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孝经》居然还在现代的中国抬头，《春秋》居然还在现代的人们心里或手里活跃，"这确是文化上一个值得讨究的问题呢"。

作为时刻感受社会脉搏跳动的史学家，周予同从来不把自己密封在书斋里，去咀嚼前人早已嚼过的东西。他总是留神观察现代生活里面仍在起作用的历史传统，细心辨别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是古之精华而今已为糟粕，然后便动手去剥那些封建僵尸的画皮。这是他的经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他中年时代所写的一些经典研究论文，例如《"孝"与"生殖器崇拜"》、《〈孝经〉新论》、《〈春秋〉与〈春秋〉学》、《〈大学〉和〈礼运〉》等，尤其令人感觉这一特色。

参与过火烧赵家楼的周予同，既反感理学家高唱的封建"道统"观念，更讨厌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说教。但他认为，主观的

爱憎不能替代客观的研究。1929年，周予同写了《朱熹》一书，致力剥掉后来封建统治者所崇拜的朱熹的假象，还历史上朱熹的本色，从而透过这位宋学集大成者的学术思想体系，使人了解由汉学到宋学的转变，以及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同"道统"说的传统见解相反，周予同认为朱熹和他的先驱者，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不是继承，而是怀疑；所谓宋学，其实是经学怀疑派之通名。怀疑经学所以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在周予同看来，消极的原因有不满于训诂义疏堵塞思辨的道路，有不满于所谓纯文学的"玩物丧志"；积极的原因则有道家和方士的思想影响，但最有力的刺激和影响则来自于佛学，因而宋学可叫做"儒表佛里"之学。清末皮锡瑞说过宋朝是"经学变古时代"，宋儒对汉儒说经多所怀疑；章炳麟更曾指出理学开始于调和儒佛的愿望，到程颐、朱熹形成宗派，特点就成为"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但他们都还把理学看作儒家的宗派，周予同则以为这种儒佛混合的产物，已脱离了本来意义的儒家的轨道。就是说，在宋朝学者那些枯燥乏味的儒家语言的背后，隐藏着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否定，思辨代替了信仰，理性冲击着感性，个性的存在被承认了，哲学的最高任务不再是对伦理道德的教条作神学的训释，就是说出现了近代意义的哲学。

既然经学史上的宋学确有贡献，为什么宋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往往得不到清朝以来汉学家的承认呢？周予同着重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原因。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朱熹他们讲的分明是哲学——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却要用经学形式表述自己的学说。由于宋学家最终没有跳出经学的框架，给他们的经传研究带来其他的严重谬误，最大的错误就是删改经书以强证己说。

在论及近代思想史上经今古文学之争的时候，周予同坦率承认，他个人比较倾向今文学。当他写下这句话时，虽在五四运动以后，但

文史界的情况仍然落后于现实，尤其表现在高等学校和出版企业中。那时文史学界有四派；否定经学而转究史学的是少数；只知抱残守缺、汉宋乱用的是多数；但在大学讲坛上势均力敌的，却是坚持章太炎"古文"说和宣传康有为"今文"说的两派，"大概地说，南方各高等学校中主'古文'的较多，北方各高等学校中主'今文'的较多；而且大概地说，主'今文'的对新事物较易接受，主'古文'的对新事物每趋抗拒"。于是我们便不难想见，为什么当问题回到学术领域的时候，主张否定经学的周予同却倾向今文了。

当然，这决不单纯是感情上的理由，它主要还来自周予同对中国近代史学变化的考察。他认为，中国的史学，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了它的"转变期"。转变的重要象征，便是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并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在周予同看来，从思想方面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的，就是今经文学，其第一部著作，便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周予同说，从清末上追到西汉末，所谓孔子的"道统"说，所谓三代为"至治盛世"说，支配着中国的哲学家和史学家，从而使封建史学总在宣传世愈古而治愈盛，"陷入无可超拔的退化泥潭，而归结于悲观论与宿命论的史观"。康有为受进化论影响而写的《孔子改制考》，主观上在于假借经学以谈政治，作为倡言变法改制的张本，但他以为中国历史由秦汉以来才可考信，人们所熟知的三代历史其实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在客观上便"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它还提出时愈久而治愈盛的进化论新见解，从而使"孔子的地位与经典的尊严发生摇动"，结果导致了史学开始向经学宣告独立。

因此，周予同认为，近代中国的史学，由"泥古"、"疑古"、"考古"发展到"释古"，也就是发展到郭沫若等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中间

清末复兴的今文经学，“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实在起了桥梁的作用。

日军侵华打断了周予同的学术生涯。直到1959年，他才重新开始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并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期”。由于经学曾经长期作为封建主义的统治学说，所以在1949年之后，经学遗产每每会被当作纯属于封建文化的糟粕，而遭到唾弃。于是，研究经学史，不但容易被看成搞冷门，而且即使像周予同那样，分明抱着“检验粪便”的愿望去研究，再三强调“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也很容易受到从“左”边来的干涉和指责，总有一些人认为经学既为“封建学”，那么，它的研究者也必定是“封建人”。

作为期望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日益繁荣的正直学者，周予同对于“左”的偏见，始终看不惯，忍不住。六十年代初，他就在各种场合，对把政治与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言行表示愤慨，指出那与其叫“革命”，不如说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说教的新版。他尤其反感动不动给学术研究扣帽子的做法，认为这是不许人们通过自由讨论了解历史真相的行为，发展下去就会重蹈封建专制君主利用愚儒黠儒以惑世诬民的覆辙。1962年，他同许多学者一起讨论孔子时所发表的意见，便集中表达了他在学术上的是非倾向，也再次显示了他在经学史研究中的特有风格。周予同强调研究历史遗产，应该注意实事求是。他认为，孔子的影响涉及亚洲等其他地区，但目前对孔子的研究并不乐观。首先，史料的运用有问题，常常先存对孔子的主观看法，然后在文献中去找论证替自己的臆说张目，例如用《易传》的思想来论孔子，便无是处；其次没有把孔子同后世的儒家区别清楚，常常把后世的腐儒、愚儒、黠儒，尤其是一些滑头政客的罪孽，都算在孔子帐上，而又有“唯成分论”的倾向；再次是忽略孔子思想的世界影响；最后还有基本功问

题,特别是文字训诂上常犯以今律古、增字解经之类毛病。1965 年,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针对围剿吴晗《海瑞罢官》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这番表达了一个学者客观的研究态度和正直品格的话语,在"文革"中,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后患。

历史以无法想像的粗野手段再度打断了周予同的研究进程。他历年积累的讲稿、手稿和其他资料大多被付之一炬,或者不知去向。但是,他遗留下来的经学史论著,标志着经学史研究的新阶段,却是永远不会被任何火水虫害毁灭的。

热诚的教育学家

周予同出生在清政府实行"百日维新"的戊戌年。从那时起,兴教育、开民智,就是许多渴望国家富强的志士仁人的追求。只有教育,才能彻底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培养热爱国家、关心时事、掌握知识和技术的国民。

周予同是一位教育学家,二十世纪初期,志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各种思潮纷呈并起,时刻激励着年轻人的身心。周予同也投身于诊断现实的弊病之中,他解剖中国的教育制度,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直至生命的终结。

五四前夕的北京,大学是思想最活跃的地带。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政策,教员中既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传统文化的拥戴者。北大之外,受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熏染,风气最为开通的学校,当属周予同所在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少提倡新文化的著名人物,都到高师兼课。周予同读大学不久,就成为"德赛两先生"的热

情拥护者。他和同学们一起，发起平民教育社，创办《教育丛刊》，抨击旧有的教育制度，探讨教育的新方向。他认为："现在的社会是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他在毕业论文《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里，控诉中国封建教育的野蛮和黑暗，揭露资本主义教育的伪善和势利，提出应该吸取革命后的苏俄实行义务教育和大战后的德国实行"能者升进"的免费教育的经验，在中国实行普及教育和终身教育，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

1921 年，他跨出校门，走进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更是热情地投入改造传统教育制度的研究和宣传之中。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写作了《中国学校制度》(1933 年)、《中国现代教育史》(1934 年)等专著，清理古往今来的教育制度。又编了《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 年，二册)、《本国史》(1935 年，四册)、《国文教科书》(1935 年，六册，合编)等中学教材，试图为青年学生奠定新的教育体系。他曾说，他心目中暂定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是：人人能用国语或浅近的文言，自由而敏捷地发表思想情感，或纪述事实，绝对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人人能懂得中国文学和学术变迁的大概。周予同的研究是二三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和理论探索的重要部分。

周予同不仅著书进行理论的研讨，而且还深入学生中，循循善诱，宣传做人的道理和治学的方法。当蒋介石要求学校读经时，周予同直言这"是将大多数的国民变成'阿斗'，预先替帝国主义者制造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予同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向大学生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历史教育，希望青年们挣脱封建士大夫的末运，决不要学清末以来许多青年的样，"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而终以腐败的官僚、政客、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在任何机关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他呼吁青年学生

认清自己的命运，认清国家民族的命运，除掉悲观，挺起脊骨，自觉地"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的任务"，"去消灭一切应该消灭的东西，去建设一切应该建设的文物制度"，为社会改造，首先为神圣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献身。这也是周予同向自己提出的要求。所以，即使在日本侵略者重围下的"孤岛"上海最后沦陷的前夜，他仍然坚信中国不会灭亡，"必然的会保持他的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作文发扬中国史学渗透的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

周予同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讲台边度过的。他曾在共产党地下文委主办的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抗战胜利后，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上海复校，周予同也应邀主讲《群经概论》。他历任温州十中教员，安徽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兼南洋研究馆主任，复旦大学教授。1949 年以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 年被评为二级教授。曾担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1957 年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56 年起，周予同负责组织重建中国经学史学科。1959 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经学史"课程，卓见时出，锋芒少敛。这是当时全国大学文科中独一无二的一门课程，他指导学生和二届研究生写作专题论文，自己也撰写相关论文，唤起了全国学术界对经学史研究的重视，开创了经学史研究的道路。他还开设"中国历史文选"课程，讲授期长达两年，每周四课时，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同时还受教育部委托，负责编选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最负盛名的教授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历史学人才。

爱国的社会活动家

今我是活泼泼的青年，

扫却了悲观和闲愁；

本着这肃杀的精神，

打破了糊涂的九州！放出了万千的狱囚！

这是周予同十九岁时写下的诗篇。研究经学时，他是冷静的解剖师。面对生活时，他是激情似火的诗人和战士。从民国到共和国，他时刻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土地和人民。

在北京高师，周予同一面钻研学业，一面如饥似渴地研究各种主义和理论，参加学校繁多的社会活动。他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也对无政府主义有好感。他宣称现有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改造社会必须打破劳力劳心的界限，提倡学生学会做工，并帮助劳动者求学，主张“作工与求学是人生两件大事”。他外向豪迈，具有凝聚群体的性格魅力，和同学们一起先后发起励学会、平民教育社、工学会等组织，创办《教育丛刊》、《工学》等杂志。其中工学会的参加者大约有三十余人，经常集会研究学术，利用课余时间做工，从事印刷、木刻、照像、办夜校等活动，天真地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他们在校园里面发表演说，到北大去参加辩论，积极投入各种爱国民主运动。

1919 年 4 月底 5 月初，巴黎和会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接受日本继承德国侵占山东权益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纷纷准备集会抗议。周予同也热血沸腾，5 月 3 日晚，工学会召开全体会议，商量对策，提出应迅速在次日即 5 月 4 日星期天举行游行示威，既可避免走漏消息遭到当局阻止，又可趁假日争取大多数同学的参与。5 月 4 日上午，周予同作为北京高师的代表之一，与各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联合会议，确定了游行方案和斗争口号。当天，工学会代表还联络到各校的激进分子二十人左右，相约暴动，准备牺牲，周予同和工学会的另一名发起人匡互生都写了遗书，打算以青年的一腔

热血换来古老中国的新生。

5 月 4 日午后，北京各高校沿着事前决定的路线进行游行。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卫队的阻拦后，愤怒的学生队伍开往了赵家楼。周予同托着匡互生从小窗里爬进了曹汝霖的宅院，大门打开后，学生们一涌而入，周予同把曹汝霖的汽车车窗玻璃打碎，划破了手掌，淋漓的鲜血倾诉着青年学生对懦弱政府的愤怒。客厅书房里，上房卧室中，到处都找不到曹汝霖的踪影，匡互生取出火柴，和周予同一起拉下卧室蚊帐，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大火。

那以后，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前途，时刻牵动着有着光荣经历的周予同的心。大学毕业进入商务印书馆后，除了进行教育史和经学史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之外，由于编辑工作的性质和热情活泼的个性，周予同广交朋友，参与各种知识分子的活动，逐渐在知识群体中成了一名活跃人士。他们批评时政，宣传民主，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增进群体的力量。1923 年，周予同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等人结为团体，准备集资创办书店，宣传新理念。因醉心清代朴学，年轻的周予同给这个同人团体取名“朴社”。不久，他又和王伯祥、沈雁冰、俞平伯、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顾颉刚等人轮流主编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1926 年 8 月，鲁迅抵达上海，郑振铎设宴欢迎，二十八岁的周予同也在欢迎的人群里，还在鲁迅的《日记》中留下了身影：“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1927 年，参加大革命的周谷城来到上海，生活拮据，周予同立刻给予热情帮助。后来两人长期任教复旦大学，被称为复旦“二周”。1927 年秋，李叔同过沪，暂居学生丰子恺家。丰子恺与夏丏尊、内山完造、叶圣陶、

周予同、李石岑等，在上海功德林素食馆宴请李叔同，饭后同随李叔同前往太平寺访问印光大师。叶圣陶专门著文《两法师》纪念这次活动。1928年春，周予同、夏丏尊、钱君匋、贺昌群、章锡琛、叶圣陶为欢送胡愈之赴法国，同到上虞春晖中学相聚，在白马湖平屋前合影纪念。1947年3月，中国语言学会在上海成立，周予同、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琛、郭绍虞、方光焘、魏建功等七人任理事，郭沫若、郑振铎、马叙伦等三人任监事。在这些活动中，周予同都是积极的角色。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期，知识界的思想虽然屡遭政治打压，然而压力却使思想绽出火花，也使知识分子格外活跃，努力拓展活动空间，发布学术自由、集会自由的信息，以自身的存在呼吁着民主社会的来临。周予同深情的目光一直关注着社会民生。1924年9月，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爆发"江浙战争"。战后，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等特意结伴前往曾经打过大仗的浏河考察军阀混战的恶果。1927年，国民党制造四一二大屠杀。4月14日，周予同和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以闸北居民的身分，公开致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就13日宝山路工兵冲突惨剧，要求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立即交出开枪暴行的负责官长和兵士，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对其加以裁判；要求当局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要求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力量，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因为这一事件，周予同、叶圣陶、郑振铎计划主编的大型选本《中国文选》，也未能成书。1935年，面对日寇侵华的严重局面，周予同与李公朴、邹韬奋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运动宣言》，要求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共赴国难、保证言论自由等等。1936年1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大学教授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各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抗日，支持各界救亡运动，

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周予同在上海的活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关注，1940 年秋，新四军黄桥大捷后，在苏北根据地的陈毅还特意委托上海记者带函给郑振铎和周予同二人，热情欢迎郑、周到苏北工作。1946 年，周予同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起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多次发表宣言，抗议当局非法逮捕爱国学生，成为国统区投身民主运动的著名人士。

1949 年以后，周予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廿余年民主活动的经历，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尊重。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他积极参加新社会的各种建设活动，成为民主爱国人士的典范。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工作者学习分会主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等职。1956 年，他与傅雷、周煦良、周谷城、罗竹风等人被复刊中的《文汇报》聘为社外编委。1963 年，周予同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与周谷城、冯友兰等老专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拍下了毛泽东同三位学者一起握手交谈的照片。

周予同研究的是最传统的学说，他本人却绝不埋头书斋。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青年时参加了五四运动，壮年时反对国民党的愚民政策，晚年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以毕生的研究和实践赢得了经学史家、教育学家和民主爱国人士的崇高声誉。

（本文主要参考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和许道勋所撰周予同小传而编写）

周予同主要论著

论著	出处
《参观学校感言(二)》(署名周蘧)	《平民教育》1919 年第十卷
《工读主义》(署名周蘧)	《工学》1919 年第一卷第一期
《中等以下的学校为什么不应该设读经科?》(署名周蘧)	《新学报》1920 年第一期
《儒家之精神的社会政策》	《民铎》1924 年第五卷第三期
《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	《民铎》1925 年第六卷第二、三期
《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	收入教育杂志社编:《教材之研究》,商务印书馆 1925 年
《纬书与经今古文学》	《民铎》1926 年第七卷第二期
《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	《一般》1926 年第一卷第二期
《经今古文学》(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	《文学周报》1926 年第二三三期
《"孝"与"生殖器崇拜"》	《一般》1927 年第三卷第一号,又见《古史辨》第二册中编(1930 年)
《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	《民铎》1928 年第九卷第一号,又见《经学历史》注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经学历史》(学生国学丛书)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第四期之前夜——向青年们公开着的一封信》(署名天行)	《一般》1929 年第六卷第一号
《朱熹哲学述评》	《民铎》1929 年第十卷第二号
《朱熹》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

《开明本国史教本》　上海开明书店 1931 年

《群经概论》(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我们往哪里去》　《中学生》1932 年第二十九期

《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　《安徽大学月刊》1933 年第一卷第二期

《<汉学>与<宋学>》　《中学生》1933 年第三十五号

《中国学校制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汉学师承记》(上、下册)　(清)江藩著、周予同选注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中国现代教育史》　良友图书公司 1934 年

《孔子》　上海开明书店 1934 年

《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教育杂志》1935 年二十五卷五期

《治经与治史》　《申报・每周增刊》1936 年第一卷三十六号

《怎样研究经学》　《出版周刊》1936 年新一九五、一九六期

《纬谶中的"皇"与"帝"》　《暨南学报》1936 年第一卷第一期

《<大学>和<礼运>》　《中学生》1936 年第六十五号

《<孝经>新论》　《现代父母》1936 年四卷九号、《中学生》1936 年第六十九号

《<春秋>与<春秋>学》　《中学生》1937 年第七十一号

《道儒的党派性》　周予同讲、欧阳超记　《新史地》1937 年第二期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学林》1941 年第四期

《冲破学校教育的围墙》　《活教育》1947 年第四卷第一期

《几部青年时代最爱读的书》	《读书通讯》1947年第一二四期
《儒、儒家和儒教》	《青年界》1949年新五卷第四期
《“经”、“经学”、“经学史”—中国经学史论之一》	合作 《文汇报》1961年2月3日
《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中国经学史论之二》	合作 《学术月刊》1961年三月号
《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	合作 《光明日报》1961年5月16日
《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	合作 《文汇报》1961年11月19日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	合作 《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年)
《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	《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
《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	合作 《新建设》1963年第1期
《从顾炎武到章炳麟》	合作 《学术月刊》1963年第12期
《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署名周予同、胡奇光)	杭州大学语言研究所编《孙诒让研究》(1963年)
《“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复旦学报》1979年第1期
《从孔子到孟荀—战国时的儒家派别和儒经传授》	《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
《中国历史文选》(上、下,内部试用本)	周予同主编、朱维铮等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
《中国历史文选》(上,再版本)	周予同主编、朱维铮等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
《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修订本)	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980年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朱维铮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 朱维铮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国经学史讲义》 周予同讲授、许道勋笔记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周予同在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十年,用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因难以确认,此处未予收入)

求真守实　抉奥探幽
——陈守实传

姜义华

陈守实，“文革”前一直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在上海同辈史学家中，陈守实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精深的研究而著称，论史时，每每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见解的独到而使人折服。

矢志历史科学的一生

陈守实，别名漱石，1893 年 8 月 24 日（旧历七月十四日）生，江苏武进人。

在 1952 年 7 月 26 日填写的《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①“本人未独立时家庭经济来源及状况”项下，陈守实写的是：“本人未独立时，父亲教读，家人力耕，生活清苦。”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他的祖父名翼新，是常州府学的秀才。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他正在北京考试，因而滞留北京，任私家教读多年。回乡后，购置了一些



陈守实先生

土地，成为小地主。但是，在他死后，土地即被几个兄弟出售。因此，当陈守实的父亲还在童年时，就又变成了自耕农。

陈守实的父亲名云赞。十七八岁时，即开始在村塾中担任塾师。陈守实是其长子，其后，又生了四个女儿，家中人口多，劳力少，生活自然相当艰苦。云赞中年时，聚族而居的陈氏族人因祠堂公产管理不善，索性将祠堂所属田产分掉。书生气十足的云赞分得远祖一块坟地。别人争田，他却认为饮水思源，保护好坟地义不容辞。这样，他家的田地就增加到了三十多亩。坟地杂树、毛草、竹篆丛生，不是耕地，却要负担同耕地一样的田赋差徭。这样一来，他家的负担更重了，负债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家境下，陈守实无力接受系统的小学及中学教育。他少年时代，一直在父亲私塾里跟着父亲就读，读的是四书五经和家中一些藏书。读书之外，还要下田劳动。直到十六岁，他方才由父亲的私塾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堂。

由于他的父亲信奉宋明理学，对封建家庭传统的行为规范深信不疑，管教孩子很严厉。陈守实后来常常说，他当年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斯巴达式”的。②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下，陈守实较早就养成了自立的精神，开始了对旧式家庭的反抗。十五六岁时，他出于对封建礼教的反感，偷偷打毁了祠堂里的神牌，还趁夜间天黑打毁了村里的五通庙。

在小学堂只读了一年，他就考中了常州府中学堂。因家中拿不出

学费与膳费，他曾预备放弃这一入学机会。由于得到他父亲的学生及一些亲友的资助，他方才进入中学堂。

进入中学堂后，他对旧式家庭更为反感，假期中也不回家去住，而住到离家半华里的陈家祠堂里去，对家庭表现了更大的独立性。但因此，经济上就愈加困难。在中学堂只读了一年，就不得不申请休学，去当小学教员，自己挣钱。一年后复学再读，读了一年后再次休学去工作。所以，他的中学是休学两次之后，方才读完的。

中学毕业后，他已没有经济能力继续到大学深造。他一边在小学任教，一边设法旁听高等学校课程。常州府中学堂增设了高等实业学校，他曾前去旁听，终因数理基础差，跟不上，只听了一个短时期，便停止了。他又去旁听过一些文科课程，因与自己教课时间常常发生冲突，也未能持续下去。

家庭的困境，以及陈守实本人已经逐步形成的不满于现状的倔强性格，使他不愿向环境低头。因为在旧学上下过一番功夫，他便想在学业上找出路。

常州府中学堂监督即校长原由屠寄担任，后由其子屠宽接任。屠寄为武进名宿，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举人，十五年入两广

① 复旦大学档案馆藏档，陈守实档案。陈守实传记部分，还参考、利用了该档案中陈守实 1952 年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登记表》、1952 年 6 月 30 日所写的《思想检查报告》、1968 年所写的《自传》。

② 见陈守实：《思想检查报告》（1952 年 6 月 30 日，该报告题为《否定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批判突出的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是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具有突出的自贬倾向）。

总督张之洞幕，校书广雅书局，主修《广东舆地图》；十八年为进士；二十年为工部主事；二十二年主修《黑龙江舆地图》；二十九年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三十年，任奉天大学堂总教习。在史学方面，用力最勤的是蒙元史，代表作是《蒙兀儿史记》。陈守实对屠寄慕名已久。在正式就读和旁听常州府高等实业学堂都不成后，他决定自修文科，即经由他任教的小学校长金监介绍，师从屠寄研究历史。

在屠寄的指导下，陈守实开始研习辽、金、元之史。应该读些什么书，由屠寄指定；有什么问题，由屠寄指示解决门径。他读了屠寄许多藏书，还读了常州图书馆不少藏书。他还受命帮助屠寄钞录一些蒙古史资料。他受到了历史考证之学的严格训练，写出了一些论文和读书札记。他没有大学学历，后来，就凭师从屠寄时所撰写的这些论文和札记，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清华研究院，而于 1925 年 9 月被录取。这时，屠寄已经去世四年，没有看到这一结果。而陈守实则始终不忘，引导他进入史学之门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屠寄。

在中学时代，他还遇到一位历史老师，即吕思勉。吕思勉研读二十四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开始治史时，也接受过吕思勉的热情指导。

进入清华研究院后，他师从梁启超，在梁启超指导下专攻明史。梁启超是时开设的是两门通论性课程，一是《儒家哲学》，一是《历史研究法》。研究院导师还有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等。陈寅恪开的课程是《佛经翻译与原本的比较研究》，参考多种文字文献，追求弄清原文原本的意义。他虽然也作历史考证，但与传统考据不同，每一个结论都能提出新的认识，发掘出史料的新意义，给人们以启迪。陈守实从陈寅恪的课程获益最多。王国维当时开设的是《说文》与《古史新证》，对古文字及古史都有独到的见解，也给陈守实以深刻印象。赵

元任开的课是《广韵》,李济开的课是《考古学》,陈守实也去听过。陈守实在清华研究院三年,跟着这些导师,不仅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接受了更为全面更为严格的训练,尤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熏染和示范下,他开始形成了无论是对先前的理论,还是对于史实,大至思想体系,小至一字一句,都锲而不舍地务要求真守实的学术精神。这种学术精神,以后贯穿于陈守实一生。

清华研究院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当时刊物的有《〈明史稿〉考证》、《明清之际史料》、《〈金史·忠义传〉完颜彝战迹及年月考》、《清初奴患》、《〈明史〉抉微》等一批论文[③]《〈明史稿〉考证》力证《明史稿》是万斯同所撰,后为王鸿绪所剽窃与改窜,梁启超亲笔评阅,肯定所论。此文刊载于1926年12月《国学论丛》,使陈守实崭露头角。其后几篇论文,进一步奠定了他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引人注目的学术地位。在陈寅恪与王国维指导下,他还进行了佛经研究与《说文》段注研究。

清华研究院似乎纯然为学术而学术,与政治是绝缘的。但1925－1927年大革命浪潮的冲击,在清华园还是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对陈守实影响最大的第一件事,是李

③《〈明史稿〉考证》刊于《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1926年12月);《明清之际史料》刊于《国学月报》1927年5月号;《〈金史·忠义传〉完颜彝战迹及年月考》刊于《新中华》1927年5月号;《清初奴患》刊于《史学与地学》1928年10月号;《〈明史〉抉微》刊于《国学 论丛》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

大钊 1927 年 4 月 6 日被捕,4 月 28 日遇害。陈守实有一个同学高饶芹,是河北乐亭人,与李大钊同乡,对李大钊很熟悉,非常激动地向陈守实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为人与业绩,使陈守实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演变。这时,梁启超就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在清华园作课外系列讲演,因为反对孙中山,受到清华大多数同学的反对而不得不中止。陈守实的指导老师、清华研究院的创始者梁启超,竟也不免得到这么一个结局,一下子就将政治问题提到了首位。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梁启超 1929 年 1 月 19 日病逝,特别是王国维之死,使陈守实大为震动。尽管这时他在政治信念信仰上还较模糊,但以他的个性,一经关注,就会立即开始追求探索,努力得到明确的结论。他转而注意阅读新书报,对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社会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和一些同学进行讨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原著不易读到,而且理解也不深刻,因此,常常陷入精神苦闷。

清华研究院毕业后,陈守实于 1928 年到天津南开担任大学讲师与高中教员。高饶芹这时也在南开,他是研究哲学和文艺学的,给陈守实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著作。陈守实称,这时他还只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启蒙期。

1929 年暑假,陈守实南返回常州。暑假行将结束时,恰值新军阀混战,铁路不通,他无法回南开,便到江苏省立无锡中学(无锡第三师范)教书。教务长王寅生 192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后来主编《中国农村》杂志。他经常邀请进步学者来校讲学。北大教授陈翰笙是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的,经常来校讲演,曾专门讲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陈守实和王寅生、陈翰笙等相识,在他们影响下,对中国农村经济也产生了兴趣。

王寅生因请陈翰笙讲解马克思的著作,引起校中国家主义派的反

对，发生风潮，不得不离校。陈守实也随之离开无锡中学，1930 年转入大夏持志私立大学任教授。这时大夏大学挂名校长是马君武，教授中有萧炳实、屠孝实、徐志摩等人。陈守实在这里教授《中国古代史》、《佛学概论》、《经学史》。他感到在这里实际上只是解决生活问题，思想上缺少同道，教学上难以有所发挥。1931 年便转广州进了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陈守实任副教授，开设了《学术文选》、《历史研究法》等课程。这是他第一次到南中国，接触南部沿海中国社会。令他感兴趣的是何思敬在中山大学所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讲座》这一课程。在何思敬等人影响下，他开始注意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在中山大学待了两年，1933 年他又转入省立安徽大学，开设《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史》课程。一同进入安徽大学的有方光焘、陈望道、周予同、蒋经之等，是校长程演生请来的。程演生刻意仿效北大校长蔡元培，各方面的人物都想罗致到安徽大学来，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教育部的不满而下台。因此，陈守实在安徽大学只待了一年。

这期间，当年资助他进常州府中学堂的一个他父亲学生的儿子叫陈志正，曾和他同住过一个时期。陈志正是中共党员。在革命工作中一有余暇，他就刻苦地用英文本、日文本对照研读《资本论》，一边进行翻译。在他的影响下，陈守实开始研读《资本论》，以求理论上得到提高。陈志正后来因参加反帝大同盟的集会被捕，死在南京陆军监狱里。

1934 年陈守实再度来到南中国，就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授。"勷勤"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原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古应芬(1873 - 1931)的字，这所大学是为纪念他而设置，分师范、商、工三院。校长为林云陔，师范学院院长为林砺儒。因为宁粤之间矛盾时松时紧，广州政治空气相对较

为自由，陈守实在历史系负责《中国通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等课程，编有部分讲义，还印发有一部分讲课记录稿④。

抗日战争爆发后，师范学院由林砺儒率领迁往广西梧州，改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此前，陈守实于1937年暑假回上海，正值八一三事变发生，匆匆返回常州，带着全家老小及亲邻向内地逃亡，一度跑到重庆。接到学院内迁的消息，他即赶到梧州返校工作。他开设了《历史唯物论》课程，另一位教授、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译者张栗原开设了《新哲学》，这两门课遭到陈立夫来文指名申斥。

广州沦陷后，文理学院迁至藤县、融县，后又迁至广东曲江附近之侯公渡。韶关沦陷后，又仓皇迁至粤北山区连州乡间东陂墟。由于地处湘桂粤山区，交通不便，国民党政治控制较为松弛。来这里任教的，有《资本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者郭大力等一批进步学者。学生也特别多，湘、桂、粤各地被开除的有所谓政治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到这里。陈守实1939年起任文史系系主任，课程设置完全不理教育部的规定，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等课程，分别由郭大力和他自己主讲，这在当时大学中是很少有的。他为系里订了《新华日报》供师生阅览，虽邮路艰阻，往往是一大捆同时到达，却受到师生热切欢迎。他和郭大力在教学中突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两人由此结成亲密友谊。他们还办了一个刊物《文理月刊》，社论多由陈守实执笔，言论都很尖锐。他还在桂林进步刊物《文化杂志》发表了一些论文。

1942年下半年，文理学院被迫改组。教育部和广东省政府联合逼迫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去职，由广东省教育厅长、党棍黄麟书来院接替。陈守实在开学后，又坚持上了一段时间课，终于不得不离开该院，于是率领家人重渡流亡生活，东回浙江，在金华一个旧同事家寄居了

几个月，然后转到常山、开化之间乡下一个临时中学教书。这时，《东南日报》一位副刊编辑、地下党员陈向平介绍他去见天目山民族文化馆副馆长卢文迪。卢文迪想办一个刊物，想拉陈守实前来帮忙。但刊物终于没有办成。这时，他接到堂弟常州来信，得知本家陈立平任新四军苏南太(湖)滆(湖)地区书记，开展游击战，便率同家属徒步返回常州乡间。他与陈立平会晤过多次，因觉得自己不适于武装斗争，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又徒步去闽北建阳暨南大学任教授。

暨南大学校长时为何炳松，熟人有方光焘等。在暨大，他开设了《明史研究》、《史学概论》等课程。在这里，他将流亡途中失散的儿子和甥女接到自己身边。而他的女儿陈次青，中共党员，则在这一年在东江纵队抗日斗争中牺牲。

在暨南大学，他待了年半，撰写和发表了评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论文。为参加革命文教工作，1944 年 8 月他又回到苏南，一边在武进、宜兴乡间私立博文、西郊等中学担任一些临时课程，一边作革命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立即到了上海，先在私立建承中学任教，又兼作之江大学教授，开设《学术论文选》等课。因宦乡邀请，他担任

④ 在大学期间，陈守实发表了《关于东西汉学家考证中国边疆史的态度问题》、《蒙古斡哥歹汗南征时之完颜绰华善》等论文，刊载于《大学季刊》1934 年 10 月号及 1935 年 10 月号。

《前线日报》主笔一个月，撰写社论与编余短评。

1946 年 8 月，他再次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开设《历史哲学》、《史记研究》等课程⑤。其时，中大校长是王星拱，文学院院长是王了一。他因为先前几次来广东任教，特别是在文理学院任系主任一段时间，在许多进步学生中留下深刻印象，这时，在粤汉线上英德地区农村从事革命工作的，多数都是他以前的学生。困难时期，他们即潜来广州，找他设法筹款。他们还将游击区出版的报刊、书籍，经常寄送给他。不久，他又引起当局的注意。为防止被检举，1948 年 7 月学期刚结束，他便离开广州返回上海。

1949 年 2 月，由周予同介绍，陈守实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5 月，上海解放；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守实的课突然增多起来。因为当时大学中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授甚少，因此，《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联共党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全加在陈守实头上。除去复旦，沪江大学、财经学院、科学院、民主党派也请他兼开这些课程或作相关报告。原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侯外庐在该校历史系任系主任，他们熟悉陈守实，特来电聘他去师大任教。复旦不同意，但 1950 年初他仍不得不去北京师大给师训班讲了一个半月的课，并作了学术报告，以报林砺儒先前粤桂湘山区共同奋斗之情。

直到 1974 年 4 月 25 日去世，陈守实在复旦待了整整二十五年。

余生也晚，1957 年 8 月下旬方才来复旦就读，但第一位拜谒、也是第一位认识的历史系教授就是陈守实先生。那是因为听了高年级学长的介绍，未等开学，就冒昧登门求教。先生非但不以为非，反而很高兴地询问了在中学学习的情况。首次见面，先生就谆谆嘱咐，学历史，一定要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要学好理论，一定要先读马克思的

《资本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史》,要在《资本论》上狠下功夫。先生本人精读《资本论》五遍以上,书上圈圈画画,做满各种记号,理论功底之扎实,于此可见其一斑。

就学五年间,听先生授《明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土地关系史》听过一遍,第二次开讲只听了一部分,因为我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与中国古代史课程重叠,所以,只能借了同学的听课笔记抄录。一有先生学术讲座,我们都必去听,因为每一次他都必能讲出精辟的独到见解。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课堂上,先生常常说:"这一点,从来没有人说过,你们可以拿去写文章。"他从来不把自己发现的新论点、新见解看作私有物。他认为,既然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了,只要学生赞同这些见解,就应当欢迎和鼓励学生写成论文阐述这些见解。

毕业前夕,我因为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国内基本矛盾、"三面红旗"等问题,提出了同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主要危险不是所谓右,而恰恰是指导思想上的"左"。由此,我和几位同学一道遭到批判,又被取消了去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师从黎澍读研究生的资格,分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中学。在许

⑤ 在中山大学任教这段时间,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克拉维约东使记》(《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21期,1946年11月);《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虫》(《昌言》,1946年6月);《明初与帖木儿关系试探》(《新中华》复刊第5卷第17期,1947年9月);《文献学的新解蔽》和《格义比附与中庸主义的解析》(刊于《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10、11期,1948年5月、6月,又俱见新中华杂志社编:《中国传统思想之检讨》,1948年7月出版)。

多同学都避之唯恐不及、忙于划清界限的那些日子，先生却从家中来到学生宿舍看望。特别是临行那天，天色已晚，先生却颤巍巍专程赶来送行，并再三叮嘱，到内蒙古要好好研究一下草原游牧地区的土地关系，介绍我去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去拜访他所熟悉的教授。先生还说："你的弱点是棱角太突出。做人还是要内方外圆。"可叹，先生指出的这一缺点，我一辈子也未能改掉。

不久，我又被从内蒙古调回复旦，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接受批判，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也不敢再去找先生，怕给先生惹麻烦。最近看到一份市委教育卫生部 1962 年 10 月起草的报告，里面便说我的上述"错误言论"根源之一，就是"学校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如陈守实教授的'人与物、经济与政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和'人民公社是生产倒退的产物'等看法"。"文革"中开我的批斗大会时，勒令先生站在一边陪斗，使我尤感难受，因为竟给高龄的他带来了这么多麻烦。我和先生在同一牛鬼蛇神队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挂黑牌同被抄家同听训斥同受批斗好几年。历史系牛鬼队是全复旦队伍最为庞大的一支牛鬼队，陈守实先生年纪最大，周谷城、周予同先生次之，我在从大学生中揪出"小爬虫"纳入牛鬼队之前，年纪最轻，只能尽自己所能，在劳动中，在生活上，设法多照顾一点几位老先生。有时也说一点大道理，那是劝慰几位先生不必悲观，要相信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先生在艰难的日子里，仍千方百计坚持读经典著作，写下了近六十万字的学术日记。直到 1973 年底，因患食道癌而病势日渐沉重时，方才被迫中止。先生未能等到"四人帮"被粉碎和"文革"结束就含恨去世了。稍可自慰的是，我参与张罗了先生的追悼会。

先生晚年培养的几位研究生，如李祖德、王春瑜、樊树志，"文革"

结束后，均陆续有所建树。惜最后整整八年，他未能再进课堂，再指导研究生，培养更多人才。

中国土地关系史的精深研究

陈守实过世后，复旦大学历史系徐连达将他留下的有关先秦土地问题、秦汉土地问题、北魏到隋唐时期土地问题的遗稿，整理成《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一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2月出版。从中可以窥见陈守实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历史沿革的一些主要思路、主要方法。

1960年9月以后，陈守实几次讲授《中国土地关系史》，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讲课纪录稿未能整理出版。结合这些讲课，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陈守实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历史沿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成就。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陈守实对中国土地关系历史沿革的研究持续了近三十年。这是因为他认定，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主要劳动对象是土地；劳动的实现，生产的进行，离开土地就一切都谈不到。如果说，解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秘密的钥匙是资本，那么就可以说，解开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秘密的钥匙则是土地。《礼记·大学》中说："有土斯有财。"旧史中常说："国君死社稷。"社即土地，稷代表农产品，那时，土地已变成可以支配一切的东西。大量社会冲突，都由土地问题引起。土地是地体的一部分，是自然物，它之所以有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藉由土地而实现。土地为领主或地主或农民自己所有，农业生产者要进行生产活动，就必须同领主、地主或其他自耕农形成某种关系。因此，研究土地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社会关系。牢牢把握这一基本点，就能使土地关系史的研究科学化。

陈守实研究了中国土地关系的全过程，从原始社会的土地关系、奴隶社会的土地关系、封建领主制的土地关系、封建地主制的土地关系，一直到近代土地关系，由合作互助到人民公社。除去汉族地区外，他还研究了各兄弟民族的土地关系，包含北方牧区的土地关系，北方边疆各兄弟民族入据中原以后土地关系的变化，西南半农业区的土地关系，西藏领主制土地关系，各兄弟民族的民主改革，即在土地关系上的各种革命过渡形式。

陈守实对于中国历史上包含一般形式与特殊形式在内的各种土地所有形式都作了研究。先秦时代，他研究了井田、辕田，领主式的分封制和土地分配形式，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过渡，论证了井田制是农民以农村公社方式获得土地的一种土地分割形式，农村公社以地域为主，与以血缘为主的氏族公社以及后来以大家庭为主的家庭公社（只是一种公社残余）不同。秦汉时代，他研究了空荒地的分配、商人与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世家大族及其土地占有、寺庙的土地占有等。魏、晋至隋、唐，他研究了曹魏的屯田（兼及此前边郡屯田与属国屯田），西晋的占田、课田，北魏的计口授田和均田制，从魏、晋到南北朝各类堡坞壁垒的土地关系，北朝、隋、唐的均田制，以及这一时代的各类军府屯田、官田、职分田、公廨田、营田。宋、辽、金、元时代，他研究了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与掠夺，各种形式的地主庄园，宋代的职田、屯田、营田与公田，契丹与女真的田制，元代的官田与民田。明、清时代，他研究了明代卫所屯田、官田、民田，清初均田、井田的最后尝试，八旗占地，对官僚豪绅兼并的压抑，以及外力渗入所引起的复杂变化。对于秦汉以来的土地关系，他重点研究了土地分散与集中周期性运动的规律，以及各类公有地因土地负担定量化而产生定量以外地租分割，从而使土地可以按一定价格买卖而最终走向私有化的过程。

地租和赋税，是陈守实中国土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他视地租为土地所有权在经济关系上的实现，视租、税为直接生产者（农民）扣除必要劳动消耗补偿后剩余产品的分割。从先秦时代的助、贡、军赋，到两汉的力役、兵役、口赋、算赋、更赋、田税，再到租庸调与两税制，包括均税与土地丈量，明代的鱼鳞图册，劳役的折变及其沿革（包含王安石的免役法及雇佣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初的摊丁入地），各地区的特种贡纳，封建地租的特种消费机构匠役与官营手工业，田赋的各种变态（包括常平义仓的租税化、盐铁坑冶的官营与商办、茶酒的榷酤、关税与市舶），田税的集散，封建王朝的三大支出：俸给、兵饷、宫廷靡费，官僚豪绅对田赋的优免、包揽、拖欠、规避，土地价格与土地买卖，高利贷及商业对土地兼并的影响，土地买卖的各种形式和附加的各种封建关系，如此等等，陈守实都分别进行了专门研究。

陈守实通过对历史记录的仔细辨析，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土地占支配地位的是私有制，尽管有时以国有、公有形式出现，也按私人财产方式来经营管理。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他们各自分散劳动，但是，一村、一里、一族、一乡、一会、一社，都有若干公地，这是古代公社的残余。愈是古代，公社残余面愈广；愈是后代，公社残余面愈窄，甚至仅存形式。但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土地私有制还不是完全的私有制，跟资本主义独立化了的完全土地所有权不同。

陈守实通过对于地租和赋税的全面考察，证实了先前各代都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租税制度。包含唐代的租庸调、明代的一条鞭法，似乎是统一的制度，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情况各不相同。中央专制政权的物质基础是一般性的田赋，以及直接征用的劳役、兵役。相较而言，赋税负担，虽有高低，但通常较为平均，而地租高低各处则相差甚大。地租高低与土地肥瘠状况有关，但起更大作用的是人口密度

高低不同。王朝之初，统治队伍较小、统治者消费欲较有限，赋税一般较轻；随着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统治者消费欲越来越膨胀，赋税就会越来越重，国家与地主、国家与农民生产者的矛盾就会日益尖锐。

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领主，农民与地主，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时形成的基本社会关系；土地关系史，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互相对立的阶级既相依存又相斗争的历史。这是陈守实中国土地关系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他说明了，秦汉以来，家族共同体为社会组织的细胞，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就是由这些细胞堆叠集结的最高结构，而儒家由家而国的修齐治平学说，就结晶为中国古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体系。他认为，了解这个细胞的重要性，正如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一样。中国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学术史，离开了家族共同体就说不清楚。无论研究土地所有者，还是研究直接生产者，都不能脱离这一社会细胞。

战国以来，尤其秦汉以来，在土地上从事直接生产的广大农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们的均田思想，他们的暴动和所发动的战争，是陈守实关注的重点。除去在《中国土地关系史》讲课中专论这些问题外，他还陆续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组织形态》、《论曹魏屯田》、《我国历史上的义仓制度》、《曹操与天师道》、《中国农民战争散论》、《农民战争与宗教》⑥等一系列论文，展开讨论了这些问题。

他指出，自耕农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每个王朝之初的兴盛，便决定于自耕农的大量存在。但是，自耕农的地位并不稳定。生产规模小，技术保守，发展缓慢；随着人口不断增殖，生产范围更为狭小；封建剥削量的增加，捐税负担的加重，使他们不得不将生活水准压到最低标准之下，最终，他们的土地不得不转到大地主手中，他们自身沦为佃农，或者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流民。广大佃农负担着沉重的地租，

还受到超经济强制的束缚，最主要的超经济强制是各式各样的劳役。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不会高，对技术改进不会感兴趣，生产的发展便不可能。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大片土地荒芜，水利工程破坏，公共设施被地主豪绅化为私有，抗灾能力大为削弱，灾害于是频繁发生，生产终于无法继续下去，农民于是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变成逃户、流民。他们自流性地集结起来。这个集结，破坏了原来家长制的分散的社会结构，发展为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农民因劳役集结，或因天灾集结，都能导致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经过农民起义之后，调整了旧的生产关系，冲去了一些旧的弊病，土地再次分散，自耕农增加，开始又一轮周期性运动。

在农民中，农村公社和家族共同体的残余气息一直相当浓厚。陈守实论证了，当农业生产在其进程中遇到某些阻碍或打击时，这种共同体观念、公社残余气息会特别强烈起来。遇到社会震荡、社会动乱时，物质资料的生产极度困难，农民中共同体观念会急速增长。农民战争中流行的农业社会主义即由此产生。陈守实一再指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行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发生进步作用，因为它可以动员农民参加农民战

⑥《中国农民战争组织形态》，原刊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编《人民史学》第3卷第1－2期，1951年10－12月；发表于《新中华》1951年9月。《论曹魏屯田》，发表于《学术月刊》1960年2月号。《我国历史上的义仓制度》，发表于《解放日报》1961年7月7日。《曹操与天师道》，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中国农民战争散论》，发表于《中国农民战争史集刊》第1期（1979年12月）。《农民战争与宗教》，发表于《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曹操与天师道》以下三篇论文俱发表于陈守实去世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争。但是,它又有反动的一面,因为这种集体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从根本上说来,是行不通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写于六十年代之初的《曹操与天师道》及《农民运动与宗教》这两篇论文。他在这两篇论文中,集中讨论了三国时代汉中张鲁政权及五斗米教问题。

前一文指出:张鲁在汉中,有一些特别建树,如:一、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量腹取足"。二、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三、依月令,春夏禁酒,禁杀生。市肆贾平。四、有病请祷,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自首其过。五、习老子五千文,教以诚信不欺,等等。"前后计四十余年,汉中地区成为桃花源式的道家理想国。"文章旋即对这一道家理想国的本质作了剖析,指出:"张鲁'不置长吏以祭酒为治'的宗教组织,乃是按等级各领部众的生产或军事集团",他在汉中的设施,"通过宗教形式而部分地实现了朴素的共产主义体制"。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社会发生动乱时,"封建统治关系被遮断,物质生产贫乏,或者遇上其它军事影响,这种集团就会回复到历史的旧型上去。氏族宗法的共同体,彼此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简单办法,就会很自然地出现"。文章随即指出:"不过这种现象只是暂时性的。它停留在公社式的集体阶段的时间不可能很长。张鲁在汉中地区的组织,时间虽延续较久,但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的结果,只会把旧型抛弃,它没有条件把义米、义肉、义舍扩展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章为此作出结论说:"天师道张鲁在汉中的建树,在社会关系上是历史旧型的回复……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发生变化,变化的迅速则与生产发展相等。因此,张鲁式的宗教化政治,只有在生产比较落后、如《蛮书》所述的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留存下去。"⑦

后文就此进一步评论说：

科学的社会主义，曾科学地分析过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财富的平均分配，和消费标准化（亦即平均主义的分配）的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财富集中、生产集中不同。原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筑在生产力极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即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在私有制阶段社会的一种残余的回复，与高度发展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原则的差别。[8]

须知，这两篇文章写于毛泽东为《三国志·张鲁传》写了批语并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印发之后。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

⑦见《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85－89页。

⑧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第8页。

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9]

这一批语写于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当时，全国农村基本完成了人民公社化。每个公社四五千户，政社合一，兵农合一，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吃饭不要钱，生活大半供给，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毛泽东这段批语，称赞的是张鲁，是五斗米道，是"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抒发的实际是对人民公社化迅速实现的喜悦之情。

陈守实同样研究张鲁，研究五斗米道，所得出的却是前面一些结论。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特别是人民公社演变的实际历程，已经对这两种不同的评价作出了公正的总结。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守实是如何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对历史现象作出具有深度的实事求是分析。

陈守实多次说过，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土地统治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统治一切，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统治一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资本论》；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者，应当有志于写出《土地论》与《劳动论》。陈守实本人的《中国土地关系史》研究，其总体构思中就有着《土地论》的影子。可惜的是，非但《土地论》未能写出，连《中国土地关系史》的写作也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

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中国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一直为陈守实所关注。他先后开过《佛学概论》、《史学概论》、《经学史》、《学术文选》、《学术思想史》

以及《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等课程，撰写过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方面一批论文。

他所开设的这些课程，绝大部分我都没有听过。只在 1961 年 9 月至 1962 年 1 月，听他完整地讲述了《中国史学史》，新义迭出，可惜讲课记录未能整理出版。

陈守实讲授中国史学史，确定史学史的任务是对史学发展历程作批判性的叙述，对先前史学成果作批判性的吸收。整个讲授，从历史学的产生，一直到清代史学，自始至终贯穿了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批判性。陈守实强调，历史的研究非带有批判性不可。尤其是学术史、学术思想史，更要具有批判性。学术史、学术思想史，要具有批判性往往更困难，因为哲学史、史学史、经学史、思想史、宗教史等等研究，要批判，则首先要懂哲学、史学、经学、思想、宗教，不懂，就无法了解这些学术的实际状况。批判性，除去揭示学术自身内在矛盾外，还要揭示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他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只做了一半，因为他仅仅就哲学本身论哲学，而没有从这些哲学的根基论起，不了解这些哲学依以存在的基础。过去各种史学史，抄了不少

⑨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旧史,开了不少阅读书目,其实完全没有解决问题,就是因为都没有研究这些史著产生的背景或社会根源。

陈守实讲授中国历代史学的发展,包含各种史著、各种编纂形式和编纂方法、各种历史观点的产生及演变,都坚持了他自己所倡导的这种批判性,特别着重揭示它们之所以出现的社会历史根源。

1962 年 11 月 27 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关于王船山史论的现实性问题》,是陈守实讲授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一份讲稿。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守实如何身体力行,实践他所要求的“具有批判性”。

文章集中分析了王夫之《读通鉴论》关于正统问题、府兵问题、均田问题的特殊持论。旧史正统论,是伦理体系与政治体系相结合的产物。王夫之只承认夏、商、周、汉、唐、宋、明为“中夏之大绪”,把三国、六朝、隋,特别是后魏、周、齐、辽、金、元作为“余分闰伍,紫色蛙声”,不许“强相缀系,以掩篡夺之迹”。陈守实指出,这种新正统论,所针对的是清廷宣布“继明统治,要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的现实,斥责降清的范文程、洪承畴等人主张清承明统,以及清就是明的继续。关于府兵,王夫之的评价是“府兵犹之乎无兵”,即作为销兵之法,也毫无用处。陈守实指出,这是因为与府兵制相近的明代卫所兵制,已为实践证明,非但不能作战,而且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现实的军事动态、社会动态,使他(王夫之)在史实的分析上扫去了很多陈说”,发现了寓兵于农,只会变成兵不兵,农不农,兵农必须分工。关于均田问题,王夫之的结论是:“为均田之说者,王者所必诛而不赦。”陈守实指出:王夫之发论的根据,一是明末农民运动中曾提出过土地分配的平均主义;二是满兵入关,在北京四周大规模圈地,对已被圈占的住房和土地的分配,就是以历史上的均田为模本;三是湖南地区,特别是湖南南部衡阳一带土地分配不成问题。王夫之反对“均田”、“限田”,反对恢复“井

田”，是对八旗圈地分地的抗议，也证实了历史上的“课田”、“占田”、“均田”，只不过是大片空荒地存在时按照劳动力来分配土地的一种操作方式。从上述三个论点的解剖，陈守实得出结论：“估计一个史论撰者对于历史的态度，取决于他对现实的态度；对于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又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和他的世界观。当然，先行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也极有关系，但这只是第二性的……因此史论撰者及史论的全面估价，必须透过这个曲折的三棱镜，才能探取他的原形。”

其二，按照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序，在给予各个时期史家史学思想以批判性叙述的同时，应予他们的真知灼见及处理历史材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所使用的新的方法以肯定。陈守实强调，在研究史学史时，要注意后人比前人在哪些地方有了发展。学术上不能要求完人，要善于抉取其中那怕是一点一滴的可供积累的东西加以肯定。史学史的批判性特别强，但绝不能因史学家有错误而否定其一切。学术史研究中尤其不能唯成分论。过去史家多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士大夫做了官总不忘回家乡买土地刮地皮。人的生活是复杂的，他们往往在某一点上很有见地，在其著作中表现出一线曙光，对于这些东西应当给予注意。当然，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后人批判前人，有时也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将一些真相给颠倒了，将一些新的东西给扼杀了。因此，在评价这些史著时，必须以历史实际自身为依据，辨明这些史著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或给了解历史实际提供了帮助，以及这些史著在其产生的时代或其后起了什么历史作用。

这就是要求能够正确给史著的是非得失作出价值评定。1962 年 4 月 12－13 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长文《读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略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便对清代学者蔡上翔所著《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作了价值评定。从这篇在《文汇报》上分两

日发表的论文,可以考见陈守实本人如何按照他自己所提出的要求去实践的。

蔡上翔生于康熙年间,历经雍正、乾隆,到嘉庆年间方才去世,积数十年之力,撰成此书。这部著作直到嘉庆九年(1804 年)方才刊行。他为什么不在乾隆间刊行?陈守实指出:这主要因为王安石是一位"代表时代变革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定值,或者说他的历史价格随着历史的进程时刻在变动……在社会停滞时期,王安石的历史不大会引起注意,而他的历史价格也在低落;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变革时期,就不是这样,他的历史定值在变动,在上升"。雍、乾的政治压力强,嘉、道间由于矛盾的激化而统治力量疲弱,王安石"在雍、乾时期,不会被引起注意,他的历史价格正在低沉。嘉、道时期便不同。这就是蔡上翔所以要到晚年才能发表这部著作的时间条件"。

文章指出,蔡著对王安石的生平事实,在历史进程中价值评判的曲折变化,作了全面澄清考核工作。从黄庭坚高度评价王安石"贤辅圣能",到明代周德恭毁谤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蔡著"在历史评价正反面的波动中,作出史料上的别择辩正,确是论定历史遗产及其代表人物的独特范例"。

与此同时,文章指出,蔡著也有不足,表明"蔡氏对于材料文献的科学考察,有些问题本身也同样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章以蔡著辨明王安石未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一事,说明蔡上翔此等辩难,并未触及问题本质。陈守实指出:"王荆公主张'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经义即理论,断不会菲薄《春秋》……至于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一公案,到今日还会被人误用,这是由于王安石所主张的'经义'即理论,新经义的实践,被历史进程即后来有关王安石的历史价格的升降变动所迷惑;诬妄的语言,也就随时粘附,不幸为某些史家不自觉地随便沿用

了。”

历史实际究竟如何呢？陈守实指出：王安石新政的理论依据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通过注释，使它理论化，和政治主张密切结合，实在可说是从王安石开始……宋儒的理学道学及各经的注释，也可说是王荆公‘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经义即理论的继续。”陈守实在文章中进一步说明：

> 儒家学说的社会基础，第一期是汉代及其以后的世家大族（即人口多、占地广的豪族），第二期是宋以后的家族宗法（即以一姓的族、分为单位，以氏族血缘共同体的残余为理想化的依据）。……儒家经典注释理解上的变化，以及经典数量的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形成的过程，都是在世家大族和家族宗法的基础上分别凝结成功的。王荆公在这上面表现得最突出，亦即由第一期转入第二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新政变法的理论，和经典不凭注疏的新经义密切结合。全力注经，而且遍注各经。……南宋以后程朱一系的经解，只是王荆公经义的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而加以定型化，除去了经义实践化的“狂妄”，而成为空想的烦琐演绎。

结合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实际，文章作出结论：“必须从实际的社会关系各种客观条件的探索分析而给予评价，王荆公的历史价格，才能有确切的论定。”这当然不是蔡上翔所能完成的，它应当由新时代的学术史研究者来承担。

其三，在学术史研究中，应当善于识别和勇于突破历史文献自身的各种障蔽，在方法论上，坚决摒弃根深蒂固的格义比附与中庸主义。

陈守实在 1948 年 5 月 16 日和 6 月 1 日在《新中华》上发表的《文献学的新解蔽》和《格义比附与中庸主义的解析》二文，曾对此作了专门论述。

《文献学的新解蔽》指出:“文献是历史经程中一切上部结构的蜕片,本身刻划着各种局限性的年轮与各别形态。作为历史性的考索,按照历史发展的阶段、范畴,一一予以清洗化验,在历史的莹彻与了解上,确为重要资料。”但是,在历史发展波浪式起伏过程中,迁徐的变化,急剧的变化,周期性动乱,以及革故鼎新的大转折,都会使文化的知识分子群在一大叠文献上“寄其回环往复的憧憬,而构成碎锦式的望古遥集之蓝图”,或用之“组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论据”,或用之向现实“投掷一个阴沉的感情上的抗争”。于是,一些人“由某一角度断片地组织古文献的装配”以“托古改制”,另一些人则“在文献上抽象探求,找到解释的根据”,如魏晋清谈、玄学,宋元明心性理气的聚讼。文献自身的叠积,以及这些解释性撰述的大量附加,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愈益增多,它便形成一大障蔽,使人们难以觅索这些文献最原始的本质。

文献学上的另一大障蔽,是现今研究者一方面标榜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却援用文献考索的成果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但史论是政论,同时考据亦是政论”,这就难以避免会“包藏着许多背反历史的因素在内”,甚至可能使其考索成果“变成另一中庸性折中理论的迷雾与伪装工具”。最常见的如将新兴理论公式化,“在文献上作枝节套印,使文献成为公式的注脚”;如“东西文化的比附,有意的倒错装配,成为现实的蓝图”,等等。

陈守实指出:“学术思想上的障蔽,便是一切歧误与歪曲利用的防御工事。配合现实的需要,予以清洗解除,实为当务之急。”

《格义比附与中庸主义的解析》指出,格义比附,本是佛教经典传译和佛教传播时为与异型文化沟通融和而使用的方法,“格义是形式的改铸,比附是内容的粘合”。可是,这种方法却在随后被用于构建思想体系。文章指出:“由格义比附的方法论到思想组成体系的建立,在

现实铸炼出来的思想形态上讲，是病态的。"因为格义比附"违背思想组成的独特的有力的尊严性"。文章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最支离的格义比附，而为腐烂倒退势力依附者所援用支持"。文章指出："东方与西方，在人类历史经程上各异其范畴、基壤，是显然的，不能相互比附。所以所得的结论是：凡作此类格义比附的人，大多数都是在现实动荡的场面下，作虚玄架构的某种腐烂势力的附属物。"格义比附既是"另一历史范畴中的传统力"，当历史发展已经突入新的阶段时，便"应该使他自己埋藏自己"。

至于中庸主义，文章指出："中庸主义是周期性运动上的必然产物。现在一切超然性的理论和措施，都以这一思想模式作胎盘。无原则，无立场；与科学背离，与人类进步的企求背道而驰。格义比附的广泛应用，使中庸主义在传统气氛未澄清的阶段上担负了迷人眼目的任务。因为中庸主义是以古典的历史范畴作为他的温床，所以传统压力经常充中庸主义的护士。"陈守实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社会结构没有被改组，儒家偶像虽然曾经刺破尊严，而中庸主义的理论依然存在，且与格义比附广泛联合，广泛应用在政治形态思想形态上支撑着反历史的势力，梦魇一般地压着活人的头脑。"因此，应当使中庸主义同格义比附一样"自己埋藏自己"。

不为笼罩在历史文献周围的重重障蔽所桎梏，不向格义比附与中庸主义屈服低头，陈守实本人这样做了，也一再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他在学术思想上，包含经学史、史学史上本可以写出更多有识见、有锋芒的论著，可惜，思想、学术、文化领域内越来越严峻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形势，剥夺了他的机会。

功力毕现的明清史发微

陈守实在清华研究院时就集中精力研究《明史》撰著问题，以后展开明清史研究，这方面的论文，陈守实一生前后共写了十多篇，占他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半。不过，早年撰写的论文，重在史书的考实订正；晚年撰写的论文，则重在结合史实作理论的思考。

《〈明史稿〉考证》是陈守实成名之作。这篇论文不仅有力地论证了《明史稿》为万斯同所撰，王鸿绪纯为攘窃，而且颠倒乖舛，以掩饰其攘窃之迹，而且特别突出了史德的重要性，赞扬万斯同"其于史德，可谓纯备"，谴责王鸿绪"既无记载是非之公心；而妄意改窜名人之稿，成为己有；又乾没史馆中长编草卷，以扶植其《史稿》，使人无可抉摘，而快其喙鸣；其于史家道德，可谓无纤毫存在"。

《〈明史〉抉微》评析清代官修钦定的《明史》，即列入二十四史正史的《明史》。以新朝而修旧朝之史，着笔本就为难；清朝开馆修治《明史》，更有民族问题夹杂其间。加上主持修史者或不学无术，或阿谀顺旨，或夹杂私念，或持门户之见，所修之史问题会更多。陈守实叙述了从顺治二年(1645 年)至乾隆四年(1739 年)修治《明史》的全部历程，重点研究了清王朝文字狱如何影响史事之记述，学派门户出现如何牵及史事之失实，修史人物学识、品行如何关系史事之裁核；然后对《明史》谬误扼要作了论纠，指出了明史料秽杂及湮佚的状况；最后讨论了《明史》之改造与补辑问题。

陈守实在论文中指出："《明史》著'钦定'字样，故在有清一代有言《史稿》之谬误，独不敢诵言《明史》之失。且不惟是，凡记述明清之际掌故者，一须以《明史》及《御批通鉴辑览》等书为准则。"晚清方有

学者稍稍言其漏略。综观《明史》之失，陈守实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一详加论证。这五个方面是："（一）清帝之禁拑太甚，致事多曲讳。（二）因学派门户之偏见，致颠倒失实。（三）蒐访之漏略。（四）明清关系多失真相。（五）弘光迄永历之终，史实多缺。"最突出的问题，是明清交涉不得其相，明末抗清运动悉数被删；配合清帝极意表彰南宋风庳之道学，以柔服俊民，使不再为急激之反动；而对王阳明及其弟子则多所指摘。对"学术之论争，因清帝之偏党而任意轩轾"。积此种种，《明史》遂"褒贬无凭"、"事实乖忤"、缺略过多。

对于明代文人所写种种野史，陈守实提醒人们："明代文人，最工作伪，中叶而后尤其盛。又党派轧轹，妄生是非，纂修实录者多失其平，……而野史更不足信。"加上明人遗著，十不存一，改造《明史》，便非常困难。

《〈明史稿〉考证》与《〈明史〉抉微》实际上是史学史研究，同类型的论文还有《明清之际史料》与《克拉维约东使记》等。和六十年代撰写的《读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及《关于王船山史论的现实性问题》相较，后者理论上有较为深入广泛的展开，前者基本上是史事本身的考证、辨析与澄清。

1949 年以前，陈守实也发表过《清初奴变》及《明初与帖木儿关系试探》这样考究明、清史事的论文；五六十年代，他所发表的《读"永禁机匠叫歇碑记"》、《跋〈苏州织造局志〉》，[10]讨论了封建行帮与封建王朝的特种工场手工业问题；《土地问题检论》，[11] 就《宛署杂记》、《明夷待访录》、《日知录》、《陶庐杂录》涉及土地问题的论述及一条鞭法施行后的丁徭问题进行了讨论；《特种'隶属状态'的历史考察》与《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12]分析了堕民、世仆、乐户、丐户的性质和秘密会社的形成与演变；《〈土官底簿〉跋》，[13]讨论明清时代的民族同化



陈守实所著《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

问题。这些论文，大多从一些具体的较小的问题切入，力图说明明、清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若干本质问题，理论性都相当强。

《读"永禁机匠叫歇碑记"》与《跋〈苏州织造局志〉》俱发表于1959年。前一文论证机匠叫歇与帮行名色、挟众把持这种类型的群众性运动，并非资本主义市民运动，"决不能在形式上作偶然类同的附会，在历史时代上造成错觉"。文章指出："'帮行'固然是劳动者的一种组织，可以对机户展开斗争，但机户机工同样在封建统治下受到剥削，而机工的帮行又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制限；劳动组织、劳动条件也使劳动者的依存关系没有摆脱，所以这种叫歇斗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隔离得很远。反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出现，必须首先毁灭帮行，毁灭苏州织造局这类封建统治下的加工消费机构，和变相的'行户祇应'的均机，以及民户贴养织造局机工之类的一系列封建强制义务关系的存在。"⑭后一文论证苏州织造局经历元、明、清三朝，"在中国历史上，此种属于官的特种工场手工业，是在社会生产缓慢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土贡的取消而出现的，同时在明、清两代又更因落后外族的影响而存在。因此，是纯粹封建式的。如果民间简单协作的商品生产小作坊出现并能保持繁荣扩大，这类机构就必然缩小而复灭。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同其始终，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处在完全相反的地位"。⑮

发表于1962年6月的《土地问题检论》，以相当大篇幅揭示了明

代各类官田的本质及其演变的规律。文章指出：

> 实际上的所有关系，决定于剩余产品的分割，亦即一般所谓地租的分割。封建皇朝对土地所征收的“田赋”包括实物、银两、徭役；地主的地租同样也包括实物、货币、工役。土地占有关系上面的人物是“封建皇朝”加“地主”加“佃农”。自耕小农减去中间一项，只有两项（皇朝与农民）。官田减去中项（地主），“租”与“赋”合并在一起，的确存在着国有的形式。但这种国有形式，在时间上无法完成和实现，因为租率在变动，在增加，结果所有关系就按照剩余产品的分割，“租”“赋”合一的所谓国有式的官田的两项：皇朝与佃农，就马上变成三项：皇朝、地主（承租官田的地主豪绅，或部分原来承种官田的佃农）、佃农（或称转佃制）。这里面有一个定律，决定着封建土地的所有关系，即土地上剩余产品，额外价值的分割及其比率。……至于对这块土地所有权的大小，当然就需要决定于所分割到的剩余产品比率的大小；还要加上特种的封建关系。⑯

⑩《读“永禁机匠叫歇碑记”》，发表于《复旦月刊》1959年7月号；《跋〈苏州织造局志〉》，发表于《复旦月刊》1959年10月号。

⑪ 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6月），在《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中以“陆：明清土地问题”为题收入。

⑫《特种“隶属状态”的历史考察》，刊于《复旦学报（社）》1979年第2期；《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刊于《学术月刊》1979年3月号。

⑬《〈土官底簿〉跋》，副标题为《再论民族问题》，仅存记录稿，未见发表。这篇论文反对将欧洲民族问题和俄国民族问题套用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强调“民族运动”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阶段时方才形成的。资产阶级用“民主”的方式消灭封建特权，从而形成了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是地主封建制。一个王朝开始时，统治关系处于正常化状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虽然也有强制关系与剥削

论文强调土地所有权,具体体现在剩余产品的分割中。论文反对用占有权、所有权、使用权一类用语来给传统土地关系作统一的界定,指出,独立的、完整的所有关系的出现,就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存在⑰。

结合明代土地关系的演变,论文批评黄宗羲"井田必可复"及顾炎武"后魏垦田均田之制,足为后世法"的主张,"这一类话代表着地主封建政权一个大段落的开始期——亦即断代史的开始期,恒产恒心,平均分配的小农思想的空想主义者所重复无数次的滥调"⑱。

论文还讨论了一条鞭法施行后的丁徭问题,指出:徭役是经济外强制的一种方式,它渗透在封建制的全部机体中。生产的不发展,封建的土地关系,使徭役按比例地增长。劳役部分在租和税的比率变化,逐次沉淀到土地上,当然是标示着封建关系的浓度在时间上或地域上的稀释,体现着土地占有关系统治一切日趋明朗化⑲。

《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附论《论兵农分合问题》,研究兵役问题。这是徭役中的一种。文章详述各代用移民实边、边境屯田、属国屯田带有强制性的办法,使兵农合一,对抗落后游牧族兵民合一、兵民不分的军事斗争,说明它们只能是暂时的。时间久,土地占有关系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兵同样也会发生变化。王夫之所谓"兵不兵,农不农"的现象,必然会跟着产生,从而减低作战能力,失去防边意义⑳。

须知,这些论文都撰写于人们刚刚开始从人民公社化热浪中稍稍冷静下来的时刻,它们无疑有助于用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来审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以及全民皆兵、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政社合一等现象,有助于透过语言表象去观察其实质。

《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和《特种"隶属状态"的历史考察》两文亦写于六十年代初,都是在陈守实去世后,在 1979 年 3 月发表的。前一文专门讨论了农民群众自发的集结问题,指出:"自然经济的结

构，分散的劳动，家长式的生产，是散而不是聚。‘散’是封建统治关系的基础。他的对立面当然就是‘聚’。”被排挤在土地之外的农民，或由兵役、出征、戍边、筑城塞、河道开浚等徭役集结起来，或由饥荒、逃亡集结起来，或由移徙结集起来，或由宗教迷信及神秘主义集结起来，而他们一旦集结起来，就会形成冲毁现状的动力。文章强调指出："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农民运动的组织，不可能超过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框廓。所以皇权主义，宗党关系，即家族宗法关系，乡里关系等等，必然仍存在于否定力量的组织关系里面。"㉑

陈守实晚年明清史研究，重点是经济史、社会史，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尤为他所关注。他一再说，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获得明确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是对于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出的理论性概括。陈守实的论著，特别富有理论性、思辨性，这在同时代史学家中并不多见。

陈守实公开发表的论文，只是他著述中很少一部分，还有不少存稿和讲课记录稿，未能整理刊布。这些遗稿若能出版，这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史学家的独到见解和杰出成就，必能为更多人所了解，所珍惜。

关系，但一般说来还比较正常，对少数民族的前进与同化都有相当程度的推动。到后来，封建王朝逐渐腐化、崩溃，对少数民族的矛盾、斗争便会加剧。总之，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和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俄国、欧洲国家的大民族主义是不相同的。

⑭ 见《复旦月刊》1959年7月号，第8页。

⑮ 见《复旦月刊》1959年10月号，第60页。

⑯ 见《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第251–252页。

⑰ 见《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第253页。

⑱ 见《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第255页。

⑲ 见《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第260、268页。

⑳ 见《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第282页。

㉑ 见《学术月刊》1979年3月号，第65页。

陈守实主要论著

《<明史稿>考证》	《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1926年12月。
《明清之际史料》	《国学月报》1927年5月号
《〈金史·忠义传〉完颜彝战迹及年月考》	《新中华》1927年5月号
《清初奴患》	《史学与地学》1928年10月号
《〈明史〉抉微》	《国学论丛》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
《关于东西汉学家考证中国边疆史的态度问题》	《大学季刊》1934年10月号
《蒙古斡哥歹汗南征时之完颜绰华善》	《大学季刊》1935年10月号
《考证学的新趋势》	《文化杂志》第1卷第3期，1941年6月
《克拉维约东使记》	《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21期，1946年11月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虫》	《昌言》1946年6月号
《明初与帖木儿关系试探》	《新中华》复刊第5卷第17期，1947年9月
《文献学的新解蔽》	《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10期，1948年5月
《格义比附与中庸主义的解析》	《新中华》复刊第6卷第11期，1948年6月
《中国农民战争组织形态》	《新中华》1951年9月号
《读“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复旦月刊》1959年7月号

《跋〈苏州织造局志〉》	《复旦月刊》1959 年 10 月号
《论曹魏屯田》	《学术月刊》1960 年 2 月号
《我国历史上的义仓制度》	《解放日报》1961 年 7 月 7 日
《读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略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	《文汇报》1962 年 4 月 12 - 13 日
《关于王船山史论的现实性问题》	《文汇报》1962 年 11 月 27 日
《土地问题检论》	《中华文史论丛》1962 年 6 月
《特种"隶属状态"的历史考察》	《复旦学报》(社)1979 年第 2 期
《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	《学术月刊》1979 年第 3 期
《曹操与天师道》	《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中国农民战争散论》	《中国农民战争史集刊》第 1 期，1979 年 12 月
《农民战争与宗教》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 2 辑
《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 月版



以史经世：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
——陈旭麓传

周　武

引　言

要是旭麓先生还活着，今年才八十三岁，可是他去世已整整十三年了！本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七十，已是造化所赐，但旭麓先生的突然去世，对中国学术界、对敬他爱他的万千学子而言，却仍不啻是晴天霹雳！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十三年前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按原来的计划，先生将于12月2日下午给在校的研究生上课，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已收到通知了，但在12月1日傍晚六点一刻先生却被可恶的心肌梗塞夺去了生命。半个月后，也就是12月15日下午，在肃穆凄怆的龙华殡仪馆吊唁大厅里，来为先生送行的家属、朋友和学生七百多人无不痛哭失声，甚至连以前从未听到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种气氛下不能自恃！后来，我曾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个主要司仪谈



陈旭麓先生

起当时那种无法抑制的悲伤情景，他说："那种发自内心的哀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导演的，是先生自己导演的。"是的，那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里，有对先生学问与人格的景仰，有对先生晚年境遇的悲愤，更有对先生遽然仙逝的震悼。

他是一个站起来思考的人，一个在大学时代就已崭露头角的有思想的史学家和有学术的思想者，毕生往来于学术与思想之间，求索百余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即使是在大批判的吼声湮没一切的严酷年代里，仍坚持以爝火萤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症结，并在老境侵夺中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了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

他又是一个当了整整四十年副教授才进入教授行列的大牌教授，去世时只是才五、六个人的研究室主任，却以自己的文章和思想铸就了大匠身后的丰碑！他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却至死也未获得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然而在学生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师道的楷模，"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

这就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生前声名洋溢，身后长令生者慨叹！他主张"以史经世"，他的经历就是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尽管曾经参与先生遗著的整理，又编过先生的文集，自信对先生的学行和志业已有所了解，但当我开始下笔写这篇传记的时候，仍然感到力不从心。我当然不指望这篇传记能够真切地传达出先生学问的精髓和神韵，也不想把它写成一篇怀古忆旧的纪念性文章，或歌颂先师学问道德的表扬性文字，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只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我

对先生及其近半个世纪治学生涯的理解。

“出　湖”

一个人的学行志业总是与他早岁的经历、境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旭麓先生遭逢的是一个“将死”和“方生”交织的大时代。这个时代裹挟了亿万苍生的命运，也左右和主宰了那一代知识人的追求。

五四前一年，1918 年 3 月 31 日，陈旭麓先生①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源湾的乡村里。②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湘乡地处“山国”，但仍不免受时局影响。先生祖上多以经商为业，曾祖父一辈家境颇为富庶，但到父亲一辈，已家道中落，常常入不敷出。因此，先生年幼时常跟姐姐到田里拾稻穗，他的母亲亦因营养不良而患贫血，因贫血而在先生五岁时早逝。先生的父亲虽非经营长才，但经商甚为得法，盈利颇丰。先生七岁时，家中已无温饱之虞。湘乡是理学之乡，重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大约在 1926 年，白源湾开办了小学，先生遂入学发蒙，随习国语、算术、图画、音乐、体操诸课程。不久，学校停办，先生乃转入旧式蒙馆，课本亦由“大狗叫、小狗

① 旭麓先生初名陈修禄，在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读书时改名旭麓，湖南话修、旭同音。笔名有老陈、林父、陈今、岳山等。

② 湘乡是个大县，有一百多万人口，1949 年后拆分为湘乡、双峰二县，先生故乡划属双峰。

跳”变为“学而时习之”。后先生又转学到一所层次较高的私塾，随私塾先生学《左传》、《诗经》、古文、唐诗，以及《近思录》和《昭明文选》等，开始系统地接受传统经史诗文的熏陶。

1934年秋，先生离开了湘乡，负笈省城长沙。自清季以来，长沙就已逐渐成为湖南的新学中心，这里有不少新式学校，传授新学课程，如数学、英语等。但此前先生一直就读于私塾，所学与这些新式学校相去甚远，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先生抵长沙后并未入新式学校，而是进了“孔道国学专科学校”。

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是一所倡导“尊孔读经”的学校，校长是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师多为前清举人、秀才，思想比较守旧，但于国学确有造诣。学校课程设置凸显国学教育，虽亦有哲学、小学、地理学、音乐等学门，但哲学课程并不教西洋哲学，而是讲授宋明理学；音乐课不教五线谱，授课乐器也不用钢琴、风琴，而是用古色古香的七弦琴。在这种波澜不兴的静谧氛围中，先生在研读经史子集之余，曾与十来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名叫“一社”，取古书上“天下定于一”之意。每当三月阳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学，登岳麓山，游天心阁，骋目畅怀，分韵赋诗。这些诗作后曾结集石印，名曰《一社集》。据先生自述，其内容多为旧体诗，也有少量文章，基本上是风花雪月、感时伤世之作。

虽然孔道国专与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的整体氛围颇不协调，但对先生而言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深厚的旧学根底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他的喜欢填词赋诗与“一社”的活动也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更何况先生也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实际上，先生博览旧籍之余，也接触了不少新学论著，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等。这些新学论著在三十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书籍了，但对于一直浸润于经史子集

的先生来说还是足以振聋发聩的。孔道国专自以倡导国学为务，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在外患迫来的时代兴起，本身就寄寓着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据先生回忆，当时国专里有位姓赵的老师，是康有为的学生，他每出作文题，不是论历史上的外患入侵，就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类命题。先生的作文，时常得到他的称赏。有一次，他还在先生课堂习作后批了一首七言诗，最后两句是"心有阴符谁可授，圯桥坐得到天明"，诗中以圯上老人自况，将学生比作张良，已由平日的称赏变为殷切的期待了。

在长沙孔道国专的那段岁月，给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特别是那些名山胜水更成了鼓舞他前进的力量之源。后来，他曾在一篇散文中深情地写道：

> 衡山、岳麓、湘江、洞庭，故乡这些名山胜水，是天下皆知的。我在青年时代，常倘佯于湘江之滨、岳麓之巅，山上的森森古木，江中的争流百舸，是多么熟悉。我原名修禄，嫌太俗气，十几岁时到长沙读书，改名旭麓，名字与岳麓山也发生了联系。可我多次从衡山脚下走过，却没有去爬祝融峰，我在洞庭湖不远的长沙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去湖上泛舟。"后来的几十年，奔驰在外，湘江、岳麓始终好像亲人的身影，萦绕胸际。岳麓山的云麓宫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涛声下洞庭"，曾成为我梦魂中追踪衡山、洞庭的向导。我也每每从地图上、游记里和诗词中贪婪地领略衡山、洞庭的风姿。"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出了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出湖'，词源何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洞庭波送一僧来'，八指头陀出了湖；《洞庭湖》杂志创刊，湘籍留日学生出了湖，湖南的名山胜水，就是这样鼓舞着她的儿女前进。

……

人对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怀。尽管年光流逝，乘腿脚尚健，一有机缘当再渡洞庭，品茗君山；还想攀登祝融峰，以偿平生未了之愿；也很向往张家界的千岩万壑。我爱故乡的名山大川，更爱那里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着丰富的生活，还有自己童年的足迹。③

这篇情文并茂的文字里，浸透着先生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更寄托着先生对故乡绵绵无尽的一往深情。受孔道国专和故乡名山胜水的陶铸，又熟见近代三湘志士在湖山之间留下的足迹，先生于苦学之余，遂有追踪前贤之想。立志“出湖”，也就成了他生命的渴望和坐标。

抗战爆发后，听说武汉有一个抗日工作训练班招生，先生立即风尘仆仆前去报考，但一到武汉，先生就病倒了，只好拖着病躯返回长沙，治了十多天才能勉强起床，因此而错过了参加抗日工作训练班的机会。病愈之后，先生继续潜修学业。由于孔道国专并未在国家教育部立案，文凭自然亦未得权威部门认可，先生乃弃孔道国专，转而投考刚刚内迁到长沙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由著名教育家唐文治主持，在教育界有不低的声誉，前往报考者有五十余人，先生考分名列前四，并受到唐校长的特别约见。考取无锡国专，对早已熟读经史的先生而言，不过是对历年所学的一次检阅，实际上，无论是孔道国专还是无锡国专，都已无法满足先生的求知欲望，他渴望深造，更期待挑战。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战局的逆转，大夏大学为时局所困决议迁校，与复旦大学联合办学，分设联合大学于庐山及贵阳。④不久，东南局势阽危，庐山恐将不保，乃再间关跋涉，辗转迁于崇山峻岭之贵阳。从庐山到贵阳，途经长沙，先生由湘乡同学引见，得识大夏大学秘书长

王毓祥。在王毓祥的支持和帮助下，1938年，先生离开无锡国专，前往贵阳，入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一年后因故转入历史社会学系。[5]这一选择，影响了先生后来一生的命运。

大夏大学立校的历史不长，内迁之时仅十余年时间，但由于创校诸老和王伯群校长治校有方，精英云集，在上海时就已声誉鹊起，并跻身上海八大名校之列。先生选择大夏作为自己的进学之所，并非就地取材，而是基于大夏本身清新形象和不俗业绩。由于先生此前一直就学于私淑和国专，从未进过新式学校，初入大夏不免新奇和陌生，但他敏捷的才思和厚实的旧学根底，很快就使他从同学中脱颖而出，1942 年 10 月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第一本书《初中本国史》，次年又在一家文史期刊上发表了洋洋三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并在贵阳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随笔和时论，成为公认的大夏高材生。先生文字中所展露出众的才思，颇得大夏文史前辈的嘉许和赏识，时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谢六逸先生更对他另眼相看，不仅经常为他排忧解难，还特地安排先生到他主持的文通书局编辑所兼任编辑干事。

③《湖山情思》，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第 446 - 448 页。

④ 大夏内迁时曾一度与复旦组建联合大学，设第一联合大学于庐山，设第二联合大学于贵阳，不久东南形势恶化，联合大学行政委员会议决，将庐山第一联合大学主体部分迁往重庆，剩余部分合并到贵阳联大。1938年2月，复旦、大夏分立，以庐山迁渝之第一联大为复旦大学，以贵阳之第二联大为大夏大学。见陈旭麓先生所作《大夏大学内迁十年纪事》，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2卷，第608 - 642页。

⑤ 先生此前从未进过新式学校，更无高中文凭。在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一年后，国家教育部审核学籍时查出他没有正式的中学毕业文凭，勒令将其退学。大夏大学注册主任(相当于副教务长)蓝春池告诉先生:“你已学的成绩完全不作数，再从一年级读起，以同等学历报部。”先生固然懊恼，但学校没有要他退学，已算很宽厚了。先生只得屈从，但不愿再读中文系，乃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从头学起。

先生在大夏的读书生涯，首尾五年。五年中，先生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而且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开始对“进步书籍”——诸如《论持久战》、《资本论》等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在与同学交谈或论辩的时候，也频繁地借用这些著作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开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闭口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先生还因此而得了一个绰号——牛克斯。先生本不是好辩之人，但目睹山河破碎，国事日非，不免忧心忡忡，并由忧心而生愤激。1941年春，国民党特务竟然在大夏大学校门口制造惨案，开枪打死一无辜女生，先生目击惨案，悲愤难抑，立即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评论文章，贴在壁报上。学校当局如临大敌，命训导处职员揭下，直送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并扬言要严惩作者。后经谢六逸先生斡旋，先生才得以免遭不测之祸。

大学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多梦的季节。在这个多梦的季节里，先生曾将自己的抱负写在对未来的规划之中，那就是要创办一所中学，或者一家出版社，先生后来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回忆说，他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文教界打下一片江山。先生所作《黔灵山寺中戏着袈裟摄影》一诗颇能反映他此时的抱负和理想：

“会首前程笑拈花，儒冠今欲换袈裟。

眼中一滴英雄泪，要渡苍生百万家。”⑥

“出湖”，并不仅仅是走出湖南，“要渡苍生百万家”，才是先生立志“出湖”的本意。带着这个豪迈的志向，1943年2月大学毕业后，先生应聘出任贵州修文县立中学校长，可是，在那荒僻之区，先生非但无法一展怀抱，反而因拒绝在校内讨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而被有关当局视作“共党嫌疑”。仅一个学期，先生就无奈地辞职了。

早岁哪知世事艰，先生一踏入社会就切身感受到这句诗的深刻含

义。1943 年夏,先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并受聘于湘乡私立起陆中学。先生选择回乡任教,主要是基于尽孝,可以就近照料病中的父亲。但是先生的孝心并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这年冬天,父亲还是去世了。1944 年春夏之交,日军攻占长沙,进逼衡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湘乡地处长沙、衡阳之间,自是一派兵荒马乱。先生携家人,一路逃难,经邵阳,且住武冈山门。到 1945 年 3 月,湘乡一带战事稍平,先生乃送家人返乡,自己只身一人,出湘西,顺乌江,入四川,在抗日烽火中颠沛辗转,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从大学毕业到离湘入川,三年中,先生在个人的事业方面几无尺寸之进,似乎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但漂泊的生活也使先生对社会的现状和民间的困苦有了更切近的了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先生在入川途中,口占《乌江船上》一诗,就强烈地发抒了这种感受:

杂花犹绕树,江上已春残。
水急千寻石,云深两岸山。
居民无完服,破屋每三间。
休道风光好,西南物力艰。⑦

1945 年 5 月,先生抵达重庆后,借住在

⑥《浮想偶存·诗词》,《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第 323 页。

⑦《浮想偶存·诗词》,《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第 323 -324 页。

一个同乡的商店里，后经两个大夏同学介绍，到赣江中学任历史课教员兼训育主任。

赣江中学系旅渝江西同乡会所办的中学，设在离重庆市区六十里的冷水场的一个庙里，有三百多学生。当时，形势动荡，校纪萧然，高年级学生中不少是袍哥的成员，常常无端滋事，酗酒斗殴。先生既兼任训育主任，自然对校纪校规负有责任，因此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整顿校纪校风，严厉训斥那些无恶不作的学生。但被训斥的学生却不买账，怀恨在心，公然在校内贴出大标语："打倒陈旭麓。"校方对此置若罔闻，先生一怒之下，辞去教职，返回重庆。

辞去赣江中学的教职，先生再次失业。就在先生为生计奔波之际，先生得知当年曾经荐举过自己的王毓祥先生此时已是大夏大学的副校长，正在重庆办理大夏大学的"复员"手续。先生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寄了一首诗，语多问候，实系自荐。王先生本来就十分欣赏先生的才华，接到来信后，便急召先生，委以校长室秘书之职，协助办理大夏大学返沪事宜，参与编纂《大夏周报》。

四十年代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较量，各种政治思潮在这里激荡，各种政治活动在这里展开。在这种氛围中，先生的思想日趋激越。19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重庆各界为促成会议成功，每天晚上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会议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先生常前往聆听，其中王若飞、郭沫若等人的演讲，以及国民党特务的现场捣乱，均给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日后回忆说："王若飞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而特务们的怪叫和飞石，更增加了我对国民党的鄙视和愤慨。"⑧1946 年 2 月 10 日，重庆各界万余人在校场口隆重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国民党当局却派遣特务、党棍，冲击会

场，抢占主席台，殴伤大会主持人和演讲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等六十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校场口血案。先生恰好在场，目睹当局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夜疾草《目击者》一文，刊诸重庆《民主报》，发抒了一个血性青年的爱憎和愤鸣。事后，先生拟以此为题材撰写一本专书，并拟定了书名和提纲：书名为“胜利了以后”，提纲共分十章：（一）胜利的鞭炮；（二）所谓“受降”；（三）毛泽东到了重庆；（四）双十协定；（五）内战！内战！内战！（六）赫尔利走了；（七）学府的血；（八）政治协商会议；（九）沧白堂与校场口；（十）历史往哪里走。这本书后来虽没有写成，但从先生拟定的书名和提纲可以看出，先生的个人立场与思想倾向已开始趋向激越了，以致于连他在赣江中学的同事都以为他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9]

先生在重庆前后不足一年半，但对先生而言，这是一段艰难而又异常关键的年月。说它“异常关键”，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因此，先生始终对这段时光怀着复杂的情感，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住在重庆一年多，街道的坡度和灰尘，宿舍里的耗子，酷暑的夏季，虽然

⑧ 熊月之：《陈旭麓先生传略》，《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614－615页。

⑨ 夏禄：《致陈旭麓先生家属的唁函》，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23页。

是胜利的司令台，人们终究不易怀着浓厚的好感；可是一旦要离开了，总有些莫名的怅惘和眷恋；何况在艰难的岁月里，有许多天真的面庞和纯洁的友谊，给你打发了多少寂寞的日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离别的须臾，怎不叫人神往！”[10]

1946 年 9 月，先生随大夏大学全体复员教职员一起乘华泰公司的轮船顺江东下，沿途开开停停，直到 10 月 24 日才驶抵南京。26 日清晨，改乘火车抵沪。一个多月的旅程，先生写下了许多诗句，后来又以《江上秋风》为题，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有“细剥核桃数浪花”的悠闲时分，更有“和平安得戢兵氛”的沉痛叹喟！兹录其中两首七言诗：

船泊奉节

茫茫湖山道路赊，眼穿望不到京华。
东风吹皱一江水，秋雨羁留八月槎。
心伴马头云出峡，人同雁影渚为家。
看书睡起浑无事，细剥核桃数浪花。

船自三峡下泊武汉重游黄鹤楼

衣冠几辈浊难分，楼阁依然满夕曛。
胸底险翻三峡浪，眼前幻接十年云。
江山合有诗人藻，竹帛空谈革命勋。
中原血泪民力尽，和平安得戢兵氛。[11]

从重庆到上海，对大夏而言，是复员；对先生而言，则是初来乍到。到上海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先生的身分仍是校长室的秘书，具体负责

联系毕业同学，起草各种普通文书，[12]看起来很平凡，但复校之初百废待举，头绪纷繁，校长室肩负沟通上下、联络内外之责，工作并不轻松，单补发文凭一项就够头疼了，[13]更何况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事上的缠绕！当时大夏校长是欧元怀，副校长为王毓祥，欧王间有矛盾，先生处境比较微妙。[14]大概从 1947 年初，先生被聘为讲师，不久擢升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949 年 2 月起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秋季开学，先生同时在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但身分不同，在大夏是副教授，在圣约翰则是教授。而在时人心目中，圣约翰是上海顶尖的名校，大夏逊其远矣，在彼为教授而在此仅为副教授，于理不通，这可能是由于欧、王之间的矛盾所致。尽管如此，上海毕竟为先生提供了一个可以挥洒才智的广阔空间。

"自由分子"

抗战期中，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国共两党周围都各自凝聚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

⑩ 陈旭麓：《江上秋风》，《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第 348－349 页。

⑪ 《浮想偶存 · 诗词》，《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第 325－326 页。

⑫ 在大夏大学复员以后出版的各卷《大夏周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先生的文章，如《大夏大学内迁十年纪事》、《江上秋风》、《文凭与工作》、《小吴》等等。

⑬ 由于八年抗战，大夏数度播迁，许多校友无法正常地取得文凭，又有许多校友在流离颠沛中失去了文凭；还有的则因种种别的缘故而延宕，而战后铨叙机关甄审公教人员的资历又日趋严格，因此，每天都有许多校友急如星火地向母校追领文凭，先生曾专门就此事写了一篇题为《文凭与工作》的文章敬献给校友。见《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第 365－368 页。

⑭ 先生就读大夏，以及后来到大夏任职，均蒙王毓祥先生荐举，因此先生与王毓祥副校长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群落。在这两大知识群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颇有声势的"自由分子"群落，他们无党无派，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无时无刻不在急切地寻找内战硝烟笼罩下的中华民族前去的路。他们的言论日趋激烈，却没有以意识形态的语言为某一个政党张目；他们"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但就立场而言，仍然是中道的"自由分子"的立场。先生曾在 1947 年 10 月发表的一篇时论中探讨过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及其胜利以后的转变，其中写道：

> 抗战期中以至于胜利以后，知识阶级的社会意识，有一个大大的转变，好些象牙之塔的学者，因环境给予的刺激，走上了时代的道路，如闻一多先生本是一个连报都不愿意看的学者，竟积极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即其一例。美国教会世界服务社理事长穆斯博士游历远东返国后谈：'中国除共产党外，尚有不少自由分子，彼等不能参加蒋主席所领导之政府，故有单独发动变乱的可能。'穆斯博士的观察，有部分的道理，在中国知识阶级的领域中，无疑的有大量的自由分子，他们不愿走入共产党的集团，更不满意政府的一切，他们拥有舆论和民气的反抗力量。大概穆斯博士所见到的，便是国共以外的许多自由分子以及五月间学生运动的表现。这许多自由分子，固然怀着满腔热血，但是欲单独举起革命的旗帜，是不容易的：一则缺乏坚强的组织，再则没有革命手段的武力，并且愿意挺身出来干涉政治的自由分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究竟太少，这是中国的中庸主义在作祟。但是他们虽然没有革命的力量，却有左右社会的影响。如果国民党能够领导政府突破当前的难关，实现中山先生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以达到民主的道路，则这些自由分子正是民主的新血液；如果政府继续腐化恶化下去，他们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将有走入左方革命集团的

可能。不可否认的，此种现象，已日趋显著。⑮

这段话虽是就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变而言，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先生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实际上，四十年代末先生的个人立场正是沿着上述的轨迹逐渐转变的。

大概从大学毕业始，先生在求职与乱离之中对国事的蜩螗、社会的板荡、生民的艰窘有了切肤的感受和直观的认识。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先生在陪都重庆的时候，便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政治性集会，经常聆听社会各界精英的演讲，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先生的视野更开阔了，对政治现实的认识更深入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怀更深切了！这种变化，使先生非常自然地与那些批评时政、急切地为民族寻找去路的言论产生强烈的共鸣。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他曾经与整个民族一起狂欢；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他也曾参与庆祝和欢呼；但“胜利的鞭炮”瞬间就被国民党特务的乱石和怪叫淹没了。随着内战的爆发，以及战事的扩大和蔓延，本来经过八年抗战已高度萎缩的国民经济再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秩序混乱不堪，经济濒临崩溃，物价急遽飙升，生活指数直线飞涨，人民

⑮ 陈旭麓：《中国还需要革命》，《时与文》第2卷，第4期。

的痛苦指数则达于极点，但黩武者却依旧党同伐异，不惜诉诸武力，诛除异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且不说那些党派化的知识群落，就连许多原本无心问政的“自由分子”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和平与民主的诉求，严厉地抨击时政，为自己的生存，也为民族的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

从重庆到上海后，先生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抗争之中，他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众多活动，以及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反美扶日等政治示威，并与几个大夏湘籍同人一道创办《潮声报》，上海解放前夕还联络部分志气相投的教师发起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等。但是，先生并不仅仅只是参与一些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更以巨大的勇气和胆识致力于从理论上探寻国家灾难的根源和民族可能的去路，成为那个时候在黑夜中呼唤光明，为新中国催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先生并不是一个政论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由这种观察和思考转化而来的言论和文章，往往不受那种就时事论时事的一般政论模式的约束，而具有一种总揽全局的气度和恢宏廓大的视野，其论旨的鲜明，思辨的神采，理路的圆融，论说的通透，文字的畅达，均明显有别于那时的言路中人，自成一格。虽然先生那时还不足三十岁，但年龄丝毫不影响他文章的深度和笔锋的犀利。他所撰写的时论《我们向哪条路走?》、《署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论学生运动》等等，均发表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著位置上或在目录中以粗黑体标出，充分地显示了这些时论本身的质地和分量！当时的上海是中国自由言论的中心，时论高手、写家云

集，先生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为难得！

那个时候，中国的局势已届山尽水穷，国民党发动了空前惨烈的内战，尽管和平已成为时代最强烈的诉求，但战争却处于混沌和胶着的状态，根本看不出丝毫罢手的迹象，和平的诉求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徊惶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谁都渴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谁又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因为各有去的方向，你不同意我走的，我不同意你走的，互相阻挡，拥塞在这交叉路口，乱作一团，开交不得。就是残存着指路的标记，也被血肉涂抹得看不见字迹了。”先生在一篇题为《我们向哪条路走？》的时论中写道：“中国历史上遭遇了空前的时期，也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大考试。这考试是否可以拿着及格以上的分数，突破两千年来的因袭，还有待我们的努力。”在这篇时论中，以一个“自由分子”的立场，相当透辟地分析了各种去向的阻力和可能性。他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不外“武力统一”、“和平统一”、“革命统一”三个去向。所谓“武力统一”，也就是剿灭政策，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待反对势力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先生认为国民党实际上正沿着这条老路走，“重庆谈判”、“政治协商”等等一切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内争端的方案，“实际上只是有权者的遁词，拿政治来搪塞，做做美丽的幌子而已”。但问题是当时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剿灭政策因为自己和环境造成的牵制，非但无法奏效，“反给予反对势力一种生存发展的保障”。因此，国民党想藉此保持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面子，换来的将是“更难堪”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当然是“和平统一”，通过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组建联合政府。要使这一去向变为现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怎样使历史传统的个人军队或政党军队变为国防军，怎样使一党掌握或独裁的政权走向民主的实践，才是症结之所在。先生对此不报任何的希望，他认为，要使

两个独立的武力集团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之后，不是一的扩大，而是数学式的一加一等于二，除非出现奇迹！至于"革命统一"，虽然那时的中国不但有着革命的事实存在，而且也有了革命的恐怖心理，但革命意味着暴力，必然受到种种现实的限制，尤其是抗争八年后，人民实在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所祈求的是过些和平的日子，厌战的心过于望治之切，视革命为畏途。所以，先生认为，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处不是火药库，但革命尚未瓜熟蒂落。先生对腾传一时的所谓国共分地而治、各据半壁以自雄的主张亦极不以为然，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南北朝那样的对立局面，但那是统治权的斗争，"与今日政权和民主的争取大异其趣"，而且，"当前的形态是错综复杂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势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际范围"，中共建立的边区在陕甘宁，但其势力并不限于陕甘宁，即使在极南的广东和海南岛也有他们的势力，就是政府自身也未必尽是真正的政府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战争或和平的两个途径，战争则包括剿灭和革命，和平则不出联合政府的范畴，绝不能有不战不和的折中办法。"和平，固然是人人翘首以盼的，但是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所以产生的革命力量无法使革命一气呵成。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希望'变'，彻底的'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力，和衷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安排。"先生当然是反对战争的，但实际上中国除了战争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选择。所以，先生在文章

的最后无奈地说:"人民是迫切地祈祷和平,希望尝一点安宁生活的滋味。如果和平不可急得,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若战争徒惹成长期的纷乱,打个你死我活,依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从和平求出路,则目前一起的决策需要有智慧者的重新考虑,不要让历史铸成了不可收拾的大错。"

在"武力统一"、"和平统一"和"革命统一"三种去向中,先生似乎更寄望"革命统一"。他在几乎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时论《中国还需要革命》中,进一步申论中国"革命的必要",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的集中,战争与饥荒的绵延不绝,土地问题的日趋严重,"官逼民反"的层出不穷,在在表明,中国已经面临"这样一个积重难返而又万分需要革命的时代"。因此,他认为"今日不谈改良则已,欲谈改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这个僵化的社会有新的转机"。但究竟"谁能担当革命的重任"呢?先生认为,能担当革命重任的,不外三种力量:一是国民政府,二是自由知识分子,三是握有武力领导革命的中共。先生分析了这三种力量各自的可能性之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阶级意识,大资产阶级不论,商人和地主式的小资产阶级,为了他们有足够温饱的享受,他们本反对流血革命,然而这阶级里的人,在官僚政治的剥削和内战的压力下,已有转变的趋势。……大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阶级及开明绅士,希望改良派的社会主义者或革新派抬头,如果国民政府能够达到改良的目的,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正是政府的诤友;可是政府的一切设施,正与相反,益增加他们的离心力。改组后的政府,所谓混合内阁,徒增几个花瓶而已,其实质不变,一如往昔:物价依然高涨,官吏依然贪污,金融依然无法调整,乱糟糟的情形依然无丝毫的好转现象。"这段话实际上已暗含着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需要革命,无论

是政府来完成为完成的革命也好,共产党来革命也好。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如不能拿革命的手段刷新社会,则'革命'必假手于人。可是你要革命,你要和平,人家都不点头,结果革命也不能,和平也不能,就演为现在你打我、我打你的局势,这局势要维持多少日子,刀柄又拿在别人手里,可以痛哭流涕者在此。"就是说,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尽快结束纷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前提下,究竟由谁来主导革命,先生并无成见。

先生的言论多析理居正,且富有见地,显然已引起舆论界的关注,许多民主人士或进步团体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先生常在被邀请之列,与上海的知识精英们一起就国内局势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先生多慷慨陈词,畅抒己见,即使因故无法出席,先生总尽可能以别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譬如,1948 年 9 月,《中建》杂志(北平版)在上海邀请一批进步教授座谈"当前的学生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先生正卧病在床,本可以不表示意见,但接到邀请后,先生依然在病床上写下并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其中尖锐地指出:"'当前学生问题',并不是学生本身真的有什么问题,青年永久是纯洁热情而前进的。问题的症结是在今日政治社会及教育的失调,数十年来的执政者不能辞其责任。我们试回想战前的学生运动,要求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五四时候的学生运动,要求科学和民主,然而当时也与今日一样认为学生有罪,事实证明到底如何!陆放翁有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条定律。"⑯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却掷地有声,特别是它写在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过激青年"的过程中,就尤其需要勇气和胆识了!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先生为《大公报·星期评论》撰文,就曾严词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学校当局处理所谓"有思想问题的青年"或"过激分

子”表示强烈不满,他在文章中写道:“不可否认的,二十年来的教育,政治的压力多于教育的启导。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悦诚服也,力不足也。’教育不能启迪青年,而用政治的威力,这是党化教育的完全失败。其实不满现实的过激青年,除极少数或含有政治的因素,大多数都是优秀而纯洁的分子。我们毫不珍惜青年的前途和社会未来的需要,凭一时的意气,断送其求学的机会,衡之教育本旨,未免背道而驰。就是这样严密的防范,何尝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学潮的产生,并不是青年本身的问题,问题在青年正义的呼声里,就是整个国家症结之所在。如果不解决症结的本身,而禁止说出症结的声音,何异慈禧太后不许太医说出同治帝的花柳病,结果同治帝的病情怎样?况且青年的思想有无毒质,既不能从血液中去化验,也无法用显微镜去透视,入学之始,何从知其向背。事实上思想行动,往往随环境为转移,在合理而顺适的环境里,青年可驯若羔羊,一旦受了刺激,羔羊也可变成怒吼的狮子。”⑰

四十年代后期先生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或其他政治性的派别,但他日趋激越的批判姿态表明,他已开始逸出“自由分子”的轨

⑯ 见《当前的学生问题》,《中建》半月刊(北平版)第1卷第7期。

⑰ 陈旭麓:《暑假话大学》,《大公报》1947年8月7日。

迹。那个时候,“自由分子”的言论已引起当局的不快,像先生这样肆无忌惮的越轨抨击就更为当局所忌恨了。南京三青团主编的报纸就曾大肆攻击大夏大学的进步教师,称他们为“群奸”,特辟《大夏群奸谱》,先生被列为第二名,大有欲灭之而后快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直提携先生的王毓祥副校长,也特别关照先生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到学校办公。先生被迫从大夏校园搬出,东躲西藏,以防不测,直到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后,这种“流浪”生涯才告结束。因言论或行动而受到当局追踪和绞杀,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但这种追踪和绞杀并没有吓倒正义的力量,反而加速地促成了“自由分子”的转变。

政与学之间

只有体会过黑夜滋味的人,对光明才会格外地憧憬;只有亲历过战争苦难的人,对和平才会格外地向往。先生见证过五四以来的民族伤心史,目睹过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恐怖,并一直在寻找民族和国家可能的去路,早已“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所以,作为一个“自由分子”,先生和许多激进青年一样,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或转化,就成了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者、支持者和拥护者。这主要不是理论求证的结果,而是出自经验的选择。因为,“解放”,对于先生那一代青年学人而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随着政权的转移,整个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多元并存的教育系统很快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原先那种国立、私立和教会教育系统被单一的国家主导的教育系统所取代。这是

一个关、停、并、转的过程。为了加强师范教育，中央政府决定，以上海的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一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的新型师范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并于1951年暑假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十余位筹备委员之一，先生以饱满的热情为大夏大学的改制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而奔波。华东师大成立后，由于教师、职工来自不同的单位，难免带来小团体主义和帮派倾向，因此，如何增进教职员工之间的彼此了解和团结，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先生以工会主席的身分，时常奔走于教职员工的宿舍和办公室之间，为学校秩序的再建和凝聚力的增强付出了复杂而艰辛的劳动。

此后，先生的命运就一直与华东师大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这所他参与筹建的大学，他的欢乐与悲哀，他的追求与挫折，他的激情与郁结，也都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

应当说，建国后最初的十七年中，先生尽管曾遭受过一些极不公平的待遇，譬如入党问题[18]，职称问题[19]等等，但大体上还是一帆风顺的。他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后又兼

⑱ 上海解放后不久，先生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几经反复，才于1953年5月正式获得批准。

⑲ 先生从1949年2月起就已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华东师大成立后，先生公开活动的身分也是教授，但到1956年却被定为副教授。先生对此颇为不平，曾与校方交涉。

任研究生处处长，1961 至 1965 年任校副教务长、党委委员。此外，先生还受上级委派，担任过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1951 年下半年至 1952 年初，华东师大师生按照上级的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参加土地改革，历史、地理两系师生独立中队去凤台，先生担任队长；1965 年 9 月到 1966 年 8 月，奉命率队赴安徽定远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然而，先生毕竟是一介书生，虽然政治参与的热情颇高，但对现实政治的成规及运作技巧却并不习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他一直在追求“进步”，先后参加过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等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的“自由分子”的背景，个性中的“温情主义”却始终没有完全泯灭。即使在“阶级斗争”高唱入云的时候，他虽也一再检讨和剖析过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并在报端上发表过诸如《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之类文章，但“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依然时隐时现。在安徽定远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甚至因此而挨过批，他却以“暗无天日”来回应对他的无端批判，好在他的朋友和学生多感念先生的人品和平时对他们的照应关怀，不愿去播扬先生这种明显触犯时忌的话，只是劝他以后千万别再说这类“反动言论”。[20] 他也曾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写过一些批判性的文章，如五十年代中期撰写的对胡适历史观点的系列批判，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对“神道”与“圣道”的批判，其间多袭用当时套语，不无移史就今之嫌，但仍尽可能在学理范围内就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展开批判，行文和立意都与当时流行的那种无限上纲、棍棒交加的批判文章迥异。我曾经反复阅读过先生五十年代初期发表一些议论文章，并与当时流行的批判文章做过仔细的比较，我发现先生并不善于写这类文章。先生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已是公认的时论文章高手，但我

觉得他这时却常常有一种无从下笔的感觉。

由于先生的个性与思想跟时势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又不善于也不屑于官场的营求，且志趣在学术而不在官场，所以，他始终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学术领域，即使在出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及党委委员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专业上的追求。先生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学的是历史社会专业，自然也就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但初衷和立意却在求其有以用于当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史经世"。先生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中写道：

>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四十二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四十、五十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

⑳ 先生去世后，当年曾随先生参加定远"四清"运动的郑宗育老师亲口向我追述了这段往事。

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

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从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㉑

当然，先生的“以史经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他也是把治文史当作谋职业的手段，读书只为稻粱谋，后来慢慢地触摸到了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才倾向“以史经世”。㉒先生早年就读于私塾，后又入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及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专修国学，熟读经史，可谓学有根底，但他没有选择国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之后，早期成果也以古代史为主，先生在大学时代出版的《初中本国史》，大学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都属于古代史的范畴，但他最后没有选择古代史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而是“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在这种专业选择的背后，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关怀在焉。这种关怀可以称之为“近史情结”。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和伤心史，也是一部百回千转、荡气回肠的抗争史和奋斗史，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有责任“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从而创造性地还原出“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近代社会巨变的过程和整体风貌。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和关怀，或者说出于那一代学人特有的“近史情结”，先生治学渐渐地归于近代历史。一方面为本科生、进修生系统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从 1955 年 8 月起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指导和培养专业研究人才；一方面引史抉义，纵横论列，不以豆丁琐碎为贵，一求再现历史的真实于说明

历史的脉理之中，在近代史的众多题目上运思于成说之外，常独具眼识，文章累积寖成风格。

那十七年中，由于先生一直担任着繁巨的行政工作，而且国家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先生还经常奉命带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或被借调去研究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如1964年被借调北京，研究中苏、中蒙边境问题，这些活动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一年半载，更不论那些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学习”活动，真正能够用于研究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根本无法进行纯思与实证的环境里，先生则“要与时间赛跑”，[23]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激情和惊人的创造欲，先后撰写和发表论文、著作五十余种，成为那个时代比较罕见的多产的学者。这些论著笔涉多面而命意深邃，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阐发，有近代史总体架构的探讨，有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分析，也有事件史的论述。

1949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逐渐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但究竟如何理解和运用这种被视为“普适”的理论与方法，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先生

㉑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见《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65－166页。

㉒ 参见陈旭麓《答〈历史学习〉十问》，《陈旭麓文集》第3卷，第539页。

㉓ 先生在1954年10月4日《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是一个积极的争鸣者和重要的代表人物，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教学》、《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等论文，并于1955年汇编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单行本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此后，先生又陆续发表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与历史科学》、《略论对历史人物的翻案》、《论"厚今薄古"》、《论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论"史论"》等论文。这些论著难免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中并不鲜乏真知灼见，其论旨和笔锋本身亦带有先生个人的特点。譬如，在这些文章中，先生坚决反对机械地照搬和片面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那样做不仅会损害"历史的科学性"，而且也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背道而驰。他说："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远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如果不是完整地正确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仅凭主观的论理逻辑办事，往往是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复杂现象的。"㉔又如，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对具体人物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地去鉴定历史人物的阶级成分"，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主张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时代"中加以考察，"抓住时代变化的环节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去把握历史人物"，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变化大，曲折多"，时代的脚步对于人们的影响更大，因此，对近代人物的评判，不仅要放在近代中国整个历史时代来考察，而且还要就近代历史的不同阶段来考察。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应当是：严格地把握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㉕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未过时。

与先生所阐发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相比，先生关于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个案研究尤富"知人论世"的功力，率多见称于学界。这方

面的论著主要有五十年代中后期发表或出版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邹容的〈革命军〉及其思想》、《孙中山先生与〈民报〉》、《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实践的矛盾》、《“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论宋教仁》、《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论冯桂芬的思想》及《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等。其中,论谭嗣同文从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第一次深入分析了谭嗣同思想的内在紧张,一直被公认为研究谭嗣同思想的代表作;论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诸文,则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并结合他们的家世及教育背景来探讨他们各自的思想个性及其局限,均为富有见地的拓荒之作;论冯桂芬、梁启超思想文皆系学术争鸣之作,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至于讨论五四前夜的政治思想及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两篇长文,以翔实的史料和清晰的理路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剖析了民国初年思想文化的复杂状况,首度从事实和理论双重层面缜密地追探和求证了民初思想文化的嬗递和五四

㉔ 陈旭麓:《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陈旭麓文集》第3卷,第45页。

㉕ 陈旭麓:《论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陈旭麓文集》第3卷,第420、421、430页。

新文化运动的由来，新见纷呈，极大地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思维疆域，是先生于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奉献给学界的力作，也是"文革"以前研究民初思想文化的代表作。在这些广受好评的论作中，先生已开始逐渐地显露出一种融汇考据、义理、辞章于一体的学术个性。譬如1964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就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学术个性。有关冯桂芬思想的讨论，曾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北京、上海等地都进行过研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先生此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力学深思的鸣辨之作。与其他研究者的文章不同，先生此文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26]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著的"思想倾向"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贴，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

然而，先生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术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方面。1949年以后，先生就开始从事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最早的倡导者和重要的垦拓者。早在1955年，先生就出版了《辛亥革命》一书，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全书共分五章，依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渐次形成，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取消，结论。全书扼要地论述了自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同盟会至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辛

亥革命的前后经过，并对辛亥革命赖以发生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做了富有深度的透析，最后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失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此书虽仅八万余字，但言简意赅，既具有一定的学理深度，又兼具可读性，因此，它于 1955 年 6 月出版后，倍受读者欢迎，先后重印十余次，发行量累积达十余万册，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普及、学科建立与深入研究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中确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提出的许多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引用。此外，先生还发表了大量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单在 1961 年，即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前后，先生就发表了近十篇相关的论文与书评，主要有《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论宋教仁》、《寓褒贬，别善恶》等。其中关于新军与辛亥革命、革命党人的纪年及宋教仁的研究论文，均独步一时，至今仍无出其右。对学术研究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更为重要，有无“问题意识”，事关研究者的取径，以及能否切中对象的要害！基于这种考虑，先生在《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

㉖ 这些版本包括 1883 年天津广仁堂刻本，1884 年豫章刻本，1892 年“敏德堂潘校刻”本，1897 年的“丰城余氏刻”本、“韬园老民(王韬)校印”本、“文瑞楼石印”本、“聚丰坊校刻”本等，1898 年的“北洋石印官书局印”本、“上海石印”本及冯氏家刻本，1904 年的甘肃官书局刻本。

题》这篇"有似研究提纲"的论文中针对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现状所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分两个层面:一是就辛亥革命酝酿、准备、发展和成熟各阶段提出的问题,一是就贯串辛亥革命各阶段的若干方面提出的问题。前者包括:孙中山的早年活动及其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发展、兴中会的宗旨和成员的阶级分析、1900 年的惠州起义与帝国主义(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系、1900 年中国所处的形势,《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和对清朝统治地位的削弱、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各个革命团体的综合研究和个别研究以至某个革命团体成立时间的考证,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及其纲领的研究、特别是同盟会的土地纲领、关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1907 年后同盟会的分化状况、光复会、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系,铁路风潮和各阶级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的关系、武昌起义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各省独立的个别研究及其特点、帝国主义对南北议和的操纵、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政党大分化和大融合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后者包括: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辛亥革命和会党力量,辛亥革命和新军力量,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革命化,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评介,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辛亥革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先生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最知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在,因此,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全面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先生的意见不只是对学界同行的期勉,更在于对自己的鞭策。先生原本打算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并已草拟

了纲目。[27]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不断，先生且为各种"俗务"所困，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克底于成。

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外，先生更致力于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但是，学科的建设，又以确定学科的范围为必要前提。究竟应该如何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围，当时学术界分歧很大，但多数学者主张把近代和现代作为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为近代，以五四运动开始以后的历史为现代，教学用书更严守这个界线；当然，也有的主张自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十年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为现代史，即把原来划在现代史的前三十年归入近代史的范围。先生是后一种主张的积极倡议者和坚持者之一。1959年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就提出"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的观点，认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是标示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示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十年中虽然有新旧民主的区分，

[27] 见先生1982年10月9日致沈渭滨函，《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475页。



陈旭麓在工作

却只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而不是两个不同内容的题目”；“历史时期的划分，贵在标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若干以片面的理由为依据，那么近代历史上的许多年份都可作为分期的标志。然而历史的自身却不一定承认这样的标志”。[28]这些看法现在已成为近代史学界的共识。1958年冬，先生应邀参加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会后，先生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与李新、孙思白、彭明、蔡尚思一起主持编写自五四运动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教材，这部教材原拟称作《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嫌其名称过长，乃改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据先生说，这个名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它作为近代史的下半部来处理的，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以区别于习称的现代史；二是作为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个段落来处理的，它不仅要写革命史，也要写经济、文化和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因此以“时期”和“通史”等字样来区别于一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29]那个时候，五四以后三十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研究基础极为薄弱，所谓“既缺乏完备的资料，又很少成熟的专史”，[30]即使是写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条件也远未成熟，更何况是写整个时期的通史！但由于五位主编各有专攻，可谓极一时之选，且又能齐心协力，互补短长，[31]因此，写作进展十分顺利。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以及五位主编的通力合作，这部四卷本百余万字的“通史”便次第完成，并

陆续出版。[32]全书以革命的递进为中心，同时又以较多的篇幅兼顾经济、政治、文化及少数民族诸方面的历史，的确已具有“时期通史”的某些气质。此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也为五四以后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厚实的基石。有关这部巨著的编纂经过，孙思白先生在《魂兮归来有怀旭麓》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

“和旭麓相识，是1958年冬由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会后，他被调来北京，开始了东厂胡同八角亭那段令人难忘的工作和生活。东厂胡同1号曾是民国时代黎元洪的总统府，八角亭据说是黎的机要会客室，在这地方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教材是深可玩味的。亭子建在一座面积不大绿树环绕的假山上，山虽不高，却也怪石嶙峋，峰回路转，有几分秀气。那时除李新住在外面，我们几个主稿人和五六位青年助手就在这座小山上结邻而居，朝夕共处。白天，大家在亭子里论稿；晚上，一杯茶，石边聊清天，有时也结伴出游，泛舟北海。工作顺手，心情欢快！这生活整整过了两年，是与旭麓

㉘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陈旭麓文集》第2卷，第45－54页。

㉙ 同上，第47页。

㉚ 见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㉛ 据孙思白先生当年的日记记载，先生所写或所改各稿往往最获好评。彭明先生在《怀念旭麓》一文回忆说：“由于他（指陈旭麓先生）旧学根底好，新学（马克思主义）又用得深，所以我这个小弟弟（在几位主编中，以我最为年轻）很敬重他。加以他对人坦诚、热情，所以我所写成的稿子总是愿意先请他看看和帮助修改。”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53页。

㉜ 第一卷于195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196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卷于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卷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三卷同时由人民出版社重印。

三十年论交中相聚最久的一段。从那次工作结束分手之后，二十八年来，南南北北，便是散时多而聚时少了。”㉝

在人的一生中，这样的经历，以及由这样的经历所孕育出来的友情，是非常令人神往的。难怪先生去世后，他的八角亭旧友李新、孙思白和彭明诸先生都不约而同地缅怀这段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一段令人温暖的学林往事。与这段往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指定教材和第一部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多卷本通史，他们精心编纂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却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命运，先是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欢迎，不胫而走者达四万五千余套；但在随后的那个怪诞的岁月里又遭到了无端的批判；“文革”后应读者的要求，人民出版社商请李新等先生略加修订后于 1981 年重印三万五千套，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由于这部通史史料翔实、立论平实、叙述清晰、文笔畅达，以及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1988 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文革”以前，学术研究日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一种毋庸讳言的事实！在这种形势的主导下，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实现，学术创造的自由空间和想象空间日趋逼仄。检视这段学术史，尽管表面上学术争鸣的气氛仍然相当浓厚，并形成若干全国性讨论与争鸣的“热点”，历史学界就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但那基本上不是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并在争鸣中凝聚共识、逼近真理，而是事先预设了“绝对真理”，然后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绝对真理”而产生的内部分歧。虽然先生也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他很少卷入这样的“争鸣”，反对机械照搬和片面理解经典作家的“原典”，甚至以“绝对真理”取代事实的研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还原历史自身的复杂性。所以，尽管整体的学术环境不断恶化，先生的论作中不可避免地

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但仍然曲折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不复存在了,本已不绝若线的"文化"在这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中遭到了最为严酷的践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人,特别是那些多少还保留和坚守学术底线和学术立场的知识人从肉体到精神几乎无不遭到肆意地摧残与凌辱,先生自然也在劫难逃,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科学与真理追求了大半生,却在毫无理由地变成了"牛鬼蛇神",变成了"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并与冯契、刘佛年一起被"造反派"打成"师大三家村"。冯契先生在《怀旭麓》一文中特别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其中写道:

> "自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校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期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

㉝ 孙思白:《魂兮归来,有怀旭麓》,《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 50 - 51 页。

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其实,我说的'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㉞

由于先生是有侠义心肠的人,见到虚伪的、不合理的现象,便横眉怒目,甚至拍案而起,更多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他在师大办公楼前看到有一张揭批他的大字报,竟然完全不顾事实地诬陷他是"国民党员",实在无法忍受,就掏出钢笔,在这条纯属诬陷的不实之词边上,写下了"我不是国民党员,从来未参加过国民党"几个字,并坦然地署上自己的姓名。这下更激怒了"造反派",一夜之间,挞伐陈旭麓"反攻倒算"的大字报劈天盖地而来。更有甚者还将揭批陈旭麓的大字报整理油印出一本长达数十页的"传单",到处散发,大有欲置他于死地的架式。此后不久,先生就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在无休止的"批斗"、"交代"、"审查"的交替中,"挖思想,究根由",苦挨着那"炼狱"般的日子。

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神奇变成了腐臭,玄妙变成了平常,神圣变成了凡庸。不用说学术研究,不用说正常的读书和思考,就是连最基本的人伦意义上的亲情关怀也遭到无端的责难和排斥!在"牛棚"岁月里,先生年迈的继母被遣送回家,他作为儿子不能前去话别;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被分配到数千里之外去接受"再教育",他作为父亲也无权叮嘱几句;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他作为丈夫,更不能前去探望,只能让她一个人在无助和苦痛中死去;……㉟尽管如此,个人的遭际却并没有使先生消沉,有时甚至还"激情满怀"地写下了一些颇为"革命"的诗句。在"电闪雷鼓"、"长风扫垢"面前,先

生深感"换骨"非易,"脱胎"尤难,但仍表示要自觉地接受"改造",洗濯自己身上的"原罪",不作"人间赘疣"。

七十年代初,先生经过数年的"斗批"和"审查",终于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但回到零落的家,见到被抄后残缺不全的书籍,又不免流露出一种凄苦的哀愁。那个时候,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先生当然希望能够重返课堂,以自己的所学为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像他这样一个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牛鬼蛇神",只有充当"反面教员",继续接受批判和改造的份,重返课堂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已。"茫茫前路无归处",先生陷入了一种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胡绳武先生却正在奉命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由于人手不够,乃商请先生到复旦主持编写工作。对好友的盛情相邀,先生固然感到欣喜,毕竟可以继续搞点自己的专业了,但内心却十分矛盾,因为这意味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必须离开自己亲手参与筹建的华东师大。基于专业的考虑,也基于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考量,[36]先生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胡绳武先生的邀请,并于1971年以借

㉞ 冯契:《怀旭麓》,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47-48页。

㉟ 参见熊月之:《陈旭麓先生传略》,《陈旭麓文集》第4卷附录一,第622页。

㊱ 先生一直想将被下放到外地一家煤矿的一位得力助手调回,却苦无办法。借这个机会,先生郑重向复旦提出希望能将他的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调回,一起参加编书。复旦答应了先生的请求,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先生的助手调来,可是先生那位在煤矿饱受折磨的助手回来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了,先生伤感不已!

调的形式正式到复旦历史系上班。可是,复旦并非世外桃源,在那个"大批判"的吼声淹没理性思考的年代里,要真正凭借自己的良知写出象样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牵扯和种种莫名其妙的禁忌!先生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处,但还是与胡绳武先生及周围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一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37]并于1972年开始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以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单位,每个事件或人物一本,每本数万字至十余万字不等。由于政治风雨的吹打,这套丛书难免有些风折雨湿之处,但它骨格清奇,文采斐然,与那时充斥于报刊的那种强词夺理、自欺欺人的文字迥异。那是一个文化凋零、学问饥荒的年代,青年人案头的知识读物屈指可数,先生主编的这套书便成了陪伴无数青年尤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度过漫漫长夜的重要读物之一。当时,这套书的印数超过百万,几乎所有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都读过其中的一种或数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堪称中国一代青年之师,他的思想对一代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影响"。[38]这套书,后来被译为英、日、俄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39]其实,这套书的意义更在于,它造就了一大批近代史研究的人才,丛书的作者大多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

"文革"后期,先生的另一项学术贡献是,在负责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的同一过程中,先生还致力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开发与抢救,参与了章太炎著作的编注,以及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的整理。前者从1974年9月开始,首尾共进行了三年时间,当年参与编注工作的二十人中,有姜义华、汤志钧、朱维铮、熊月之等;后者则聚集上海各大研究机构的有关专家和学者,分门别类地予以梳理和标校,并按专题汇编成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题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的史料丛刊，由先生与顾廷龙、汪熙先生共同主编，迄今为止已出版《辛亥革命前后》、《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专辑，其他各专辑亦早已编就，只是受庞大的出版经费所限，难以一次出齐。但已出的各专辑以资料丰富、编排得当、标校谨严而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征引，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史的资料库存，为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入和近代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提供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卓著的，他做了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与先生实际的才华和先生早年的抱负相比仍然是不太相称的。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了从三十岁到六十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以他的强有力的创造力，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为辉煌的学术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一样，遭逢了很大的折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极左"思潮恶性泛滥，"革命"、"造反"甚嚣尘上，人间的是非变了形，

㊲ 这套丛书由先生主编，前后共出版三十余种。但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各书均未署名，"文革"后续出诸书才在版权页上标出"陈旭麓主编"字样。后因中宣部授权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编纂《祖国丛书》，其中相关拟目与近代史丛书雷同。先生决定将近代史丛书纳入《祖国丛书》计划，不再单独组织力量续编。

㊳ 参见费成康：《忆旭麓先生》，《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103页。

㊴ 这套在特殊年代编纂的丛书，先生自己并不满意，1983年苏联著名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访问上海时曾提及已把该书的日译本（将丛书中十大事件汇编为《中国近代史》）转译为俄文本。不久后，先生在写给学生的一封信函中提及此事说："他们为什么对这部汇集的书发生兴趣？我看可能是由于正统观念比较合他们的胃口。"见《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538页。

一切罪恶都假"革命"、"造反"而行，不用说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也不用说学术研究绝对必需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就是学者自身的存在也都朝夕不保、难乎为继，又如何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造！"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先生悲哀地写道：

>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著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著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㊵

这段话虽是就那时近代史研究的整体现状而言，但个人离不开整体，没有超然于整体之外的个人，因此，先生的研究亦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如前所述，先生固已取得许多成就，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而且尽可能地曲折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关怀，但在这样一个文网密织、动辄得咎的背景下，毋庸讳言，其中能够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论著终究是不多的。至于其他一些早先拟定且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计划，如撰写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及

《梁启超传》等，也都在各种“是是非非”和“营营扰扰”中无奈地搁浅了。这岂止是先生个人的悲剧，实在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新陈代谢”

然而，扭曲的历史终究要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和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之后，1976 年秋天，恶梦般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几乎所有亲历过浩劫并从劫灰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幸存者，还来不及弹冠相庆，千百个沉重的问号就已扑面而来。由事变启导的反思，很快就如同江海决堤一般，倾泻而出，千百篇文章以反思为题，千百种文艺作品以反思为机轴，于是而有思想解放，而有改革开放，而有“新时期”。

这是一场由现实而历史的反思，一场关于民族去路的整体性反思，“十年的怪诞，数十年的革命，一百余年的社会，两三千年的传统，其间的联系与得失，由近及远，结成网络，无不是人们寻思和探讨的话题”。先生对这个激荡的反思大潮曾做过深刻的描述，他说：作为民族的心态活动，这场席卷整个

⑩ 陈旭麓：《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陈旭麓文集》第 3 卷，第 515 页。


陈旭麓与学生

知识界的反思并“没有经过谁的思想动员，更不是宗教的无边忏悔，而是对造神的社会性的自我教育，对社会历史因袭的精神负荷的必然倾诉。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和各种‘社会相’引起的心灵痛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知识界的共同感受。十年来倾泻而出的文艺作品，触摸政治社会生活的各类文字，席卷思想领域的文化研讨热，它们不是反思的直接陈述，也有反思的因子或内涵。”[41]反思的精义，就是要告别前此的迷思，走出极左思潮的迷雾，为民族和文化的再生确立理性的航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说：“反思不是翻烧饼，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回归与开新的统一。”“它的确切含义，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革命的再认识，对历史的再认识”。[42]而所谓“再认识”，从根骨处说，其实也就是如何重建浩劫之后的民族心智结构。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亲历者，先生曾以“大史震”比拟“文革”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他认为，这种痛楚和震撼甚至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来得剧烈，它的震波所及远远超出了“文革”这一事件本身。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精神历程的时候，曾这样写道：

> “中国革命在 1949 年取得了全国的伟大胜利，随之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它震惊了整个世界，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谁知在洒满阳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大道上，已潜伏着荆棘和阴霾，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

的'文化大革命',它几乎吞噬了我们前此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偶然,而偶然的积聚和联系又是必然的反映。'文革'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责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民族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的革命史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革'是一场'大史震',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43]

其实,先生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早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先生出众的才华,"文革"后期,"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颇有利用先生之意,但先生对现实政治有自己的见解,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种种劣迹也已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更不屑于趋炎附势,因此,始终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1976年初夏,某报社要《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撰写一版批判洋务运动、旨在借古讽今的文章,先生就以要加强学术研究,不应分散精力,予以拒绝,而且在此之后编写组未再接受此类"政治任务"。[44]不惟如

[41] 陈旭麓:《反思,也还要一点反反思》,《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226页。

[42] 同上,第228页。

[43] 陈旭麓:《对于中国革命史的悬想》,《陈旭麓文集》第2卷,第152页。

[44] 参见费成康:《忆旭麓先生》,《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104页。

此，先生还经常以“无声的中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话语向一些信赖的朋友和学生倾吐自己内心的郁闷和深广的忧愤！[45]所以，“文革”一结束，先生的这种郁闷和忧愤就迅速地转化为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揭露和批判，[46]并逐渐将这种揭露和批判上升为从学理层面上对民族、历史和革命的痛切反思，孜孜地探寻中华民族前去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成为由现实反思历史的先觉者之一，而且成为民族整体反思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之一。

先生是历史学家，又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合二者之义而一以贯之，他名之为“以史经世”。1978 年秋天，他婉拒了复旦大学的盛情慰留，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华东师大，可是“迎接”他的却是“风风雨雨，深文周纳，使他竟然连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和博士生导师资格也历久不能解决，精神痛苦达于极点。[47]然而，先生并不怯于权势乌云和无端得咎，他说：“书、文章要有精神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48]这段写在《浮想录》中的话，其实就是他本人最后十年精神风骨的自画像。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巨大的民族精神压力，艰窘的个人境遇，这双重煎熬，不仅没有摧垮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老境侵夺中爆发出旺健的创造力和惊人的学术能量，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上了一生中的巅峰状态。[49]其论域之深广，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特，不仅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个人的学术巅峰状态总是透过他深广的论域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论域的深广又最足以考验他的视野和学力。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先生的论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政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

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误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所有这些论域无不有先生的一家之说，几乎所有学术界热烈争鸣的现场都可以听到先生那独特高亢的湘乡口音。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论域就越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犀利！这可以从先生的《浮想录》中得到印证，在总共六百九十五条警句断想中，1978 年二十九条，1980 年四十四条，1985 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超过一百条。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他参加的学术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学术演讲比任何时候都频繁，其视野之开阔，谈锋之机警，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不已！

且看他去世前半年的学术活动日程表——

6 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戊戌维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7 月，参加并主持“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

8 月，出席中国史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参加“史学理论与史学危机”座谈会；

㊺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据郑云山回忆：1975 年初，他去看望先生，交谈总共不到一个小时，先生针对“四人帮”正在罗织罪名大批“周公”，前后四五次怒斥：“这些人（指‘四人帮’）太猖狂了，竟敢搞周总理，这样下去我们国家怎么得了！”每言及此，先生都怒不可遏，脸涨得通红，音量提得很高，全然不顾“隔墙有耳”之忌。参见郑云山：《胸襟炽热之心的良师》，《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 73 页。

㊻ 1977 年 7 月，先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上海市委大批判组副组长，参与负责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的揭露和批判，主持撰写了不少雄辩的揭批文章。

㊼ 唐振常：《热泪祭旭麓》，《文汇报》1989 年。

㊽ 陈旭麓：《浮想录》，《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第 136 页。

㊾ “文革”前几年，先生一直担任着副教务长和党委委员。1978 年以后，先生除了一度担任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副主编之外，其他便只有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一职了，虽然这样的待遇极不公平，但先生却因此而摆脱了先前繁琐的行政事务的困扰，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到学术研究上来。

9 月,参加上海市川沙县志稿审议会;

10 月,参加"近代会党史讨论会"(上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讨论会(合肥);"中国社会史讨论会"(南京);

11 月,参加"中国近代军事史"讨论会(上海);"戊戌维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广东)。

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先生分别就"戊戌与启蒙"、"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发挥史学家的良知"、"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军事与近代化"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这些专题演讲一洗学界固有的陈词套语,新见叠现层出,因此,每一次专题演讲就如同一阵飓风刮过,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震撼!仅仅半年时间,就要在如此众多的不同专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又都激起积极的回响,这就尤其难得了!难怪学界的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与论域之广相对应,就是先生推出的成果之多了。且不论先生论著的质量,仅据《陈旭麓文集》第 4 卷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先生在最后十年撰述的数量就已是十分惊人的了,单是论文和其他学术性文章就有近一百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先生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就我的陋见所及,这个数字实际上也超出了同时期任何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撰述数量。但是,先生学术成果之多还不仅仅表现在他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先生一生撰写、主编和整理的七十余部书籍,绝大多数也都是这十年中完成的,除了续编《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洋洋大观的丛刊之外,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辞典》等字数都在百万以上,此外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也都颇具规模,累积字数在一

千万以上。单看这些数字，就足见先生著述是如何之勤奋了！如果再加上先生那些未及实现的成熟构思，如《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国家教委委托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等，以及替别人审读、阅改的大量稿件，那就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了！

其实，先生晚年之为世推崇，还不仅仅因为他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辨的深邃，识见的卓特。冯契先生曾盛赞先生的"史识"，他说："刘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50]先生晚年的著作和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处处显示出"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所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51]先生有时也把"史识"称为"眼识"或"通识"。无论"史识"、"眼识"，还是"通识"，说到底，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更是一种史学的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

[50] 冯契:《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序》，见《陈旭麓文集》第1卷，第130页。

[51]《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3，1372页。



陈旭麓与孙儿孙女

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史家本人的禀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思辨，关于近代历史进程标志的概括及其塔形层次演变的分析，关于从“夷”到“洋”的改称背后的民族心路历程的透视，关于晚清“西学”内涵的流变及“中体西用”作为思想流派而影响弥久的原因的洞察，关于“改良派”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种分称（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的含义的剖析，关于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思考，关于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军阀与近代社会变迁等复杂关系的阐释，关于“海派”内涵的界定、“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及其流变的考察等等，无不是先生卓异史识的生动体现。与“思而不学”与“学而不思”者迥异，在先生那里，学术与思想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使他的学术富有思辨的魅力，学术则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力度和厚度，他的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他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

先生的黄昏是苍凉的，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的学术与思想却有如岩浆奔突、江河澎湃，他以深广的论域、丰硕的成果和卓特的识见铸就了学术人生的最后辉煌。胡适在一篇题为《不老》的文章中引用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攫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

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52]梁先生说的是人生的常态，先生则不然。“文革”后他已“渐入老境”，但他的“知识的摄取力”和“思想的构成力”并不因为年龄的增大而减退，反而是大大地增强了，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进取创造、日新又新的精神，他那“方兴未艾的创造”正是从六十岁以后开始的。这的确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如果说学术创造是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以“新陈代谢”的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先生是有心别开新局的先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然而，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它的后三十年且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何重新认识，势必牵动前此数十年中形成的共识或认知惯性，牵动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观念屏障，学术上的难度自不必说，由于它与当代的历史是近亲，还会涉及到许多现实的关系。譬如，究竟如何真实

[52] 见《新青年》，1919 年 4 月。

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革命的胜利和曲折，如何严肃地而不是因袭地对待革命史上的臆说，这是历史本身赋予的任务和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重构近代新史架构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自然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历史的再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再认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是那样的万象杂陈、光怪陆离，正义与非正义，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保守，激进与徐缓，反传统与回归，无不相互纽结，互相渗透。而大量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又往往掩盖和包含着新旧矛盾、交错和转化。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对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学力与智慧的双重挑战！这些都是就客观上的困难而言。实际上，客观的困难之外，史家的主体意识方面也有一个破启“禁锢”及认识上的调整和深化的问题，即荀子、戴震所说的“解蔽”问题，只有解除种种蒙蔽，特别是挣脱线性思维，思想获得解放，才可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有这些问题的累积，就注定了近代新史架构的探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段。所以，尽管先生在七十年代末就已提出“新陈代谢”的构想，但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最后成型。这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主要围绕以下三大环节展开：

（一）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是贯串整个中国近代史始终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但前三十年形成的中国近代史架构以革命为叙述中心，在这个分析架构中，改良一直被看成是灰色的、骑墙的，甚至是反动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的高音喇叭日夜呼啸，改良从现实到历史都遭到了更大的歪曲。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论述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弄清改良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作用，就不仅是史学上的重要任务，而且是

重新建构中国近代史分析架构的前提。基于这种宏观思考，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980年便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先生首先从理论和史实两个层面上重新界定了革命与改良的内涵与外延，并把改良与改良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然后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改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近代社会变革的塔形层次说，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取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的变革由上层肇始，依次推移，逐级发自中下层，形成一个塔形，一个否定另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革命与改良都是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但作为两股新的政治力量决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消长和分化组合。在革命兴起之前，改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两条道路（革命与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的角逐，革命成了时代的主角，而保皇的改良派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还有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刚从封建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辛亥革命时期张謇等人发展实业所作的努力，梁启超传播新知识的大量文章和严复介绍西学的许多译著，都独步一时，启迪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帮助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辛亥革命后，革命与改良对发展实业表现了较大的共性。改良除了消极的一面外，仍有积极的一面，有时积极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是五四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囿于自己的经历，以目带纲地各自提出实业、科学、教育等救国主张，虽然救不了国，多数还是出于不甘自弃的好心，在黑暗中以爝火萤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经过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后，采取

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样的改良决不是历史的赘疣，而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1985年，先生又发表了《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作为前文的续篇，进一步论证了近代史上改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同一性。文中，先生分析了改良派从维新派到保皇派再到立宪派的循环和代谢过程，以及这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各自的含义，认为二十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和分道扬镳的对抗形式，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二者的并峙表现了革命与改良的不同一性，也有对抗性，但对立着的双方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又具有同一性。并从二者的性质、反帝爱国、思想武器和斗争锋芒等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同一性。他在论文的最后写道："在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取代旧的，如戊戌维新，如民国之取代清朝；一是新与新的递嬗，前一种新的褪色了，后一种新的跟上来，辛亥之与戊戌是这样，五四之与辛亥是这样，戊戌之与洋务也有这种迹象。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是推动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的。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与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有很大不同，但又有着某种亲缘关系。"[53]围绕革命和改良，先生还写了不少其他论文，如《光绪略论》、《戊戌与启蒙》等，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改良在近代史上的各种作为。通过所有这些论文，先生创造性地还原出改良的历史面目及其在近代史上应有的位置，体现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种新思维。这样就在事实上动摇了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架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已呼之欲出了。

（二）国家与社会

建立近代民族民主国家，曾经是所有不甘沉沦的民族精英力追不舍的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虽然在民主模式上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分野，在达到目标的手段上有激进与温和的差异，但在终结帝国时代的君主独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曾经合力地促成了中国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但进入民国之后，民主国家体制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民国迅速地走样、变形，以至于鲁迅在民国创立十多年之后就感叹民国的来源和民国的精神已经"失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遭遇到严重的挫失和曲折，甚至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这究竟是为什么？根源在哪里？不解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揭示近代历史的真相。先生认为，单从国家或政治层面出发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应该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寻找，而国家与社会的非同构性乃是其中的关键。

与静态的、具有很大凝固性的传统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

[53] 陈旭麓:《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陈旭麓文集》第2卷,第135页。

踵而至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机制变外来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又反映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旧冲突，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很大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陈代谢的急剧性，这种急剧的程度是中国传统的静态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西方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过程中所不曾出现过的。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完成，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到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仅仅用了近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超过了西方社会有中世纪到近代演变的数百年的行程，这就意味着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给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二是近代社会上层体制、政治思想的演变是迅速的，而社会生产、经济结构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则是缓慢的。在政治思想上，我们似乎是胜利的，但胜利又是不巩固的，广大的处于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从意识到生活都没有越过小生产的轨道，实现向近代的根本转变。在近代社会里，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商业都市与停滞着的广大乡村同时存在，民主、自由、博爱观念与宗法、畛域观念同时存在。近代与传统的并存构成了近代社会显著的特征。这又意味着经济基础与上层体制、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脱节和不对应性，这种脱节和不对应性导致了上层体制始终处于游垠无根的摇摆状态，无法正常地走上宪政的轨道。

沿着这样的思路，先生致力于近代社会深层结构的探究，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深见卓识的论文，如《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若干问题》、《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这些论文着眼于社会变迁，或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近代社

会的特征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阻力,或从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制约近代步伐的结构性根源。在《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先生论证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矛盾激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正比一反比一正比的矛盾规律,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人口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会变成不利因素,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起了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秘密会党是进入近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先生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并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整体演变中,剖析了秘密会党之成为"第三种社会组织"的原因,又通过三种社会组织的比较,论述了会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特征,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揭示出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认为"不懂得会党就不懂得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或者不能全面地懂得这个社会"。这样的思路和理路,已完全逸出了前此的近代史分析架构的认识轨道和思维惯性,它表明先生的近代史思辨已完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转换,即由以革命为叙述中心的近代史架构转变为以社会变迁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

（三）确立近代新史架构

在上述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在原有的分析架构之外树建了自己的近代新史架构。树建近代新史架构并不是为树建而树建,也不是为了立异以鸣高,而是从"文革"后"最严峻的反思"中得来,是近代

史的再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按照既有的分析架构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树建更切近近代历史真实的架构，乃是学术史演进的一种必然。先生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指出：

“我们在五十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54]

改革开放以后，在“三次革命高潮”架构之外“探讨新的线索”逐渐成为近代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并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场波及整个近代史学界的大讨论中，以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最为引人注目。先生相继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等论文，以“新陈代谢”为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创造性地探寻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整体地展示新旧嬗替、洄浪相逐的近代社会巨变的风貌和全过程。不仅致力于理论上的阐发，先生还把理论思考所得付诸实践，写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的近代通史性著作，如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以及先生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与以往的通史性近代史著作不同，这些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近代史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不再简单地以侵

略与反侵略为主线，而是把近代一百一十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以社会史会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侧面。

早在 1959 年，先生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和现代史的开始。1978 年以后，先生开始深入而全面地反思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延续了三十年之久的近代史体系的内在弊端，建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先后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等重要论著，虽然这些论著并没有直接讨论近代史的线索，但它们一种不同于"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框架的"新的线索"已呼之欲出。1983 年，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率先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依循近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和历史自身的起伏进程，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八十年依次分列三十二题，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

[54]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陈旭麓文集》第 2 卷,第 3 页。

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这个新架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88年6月，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将他长期对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主张以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来贯穿中国近代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他认为"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其趋向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大过渡，其核心是汲取与扬弃、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辩证过程。引进和汲取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是西方传来的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扬弃旧物，不是简单的排斥，这里面有继承，有批判，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而不是发展的中断和停顿。

作为一个崭新的近代史分析框架，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酝酿于七十年代末，构思于八十年代初，而于八十年代末形成周密严整的学说。这个新体系包含了阶级斗争，但又广于阶级斗争；他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包容了政治、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嬗。它的出现无疑是对前此流行的"两个过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超越，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已走出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约定格式。先生晚年精心构思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

谢》就是他积多年之思探讨“新的线索”的产物。在这本书中，他摒弃了旧的僵化的架构，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变迁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论证，把“新陈代谢”这一主旨展现为非常丰富多采的内容，极富思辨地还原出近代社会巨变的图景，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范式。

学术创造之外，先生的“大勋尤在携后”！[55]早在五十年代，先生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导师了，“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先生又招了七届，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前后达百余名之多，私淑弟子更难计其数。先生曾

[55] 成晓军写给先生的挽联，见《陈旭麓先生哀思录》第29页。

说："教书、写书、学生是我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我就不存在了。"[56]这话一点不假，先生在教书和学生上的确倾注了罕见的热情和巨量的心血。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固然是关怀备至，煦煦如春阳之温，就是那些素不相识的晚辈，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求，他的奖掖和提携同样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放下自己手边的著述，给他们提意见，改稿子，介绍出版社，处理他人的稿件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这在整个学术界都是尽人皆知、有口皆碑的。有的好心人劝他，应该尽可能给自己多留一些时间，把学界期待已久的著作写出来，先生却在一篇序言的最后写道："近几年，我常为年轻人阅稿作序，目不暇给，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已。能为他们做点事，'鬓微霜，又何妨'！尽管，我的双鬓已不止'微霜'了。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57]当今之世，师道之不尊已久矣，而先生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却始终是"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回想从师受业的情景和先生的教泽雨露，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翻开《陈旭麓先生哀思录》，其中绝大部分篇什无不是感念师门的记录。如果把身受和亲见先生关怀弟子和提携后进的事迹都写出来，那该是一部多么感人肺腑的长卷！

因为写这篇小传，最近我又重温了先生写给友朋和学生的信件，深深为先生这些信中流露出的真情和至性所感动，那一封封信件，或答疑，或切磋，或关爱，或幽默，或自况，无不语酣情长。先生以大学问、大识见为世推崇，却从不拿名家派头，他的平等、自由、宽容，都见之于他行事的深切著明。读着这些信，眼前常常浮现出先生坐拥书城或漫步丽娃河边、银锄湖畔谈古论今的情景，虽然当年谈论的内容已记不真确了，但那种如坐春风、如沐秋月的感觉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然而,我也常常想,先生用于处理别人稿件的时间毕竟太多了,要是先生能够为自己多留一点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专业上的创造,而不是那样无论识与不识,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求,都尽力提携,那先生该可以写出多少像《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说“海派”》那样的鸿篇来,至少可以在他有生之年将那本学界期待已久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出来,那样的话,先生在学术上或许也就可以无遗恨于人间了! 毕竟能够写出先生那样炉火纯青的文章的人在当今学界是太少了! 先生的学术成就固然已是万人瞩目,海内境外莫不尊仰,但走的时候毕竟是“鸿篇未尽”呵! 这一点,先生在世的时候,就已非常人所能理解。先生一再说,他做这些为人作嫁的事情,是因为“起了惜才的念头”。当然,他也一再表示“要腾出手来搞‘新陈代谢’了”,在去世前三个多月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甚至说:“我的岁月不多了,无论如何从九月开始我要转到自己那部书上来了。”[58]但实际上直到去世,先生仍然困于别人的书稿和序言! 我真的不知道,对先生而言,这是得还是失,但对学术界而言,那肯定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56] 陈旭麓:《浮想录》,《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37页。

[57] 陈旭麓:《民主思想的长卷》,《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210-211页。

[58] 见先生1988年8月28日致郑云山函,《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565页。

“述作传诸不朽”

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 1988 年 12 月 1 日去世为止，先生从未中断过思考和写作。即使是在“文革”岁月，先生也没有放弃或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字生涯中，先生留下的著作和文章是非常多的，其中固然有一些不免烙有特定时代的痕迹，这一点先生自己并不讳言，他曾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的最后写道：“‘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岸边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59]正因为时常以印在自己身上的“沙痕”省察自己，先生的思辨才更加绵密、深沉，先生的学问才走向博大和深邃！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先生文思之精湛奇伟，文气之酣畅贯注，文笔之便捷流美，更令人赞叹！作为一个站立起来思考的历史学家和思想者，先生的许多文章和思想，早已融入中国当代文化之中，并成为其中最富个性和理性神采的部分之一。现将其较具代表性者分论文、主编及著作三部，胪列并略加评点于后：

（一）论文之部

自 1943 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以来，先生究竟发表了多少论文和文章，已无从稽考。单就《陈旭麓文集》第 4 卷的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就有一百七十余篇，[60]而且体裁非常广泛，有时论、散文、随笔，也有序言、书评、诗词，当然最多的还是学术论文。在学术论文之外的不同体裁中，先生都有一些堪称上乘的作

品，如时论中的《我们往哪条路走?》、《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暑假话大学》等针砭时政诸文，笔锋犀利，论理条达，在四十年代后期的时论中自成一格；散文、随笔中如《天上人间》、《湖上情思》、《去忌讳》、《发挥史学家的良知》、《众里寻他千百度》、《史学的苦恼》等都是凝练旨深的难得佳作；诗词中亦有不少如"放怀天地神州赤，到眼风光大漠青"那样浑然天成、气象豪迈的佳句。至于学术论文，先生在"文革"前发表的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论梁启超的思想》、《论宋教仁》、《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等文就已达到相当的学术水准，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辨风格；"文革"后发表的论文，更不乏思辨精深、文光焕然的精品力作，其中宏观综论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对中国革命史的悬想》、《历史·传统·现代化》等，专题论著如《论"中体西用"》、《辨"夷"、"洋"》、《说"海派"》、《光绪略论》、《因袭—规抚—创获》、《"小我"与

⑲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自序》，见《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168页。

⑳ 参见《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陈旭麓先生主编书目》，《陈旭麓文集》第4卷"附录"。

祖国这个"大我"是一体》、《也谈杨度》、《小凤仙其人》诸文，以及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瞿秋白年谱》、《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等书所作序言，无不显示出融才、学、识于一体的风格，无论从视野的宏阔、思辨的缜密和文字的洗练上说，都已达到成熟而纯青之境了。先生的这些文章，除 1982 年以前发表的论文曾辑入先生自编的《近代史思辨录》于 1984 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外，[61]绝大多数均散见于各地报刊杂志，一些手稿和讲课记录稿也没有完全整理发表。先生去世后，我们编辑出版了《陈旭麓学术文存》，但还有不少篇什因篇幅或体例的限制未能收录。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又编成了四卷本《陈旭麓文集》，并于 1997 年 2 月出版，除了少数尚未找到的文字及先生主编的六十多种书籍外，他个人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基本上都收进去了。这部文集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一个历史学家所走过的曲折的学术之路，也记录了在时代风雨洗礼下一个爱智者的智慧和良心。



《陈旭麓学术文存》书影

（二）主编之部

文章之外，先生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书籍，类型各异，品种繁多，涵盖辞书、史料整理、教材和著作等方面，累积达十三种六十余册。

辞书有：《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年版），《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近代人物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

史料整理有:《宋教仁集》(两卷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印行《辛亥革命前后》、《甲午中日战争》、《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六册),《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等;

教材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1980 年重印),《中国革命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等;

著述有:《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开始出版,至 1987 年止,前后共出版近四十种),《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五四后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等。

这些书籍虽非先生个人著作,但从选题的策划到提纲的拟定,从观点的形成到资料的搜集,从体例的安排到文字的润色,无不浸透着先生的心血,譬如先生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由他本人撰写和改写的就达三十余万字。因此,先生主编的众多书籍,从体例到观点到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明显地带有先生个人的学术

61 《近代史思辨录》出版后,先生原拟在适当的时候再辑编《思辨续录》、《序跋集》等书,惜乎这个愿望未能在生前实现。

风格。这些书籍中，辞书和史料书之嘉惠学界自不必说，先生主编的各种著述亦以架构独特、风格清新而率多见称学界。其中如《中国近代史辞典》、《近代中国八十年》等书，甫经出版，即不胫而走，风靡学界，发行量都在百万册以上，影响尤为深远。

（三）著作之部

大学时代先生就撰写出版了《初中本国史》（文通书局 1942 年版），在此后的“述作”生涯中，先生又陆续构思、撰著、出版了十余种著作，其中以《辛亥革命》、《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最为重要。

《辛亥革命》完稿于 1955 年初，并于同年 6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它的出版不仅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本，而且直接推动了此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因此，这本书虽仅八万多字，但在辛亥革命学术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先生原拟在此书及相关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辛亥革命史》，并已有具体的设想，八十年代初又一度想重理旧业，把中断二十年的设想付诸实现，可惜皆因忙于他务、无由分身而作罢。

《浮想录》系语录式的警句断想，是先生晚年思想的精粹所在。先生在世时，曾与学生多次谈及此稿，但从未示人；先生去世后，我们在清理遗物、整理遗稿时找到此稿。原稿写在两册 32 开的笔记本上，后由熊月之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后，编入《陈旭麓学术文存》于 1990 年 12 月出版；不久，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编先生文集时，我们又将此稿编入《陈旭麓文集》第 4 卷《浮想偶存》中。三个版本略有差异，以后一个版本最完整。这部手稿从 1977 年 7 月写起，一直到 1988 年 12 月 1 日先生去世为止，前后历时十二年，共六百九十五条，每条长短不一，少则几个字，多则一两百字，它就像一条引之弥长的思想长链

上的一个个环节，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一个历史学家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思考，被誉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标志性专著”。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则是先生晚年精心结撰的一部带有哲理性的巨著，[62]也是先生晚年倾全力树建的近代新史架构的奠基之作。全书共二十章三十余万字，以总揽全局的气度，并依照历史自身的时序深入地论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到社会意识的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史。此书于1992年7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性之作”、“力透近代社会风云的精湛之作”，先后获得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华东六省一市优秀理论读物一等奖、第二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六项大奖。

“才识并世同钦，述作传诸不朽”。这是谭其骧教授写给先生的挽联，它代表了学术界对先生“才识”与“述作”的客观论定。先生的身影消失了，但他用心血、才识和良心写成的文章，以及凝结在这些文章中的思想是不会磨灭的。

[62] 这部书，先生原拟分上下两卷，但最后还是决定写成一卷。见1987年3月21日致郑云山函，《陈旭麓文集》第4卷，第559页。

陈旭麓主要论著

陈旭麓文集(四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版。

晚于青史识苍凉

——程应镠传

虞云国、严耀中、范荧

一、志存家国嗤心性，斗争文字疾风雷

程应镠，1916 年 11 月 4 日(旧历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这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但到求知时，他的思想和知识已完全受其惠赐了。程家是当地大族，他的太高祖程矞采，历任江苏、山东、云南巡抚，云贵、湖广总督，同族的程楙采也官至安徽巡抚。他的父亲程懋琨(后改名觉吾)先后在河北和江西当过县长，母亲况葆琴是一个旧式妇女。五岁那年，他入私塾读书，私塾设在家中的望庐楼，读的是《四书》、《左传》和《古文观止》等古籍。在望庐楼里，他接受了六年旧式教育。祖母是幼年对他影响最深的人，经常给他讲家史，希望他成为太高祖那样公正清廉的官吏。

1928 年，程应镠去南昌，半年补习完考中学的课程。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二中，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的读书面大为拓宽，生理卫生、植


程应镠先生

物学都使他感到前所未闻的惊异。1932 年，他以成绩优良免试直升本校高中，就读理科。南昌当时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教育也颇受这一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风岛社”，开始向刊物投稿。1933 年，他写过一篇《我们的西北》，投寄给在南昌出版的《汗血周刊》，次年正式发表，时仅十九岁。因新任教务主任有意为难，指责他和几个同学不服管教，1934 年，他被迫转学到南昌私立心远中学。这个学校的历史教师讲中法战争，讲甲午战争，讲戊戌政变，常讲得流泪，而他也听得流泪，影响之下，喜欢上了历史，决定弃理学文。

1935 年夏天，二十岁的程应镠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秋天，他负笈北上，赋诗说“异乡月好不须圆”，抒发了开拓新生活的豪迈胸襟。一入大学，他就如饥似渴地沉溺于俄国小说、古典诗词和《世说新语》之类的著作中。然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受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渐渐感到蒋介石所说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成为 12 月 16 日示威游行的前锋队员之一。他后来回忆：“一二九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过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声喊着，一边喊，一边淌着滚热的眼泪。”以后的三·三一、六·一三几次示威游行，他也都参加了。

1936 年年初，程应镠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这年，燕京大学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他成为负责人之一，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当时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作代表去找沈

从文。于是他初谒这位倾慕已久的作家，沈从文为《青年作家》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词》。其后，两人保持着终生的交谊。这年春夏之际，他与燕京大学同学王名衡、刘春发起组织“大学艺文社”，出版《大学艺文》的杂志。他还代表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和“大学艺文社”，参加由清华大学发起组织的北方文学社成立大会。他当时是艺术至上论者，强调写什么都可以，但必须“情欲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动人心。这一主张，遭到刘春的尖锐批评，撤消了他出席“北方文学会”的资格。这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参加上海妇孺慰劳团赴绥远，同行有柯华、周游、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程应镠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游击队，没有成功。8 月初，他经天津至秦皇岛，由海道在 8 月 12 日到上海。次日转乘沪杭车至嘉兴，由苏嘉路经苏州到南京。在南京居留月余，参加过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工作。9 月中，他离开南京，回新建故乡小住数日，即由九江去汉口，借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与赵荣声、刘毓衡（即陈其五）办过一份叫作《活报》的刊物，仅出了一期。12 月，因范长江的介绍，他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工作，主要编印团宣传科发行的一种油印报，开始使用流金的笔名。这年，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离散之前》、《平津道上》、《记绥远》、《给一二九运动中的朋友们》等文章，真实反映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人民的流离失所和慷慨纾难的情景。

1938 年 4 月，柯华从八路军总部来到六八六团，他打算搞一个火线通讯社，刊发八路军战地消息和照片，邀请程应镠参加。征得领导同意，他们同去延安。延安有关方面同意他们去武汉，一方面向国民政府办理通讯社的登记手续，一方面采购通讯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

途中，在耀县碰到周游，便邀他一道参加通讯社工作。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他们，认为国民党不会批准通讯社立案的，要求他们等延安电示再定行止。在武汉待命期间，程应镠写了一些记述八路军抗战的报道、散文和小说，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们怎样在这里生长着》、《黑夜的游龙》和《姑射山中的风雪》等，他还以八路军的战地生活为题材，写过一本名为《一个士兵的手记》的小书。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机会回家省亲，在故乡组织大塘读书会，举办过农民识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写抗日标语，还演出过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其后，读书会有些成员分别去了延安和新四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当他返回武汉时，柯华、周游已奉命北返，他便由江西经湖南、贵州辗转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应镠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倡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题为《哀联大》，诗中有讥讽，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这批年轻学子，对联大也不满意，与前线血肉搏战相比，这里犹如一潭死水，他们渴望波澜壮阔的生活。课余，程应镠继续向报刊写稿。1939年，因沈从文推荐，他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凤子和孙毓棠。不少联大的学生在这一副刊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他自己也发表了《秦皇岛上》、《副官》、《故乡小景》和《澂江小记》等大量文学作品。他在联大两年，除了学习，便是写小说和散文，内容多与抗战有关，也充满了对故乡的思恋。这些文章，一部分收入《一年集》。这个集子作为章靳以

主编的《烽火丛书》的一种，1940 年由沈从文推介出版。1949 年 1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其列入《文季丛书》改版重印。

1940 年夏天，程应镠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之前，他已在联大所属师范学院的史地研究室参加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师范学院有意留他担任助教。就在这时，燕京大学同学赵荣声从洛阳来信，他当时是共产党员，正在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当秘书，希望程应镠也去那里。于是，程应镠决计重返抗战前线。8 月初，由昆明间关赴洛阳，行程十分艰苦，从重庆到宝鸡几乎走了一个月。到西安时，他因痢疾猛袭，几度昏迷，多亏途中结识的国民党某军副师长蔡剑鸣将他送入医院，才转危为安。到达洛阳后，他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同上校秘书。1941 年夏季，转入第一战区第 13 军任同上校秘书，仍驻洛阳。这一期间，他到过叶县、郑州、登封、密县、新郑，招待过记者，参观过名胜古迹。工作之余继续小说、散文、旧诗的创作，有的寄到重庆《大公报》，有的则在洛阳《阵中日报》和《北战场》上发表。在《北战场》上，他发表了长篇小说《京儿与小庆》的部分章节。洛阳的军旅生涯离他的追求相去颇远，他在诗里抒发内心的不满："萧条山市堪沽酒，寥落军书好醉眠"；"何时弃此冷官去，独向湖边赋索居"。同时，他对抗战前途和民生疾苦依旧投以殷切的关注："民困应知征调久，边烽频报捷书迟。诸公好画平戎策，莫任苍生靡孑遗！"

1942 年年初，他为了营救军中一位受迫害的女译电员，避居 13 军在临汝的办事处。3 月，化名上官灵亡命安徽太湖县，匿居赵荣声故里半年有余。在大半年避匿索居的日子里，他读了《宋元学案》等大量史籍，一种对历史专业研究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病余》一诗反映了这种心境：

病余岁月似还山，得意希罗古史间。

损益可知千载事，蹉跎已负一官闲。

希罗多德真吾业，凯撒庞贝失旧颜。

怀古怀人情不浅，短灯挑尽意犹悭。

10 月，他结束避难，返回洛阳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张雪中的私人秘书。1943 年初，他将战区政治部所属抗日宣传演剧一队和原 13 军政工队的演员合并，成立了《北京人》剧团，在洛阳连续演出《北京人》一剧达二十天。后来还准备排演《蜕变》，被政治部主任秘书等造谣诬指为共产党。见洛阳已难立足，而赵荣声夫妇正从太湖经过洛阳去成都燕京大学复学，程应镠便与他们同赴成都，然后经重庆去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师。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今后将转向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当时他很满意自己的角色转换：

三年奔走空皮骨，到此能安且作家。

止酒不愁贫无俸，著书可待笔生花。

溪山有约行千里，学殖何须富五车？

羁绊一官抛弃早，报书应向故人夸。（《三年》）

1944 年 8 月，程应镠与李宗蕖在贵阳结婚。不久，他携妻移居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助教，并在私立天祥中学任教。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他与丁则良虽都不是盟员，但参加过民盟邀集的座谈会。《民主周刊》发行后，程应镠写过《一二九回忆》和《一个十九岁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给闻一多，由他拿去发表的。1945 年 6 月起，因沈从文的关系，他开始编辑《观察报》副刊《新希望》。闻一多认为这个副刊脱离政治，不赞成他编这样的副刊。闻一多和沈从文原来是老朋友，这时，闻一多转向激进，认为沈从文还是老一套，没有进步。程应镠对两位师长都十分尊敬，认为他们都是好人，还打算调和他们的关系。回顾程

应镠后来的治学与为人,不时可以看到这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追求慷慨壮烈的事业与向往潇淡自然的情趣,是他性格深处看似矛盾却依傍共生的一对因子。

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政治现状并不符合程应镠所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理想。这年岁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应镠,他与广大学生一起投入了民主运动。1946 年,他曾任天祥中学训导主任。不久,学校迁往距昆明七、八里地的小坝,迁校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请当时在校任教的冯契写了一首迁校的歌词,以后成为这个学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学时,向学生大力宣传"独立不惧,朴质自然"的人生精神。1946 年 4 月,闻一多希望程应镠也能和他一样勇敢地过问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7 月 16 日,闻一多被暗杀的次日,他去医院瞻仰了尊敬的师长的遗体。他后来指出:"这件事对我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对国民党反动派如此无耻地暗杀一个正直的学者,充满了愤恨。"一时传闻他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学生协助下,他只身匆匆飞抵武汉,把妻儿都留在了昆明。在武汉等待亲人的日子里,他写诗吊唁闻一多,抒发他的哀悼和愤慨:

西南漂泊佳人死,忍泪脱从虎口来。
契阔死生诚梦寐,斗争文字疾风雷。
望门投宿思张俭,酹酒临江吊楚闾。
家国阽危忠义绝,江声东去隐沉哀。

8 月,程应镠挈妇携雏回乡探亲,1947 年 2 月由故乡抵沪,任新陆师范学校教员。8 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在这里他结识了孙大雨和戴望舒。这年秋天,他们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上海教育界当时发表支持反饥

饿、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与大教联成员都签了名。9 月起，程应镠兼任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的训育主任，因站在学生方面与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校长董任坚作斗争，11 月被当时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职。从 9 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为生计所迫，他还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学兼课。1948 年，因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学院任教。这年 9 月起，因张芝联介绍，聘为私立光华大学副教授，继续参加民主运动。1949 年春，他由尚丁（孙锡纲）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组织关系。4 月的一天，他正在光华大学上课，有人告诉他，国民党在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贴出逮捕的名单，第一个便是他。他当即去找张芝联，请他用光华的车把自己送走。他蛰居了将近两个月，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谁都不见面。从 1947 年到 1949 年的三年间，他在《中国建设》和《启示》等杂志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路》、《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论持久和平》、《民主主义的真谛》、《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等长篇政论，还写了《帮忙与扯淡》、《痴人说梦》和《停战乎？和平乎?》等杂文，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独裁，揭露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在避难的日子里，他迎来了新旧政权的更迭。

二、得失久谙关世运，报国谁知白首心？

对新政权的诞生，程应镠当时是由衷高兴的，有《闻解放军云集江岸喜成一绝》。1949 年 5 月，程应镠仍在光华大学和法政学院任教，还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组织委员会的副主委，积极参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动。例如，7 月 15 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大会，他不但参与了筹备工作，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与此同时，被国民

党反动派查封的杂志《展望》周刊也被军管会批准复刊，他也参加了《展望》周刊的工作，当时《展望》的负责人是尚丁。在复刊第 1 期上，他写了欢呼上海解放的社论。自 7 月底 8 月初起，他担任了《展望》周刊的编辑部主任。

1949 年 9 月，上海市高教处指定程应镠担任光华大学的政治教授，同时，上海市军管会中教处派他前往高桥中学任校长。次年年初，他辞去《展望》的编辑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专任高桥中学校长。他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办刊物，二是办学校。出长高桥中学，满足了他办学的宿愿。他本来就有一套办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桥中学，便把这些主张付诸实现。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从办公费中节撙款项，购置图书。其后几年，图书费成倍增加，学生已能在图书室里阅读到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他努力贯彻"教学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标准。到任不久，他还抓了学生劳动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短短数年，高桥中学就成为闻名沪上的浦东名校。

1951 年 2 月，在仍任高桥中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的同时，教育局一度命程应镠兼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负责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在暑假后就辞去这一兼职。这年冬天，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学的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去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县王堂村工作了一个多月。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他辞去了原先兼任的光华大学的教职。这年，他参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学习，通过以后，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桥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员。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次触及旧知识分子灵魂的政治运动，树立了执政党的绝对权威。程应镠感到自己不是党员，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几次向教育局辞职，打算回高等院校

搞教学和科研，都未获准。1953年，他写了《屡求去回高校任教不获忽四年矣因春感赋一律》，表达了自己在社会变动新旧交替之际的喜悦、迷茫和追求：

万里春风喜莫加，卅年委运恨如麻。

回天力已成诸夏，起死恩今感万家。

快意恶除萧艾尽，会心人惜蕙兰花。

自怜才薄当斯任，有志难谐鬓渐华。

1954年暑假，他从高桥中学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在其后三年间，他代理过一年教务主任，担任过校工会主席，但主要负责历史学科的建设工作。在各种会议上，他总是强调必须尊重教师，认为师专既然是高校，就应当从速确立学衔，不能都是一般教师。他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室的建设，添置了象《明实录》、《册府元龟》这样的重要典籍。他还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实物，向学校建议筹办文物陈列室。在争取到资金以后，他致函委托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在京代为收购故宫博物院不收购的文物。文物陆续运达上海，他捐赠了自己所藏乾隆宫纸和数种丝织物，还趁沈从文以政协委员身分视察之便，邀请他来校对文物陈列室作具体指导。1957年，文物陈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现已改建为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成立，程应镠出任历史系主任。这年，他当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当"双百"方针提出时，程应镠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主张来诠释这一方针。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解，使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而终于运交华盖。在一次民盟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公开批评说："学校现在权威太多，党委书记是权威，校长是权

威，一级一级的领导，都是权威，只有教授不是权威。而学术问题，真正的权威是教授，是每一门的专家。不去掉这些权威，学术就不能发展。”1957 年鸣放期间，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认为这是一个新五四运动。反右斗争开始后，费孝通在报上被点了名，许杰也在上海被点了名，他在公开场合认为许杰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不会是右派。还说：“倘若这样，以后知识分子都不能讲话了。”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学生”点名划为右派。他坚定认为自己并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和某些党员干部相处不好，只是个性脾气，决不是反党。他声明：“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当右派。”但一个知识分子在狂暴的政治风雨面前，是多么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他也想到过自杀，只因儿女尚在童稚，才没有走这条绝路。直至这年 8 月底，在强大压力下，他见一向比自己进步的一些朋友也都沦为右派分子，才被迫承认自己是右派。从 7 月份起，他被免去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入资料室工作，等待所谓处理结论。即便如此，为历史系的建设，他仍然不计一己之荣辱，主动提议整理文物陈列室所购置的碑帖。他利用“交代检讨”的间隙，白天赴上海图书馆查核有关资料，入夜则伏案运思，挥毫作跋。在这个急风暴雨的仲夏，他将历史系收藏的全部碑帖研究了一遍，每一通碑帖都撰写了一篇见识精到的跋语，交系备用。

1958 年 9 月，程应镠参加了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的部分右派分子劳动学习班，地点在上海县颛桥乡。1959 年 2 月起，他又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的“学习”。7 月结业，回上海师院历史系工作，从教授贬为中文系马茂元等人的助教。仍须一方面在校学习，一方面在市委统战部和民盟市委学习，每月还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这种汇报持续了三年。在这些阴霾的岁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写思想改造日记，自题为《严谴日记》。1957 年以后直至 1960 年摘去帽

子，他除了和母亲、姐弟还偶有通信，与一切朋友都音讯俱断。工资已被割得难以养家糊口，1959 年之后，为贴补家用，家里的藏书一批一批地卖去，所剩已经无多。这对以学术为生命、以图书为资粮的学者来说，是最不堪忍受的。

1960 年 9 月，程应镠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允许正式授课。他感到作为教师还必须有点真才实学。从 1961 年秋天开始，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如何重理旧业，掌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他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准备作论文。从 1962 年起，他因原任民盟市委委员，就不再在学校进行政治学习，而是直接参加由民盟上海市委组织的政治学习。直到 1965 年春夏之际，他才由民盟市委通知仍回学校学习。这一期间，只要一有余暇，他就埋头于史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但他还是陆续完成了《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和《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等论文。他有一首诗反映了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偷闲治史的情景：

少逐声名翰墨场，晚于青史识苍凉。

九年蝶梦迷归路，三斛纯灰净秽肠。

绿色侵帘瓜豆蔓，好风穿户午荫长。

夜窗卧看星河落，清露无声枕簟凉。

由于周游和吴晗的促成，约程应镠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1963 年，他写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他："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写作过程中，吴晗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吴晗都明确表示了意见。1964 年春，《南北朝史话》完稿，不久看了三校

样。1961 年和 1962 年，对于历史问题，不同意见屡见诸报端；1964 年初夏，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大批判。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程应镠对当时讨论或批判的历史问题，是有自己想法的。经过《史话》的写作，这些想法更为明确，他很想为《史话》写一篇序，阐述自己对有关史学问题的系统看法。但这个念头只在脑子里转了一下，便放弃了。书稿交出半年之后，这年初冬，终因政治大气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 年 9 月，程应镠参加上海师院农村学习访问队，去松江城东公社学习访问，住了四十天，参加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会议，主要是成立贫协的会议。访问结束时，学院领导号召写家史，他也参加了两篇家史的讨论，写了部分初稿。回校不久，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吴晗的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也希望是个学术问题。但在表示意见时，却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1966 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与胡适》，他不仅感到吴晗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预感到又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能够保住平安，被迫把吴晗 1963 年的来信交给了历史系党总支。

风暴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他每次去看大字报时，总是担心大字报会集中揭露自己的问题。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主动交代了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师院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图书和诗稿，还准备烧毁文物陈列室的珍贵藏品，把他与魏建猷和张家驹等人挂牌游斗，沉重的铁质游斗牌压坏了他的颈椎神经。他认为红卫兵全面地否定过去的文化"太过分"，也"不合法"。运动初期的惊涛骇浪过去以后，他作为牛鬼蛇神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桂林二队劳动改造。每天，他

送蔬菜去市场，到梅陇镇去拉砖瓦，去七宝镇车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宝路上拉粪车……。这一期间，他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晚饭后，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便已熟读的《资治通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伴侣。他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下去，时而沉浸在历史之中，忘记了一切，时而古今对读，发出会心的苦笑。

1968 年元旦，程应镠是在写检查交代中度过的。这年 5 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也没完没了地写交代，现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就有十余份。1969 年 2 月，他一度被隔离审查。4 月 12 日写了长达二十页的"罪行交代"，约二万五千余字，三天后，续写"我的交代"，约万言。当月，他被"解放"。5 月，参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队"赴横沙岛。连年以来，揪斗关押，惊魂不定，面对横沙岛上的风雨怒涛和雁月夜窗，他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

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娑泪万行。

大约从这年岁末起，程应镠转到松江佘山劳动。1970 年 5 月，转赴江苏大丰"五七干校"，继续那种无休无止的改造和学习。

1971 年 4 月，工宣队发还抄家取去的书物，而程应镠所珍爱的诗稿本却不见踪影，于是他凭借着记忆默录出部分旧作。10 月 2 日，他为默录的诗稿写了一段跋语："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五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当时窃惟革命人们可以据此审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这种东西，本来是应当烧掉的。为了使儿女从这里取得一些教训，则还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这个人自幼读孔孟之书，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润。在洛阳，虽有忧愤，但

仍幻想改良。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中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语强调“读其诗，想见其为人”，“重录了这些东西，不免和它们一同回到了过去的日子”，肯定诗草对了解其人其事的价值。这些诗草与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说、散文、报导、杂感和政论，后来大都收入《流金集·诗文编》。

从1972年起，程应镠结束了在大丰“五七干校”劳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二十四史标点组，先后参预标点了《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标校完毕，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标点组开始标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年动乱中，程应镠私下里只与魏建猷、张家驹仍有往还，患难之中保持着十分感人的友谊。1973年，他们三人还结伴携妻出游苏州，成为那黯淡的岁月中鲜见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的消息传来，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达了对政治阴晴的密切关注和乐观情绪：

日里几番晴雨晦，夜来月色暗还明。

黄梅时节江南客，头白昏昏醉复醒。

10月，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也有诗纪事道：

谁知覆雨翻云手，搅得周天阵阵寒。

易直果能当大事，未须甲兵即平安。

易直是宋代大臣吕端的字，他一向被视为“大事不糊涂”的名相。程应镠谙熟宋史，他预感到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

1977年，程应镠仍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该标点组后来改为上

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 月，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为十余年前的旧稿《南北朝史话》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华已经二十一年，见到阔别已久的师友，抚今追昔，既感慨，又高兴。在北京的五十天里，他往往上午校改书稿，下午去访寻古迹，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约有两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他还去探望了吴晗的遗孤，吴晗是促成他写《南北朝史话》的师友之一。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濛濛细雨，他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吴晗的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

诗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当时，他还不敢轻易示人。

1978 年，高考恢复以后首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入学，程应镠不仅为他们制定了教学计划，还亲自担任了《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工作。这年岁末改正右派错划，他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为历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同时，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兼职也日渐增多。1979 年，程应镠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成为全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这年 3 月，他在为即将出版的《南北朝史话》所作的《后记》里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他确实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的，迎来了自己学术和事业的最后收获期。写完《后记》，他赶赴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宋史研究会，并推北京大学邓广铭、暨南大学陈乐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郦家驹和上海师范学院程应镠组成筹备小组，责成上海师院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2 月，他去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与北京大学邓

广铭同被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主编。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分卷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希望宋史卷能作为断代史卷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书。会后，他全力投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的组织工作。10月，他与邓广铭、陈乐素发起组织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他代表筹备小组介绍了宋史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并被选为秘书长，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这年，他开始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前期准备。

1981年，程应镠完全摆脱学校里的工作，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审稿、定稿。1982年4月，他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疗，但梦牵魂绕的却是尽量夺回十年浩劫损失的时光，为史学研究多做贡献。他有两首诗最能说明这种心境：

忧患余生最自珍，病魔潜袭已兼旬。
文章又见流传日，议论终须不傍人。
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
莺花三月江南夜，怀远思亲一怆神。

（《友人问疾诗以答之》）

老去移山志未伸，汝曹宜自惜青春。
传经我爱他山石，报国谁知白首心？
秋入园林思塞马，梦回长夜忆青襟。
登临敢说兴亡事，太息当年苦避秦。（《示儿》）

盛夏出院，程应镠继续擘划《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有关事宜。与此同时，他进一步着手《范仲淹新传》的写作准备工作。盛夏休息在家，便浏览家藏的宋人笔记，有关范仲淹的则随笔录下。约10月开始，作范仲淹传记长编，断续花了一年时间。



程应镠与他的学生严耀中

1983年,程应镠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并把上海师院的古籍整理专业建设成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与妻子重游昆明、贵阳等旧地。返沪后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参加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西南之行,故地重游,令他感慨和兴奋,为此他写了一组《重游西南杂事诗》。江西是他的故乡,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以"气节文章堪继往,江山人物自开颜"的诗句来颂往勉今。他频繁地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活动,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癌症初愈的年近七旬的病人。这年秋天,他开始写作《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他对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考虑了很久。上海师院校庆,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10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11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

的征文约稿函，便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传》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一次实践。

1984 年初夏，程应镠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被聘为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他还是上海市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11 月，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是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成都成立，他与谭其骧、周一良、唐长孺、何兹全、王仲荦、缪越、田余庆、韩国磐、吴泽等同被推为顾问。这年岁末，由他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出版面世。这年，为推动海内外宋史学术交流，他还创办了《宋史研究通讯》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会刊，并题写了刊名。1985 年 7 月，《范仲淹新传》完稿。1986 年 4 月，他赴杭州大学参加国际宋史讨论会。月末，赴贵阳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10 月，《范仲淹新传》出版，自去年定稿后即着手《司马光新传》的写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名誉所长。1987 年 9 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增补为副会长，仍兼秘书长。因十年浩劫中被揪斗时伤及颈椎，颈椎压迫症引发多种疾病而住院治疗。这时，他的《司马光新传》已经完稿，惟传主事迹著作编年仅成其半，征引史料也未及覆核，遂委托助手完成。自此，他久困病榻。卧病期间，偶以笔墨书录昔年所作旧诗。1991 年 8 月，《司马光新传》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一丝快乐。1994 年 7 月 25 日，程应镠病逝于上海寓所。

三、史学方法和历史教学

在史学思想上，程应镠既受传统史学的濡染，又汲取了新史学的理论方法，两者交融结合，形成自己的治史特色。他充分肯定由刘知

几首倡、章学诚补充的“史学四长”之说，认为“现代能写出一本可称为史学的著作的，也必须具备这四长”。在史学的功能与作用上，他主张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故而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司马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都极为推崇，认为他们“以古为鉴的作史目的，实际上也是在史学的领域对古今关系的一种解决”。他所主张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历史研究应该找出规律性的动向，以帮助当代人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大势；二是指总结历史上某一方面的具体的经验教训，作为当代相关问题的借鉴。

程应镠强调“学问之道，在于求真”，因而十分重视史料功夫。他自述大学时代所受的史学方面的训练，“考证、校勘占的分量颇重”。这种传统史学的早期训练，以及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的经历，使他在治学方法上尤其重视史料的作用。他认为“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赞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在某种意义来说，开创了我国求实的学风”，肯定清代朴学中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他主张，“学历史是要有点‘考据癖’的”，任何史料史实上的疏忽偷懒，都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一再告诫学生要抵御名利思想的侵袭，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座右铭，静心坐下来认认真真多读几部中国古代基本史籍。他让研究生第一年以逐字逐句研读《资治通鉴》为日课，就是要求他们打下研治中国古代史的深广扎实的基础：通过查找《通鉴》的史源，初通目录版本之学；在比勘相关史料时，校雠之法也得以略涉门径；在史料比较和溯源的同时，既可观摩司马光和胡三省在史料运用与考辨上的精当，若偶有讹误发现，又可粗知考证的门道；而《通鉴》正文和胡注涉及的典章制度、史事人物更是研治中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

然而,程应镠治学并不局限于史料考据促迫烦琐的天地中。五四以来的新思潮促成了他治史方法的另一侧面,即重视理论,推崇会通。他认为:“史料不等于史学,不论他掌握了多少史料,都不能说他是史学家。”“霸业千秋余古迹,议论终须大手笔”,说出了他对史学研究中理论的高度重视。他所强调的史学理论修养,有特定的内涵。首先,要有理论追求的勇气。他曾指出:“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领袖,绝不是科学的态度”,还经常引用张载“剖破藩篱是大家”的诗句,来提倡好学深思,不为前人与他人所囿,也不为自己所囿。在他看来,剖破藩篱,解放思想,是提高史学理论修养的前提。其次,对理论的追求是不应该有止境的。他认为:理论是随着事物的变化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理论的完善也没有尽期。因此,“认为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其三,他所说的史学理论并不仅仅狭隘地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经我爱他山石”,这史学理论的他山之石,包括了人类思想宝库中一切对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理论遗产。他曾向学生推荐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名著。“议论终须不傍人”,他在史学研究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总是以有无新见解来评价当代学人与自己学生的史学成果的。

程应镠自幼养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至老不衰,青年时代又从事过文学创作。这种爱好、修养与经历,使他在治学方法上特别讲究文字的表达。他相当钦佩和推崇史学名家张荫麟那些“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的历史名篇”。他的史学论著《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等,无不形象生动鲜明,文字清峻雅洁,绝无斧凿的痕迹,却有一种文情并茂、摄人魂魄的魅力,堪称史学和文学相当完美的结合。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追求史学著作在表述上的信达雅,他让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女儿读他《南北朝史话》的稿子,

以推敲行文是否通俗生动，而其中《崔浩之死》一节竟先后属稿达十一次之多。他招研究生，都必须经过作文考试方得入其门下，文章优劣是录取与否的最重要参数。这种做法在历史专业研究生招生中是别具一格的，其理由正如他说的那样："不能设想一个文理紊乱的人将来能进行思路清晰、识见敏锐的科学研究。"

总之，程应镠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却不主张仅以罗列史料为能事；推重理论，但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论。他认为：历史研究，无论宏观微观，都应当是具体的。他不止一次指出：研究历史应该从微观搞起，只有把微观搞清楚了，才能准确把握与清晰鸟瞰整个宏观的历史。他认为：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结合，卓特的史学成果与生动的文字表达的结合，是可以也应该在一个优秀史家身上完成的。他所推许的剖破藩篱的史学大家，应该在史实史料方面具有广博精深的素养，并能把握历史发展中带有普遍性或关键性的课题，以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精炼优美的文字表述，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果。

相对于历史学家的声名，程应镠更重视他作为历史教师的身分。他多次对人说过："我首先是一位教师，不是什么学问家"，可见教师生涯在其人生历程与自我评价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中学校长到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历史教育园地里耕耘了半个世纪之久，培育桃李无数。任何时候，在他身边都会聚集着一群青年学子，平时，他关心他们的学业和为人，关键时刻，他总是忘我地保护他们。他在传道授业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教育、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作为长期从事师范教学的历史学家，程应镠对历史教学和学生培养有自己的见解和特点。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学生对历

史课没有兴趣？他以为，学校对历史教学不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得不好，历史教师缺乏专业训练，等等，都是导致学生不爱上历史课的原因。而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历史教学和研究又直接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因此他特别反对把历史研究与教学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剩下几条筋，无血无肉，干瘪得像瘪三，青少年是不会有兴趣的。”他还反对以一成不变的理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贴标签，在他看来，贴标签“是不会有说服力的，就会使得学生以为历史味同嚼蜡”。他主张历史课可以通过讲人物，使学生了解过去。比如讲秦汉，就要讲秦皇、汉武，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讲均田制，就要讲文明太后、魏孝文帝；讲改革，就要讲王安石、司马光；讲淝水之战，不能只讲战争性质、双方力量对比，要讲苻坚、苻融、谢安、谢石……通过人物的讲授，使历史课变得津津有味，才能使学生从中获得教益，否则，“要激动青少年的心大概是不可能的”。

程应镠在大学先后讲授过世界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国学概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很多学生说，听他讲课，如同一种艺术享受。他的历史课既有理论上的开掘拓展，又常常在关键处旁征博引，中西比较，信手拈来，适时点化，使学生在豁然会悟、欣然有得中感受其中的深度和广度。他讲课时，感情十分投入，有时激越雄辩，使人奋立；有时深沉低徊，令人感慨；或描摹人物，或引据诗词，高屋建瓴又挥洒自如，把学生带入应接不暇的不同境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曾为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中国通史，大梯形教室为之爆满，以致走廊、门厅处都临时加座。他对自己的历史教学的最高要求是：“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深度和魅力浑然一体的教学境界，数十年中，他始终要求自己把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走上讲台却又不带讲

稿，其中，需要付出多少创造性的艰苦劳动！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要上好历史课，最主要的还是学习，比在大学读书时还要学习得认真，为培养人而学，为未来的建设者而学，为那些将来要超过我们的人而学。"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懈的追求，正是他几十年历史教学常讲常新的源泉所在。

为了培养出更多基础知识扎实、创造思维活跃的优秀学生，程应镠在历史教学上推行了许多有力措施。他创建了有相当规模的文物陈列室；把走出校门考察历史文化古迹列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加强图书、资料、教具的建设，甚至聘请专职的历史地图绘制员；他主张必须让最有经验的老师上基础课，让学生接受最好的基础教学；他强调必须改革基础课，在削减基础课课时的同时增加选修课，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他主张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多学早学；他多次主持学生的学术讨论会，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早出成果；他的课外答疑，使学生受益匪浅，甚至启发他们走上研究之路。总之，他的办学主张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为的是培养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在提倡素质教育、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今天，他的历史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也依然是行之有效、值得借鉴的。

四、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自西南联大毕业以后，程应镠不论身处何种环境，从事什么工作，都始终钟情于史学研究。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仍默默进行着学术积累。如此辛勤耕耘二十年，才有机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起将自己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刊布于世。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其思维方向、学术观点、研究结论等，在当时都有独到领先之处。

其一，述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壁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为深入了解当时人民的生存状况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场景图。

坞和壁都是古代军垒之名，但当时的人民，尤其是战乱时期的大部分北方人民，却生活在坞壁里面。对这一现象，陈寅恪、范文澜、唐长孺等学者的论著中都分别提到引证过，或附带论述过。但首先对这种现象进行全面深入论述的，应推程应镠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 年第 1 期上的《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

从研究社会史的角度看，有关坞壁的记载十分重要，但在现存史料中却分布得非常零散。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程应镠几乎把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坞壁记载都钩辑齐备，然后构思了这一力作。这篇论证坞壁的代表作，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较完整地勾勒出坞壁在当时中国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坞壁简史。第二，对坞壁的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例如坞壁居民的构成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军事属性和生产劳动情况等等，实证了坞壁在相当时期内是北方大多数人民的生存处所，对了解当时社会面貌至关重要。第三，论述了坞壁在当时的作用与地位，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例如"坞壁对胡族统治者的斗争，客观上促使了胡族的汉化"；"永嘉乱后，汉族先进的生产事业被坞壁保存下来了。个人常以为对北魏的均田制，从生产方面估计过高，恐怕不合乎事实。《齐民要术》所总结的生产经验，实标志着坞壁生产的水平，而不是均田制制度下生产的水平"等等。他在其他文章中还指出："永嘉乱后，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是以坞壁为主的地方势力"（《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86 年）；"五胡十六国真正统治地方的是坞壁主"（《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载 199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流金集》）等。这些



程应镠手迹

提法在当时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亦大有启迪，开辟了一条通过前人的生存环境来揭示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

其二，以考实均田制在北魏实施的具体情况，来把握少数民族统治下的胡汉关系。

北魏的均田制历来是史学界引人瞩目而众说纷纭的热点，但一般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对制度本身的研究上。程应镠对均田制的研究则独辟蹊径，把研究方向着重放在与之关联的胡汉关系上。他的研究，透露出对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独到洞察力，即经济利益驱导着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而民族关系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就是经济体制中各民族所占的地位。为什么北魏要建立均田制？它究竟在什么时候，在哪些地区实行了均田制？均田制与私有土地关系如何？给哪些人带来了好处？它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对这些问题，程应镠都用民族政治关系的互动演变来进行解释，从而为理解与阐释当时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的《论北魏实行均田令的对象与地区》（载巴蜀书社 1990 年《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通过考据有力证明：第一，“对鲜卑平民，均田令是不适用的”，“肯定北魏在畿内和近畿之地没有实行均田令”，“在中原，为州郡所领的杂户、营户，也没有包括在均田令实施的对象中”；第二，“均田令中并无计口授田之文”，计口授田的对象主要是被迁在平

城附近的"新民",二者并不相同;第三,"均田令是文治的重要内容",而文治又是主要对汉族而言;第四,"均田令所要解决的矛盾,是北魏朝廷和汉族坞壁主对民户的争夺,看来并不适用于解决鲜卑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最后的结论是,"北魏均田令只是在中原实行了的,对于汉族坞壁主、中小地主、自耕农和被清查出来的荫附才适用"。也就是说均田制是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它适应北魏拓跋鲜卑政权统治中原汉族人民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和坞壁主所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也表明那时的胡汉关系包涵着多重形式。与此同时,北魏均田制的局限性,通过这篇论文的论证也已一目了然。

从现存有关北魏均田制的史料来看,这一论点完全可以自成一家之说。尽管不能断言北魏均田制的其他说法难以成立,但它们并不见得比程应镠的论证更有道理。而不同说法并立存在,将更有利于研究接近历史的真相。

其三,通过对劳动者名实关系的探索,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结构进行全面剖析和新的阐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人们的社会地位升降不定,诸种身分变化无常,代表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构成,决不可简单地归结成诸如统治与被统治、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所谓两大阶级的矛盾。例如"吏",历来把它作为官的一种通称,大吏就是大官,故连称为"官吏"。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吏的内涵非常复杂,既有为官之吏,也有当兵之吏,更有被当作劳动力使用的吏,其间高下贵贱贫富的差别可以说千变万化。因此在吏这个称谓之下,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呈现了不同的身分?其间不同的身分又是如何转化的?当时许多关于身分的称谓,如门生、宾客、部曲、士等等,无不和吏这一称呼的内涵演变有着同样的情况。程应镠对此

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一条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真相的绝佳途径。于是他与时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同窗好友熊德基共同倡导这方面的研究，他自己先后写了《释幹》、《释吏》、《释新民》等一系列文章，在《中华文史论丛》上陆续发表，作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种类繁多的劳动者进行个案研究的切入点。

“幹”是当时形形色色吏的名称之一，由于北齐实行过“食幹制”，就使幹在当时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吏。《释幹》是最早对幹的身分进行系统描述和研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程应镠叙述了历代幹的来龙去脉，还对北齐食幹制的内容与实质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食幹制中的幹不仅是地位“卑末”，也“不仅是在衙门里当差打杂而已”，还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总结道：“北齐时，贵族官僚有食州郡县幹之权，幹被迫从事无偿的农业劳动，是这一时期一种特殊形式的农奴”。《释幹》发表后，谈论幹与食幹制的论著为数不少，解释纷纭，但都未提供出新的史料作为依据。至今为止，程应镠关于北齐的幹与食幹制的论述，不仅独树一帜，而且最接近历史的真相。《释吏》则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进行系统分析和概括性的总结，指出当时不少吏被使用于农业劳动的特殊现象，这一现象在以往是容易被忽视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佃客和部曲，兵和吏，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是主要的劳动阶层。他们的身分、地位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相似”。与泛泛地说农民阶级是主要生产者等说法相比，这一论述无疑要深刻得多。

“新民”是北魏政治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身分，它是北魏统治者将各地被征服者迁徙到平城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定居者。由于它关系着对北魏民族关系和土地制度的讨论，程应镠早就将它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在其他文章中屡有提及。《释新民》全面归纳了他对这一历

史现象的看法。文章认为，新民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农奴，“当与隶户、营户、僧祇户相等，是需要封建国家明令放免才能成为平民的，不可能和编户齐民相同。所谓‘计口授田’，给耕牛和农具，只不过是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生产劳动，为拓跋国家提供租赋而已”。毫无疑问，在与此相关的研究中，这一观点也是卓尔不群的。

除了上述学术发明外，程应镠很喜欢追随其师陈寅恪的研究路数，作些新探索，其典型文章有《王导治理江东政策试释》（载《历史教学问题》1983 年第 2 期）。众所周知，陈寅恪写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主要论述王导如何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程应镠之文则“就陈文所论未备者，取有关史实，试为诠释”，具体论述了王导如何安抚流民，如何创置侨郡县等等，把王导的功业落到了实处。程应镠讨论玄学与文学的文章，融文史哲为一体，彼此相证发明，例如以阮籍与陶渊明的诗来阐述玄学，证明玄学和经学之间的关系，得出“魏晋玄学是经学的反动，但它又是经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等结论（参见《玄学与诗》等，载《流金集》），开拓了探索的新空间。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其任务不仅在于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要尽其可能地让历史的真相使更多的人知道，惟有如此，才能使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一个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一定会努力使自己的论著简明畅晓，也一定会努力撰写史学通俗读物。程应镠的《南北朝史话》，就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南北朝史话》初稿完成于 1964 年，由于政治原因，直到 1979 年才得以出版。但十五年的拖延，并未使其丧失在知识领域中的前沿性。这本书的特点是，第一，囊括了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大事要点，无一遗漏，可以说是一部较全面叙述当时历史的通俗简史。

第二，文笔简练明快，生动流畅。例如叙述南齐一朝的兴亡，前后不足二千字，却把齐朝兴衰契机、政治特点和历史地位等等，交代得一清二楚，同时还把齐高帝萧道成、齐明帝萧鸾等事迹与心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整部书仅十二万字，引人入胜，可以一口气读完。第三，字里行间充满着历史的智慧。这种智慧既有来自前人的，也有来自作者本人的。例如谈到梁朝的连坐法不起作用时说："严酷的刑罚，阻止不了求生的斗争"。又如提到那一时期宗教时，指出"现实的斗争却使宗教分为'邪''正'"，"'邪''正'的对立，使道教在南北朝被重新改造"，等等。这些真知灼见随着史实的描述，潜移默化地印入读者的脑海，使人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享受了智慧的熏陶。第四，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笔触里充满着强烈的爱憎和情感，对真善美的颂扬和对丑恶卑劣行为的鞭挞，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流露了出来。这种来自正义感和历史道德观的深情，使原本冷冰冰的史实能变成一团唤醒良知、驱人向善的烈火。

《南北朝史话》一问世，即誉满京华，获得了有关专家的交口称誉，周一良推许为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该书尽管一印再印，仍然经常脱销，还先后荣获过全国优秀图书奖和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成为当时历史通俗读物的一个范本。

五、关于宋史研究

上海师范学院的宋史研究，是由张家驹奠定基础的。张家驹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开始发表宋史论文，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等论著，曾在宋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宋史研究开创期的重要学者之

一。五十年代，张家驹到上海师院任教，教授宋辽金元史，同时继续发表《论赵匡胤》、《沈括》等有分量的论著。1973 年去世以前，他是上海师院二十四史标点组中标校《宋史》的骨干力量。张家驹去世以后，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顿时少了一位带头人，为了使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能够继往开来，更上一层楼，程应镠毅然放下了对自己来说是轻车熟路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转向了宋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把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而且使其成为全国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宋代史籍整理是程应镠对宋史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1972 年，他结束了在大丰干校的劳动，参加了上海师院承担的《宋史》点校工作。《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向以卷帙浩繁而著称，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要多一倍；志的分量也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礼志》竟占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因而陈寅恪为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就说过："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点校整理这样一部史书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上海师院集中了中文、历史两系几乎所有可用的人力，还从上海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借调了一些研究人员，而程应镠自始至终参与主持了这一艰巨的工作。他常常为了确定一个顿号或专名号，废寝忘食，查阅群书，反复多次才能肯定下来。尽管如此，程应镠对整理本《宋史》仍留有一份遗憾，认为还存在许多问题，"标点、校勘、分段都有问题，更不必说此书原来已经存在的自相矛盾的那些问题了"。通过整理《宋史》，他进一步认识到："宋代史料整理的工作，是大量的，没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认真组织人力，是整理不完的。整理是为了研究。整理研究的目的，那就是弃糟粕而取精华，继承宋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杂谈宋史研究》)于是，在他的组织协调下，上海师院和华东

师大两校学者开始标校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他还亲自为前 189 卷定稿。该书后获 1984 年上海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稍后，两校又共同承担了《文献通考》的整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文献通考》三大书的整理出版，是宋史研究中功被后世的盛事，程应镠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

编纂宋史辞典是程应镠对宋史研究的另一贡献。在整理《宋史》和《长编》的过程中，许多词语和典制令人不甚了了，他痛感编纂宋史辞典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79 年 3 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决定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其后，《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约请邓广铭和程应镠出任《宋史卷》主编，由程应镠负责组稿，希望《宋史卷》能在 1983 年成书，成为断代史辞典的第一部。于是，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从设计词目、邀请作者到审读定稿，他都每事躬亲。考虑到宋代的名物制度最难索解，他决定对食货、职官、选举、兵刑等词目尽量兼收并蓄，一些官职的简称、别称也加以收录。有关人物的词目也考虑得较周全，文官中参知政事以上的都收录，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基本上也都有一席之地。仅仅词目的收录定稿工作就进行了一年有余，因为在他看来，“要使一部辞典适合于读者的需要，首先就必须在收录词目上下功夫。”初稿写就后，审稿、定稿是更艰巨的任务。他集中邀请了近二十位专治宋史的学者来进行这一工作，要求“一切据《宋史》所写的名物制度，除查对原书，还要核以《宋会要辑稿》和《文献通考》，其据宋人笔记以成文的，也必须参校他书。宋史人物，据《宋史》者必核以《东都事略》及有关行状、墓志”。（《编辑〈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后言》）这样就使许多《宋史》成书以来包括人物生卒、籍贯、俗语解释等失误得以大量改正。在这一阶段，他集中全部时间审稿。有的稿子要重写，有的稿子要补充，还必须根

据需要增补词目、编写释文，工作之繁重，以“宵起旰食，殚精竭虑”来形容当不为过。在稿件三审时，他被查出患上了鼻咽癌，住院治疗期间，依然关心并指导着审稿工作的继续进行。治疗刚告段落，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审读样稿。因他住院，宋史卷原定交稿出版计划也随之改变。1982 年秋天，《中国历史大辞典》决定停止若干专史分册的编撰，宋史卷须酌量增加有关方面的内容。他一边断断续续地看稿子，一边约人编写新增词目的释文，1983 年暑假送出全部稿件。1984 年岁末，《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终于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专业辞典，也是第一部宋史研究工具书。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似乎又经历了一次青年时代完成一篇创作时的那种喜悦心情。”《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后来荣获 1986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程应镠不止一次地说过：编写年表、索引、辞典，包括整理典籍，如同前人栽树，能为学术研究起“开路搭桥的作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为此，他甘愿为后学作人梯，置自己大量亟待整理的旧稿于不顾，投身于宋代典籍整理与宋史工具书编纂。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88 年，他还以衰病之身慨允汉语大辞典出版社之约，领衔主编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文化史辞典·宋代卷》。

历史人物是程应镠宋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兴趣，他起始甚早，1937 年借读武汉大学时，就曾泛览名人传记。1957 年以后被迫弃离学问，偶读朱东润《陆游传》，他就产生了为范仲淹写传记的冲动。因此，当他开始撰写《范仲淹新传》时，对历史人物研究已有很多很深的思考。

程应镠在《谈历史人物的研究》里认为，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每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与时代精神的代表，优秀的传记作品可以通过一个人物反映一个时代。不仅如



程应镠《司马光新传》等著作

此，历史人物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社会效应的广度，历史传记在史学成果中具有最广的读者覆盖面，我国古代史学早就有与教育携手发挥历史传记的社会教育功能的优良传统，而这一传统应该得到发扬。他还认为，研究历史人物，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所活动的地域。任何一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还有生理的、心理的、教育的局限。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充分理解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才能认识这个人本质的东西，才能见其本色。研究历史人物还应研究他的行事，他对事物的态度、分析和决断。历史人物留下的著作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研究一个人的作品则要求全，否则对人物的了解就不全面，就写不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程应镠之所以选择范仲淹和司马光作为他研究的对象，这是因为他认为：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纵观中华民族那些逝去的巨人行列，宋代人物中以功业彪炳史册的并不多见，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历史传记既然是为现世人们提供最具体的道德楷模，那么，选择范仲淹、司马光作为传主是最符合程应镠心目中

的严格标准的。

在《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的写作中，程应镠实践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尽管稔熟宋代史料，但他在写作前仍重新研读了《范文正公集》和《司马温国文正公集》。他做摘要，抄警语，遍阅相关的宋人笔记与文集，将浏览所及的传主资料笔录在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和顾栋高的《司马温国文正公年谱》的相关系年下。然后或订正前人的失误，或增补旧谱的不足，在充分全面占有传主资料后，写出传记长编，这才正式动笔。在写作中，程应镠推崇司马迁《史记》的风格，着力于叙事，以及刻画与事相关的人，认为这样做好了，其论自现。他坚信论从史出，不主张在传记中发议论，连夹叙夹议也尽量避免。在着力表现传主思想、事业最本质、最主流的那部分的同时，对其性格、情绪等其他侧面也努力作了发掘，以凸现一个完整无缺、有血有肉的传主形象。他曾说过："传记作家要以传主达到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正是他追求这一境界的具体实践。这两部宋人传记，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深刻，又有文学家的激情和技巧，融史学论著的谨严与文学传记的优美于一炉。故一经问世，即被宋史学界推为人物研究的佳作。

程应镠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学术论文结集为《流金集·学术编》，文学作品有《一年集》，其他散文、杂感和政论结集为《流金集·诗文编》。1994 年，为纪念他从教五十周年，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1977 级和 1978 级部分学生集资出版了《流金集·学术编》，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先生无论在人格道德、学识文章上都是我们敬重的老师；师恩是没齿难忘的，师道是仰之弥高的，先生半个世纪所从事的业绩在社会大生命中将是传之久远的。"

程应镠主要论著

著作：

《一年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1949年改版重印。

《南北朝史话》

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获1980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全国青年优秀读物奖。

《范仲淹新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司马光新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流金集·学术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流金集·诗文编》

2001年私家版。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与邓广铭共同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获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文化史大辞典·宋代卷》（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即出。

古籍整理：

主持《宋史》的整理标校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组织《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整理标校（负责1－179卷的定稿）

中华书局,1982 年起出版。获 1984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论文:

《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

《新观察》,1948 年卷。

《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

《中国建设》,1948 年卷。

《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1 期。

《论北魏实行均田制的对象和地区》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 年版。

《王导治理江东政策试释》

《历史教学问题》,1983 年第 2 期。

《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1986 年。

《玄学略论》

《河北学刊》,1986 年。

《释"干"》

《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 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释"吏"》,

《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 4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释"新民"》

《中华文史论丛》,1987 年第 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谈历史人物的研究》

《历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论林逋》

《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书王荆公〈明妃曲〉后》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

《读〈宋史〉札记》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第 2 期。

《宋代都市发展两证》

《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中国文化三题》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关于尉缭和〈尉缭子〉》

《艺文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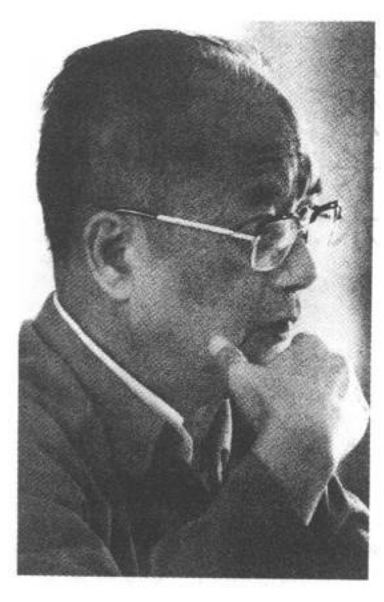
悠悠长水 求索时空

——谭其骧传

葛剑雄

尽管至迟在二十世纪初上海就成了中国第一、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但直到六十年代初，人们对“上海”一名的来历还沿用了几百年来的旧说，即因为“地居海之上洋”，历史学家对此也不甚了了。但到1960年谭其骧发表《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一文，明确指出，上海得名于一条名叫“上海浦”的小河，最早的聚落就在这条小河旁形成，以后成为上海镇、上海县，并为新兴的上海市所沿用。

在上海已故的历史学家中，谭其骧是唯一一位“两栖”人物：他当然是一位历史学家，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首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代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担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长，并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虽然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二十年代在



谭其骧先生

上海上大学，四十年代在上海当大学教授，1951 年起定居上海，直到 1992 年去世，前后在上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一、差一点成了职业革命家

谭其骧，字季龙，浙江嘉兴人。谭氏定居嘉兴数百年，到明、清时已子孙繁衍，到晚清时更因从商致富，蔚为大族，所以潘光旦在《明清时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已将谭氏列入。但盛极而衰，谭其骧祖父虽中过举人，家道却日益凋蔽。清末废科举，谭其骧的祖父与父亲都东渡日本。——1911 年 2 月 25 日，谭其骧出生在奉天（今沈阳）皇姑屯车站站长宿舍。不过第二年谭新嘉就因病去职南归，谭其骧的童年还是在嘉兴家中和海盐姑母家中度过的。

或许是受到“五四”运动后席卷江南的新潮的影响，或许谭其骧家庭中本来就有旧学与新知并重的传统，或许他的父亲给了儿子过多的自由选择——直到谭其骧读大学时他还不知道儿子学的是什么专业，在读中学时谭其骧就产生了一种革命倾向。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帝高潮。离上海不远的嘉兴很快受到影响，在一向平静的秀州中学里，开始出现反对学校当局的言行。当时，谭其骧的大哥其玉在上海工厂当职员，常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带回家中，使

他从这些刊物中接触到了革命思潮，更激起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恨。1926 年夏，在高二下学期即将结束时，为了抗议学校对学生的压制，谭其骧和班里一些同学同盟退学。后来有的同学在学校和家长的劝诱胁迫下复学了，但谭其骧和另外几位同学仍坚持退学，就此结束了中学生活。由于多次跳级，已经读到高二的谭其骧还不满十五岁。

当时谭家经济相当窘迫，谭其骧退学后，正好上海一家无线电公司招收练习生，家中就要他去报考，但他对无线电毫无兴趣，就故意不认真考试，结果自然没有被录取。他不愿再上其他中学，就到上海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靠谭氏宗族义庄的补助和亲戚的资助凑足了学杂费和伙食费。

上海大学由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创办，是当时上海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堡垒，也是共产党人培养进步青年的基地。当时上海大学已在郊区江湾建新校舍，临时校舍和学生宿舍则还分散设在闸北青云路宝山路口的几幢民房里。主持校务的是陈望道，教授主要有李季、施复亮（存统）、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曾经担任过教授的瞿秋白等已经离校。上海大学有共产党和共青团（CY）组织，谭其骧进校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除了开会、讨论等活动外，共青团员经常在闸北一带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马路上和茶馆中向群众演说。孙传芳的“大刀队”不时出没，团员们得随时注意，一有动静就散入小路，或从弄堂中溜走。

1927 年春新学期开学，学校迁至江湾，但北伐军已逼近上海，时局紧张，没有开课。谭其骧和同学们成了职业革命家，天天在闸北街头作宣传。3 月 21 日，上海工人配合北伐军，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大学同学跟随队伍呐喊助威，并参加救护伤员。在攻打北火车站时，一位指挥员让谭其骧随同，临时发给他手枪一支，但到达不久车站就

已攻克，他的手枪还没有使用就交回了。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谭其骧和同学们又多次参加群众大会，他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振奋之中，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对即将到来的反革命风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每年清明，谭氏合族老小都要去杭州扫墓，往返费用和在杭州的食宿都是由义庄负担的。谭其骧舍不得放弃这个免费游玩杭州的机会，作为一名普通团员他也不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就在4月初向团组织请假去了杭州。他和家人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归途中又在家乡嘉兴停留了几天，回到上海已是四一二政变以后，上海大学已被蒋介石当局封闭。谭其骧从学校取出行李寄存在大哥处，带上随身用具，过上了革命流浪生活。为了与组织保持联系，也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他们几乎每天换一个住处。最后，他和一位姓康的宁波籍同学住进了一位负责同志租的公寓，这位负责同志因风声很紧已在事先撤离。两三天后的黎明时分，一伙拿着手枪的便衣闯进屋来，当发现他们要逮捕的人已经不在时，就抓走了谭其骧和康某。他们被押送到设在引翔港一所停办的医院里的宪兵司令部，分别囚禁，被提审了几次。由于所有的文件事先都已销毁，敌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们又不是搜捕的对象，所以每次提审时只是恐吓诱骗。他俩自然不会上当，一口咬定是因为学校被封，没有住的地方，才住到那人的空房中去的。一星期后，同学陈广云得到他们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了谭其骧的大嫂。大哥闻讯后赶到宪兵司令部营救，经办人大概觉得这两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油水，在收了一百块钱后就同意保释。

出狱后，康某回了宁波，谭其骧暂住在曹家渡他大哥的工厂里。他两次到闸北寻找组织，但所有认识的同志都已转移，没有得到什么线索。这时，家里得知他的消息，来信催他立即回嘉兴。在上海没有工作，大哥厂里也不便久住，他只得返回故乡。

两星期后就到了暑假，谭其骧决定重新报考大学，结果考上了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他之所以选择暨南，是考虑到自己高中少读了一年多，大学一年又没有上过多少课，要考名牌大学把握不大，而暨南大学虽是国立，却以招收归国华侨子弟为主，录取要求相对较低。

开学到暨南大学报到后，谭其骧仍然没有放弃与组织接上关系的念头。有一次偶然打听到上海大学一位同学的地址，他估计此人与组织有联系，就给他写了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个月下来，连熟人都遇不到一个，他绝望了，给短暂的革命生活划上了句号，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二、师生之争引上治学之路

脱离了革命活动的谭其骧思想依然激进，对新文学充满热情，发表过小说，所以很快得到系主任夏丏尊的赏识，还带谭其骧和几位同学与鲁迅作过座谈。但半年后开学，夏丏尊因故去职，中文系主任换了陈鍾凡。陈鍾凡是崇尚旧学的，擅写古文，请来的教授也比较守旧，上课都讲旧学，深为谭其骧所厌恶。于是他串连了班上同学，联名上书校长郑洪年，要求撤换“顽固派”陈鍾凡，还在饭厅前张贴壁报。校方自然不为所动，他们换来的只是教务长的召见和一顿训斥，系主任依然是陈鍾凡。

于是，谭其骧再也不愿在中文系读下去了，好在学校允许转系，他就转入了外文系。外文系主任是叶公超（崇智），加上当时普遍重视外文，在一般人看来，能转入外文系自然是幸运的。谁知才上了两星期课，谭其骧又转系了。

原来学校新成立了历史社会系，贴出布告招生。不过这一次他却

寝食不安地思考了好几天，究竟要不要转？当时不少人对他的转系打算不以为然，劝他慎重考虑，最后他还是决定转入历史社会系，主修历史，兼修社会学。他的选择是认真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历史社会系第一任主任是黄凌霜，几个月后就由陈憬代理，以后又换了许德珩(楚生)，教师有孙本文、邓初民、潘光旦、周传儒、王庸(以中)、徐中舒、方壮猷等人。陈憬教中国古代史，传播的是当时风靡一时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观点，使谭其骧感到很新鲜，对顾颉刚十分向往。陈憬还经常邀谭其骧去他家，谈疑古学派，谈做学问的方法。在他的鼓励下，谭其骧开始翻线装书，他到福州路买书时也逐渐转而选购史学书籍了。徐中舒、王庸、方壮猷都出身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深受王国维、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和学风的熏陶，他们的课又使谭其骧受到考据方法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训练。

另一位对谭其骧有重要影响的教师是潘光旦。潘光旦是著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他开的两门课——社会学基础和种族问题，谭其骧都选了。潘光旦讲课非常动听，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尽管谭其骧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优生学理论，对他的很多见解却完全赞同，并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求教，潘光旦也很乐意作指点和讨论。他们讨论的范围很广，如有移民问题、血统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同化、江南的宗族、一些民族和地方人口的来源等。虽然限于谭其骧当时的知识，这些讨论不可能很深入，但给谭其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他一些重要论文的观点就是在这些讨论的启发下产生的。谭其骧将一套《谭氏宗谱》送给潘光旦，成为潘光旦写《明清嘉兴的望族》一书的资料来源之一。谭其骧的毕业论文就以《中国移民史要》为题，由潘光旦指导完成，并得到潘的激赏。

到1930年夏，谭其骧已修满学分，完成毕业论文，提前毕业，他在暨南大学实际只读了两年。毕业时的谭其骧已经选定了治学的目标，决定到故都北平攻读史学。陈憬将他推荐给燕京大学研究院。燕京研究院录取研究生不通过考试，只审查大学成绩单和推荐书，谭其骧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在9月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1931年9月，顾颉刚新开"《尚书》研究"，谭其骧因学分已满，是三位旁听生之一。顾颉刚当时正准备作《王制考》，所以准备将《尚书》一篇篇地教读，编了《尚书研究讲义》两册，但只是他计划写的讲义的三分之一。讲义的第二册包括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尧典》著作之时代"。顾颉刚认为《尚书·尧典》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主要的证据就是《尧典》中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的只有九分制（分为九州），却没有十二分制（分为十二州），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是以某州为名，自此才有十二州之名，所以《尧典》中所载十二州应是汉武帝时的制度。

谭其骧在读了这段讲义后，又把《汉书·地理志》仔细翻阅了一遍，觉得顾颉刚在讲义中所列举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汉时的制度，而是东汉的制度。一天下课，他就向顾颉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听到学生的不同意见后，顾颉刚非常高兴，鼓励他写成书面。原来谭其骧只是想口头说一下，由于老师要他写成书面意见，促使他又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结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在10月2日将三点意见写成一封信。

在信的一开始，谭其骧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先生《尚书研究讲义》中所列之十三部，非西汉之十三部（不但非武帝时之制，亦且非平帝时之制），兹已证实。"并列举了三条理由。他建议，"先生所谓'《尧典》之十二州系袭诸汉武之制'一义应有所改正"。不过他认为，"推翻此

点，殊无伤于全文之大旨；不但无伤，且益可证实之”。因为西汉虽抚有朔方、交趾而不设州，与《尧典》中所载尧抚有朔方、南交之地而不设州是一致的。至于西汉实际只有十一州，《尧典》却要凑成十二州，是因为作者有意要凑成“天之大数”的缘故。

在收到谭其骧来信的当天，顾颉刚就复了一封五千多字的长信，首先肯定了他的努力：“西汉的十三州久已成为一个谜，现在经你这样一整理，觉得大有弄清楚的可能了。”接着又详细讨论了与意见有关的史料，在学术问题上，师生之间没有什么客气了。

在作了详细论证后，顾颉刚的结论是，赞成他的三点意见，即：(1)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内无司隶校尉一部；(2)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内有朔方刺史部，不属并州；(3)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内有交趾刺史部，不称交州。不赞成他另外三点：(1)朔方刺史部与并州刺史部同时存在；(2)朔方郡属并州，朔方刺史部分自雍州，两不相关；(3)交州之名始于东汉建安八年。认为取得了三点收获，另有两点只能存疑。根据这些意见，顾颉刚重新排列出汉武帝所立之十三州、王莽所更定之十三州和光武帝所列之十三州，“不知尊见以为如何，敬待商榷”。最后他又鼓励谭其骧继续努力钻研：“但我们不要怕，只要肯找，总有新材料可以发现！”

这封回信进一步激发了谭其骧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以后果然找到了新材料，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信，对被顾颉刚反对的三点提出异议，认为顾先生的三点收获应有所改正，但仍有两点不明白。

在认真研究后，顾颉刚于 10 月 24 日再次复信，表示对谭其骧的来信“佩甚”。“你既寻出了朱博在成帝绥和元年前曾为并州刺史，又寻出了翟方进在成帝世曾为朔方刺史，那么，并州自是先于王莽的更定州名而存在，且确是与朔方刺史部同时存在”。接着顾颉刚主动为谭其骧提供了一条证据，即根据扬雄《益州箴》的内容，“益州确是梁州

所扩大的而不是与梁州并峙的”，益州不与梁州同时存在，“证明我上次猜测的失败”。“并州既与朔方刺史部同时存在，益州又不与梁州同时存在，则武帝所设的十三部刺史的事实可定，且足证明《汉书·地理志》叙论中的话是不错的”。随后他考定了十三部的具体名称和来源。但顾颉刚不赞成谭其骧对交趾改交州时间的结论，也不同意朔方与并州合并是在光武帝时而不是王莽时代。

尽管还有不同意见，顾颉刚认为主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不仅如此虚心地接受了学生的意见，还将往返讨论的这四封信加上附说，作为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

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其骧此后六十二年的学术方向，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五十年后，谭其骧还在发表这些信件的《后记》中深情地忆及往事：

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地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他不仅对我这个讨论对手承认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错误的，并且还要在通信结束之后把来往信件全部印发给全班同学，公诸于众，这又是何等宽宏博大的胸襟！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才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努力深入钻研下去，勇于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见解，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顾先生后来之所以会写出《两汉州制考》这篇名著，我的这两封信当然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当年这场讨论，不仅像顾先生在附记里所说的那样把一个二千年来多少学者没搞清楚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还有一点顾先生没

有提到而同样很重要的，那就是：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这对于我后来能够在大学里当一名还算称职的教师，在学术上多少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三、既开风气亦为师

燕京研究院的学制是两年，谭其骧完成答辩时离毕业还有一个学期，按燕京大学的规定虽不能提前毕业，却可以离校工作。他的从伯父谭新嘉（志贤）先生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元老，时任中文编目组组长。经新嘉先生向馆长袁同礼（守和）推荐，谭其骧于 1932 年初被录用为馆员，负责汇编馆藏方志目录。

就在谭其骧到北平图书馆报到上班后一星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登上了大学讲台。当时在辅仁大学教中国地理沿革史的是柯昌泗（燕舲），就在春季开学前不久，却突然因家庭纠纷不辞而别。这门课是一学年的，不能就此停上，辅仁大学代校长沈兼士十分焦急，只得四处找人代课，邓之诚先生极力举荐谭其骧应聘。沈兼士对初出茅庐的谭其骧自然一无所知，但一则是邓之诚的面子，二则临时实在找不到代课教师，只能同意一试。一学期后，学生对谭其骧的课相当满意，辅仁大学就续聘下去了，结果连续上了三个班。当时谭其骧刚满二十一岁，而这门课是为高年级开的，学生中不乏比他年长的，仗着初生之犊的锐气，他以严密的条理、充实的内容和洪亮的声音使学生折服。正巧谭其骧在燕京结识的好友周一良在上一年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是一年级学生，他觉得沿革地理重要，谭其骧也希望他来听课，以便作为"坐探"了解学生的反映。因此周一良放弃了必修的谌亚达先生的

"中国地理概论",成为谭其骧课堂中的一名学生,使他能不断根据学生们的要求改进教学。第二年听他课的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山西平陆的史念海(筱苏),比谭其骧小一岁,他大学毕业不久就成为禹贡学会的驻会研究人员,解放后长期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曾任副校长,现为该校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辅仁大学的课每周才两个钟点(两节),第二年邓之诚先生又向燕京推荐,让谭其骧在燕京兼同样的课。在燕京听课的学生中有侯仁之、张家驹,侯仁之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以后又赴英国留学,归国后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家驹六十年代曾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是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文革"中病逝。1934年8月顾颉刚先生因继母在杭州逝世,奔丧南归,请假数月,开学后顾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兼任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委托他代上。当年11月底顾先生回到北平,但仍由他将这一班的课上完。当时北大规定选课满五人的课才能开,顾颉刚为了保证谭其骧能开课,特别动员了高年级学生杨向奎(拱辰)选这门课。谭其骧还在辅仁大学上过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也是代邓之诚先生上的,因为邓先生的家已从城里搬到了燕京大学,那年他身体不好,不愿再城里城外来回奔波。

1934年2月4日,顾颉刚约谭其骧在他寓所附近的斌泰饭店吃饭,席间邀他共同发起筹组一个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学会,商定以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描述全国自然、人文地理的著作——《禹贡》作为名称,还决定创办《禹贡》半月刊,作为未来学会的机关刊物。当时,他们正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所以准备以三校学生为基本成员,并以学生们的习作为主

要稿源。

学会的筹备处和刊物的编辑部就设在燕京大学旁成府蒋家胡同3号顾颉刚家中，全部人员就是他和谭其骧这两位主编，由顾的女儿顾自明担任刊物的发行人。经费主要靠顾、谭月捐二十元，有时捐四十元维持；一部分来自会费：他们广泛邀约班上的学生及平、津、沪、宁、杭、穗等地的熟人参加学会，普通会员每月收会费一元，学生会员收五角。刊物不设稿酬，写稿、审稿、编辑和全部工作都是义务的。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禹贡》半月刊的创刊号在3月1日问世，16开本，连封面、封底在内二十四页。此后基本每半月正常出版，到当年8月已出了十二期，约四十万字，每期的发行量也增加到数千册。那时，顾颉刚对谭其骧的才华和能力都极为赞赏，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他对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问他有几县，县名什么，位置怎样，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对于地理沿革史，夙有兴趣，且眼光亦甚锐利，看《禹贡》半月刊、《史学年报》、《燕京学报》诸刊物所载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今年我所以敢办《禹贡》半月刊，就为有了他，否则我一个人是吃不住的。"

《禹贡》的第一、二期是由顾颉刚编的，第三期由谭其骧编。他毕竟缺乏编杂志的经验，稿子排出来后是二十六页半，装印不便，临时由顾颉刚补了三个短篇和校记，凑满三十二页。8月中旬，顾先生因母丧南归，请假期间《禹贡》的编务及燕京、北大的课程均由谭其骧负责。11月底，顾先生回北平。次年1月底至5月初，顾先生南归度假及葬母，谭其骧单独编了《禹贡》第三卷第一至五期。

在离平前的1935年1月8日，顾颉刚向谭其骧提出合编一本中国地理沿革史，谭答应先试写一部分。但顾颉刚到上海后即与商务印

书馆签订了出版《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合同，希望尽快写出，致函催促谭其骧。谭其骧复函顾颉刚，答应不久将先寄出一部分。虽然谭其骧已经开了三年的中国地理沿革史课，又写过一些专题论文，但动笔后却发现写沿革史并非如此简单；加上独自编《禹贡》和负责三校的课程，深感力不从心，《禹贡》第三卷第一期也迟出了一星期。3 月 6 日，顾颉刚得知后十分不满。次日他向谭发出一函，除催促沿革史外，又提出《禹贡》务必不能脱期，信中对谭颇有责难。13 日，顾颉刚收到第一期《禹贡》，又生"才难"之叹。正在此时，谭其骧的回信也到，针对顾的诘难诉说了自己积郁已久的烦闷，谈到"自己不能安心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文章，不能好好儿看一点不为做文章而看的书"。

3 月 18 日，顾颉刚给谭其骧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告诉他《沿革史》"书肆之约已定，不可愆期"，"请将大作已成者及其他必要之参考书"寄来，"当急遽写成，寄沪而后回平也"。接着又就谭对自己烦闷和繁忙的诉说，谈了他的看法："这个愁闷不是某人某人加给你的，乃是这时代、这国家加给你的。""兄之忙，从表面看来都是我给你的，……但你须知道，……乃是我想帮助你"。他力劝谭应面对现实，"最苦的一件事，就是做了现代的中国人，无论你学问怎样好，无论你将来的学问可有多大的成就，而依然不能不顾生计问题，依然不能不受生计问题的压迫"。"所以，你固然忙得没办法，但这忙是在社会上奋斗所不得不经过的难关；而且这忙的性质是一贯的，并不是乱忙。……所以，我劝你尚友古人固是要'论世'，评论今人和为自己计划也应'论世'。须知今日决不是乾嘉承平之世，……我们的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过，乃是受了时势的压迫，不得不然。只要我们不存心欺世，发见了自己的错误就肯改正，那就对得起这时代。若一味希望'水到渠成'的作品，这仿佛责乞儿以鱼翅席，得无望之太奢

乎!"

顾颉刚说:"我深知和你性情学问有很不同之点。龚定庵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拿适之先生的话来说,开风气者是敢作大胆的假设的,而为师者是能作小心的考证的。这两种精神固然最好合于一个,但各人的才性不同,不得不有所偏畸。我是偏于开风气,你是偏于为师,这是没法强同的事情;但正有此不同,故得彼此救蔽。这半月刊由我们二人办,以你的郑重合上我的勇往,以相反而相成,事就做得好。……不幸你不甚热心,弄得偏重到我的肩上。"

对《禹贡》的办刊方针和方法,顾颉刚重申了他的看法:"我说《食货》篇幅多,《禹贡》不应少,为的是有了比较。你说东西好坏在质不在量,不必计较这个。你的话固然很对,但你的经验实在不够。试问懂得质的美恶的,世上能有几个? 大多数人是只懂得量的多少而已。你将说,办这刊物何须取悦于大多数人! 学问之道何必妥洽于一班庸众! 话说得自然对,但试问《禹贡》半月刊的基础建设在哪里? 如果定户与零售减少,我们能不能存在?"

但顾颉刚的信并没有说服谭其骧,他于 23 日复信,说本来没有能力编辑《禹贡》,也不可能在短期间内写出一部沿革史,所以勉强从事只是遵顾先生之命;对顾的其他批评也申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顾颉刚在 28 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长信,对"中国知识阶级的不济事"大发感慨,联系到自己参预过的新潮社、朴社、景山书社、技术观摩社等都不能善终,感到"真是使我伤心极了",说"中国人为什么竟不能合作? 我为什么永远找不到一个合作的伴侣"? 又谈到他之所以要个人出版《禹贡》,而不在一个机关,是因为以前在北大编《歌谣周刊》和《国学周刊》,在广州中山大学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都是人一走就烟消云散,"我办《禹贡》,就是要避免机关中的厄运,让

我用一个人的能力维持下去"。他表示下学年决计不离开北平,把《禹贡》办下去。"但是这个刊物,终究有一半为了你而创办的",所以,他与谭约定,"此后你应当担负下列两个责任:1. 你常做小篇的考据文章。2. 凡属于汉以后的沿革文字,我把排样寄给你看;如有大笑话,请你改后寄我,免得又有'唐三十六道'等语句出现。此外都由我来做,好吗?"

顾颉刚认为他们的分歧之一,是创办刊物的胸怀太不相同。其次是治学方法的差异:"现在研究学问,已不是一个人目不窥园可以独立成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个人编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而实际上是无数人帮着你编。一个人精神有限,对于一种学问,无论怎样用心,必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问题。几个人一讨论,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说你不赞成编《禹贡》,试问你将来编纂沿革史时能否不看《禹贡》?"再次是工作精神的不同:"你说我的笔头快,也是当编辑的便利,这话也可商量。诚然我写字快,写议论文章也快,……但考据文字,你要查书,我也要查书;你要整理材料,我也要整理材料;彼此便没有大差异。实告诉你,我的作文是拼了命的。"他告诫谭:"你如不欲解决生计问题则已,如果打不破这现实的需要,而犹欲解决之,那么,照你这样慢吞吞地干去是不成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性,我固然决不该希望谭季龙也成了顾颉刚,作同样的艰苦奋斗;但至少也须把精神紧张起来,才可在社会上打出一个自己的地位。"

1935 年 5 月初顾颉刚回北平,《禹贡》从第六期起仍由他主编,谭协助。至暑假,谭其骧决定应广州学海书院之聘,正式向顾颉刚辞去《禹贡》编务和学会事务。顾无法挽留,心中却十分惋惜和遗憾,在谭其骧向他辞行的当天又在日记上写下了"才难"之感。《禹贡》改由顾颉刚和冯家升主编。

促使谭其骧离开北京既有经济因素，学海书院的薪水相当于北平的教授；也有其他老师的作用，他们都认为谭其骧留在燕京缺乏前途。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与顾颉刚在治学、处世、为人方面的歧见。顾颉刚在信中将自己称为“开风气”者，而把谭当作“为师”者，实在是一语中的。如果真能做到“以你的郑重合上我的勇往，以相反而相成”，无疑是最佳组合；但实际上却办不到。

不过顾、谭都不愧为“和而不同”的君子，事情过后都不再提及。谭其骧离开北平后，遵守对顾的诺言，继续为《禹贡》撰文审稿，《禹贡》也不时刊出他的文章来信。1936 年 5 月 24 日禹贡学会在燕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的七位理事中就有正在广州的谭其骧（其余六位为顾颉刚、钱穆、冯家升、唐兰、王庸、徐炳昶）。当年夏天，陈济棠反蒋介石失败下台，学海书院被封，顾颉刚在为历史系向校长司徒雷登争取到五千元追加款后就聘请谭其骧为兼任讲师，谭其骧回北平后也还是学会积极的一员。1953 年顾颉刚与章巽合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后，特请谭其骧审校。1979 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筹备出版《历史地理》丛刊时，谭其骧任主编，顾颉刚是两位顾问之一。总之，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和朋友的情谊。

四、奠定里程碑——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北平，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还能保持正常的教学。加上家庭负担无法离开，谭其骧只能暂留北平。但到了 1940 年下半年，日伪活动日益猖獗，伪“新民学院”多次试图拉谭其骧任教。北平非久留之地，谭其骧于 1941 年初经天津、上海、香港、河内、昆明，至内迁于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

教授，次年升为教授。1946 年，他随浙大复员回到杭州。1948 年因物价飞涨，家庭生活无法维持，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解放后，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于 1951 年至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1954 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与吴晗坐在一起。他们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毛泽东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又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都找不到。这种图只能对付看作中小学教学之用，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详细的史书时的要求。

吴晗想起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编绘过《历代舆地图》，内容相当详细，凡见于正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不过杨守敬的地图是以木版将分别代表古、今内容的黑、红两色套印在连史纸上，是有三十四册之多的线装本。而且是将一朝版图分割成几十块，按自东而西、自北而南的次序排列的，翻检起来极为不便。再者，杨守敬地图上的"今"是清同治初年胡林翼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许多州县的名称、治所已不同于五十年代的"今"了，必定也会给读者带来许多麻烦。因此，他向毛泽东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该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加以改造，改用现时的地图为底图，绘制、印刷和装订都采用现代技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毛泽东赞成吴晗的建议，就把这两件事都交给他负责办理。

会后吴晗就找了范文澜、尹达等商议，决定请谭其骧来北京主持编绘工作，并初步制订了计划。吴晗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给吴晗写了回信，表示同意他的计划，“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由于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很快结束，而改编“杨图”工作既需延长又有扩大，委员会也改名“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

1954 年底的一天，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亲自来到谭其骧的寓所，告诉他高教部下令借调他去北京编绘历史地图，为期一年，春节后即赴京报到。此前没有任何人向他透露过风声，所以他既感兴奋又觉突然。但编绘一部中国历代沿革地图不仅是当年禹贡学会未竟的事业，也是谭其骧的夙愿。在遵义浙江大学期间，他曾着手编绘，系主任张其昀也相当重视，校方为他配备了助手，但他能用以编绘的时间有限，资料的收集也异常困难，仅画成了二三十幅，只能用红黑二色印在土纸上。现在有此良机，自然欣然从命。1955 年 2 月 11 日，谭其骧乘火车去北京，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党委副书记王零、党委统战委员王中等在校门口欢送，说明谭其骧此行实系重大政治任务。

到北京后稍事安顿，谭其骧就开始了西汉敦煌和河西走廊水道、清朝图的编绘，以便试验不同时代和内容使用的方法，估计工作量。实际上，除了吴晗与范文澜外，“杨图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只是在开会时发表意见，而吴晗身为北京市副市长，还有大量社会兼职，难以分身，范文澜也只在与有关方面沟通时起作用，所以对谭其骧的方案和设想都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在首次会议上，对将“杨图”改到什么程度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直接向毛主席领受任务的吴晗倾向于比较简单的方法，以便尽早完成，而谭其骧认为应保证质量，主张改用当今地图古今对照的底图。不久发现底图非改不可，委员会同意了谭其骧的

方案。

原来以为花一两年的时间就能完成改编，进行后才发现根本不可能。这不仅是因为“杨图”的错漏比想像的要多，更主要的是“杨图”只画中原王朝，甚至连中原王朝的疆域也没有画全；“杨图”只画到明朝，清朝的地图必须新编；“杨图”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改用新底图后绝大部分点线都得重新确定；任何一项工作都得花费巨大的工作量。

转眼已近一年，复旦开始催谭其骧如期回去。北京方面好不容易争取到让谭其骧延长一年，但结束遥遥无期。吴晗怕谭其骧返回复旦后无法集中精力编图，就与竺可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动用了不少关系，想将谭其骧调入中国科学院。但高教部和复旦大学都不同意，于是商定由复旦提供条件，保证谭其骧返回后继续主持这项工作。

1957 年 1 月 13 日，谭其骧回到上海，次日就着手安排工作，学校专门组织配备了研究和辅助人员。尽管谭其骧、章巽、吴应寿、王文楚、邹逸麟和三位绘图员全力以赴，但不出吴晗等所料，谭其骧一回学校就身不由己了。当然也有吴晗等意料不到的事，那就是不久就开始的整风反右和接踵而来的大小运动。

1959 年 1 月的“杨图委员会”会议决定彻底改变“杨图”的旧体系，到 1960 年 6 月又决定扩展原来的计划，将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和边疆政权也包括进来。至此，“重编改绘”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编一套足以显示历史时期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全部疆域政区的历史地图集了。

从 1958 年开始，一批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本科毕业生、青年教师陆续参加，1959 年在历史系成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到 1966 年“文革”前，历史地理研究室已有教学、研究和辅助人员

装 订 线

第＿＿＿＿页

[illegible]同学：来函收悉，答复如下：

[illegible]

单位：＿＿＿＿＿＿

定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稿纸 20×15=300

谭其骧手迹

三十多人，成为国内最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随着范围的扩大和工作量的增加，中国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武汉测绘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先后加入，最多时人员上百，临时参与审稿、讨论的人更多。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主编，谭其骧在学术上承担的责任和工作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1963年1月，“杨图委员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会，由于争论激烈无法分身，尽管谭其骧知道住在离饭店不远的母亲已经病危，却没有能再见上一面。

1965年7月，“文革”前最后一次、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杨图工作会议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数十位一流的专家参加了已完成编稿的审定。8月11日会议结束，确定了到1967年底完成全部编稿的目标。但几个月后，“文革”序幕拉开，吴晗首当其冲。不到一年，“文革”全面爆发，编图工作全面停顿，吴晗、尹达、谭其骧和杨图委员会全部成员，都毫无例外地遭受批斗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但编图工作毕竟是毛主席交办的，所以得以在1969年5月恢复。此时的谭其骧只是一位刚被解放出来、“一批二用”的反动学术权威，尽管很多方面还不得不依靠他制订方案、解决难题和最后把关，却一次次地将他当作批判的靶子。更使谭其骧为难的是，盛行的极“左”思潮已渗透至学术领域，不仅当时的领导一切从“政治”出发，就连一部分同事也深受毒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一味强调为现实服务。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人都噤若寒蝉，谨小慎微。

实际上，大部分图稿到“文革”前夕已经完成，复工后虽然作了不少补充，却也增加了很多新的错误，甚至造成了至今无法消除的创伤。例如，原来已经着手编绘的首都城市图和一些首都城郊插图被扣上“突出帝王将相”的罪名而被删除，唐大中时期图组被取消，东晋十六

国图、南朝宋梁陈图、北朝东西魏和北齐周图、五代十国图都被简化为只画州郡而不画县治，还删去了不少民族注记和县级以下地名。为了显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一些全国总图还故意混淆标准年代，将不同年分的最大范围拼在一起，凑成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极盛疆域”。

《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初稿完成于 1974 年，后陆续以“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内部发行，作者一栏署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 1980 年决定对内部本进行修订后公开出版。从提出方案到主持修订，谭其骧又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而此时他已年过七十，又因患脑血栓而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谭其骧提出了尊重历史事实、恢复历史真相的修订方案。如他认为，为了充分体现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精神，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应该显示它们的最大疆域，所以他增加了一幅公元 920 年吐蕃图。有关部门和同仁或心有余悸，或习惯于旧的思想方法，但他的方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准，使他深受鼓舞。《图集》自 1982 年起分册出版，至 1988 年出齐。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谭其骧最杰出的贡献。

这部空前巨著共八册、二十个图组、三百零四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七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上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

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至今还是国内外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谭其骧清醒地认识到，这部地图集还只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历史地图集，还不足于全面显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各分支的要素，充分反映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从 198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持下，他又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关注这一项目的进展。可以告慰他的是，《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第一卷将在不久出版，其他两卷也将陆续出版，这部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战争、地貌、气候、灾害、植被等图组一千多幅地图的国家级历史地图集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一个新的里程碑。

五、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

谭其骧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是从沿革地理入手的，但早在 1935 年，顾颉刚与他所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就开始以 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作为该刊的英译名称。从 1942 年起，他就在浙江大学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使他从沿革地理走向历史地理学，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疆域政区是沿革地理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谭其骧就对历代疆域政区作过较全面的研究，发表过《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新莽职方考》等重要论文。但对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探索和综合研究，还是从 1955 年开始的。从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起，如何理解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就成了谭其骧和同事们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提



谭其骧在工作

出过一些自己的想法。经过长期、反复的讨论和实践，最终确定的原则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确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对中原王朝超出这一范围的疆域，也保持其完整性。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谭其骧就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对这一原则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中国的边界决不能仅仅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仅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华民族的各族共同建设的，就是历史时期的中国，也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把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祖先都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员，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政权。谭其骧这一理论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确定了重要的原则，也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确定了空间范围。

长期的深入研究，使谭其骧对中国历史政区演变的内在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归纳出的三个主要方面是：1. 同一种政区，通例都是越划越多，越划越小；到一定程度，它的级别就会降低；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开发的结果，但也有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因素。2. 汉武帝后二级制就已不适应需要，多级制又不利于政令民情的上下传达，所以二千年来最常用的是三级制，但有时采用虚三级制，有时用实三级制，民国以来的三个阶段则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虚三级制。3. 历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往往由吏治监察区或军务管理区转变而来，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往往由派遣在外的中央官转变而来。他认为政区的这些演变规律，一方面正好说明了中国自秦汉以来长期在中央集权制统治之下，所以中央的使者能以监督的名义侵夺地方官的权力，终于使中央使者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原来的地方长官降而成为他的下级或僚属。但另一方面，因为由这种方式形成的一级政区辖境、权力过大，所以一到乱世，这种政区的首长很容易成为破坏统一的割据者，犹如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唐安史乱后的节度使和民国的督军、省主席。

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谭其骧一直关注着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改革。他认为，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是二千多年来中央集权制度下长期演变发展的产物，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或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必要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做划定省、区界线的工作，不如下决心调整省、区的设置，理顺省、县两级政区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89 年 12 月，他在中国行政区划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设想》的报告。他的建议主要包括：调

整现行政区的名称，避免不同等级的政区使用同一名称，如市、区等。划小省区界，将省级政区调整增加至五十个，每个平均辖四十七个市县；在此基础上取消虚三级制（省、地或市、县），实行二级制（省、县）。

还在涉足历史地理之初，谭其骧就注意到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黄河下游水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不仅是政区沿革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个历史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要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各种自然因素演变的规律，只依靠文献资料和历史学手段的传统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

1955 年，在为一次有关黄河与运河的学术报告的准备过程中，谭其骧把黄河有史以来的变迁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的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后期却决徙频仍，害多于利。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塞。但同时他也发现，黄河的灾害不是一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前期的灾害虽然比后期少，但在前期本身范围内，灾害也不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过去研究黄河史的学者，习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势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这也与史实不符。乱世未必多灾，治世却常常有决溢泛滥。归之于治理工程的成败更不可思议，难道数千年来工程技术是在退步吗？元明清时的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治河工程难道反而不如东汉的王景和传说中的大禹吗？对于这些矛盾，当时他还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

1957 年，在编绘西汉河北地区的地图时，谭其骧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西汉河北水道的画法不符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又可以证明《说文》、《水经》中有关部分存在错误。将这些史料综合分析，可见西汉时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分

流入海的，还没有像以后那样合流于今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直到公元三世纪初曹操开白沟和平虏渠以后，才逐渐使各条河的下流淤塞，合流入海。在当年复旦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会上，他将这一探索成果在历史系作了一次题为《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报告。此后他一直没有时间将提纲写成论文，直到1984年才写成《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载《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但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广泛运用，治理海河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人工开凿的水道将海河水系由众水合流入海变为分流入海。

谭其骧对黄河变迁史的探索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找到了新的答案。他从导致黄河决溢改道的地理环境着手，肯定泥沙淤积是关键因素，而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是中游泾、渭、北洛河水系流域的黄土高原。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植被保存的好坏会使水土流失量相当悬殊，因此当地人民土地利用的方式是影响水土流失以至黄河灾情的主要因素。从历史事实看，秦汉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河地区人民还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手段，原始植被未受破坏，水土流失轻微。秦始皇、汉武帝大规模向西北边郡移民的结果，导致该地区不合理的开发，牧地、荒地辟为农田，引起水土严重流失。东汉以后，以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逐渐迁入该地区，经营农业的汉人日益减少以至基本退出。此后几个世纪中，该地区重新成为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显然，这才是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发表于1962年第3期《学术月刊》的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这一研究成果。

1973年起，谭其骧承担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编撰任务。除了拟出黄河、长江演变的大纲外，他还在长江中游、黄

河中下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察。这使他对长江、黄河的变迁增加了大量感性认识，特别是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造成的影响所作的实地调查使他对黄河变迁规律的认识产生了升华，最终构成了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名作，这是谭其骧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西汉以前的文献记载极少，古今学者讲西汉前的黄河故道，都只知道见于《尚书·禹贡》记载的那一条，都没有注意到在《山海经》中还隐藏着相当丰富的有关黄河下游河道的具体资料。1975 年，谭其骧在研究先秦时代黄河下游河道的位置时，发现在《山经·北次山经》中记录了数十条黄河下游的支流。与《汉书·地理志》、《水经》及《水经注》中所载的河北水道作比较，这些支流的终点、即它们流入黄河的地点不同于后世，所以只要将这些支流的终点连接起来，就可以钩稽出一条径流确凿、远比《禹贡》河水详确的古河道，这就证明了西汉以前的黄河水道绝不止《禹贡》中记载的这一条。

谭其骧进而考虑另一个重大课题：西汉以前的黄河河道是不是只有已知的几条，也就是说，在西汉以前黄河究竟改道过了多少次？前人只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汉以前只发生过一次改道，从东汉的班固、北魏的郦道元、南宋的程大昌，到清代的阎若璩、胡渭都是如此。另一种是认为《周谱》的记载不可信，汉以前黄河根本没有改过道，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清代学者焦循所著《〈禹贡〉郑注释》，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一文更进一步提出，见于《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道。

谭其骧认为，从黄河下游的地形特征分析，黄河在汉以前不可能不改道，《周谱》中的记载只是很多次改道中偶然被保留下来的一次，

以上两种看法都不正确。他把目光转向考古发现，果然找到了新的论据。因为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春秋时期，河北平原中部始终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其间既没有发现过有关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城邑聚落的可靠记载。这片空白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消失。谭其骧指出：由于这片空白正是河北平原相对低平的地区，在战国中期黄河筑堤之前水道经常在这一带摆动。因为没有河堤的约束，每遇汛期，黄河不免漫溢泛滥，河床渐渐淤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改道，所以人们不会在这里定居。而在筑堤以后，经常性的泛滥和频繁的改道得到控制，两岸的土地才逐渐开发，大小居民点才会形成。因此他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一文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黄河下游在战国筑堤以前，决溢改道屡见不鲜，只是因为当时人烟稀少，黄河改道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小，因而为一般古代文献记载所不及。《汉书·地理志》所载河道始见于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并且是春秋战国时代长期存在的河道，《禹贡》、《山经》二河形成较晚，目前无法决定二者的先后。春秋战国时黄河下游可能有东（《汉书·地理志》河）、西（《禹贡》、《山经》河）二股长期并存，迭为干流，而以东股为常。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曾多次改道，但黄河经流每条河道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约公元前四世纪四十年代，齐与赵、魏各自在河的东西两岸筑堤，从此《禹贡》、《山经》河断流，专走《汉书·地理志》河，沿袭至汉代。

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张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由张修桂写成论文，他自己撰

写了《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他作出的结论是：古籍中的云梦乃是泛指一个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等多种地貌，范围也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其中一部分，位于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汉之间，与云梦游猎区不可等量齐观。先秦的云梦泽有三部分，但从战国至南朝已先后淤为平原，或被分割为更小的湖泊和陂泽。令人惊喜的是，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大量钻探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与谭其骧不谋而合，即历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梦大泽。

谭其骧对历史时期水系演变和历史地貌的研究成果，不仅开拓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而且为中国历史自然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范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谭其骧一直认为，历史人文地理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他自己早年的研究就是从政区沿革、人口迁移和民族分布等方面入手的。但从五十年代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文地理在中国大陆实际被列为禁区，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难逃厄运。

进入八十年代，尽管他依然忙于国家项目，但只要有可能，都要大力倡导、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开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特别重视研究文化的空间和时间差异，在 1986 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一文中他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理应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也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同时各个时期也都存在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甚至完全不同。在简要列举了中国文化在六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后，他着重论述了西汉中期至明代中原王朝范围内显著的地区性差异。他的结论是：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虽然儒家

学说一直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他指出，历史文化地理的重点是要研究历史时期文化区的界定和演变过程。这几年来历史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与数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无疑与他的大力倡导有关。

1990 年 11 月，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了题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在阐述了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后，谭其骧说："尽管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还是要大胆地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他觉得不能光提出问题，还应该以自己的积累，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内容，因而决定写一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将此文作为上篇，另外撰写人口、政区、文化各一部分作为下篇。但在人口部分写完后，疾病便夺去了他的工作能力，这篇未完成的文章终成广陵绝响。

谭其骧认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中国历史文献这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宝库，还要留意发掘古代学者的人文地理研究成就和人文地理学家。他早就发现了明代学者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上的贡献，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地位不在徐霞客之下。1985 年 12 月，广西桂林召开纪念徐霞客学术讨论会，谭其骧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了这位"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着重评价了王士性的代表作《广志绎》的价值。他的观点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王士性的介绍和研究已产生不少成果。

谭其骧对中国的古地图和古代地理名著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



谭其骧与他的学生周振鹤(左)、葛剑雄

就。

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汉文帝时代的帛制地图,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是长沙国西南部当时的深平防区和相邻地区的地形图。此图发现之前,中国地图史学者对西汉地图的评价只能依照西晋地图学家裴秀的说法,“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但在仔细研究了这幅古地图后,谭其骧认为裴秀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他发现这幅图的主区部分和采用现代测绘技术以前的旧图相比,决不比任何图差,“它不仅是一幅截至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地图,同时又是一幅足以显示我国制图学早在二千多年前业已达到高度科学水平的地图”。他的研究确立了这幅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古地图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理学意义,国际权威的地图学史著作已经采用了他的结论,重新评价了中国早期的制图学成就。

在我国最早的有关地理的著作中,人们对《山海经》一直评价不一。谭其骧认为对《山海经》各部分应该加于区别,其中的《山经》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叙述山川物产为主,是很有价值的地理书。但《山经》同样掺杂着诡谲荒诞的幻想和臆测,前人注释中的问题也不少,必须去伪存真,才能恢复其本来面目。任何解释都不能离开经文本身,重

要的是要具体弄清《山经》中每座山所指，相互间的实际方位和里距，因为《山经》中的二十六经，每经在首山后的第二山开始就记载了方向和里距，如能最大限度地复原出其中一部分，其地域范围就可以大致明白了。在最终完成的《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中，他在分析了其中七篇所录一百四十座可考定确址的山的基础上，推断《山经》所述的范围大致西起新疆东南，东抵山东半岛东端，北至内蒙古阴山以北，南达广东南海。他还断定《山经》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 221 年）之后、完全征服南越（公元前 214 年）之前。

在谭其骧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沿革地理逐渐向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至八十年代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理论和分支体系，取得了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为代表的重要成果，这些都离不开他的贡献。谭其骧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199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 时多，谭其骧在家中用餐时突发脑溢血从座椅上倒下。经医院抢救后暂时脱离危险，但他再也没有恢复说话、写字和走路的功能。1992 年 8 月 28 日零时 45 分，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了人生的历程。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长江口外的东海，汇入海洋，回归自然。

谭其骧主要论著

《长水集》上、下册（1981 年前主要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长水集续编》（1981 年后主要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中国历史地图集》1－8 册（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7 年
《中国历史地图集简编》（主编，图说撰写）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 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年
《长水粹编》（历史地理论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风雨八十载
——魏建猷传

周育民

一、童年和求学

魏建猷，曾用名守谟，于1909年1月20日出生在安徽巢湖畔的槐林镇小魏村的一个耕读之家。幼而聪慧，祖父十分喜爱，教以识字念书，常能过目不忘。在小魏村，魏家的家境虽说还算富裕，[①]六岁那年便送魏建猷进了私塾，但子弟稍稍长成，亦不免帮助放牛割草、放鸭捕鱼。辽阔的巢湖孕育了他宽广的胸怀；繁重的农作养成了他朴实耐劳的性格。

小魏村没有小学，离开县城又远，魏建猷直到十三岁那年才上了小学。巢湖很大，湖头向着李鸿章的家乡——合肥，湖尾才是巢湖的治所巢县。小魏村在巢湖的南岸，虽说坐船到县、到合肥都很方便，但是，皖中的人们要出外，还是更乐意走皖南，出长江。或许是这个缘故，父母将魏建猷送到了远离家乡百里开外的无为县励志小学念书，



魏建猷先生

不久又转到了竞存小学。正规的小学生涯虽只过了两年，他却由此而获得了不少“新学”知识，打开了眼界。1924 年 6 月在竞存小学肄业后，魏建猷便顺江而下，到无锡中学就学。

无锡中学是唐文治的学生高践四根据先人遗命捐助成立的一所私人学校，由唐文治任名誉校长，并手订校规。1920 年创立时，暂租西水关马氏的房屋为校址，1923 年在南门外羊角湾建成新校舍，魏建猷就是在这新校舍落成的第二年进入该校的。虽然他的英文成绩十分优秀，而且在市里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还获了奖，但他感兴趣的还是文史。在这所优秀的中学里，有两位年轻的语文教师对魏建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是侯堮，号云圻；一位是王瑗仲，号蘧常。侯云圻后来把魏建猷引到了北京这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而王蘧常则成了魏建猷的终身师友。在无锡中学，魏建猷虽只读了一年，但由于两位老师的提携，专业的方向从此确定。1925 年江浙战争爆发，学校停学，魏建猷不得不告别老师，休学回家了。

魏建猷又在家乡过了两年的乡村生活。虽然已进入民国十多年了，科举废除已二十年了，但是，在乡间还是有新学不到之地，前清的老知识分子大可发挥其“余热”，设塾招徒。乡里有位叶芝岑先生，就办了一所这样的学塾。已受业于侯云圻、王蘧常先生的魏建猷就向叶老先生请教古文的写作，“小学”和文言文的功底在这两年中进一步夯实了。

1927 年夏，虽然经过大革命的风暴和反革命政变的血腥屠杀，与

"新都"南京和"闹市"上海不即不离的无锡，仍然聚集了一批回归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应江苏名绅、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之召，坚持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②]纷乱暂告平息之后，曾在无锡中学任教的王蘧常先生受聘到无锡国专任教，自然他也通知了学生魏建猷前来报考。在无锡国专，魏建猷经过了长达四年的学习，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国学教育，为其后来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建猷后来回忆，他喜欢历史，在无锡国专读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书籍。在国民政府治下的欧风美雨的新潮时代，出现这样一个标榜弘扬国学、培养国学人才的专门学校，教学生读古书、写古文、专研古代经史与学术，这的确是一个异数。这所学校，因其背离"时代潮流"，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弘扬国学的一大渊薮。

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

1931 年 7 月，二十二岁的魏建猷由无锡国专毕业，经时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的侯云圻介绍，到了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助理员，搞中日文编目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魏建猷刻苦地学习日文，钻研业

① 解放初的魏家被划为富农。

② 无锡国专于 1920 年冬开办，称无锡国学馆，1927 年改称国学专门学院，1929 年定名为国学专修学校。由唐文治手订学规十条，第一批招生二十四人。初赁锡商山货公司为校舍，次年起学舍于学宫旁原金匮训导官廨旧址，并建尊经阁。

务，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上发表了有关图书版本、考订和评价论文多篇，如《跋明翻刻宋本唐百家诗零本》（第17期）、《跋明信郡王如松竹窗雅课稿本》（第25期）、《高丽刊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跋尾》（第27期）、《馆藏清代禁书题跋记》（第30、32期）、《馆藏批点本礼记敬业质疑》（第33期）、《跋墨香书屋丛书十一种稿本》（第37、40期）、《书"蓼绥阁诗钞潞河词跋"》（第43期）、《跋黄育楩〈破邪详辩〉》（第44期）。作为图书版本学的题跋，题材短小，文字精练，但要概括图书的版本、作者、内容、价值等多方面的问题，写作不易。如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批点本《礼记敬业》一书，有凌义渠蓝笔庚申年校、袁了凡黄笔壬寅年校，向被视为珍本，但魏建猷根据《京山县志》作者杨鼎熙为天启辛酉举人的记载，指出《四库总目提要》记为"崇祯庚午举人"之误；又根据凌、袁二人的生卒年和该书的出版年代，断定此书的蓝、黄笔批校均为伪托。再如，馆藏明刻本《唐人十三家诗集》，经魏建猷考订，此书为宋本《唐百家诗》的零本翻刻，由书商自行定名，而清人江标所刻所谓"影宋本"的《唐人五十家集》中，有九家系翻刻《唐人十三家诗集》的残本。又如，馆藏《墨香书屋丛书》十一种稿本不署著者，经魏建猷考订，系清宗室奕赓于道光年间所撰，是清代的重要史料。③这些题跋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魏建猷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造诣。

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郭绍虞先生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魏建猷也时常向他们请教，并相互切磋，他与顾颉刚的友谊，一直保持终身。在中日文编考部有位同事蒋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吴晗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吴晗在1930年秋也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了将近半年时间，蒋山和魏建猷又同住一个宿舍，三位年轻人于是就因此而经常相聚在一起。这一时期的魏建猷，由于交

友和兴趣的关系，在专业上日趋倾向于历史学，并立志希望和师友们一样能专业从事历史学的教育和研究。而在研究方向上，虽然魏建猷对少数民族史表现了一定的兴趣，开始注意从地方志中搜集瑶族的史料，但从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看，魏建猷显然对清代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馆藏清代禁书题跋记》、《跋黄育楩〈破邪详辩〉》等文章说明他对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有关清代的珍贵史料已经给予了较多地关注，后者则是国内发表的第一篇肯定黄育楩《破邪详辩》史料价值的专论。

黄育楩曾在道光年间在河北巨鹿等县担任知县，在当地搜缴了大量民间教门的经卷。为了肃清这些民间教派教义在当地民众的影响，黄育楩将这些经卷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摘录下来，逐条批判，汇编成册。这些经卷由于清政府大量禁毁，已很难看到，但"从这部书里我们可以窥见这二十部经典的内容大要"，[4]"此等宝贵史料，得藉黄氏之书而传，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其有补于中国社会史、宗教史者，实非浅鲜！"[5]他还专门撰写了对这部书的研究论文。对于有关清代秘密结社的史料，他也开始着手搜集，[6]他之后来成为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专

③ 魏建猷不久发现金梁在《瓜圃丛刊叙录》中录有观成《重订东华录跋》、奕赓《重订东华录序》各一篇，证实了他先前的论断。见《〈墨香书屋丛书十一种稿本跋〉补记》，载《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40期。

④ 魏建猷:《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刊《逸经》1936年第10期，1936年2月间写于日本东京。

⑤ 魏建猷:《跋黄育楩〈破邪详辩〉》，载《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44期。

⑥ 在《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一文中，魏建猷先生写道:"作者前年居北平时，曾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故宫文献馆所藏清代档案中，关于'教匪'、'会匪'史料甚多，且强半皆世间所未见者。当时有意摘要录出若干，旋因去国匆匆，未得如愿。"

家，起步于斯。

1933 年 2 月，魏建猷完成了《清雍正朝试行井田制的考察》[7]这篇论文，也表明了他对于清史的兴趣。清初入关八旗在近京一带实行圈地，以解决旗民生计问题。但由于旗民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生活日益困难，变卖典当田房、拖欠钱粮日益普遍。至雍正朝为解决这一问题，便在直隶原圈地区域内试行了井田制度，分配井田耕作的仅限于最贫穷的旗民、治罪革退的旗籍官兵。井田的经界则尽可能"以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共力同养公田"。授田之法亦仿周代制度，每户百亩。在试行井田地区，设立管理、劝教、骁骑校、领催、乡长等官员、执事，并由政府拨款为无业旗民建房，发给口粮种子及农具等费。但井田制仅试行了十一年即告失败，不得不改为屯田，其关键原因还在于养尊处优的旗民已经奢侈懒惰成风，"不能力穑"。这篇论文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时史学界关于中国存在不存在过"井田制"争论作了回应。[8]当时郭沫若、胡适等人根据《孟子》、《礼记》中所记井田制度太不近事实而断定古代未曾有过井田制度的存在，魏引用了《诗经》"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等史料，指出了郭、胡二氏的武断之处。在日本留学期间，魏建猷曾两次拜访郭沫若先生，估计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三、留学日本与学术方向的转变

魏建猷在燕京大学当图书馆员的目的，一方面便于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方面也是为了谋生和积蓄，以便进一步深造。两年的"打工"，省吃俭用，积蓄了三四百元钱后，魏建猷决定去日本留学。1933 年 9 月，魏建猷东渡日本，初在日本东京东亚学校补习日语，后入中央

大学经济科学习。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日本，喧嚣着灭亡“支那”的军国主义思潮。对于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日本政府既抱着培养“汉奸”的目的，又担忧中国政府借此培养“间谍”。因此，对于来自“敌国”的中国留学生既设法拉拢，又严加监视。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后，日本政府也装模作样地表示“退还”，但“退还”的庚款需由日本政府控制，专门用于资助中国留日学生，条件是填写一份含有向日本天皇表示效忠内容的申请书。魏建猷来到日本之后，所有积蓄在支付了旅费和学费之后，所剩无几，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接济一个留学生，但他坚决拒绝了日方提供的这种“嗟来之食”，靠翻译日文资料以补贴生活费用。当时国内的新闻界、学术界十分重视来自日本这个汉学研究精深而却志在亡我中国的邻国的政治新闻和学术动态，魏建猷的译稿自然受到国内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欢迎。据魏建猷回忆，当时有关学术译文大都能够寄回国内刊出，如山口察常的《孔子的思想》(刊《国光杂志》第6－7期)、武义内雄《宋学之由来及其特殊性》(刊《国光杂志》第9－12期)、后藤末雄《西洋人观察之中国》(刊《国光杂志》第14－16期)、

⑦ 刊《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1936年8月)。

⑧ 原稿曾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编辑删去。

《中国国家成立过程之一考察》(刊《文化批判》第三卷第一期)、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之变迁》(刊《禹贡》第五卷第十期)等等,撰有《儒学与日本武士道之关系》(刊《国光杂志》第13期)、《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刊《逸经》1936年第10期)等,但有关日本政情动态的文稿除少量在汉口《武汉日报》、南宁《民国日报》上发表外,其他如《日本政局透视》等一类大都被日方扣留,以后不仅对魏建猷的所有译稿加以扣留,甚至派人跟踪、直接盘问。在这种情况下,魏建猷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陷入了困境。"屋漏偏逢天下雨",1935年夏天,魏建猷又患了肺结核。在贫病交加之中,同学周默秋向他伸出了援手。

周默秋是湖南省的官费留学生,与湖南上层关系比较密切,他写信给湖南省主席何键讲了魏建猷的境况后,何键允准汇了二百元资助,这使魏建猷得以渡过难关,完成在日本最后一年的学业。当时何键正在湖南提倡"国学",在长沙仿照无锡国学专修馆的模式亦创办了国学专修馆,而《国光杂志》则是何键的言论工具,但其学术水平显然落后于无锡国专的《国专月刊》,而且稿源缺乏。因周默秋的关系,魏建猷的学术译稿主要供给了何键的秘书张博言主编的《国光杂志》,该刊共办了十八期,其中有九期刊有魏建猷的译稿和论文,这些情况何键自然清楚。对于魏建猷来说,雪中送炭,却之不恭;顺藤攀援,君子不为。回国以后,虽然与何键有过几次见面,并因何键、周默秋等人的关系与湖南政界有所往来,但他初志不改,始终淡泊于官场名利。而何键对这位青年亦十分器重。1937年2月,何键到无锡国专参观并讲学,魏建猷恰在该校任教,两人第一次会面。不久他拨经费给周默秋办《现代国际》杂志,没有忘了关照请魏担任特约编辑,月支车马费六十元。魏无意从政,因此未参与该杂志社的工作,也未领支薪水。抗

战爆发后，魏建猷避难至长沙，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少校秘书，负责抗敌宣传工作，亦与何键有过会面。第二年魏建猷患肺病，生活发生困难，何键闻讯后派人接济五十元。离开长沙赴成都，又赠仪五十元。何键一生，已经盖棺定论；但三次雪中送炭，作为近代史专家的魏建猷于学于私不能不感慨系之。

1936年6月，魏建猷离开日本回国，到无锡拜访了唐文治先生。受唐先生的聘请，于8月开始在无锡国专任教。当时的《国专月刊》发布消息说："本学期新聘教师有陈天倪先生、李浚清先生、魏守谟先生。……魏先生本校第七届毕业，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后东渡，毕业于日本东亚大学研究所，于史学有深湛之造就，本学期来校教授史学概论、通史课外，并设日文补习班"，[9]补习班学生共四十四人，魏建猷还是补习班的级任导师。此外，他还在庆丰纱厂纺织人员培训班教日文。教学之外，魏建猷笔耕不辍，在《论学》上发表了《朱舜水思想概述》（1937年2月）、《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1937年4月）、《关于朱舜水先生二三事》等，这些论文的材料，大抵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所搜集。同时，魏建猷开始计划撰写

⑨《国专月刊》第四卷第1期，校闻。

《甲午战争史稿》。谈朱舜水及明末流亡日本的志士,既反映了在日本留学期间魏建猷的心态,而撰写《甲午战争史稿》,则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方向的重要转变。

《朱舜水思想概述》既叙述了朱舜水的生平、民族思想、学术思想、政治思想,作者不能不有慨于时势人心:"今者四夷交侵,中国危矣!人皆言救国,夷考其实,犹汲汲以富贵骄奢为务,养生之厚如此,能不爱其死乎?彼诸先哲所以能历艰阻、忍饥寒为人所不能为者,以其心中惟有正义,生死穷达,不及其胸,故有此大无畏精神也。人之情岂异哉,贪生恶死,喜安避危,豪杰与庸众不相远。知所患有过于死,故杀生而不辞。彼贪生者,由不知耻耳,知耻则近乎勇也。仓卒舍命,犹可以血气为之,若假以时日,利害之心乘之,则改其初衷。故此非学有根柢、行有素养者,不能若舜水先生者。不能徒羡其行事,尤须注意其学养。治其学者,当体其存心,若徒拾其支节,以为谈助闻见之知,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岂先生之志欤!""学有根柢、行有素养",也是魏建猷后来的为学为人的准则。

《甲午战争史稿》的史料搜集也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至少完成了三章,战争爆发后,由于颠沛流离、生计艰离,无法再继续下去。现存文稿仅有作为第三章的《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一篇,刊登在 1937 年 5 月《国专月刊》第五卷第四号上。除朝鲜问题之外,作者还有《甲午战争之经济背景》一文,以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目的,亦可由《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一文中可见一斑:"处今之世,尤须将此义宣示我国民,使知帝国主义之侵略我者,其原因别有所在,非可苟求幸免,惟努力自强,统一团结,发展生产,充实国防,以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周旋,则人自不敢侵略我。若舍此不

求，图侥幸于一时，终亦必亡而已矣。”

朱舜水的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可谓以史为学、以史明志、以史为鉴，既反映了在三十年代上半叶，年轻的魏建猷在学术上的成熟、人格上的升华，又反映了他的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甲午战争史稿》虽未完成，但在魏建猷的学术道路上意义重大，他一生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就是由这项研究开始确立的。

四、流离与回归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了。8 月，淞沪战役爆发。9 月，无锡国专因战事无法开学，魏建猷失去教职，带着新婚的妻子吴佛因前往长沙，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离生涯，流离的还包括他所钟爱的学术研究。在长沙，有因“稿缘”而结识的原为《国光杂志》主编、现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的张博言，经过他们的安排，给魏建猷补了一个长沙警备司令部额外少校秘书，从事抗敌宣传工作。当时历史学家吕振羽也来到长沙，担任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也来长沙，经常参加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和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活动，文抗会经常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邀请各党派、各阶层和各群众团体的著名人士参加并作报告。魏建猷与吕振羽的往来较多，也参加了文抗会的一些工作，并参加了该会举办的俄文学习班。当时长沙有三家大报，《湖南民国日报》、《全民日报》、《力报》，宣传抗日比较积极的《全民日报》在桂系停止资助经费之后，经费困难，编辑人员相继离开，只有一位共产党人独立支持，呼吁文化界支援，吕振羽、翦伯赞便义务担任了《全民日报》副刊的编辑，魏建猷则承担撰写专论和社论。他与共产党人的往来很快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不久，他们发现在长沙青年会主办的

“抗战讲座”上，魏建猷与徐特立一起登台演讲，还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拜访徐老，这样这个额外少校自然不能让魏建猷继续干下去了。

不久，湖南政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动。11 月，蒋介石将何键调任内政部长，明升暗降，随即改组湖南省政府，12 月，魏建猷失业了。1938 年 2 月，他以失业青年的身分向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写信，请求安排工作，被派为秘书处科员，负责抗敌宣传。但到 6 月间，便因肺病复发，吐血不止离职。随着战事日益逼近长沙，又加妻子怀孕，魏建猷为免不测，病未痊愈，便长途跋涉，经宜昌、万县、重庆至成都。

这一路走得十分艰难，魏建猷的肺病还未好，妻子又在途中分娩，生下了长子，前途漫漫，他们走走停停，在宜昌住了一个多月，万县住了近两个月，重庆住了二十多天。原定目的地是到重庆找工作，随何键一起到重庆担任内政部参议的张博言听说魏建猷来了，生活又困难，便介绍他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当专员。这个机构属于何键管辖的内政部，在这样一个国民党控制舆论的权力机关工作，位崇薪厚，但与魏建猷之于学问、政治的态度格格不入。婉拒之后，他便到教育部举办的沦陷区高等学校失业教师登记处登记，领了四十元的生活费，等候分派工作。不久，自己想办法到当时迁到成都的光华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1938 年 10 月，魏建猷到达成都后，身体十分虚弱，肺病尚未痊愈，第二年又患了伤寒病，经济十分困难。图书管理员工资微薄，虽然不久升为主任，但境况仍无多大改善。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顾颉刚聘魏建猷为兼职的私人秘书，协助他编制中国历代人口分布区域图，以解决他的一部分生计问题。光华大学图书馆规模很小，根本无法满足魏建猷的研究需要；加上日机经常来轰炸，患病的他无力经常奔跑进掩体，因此，1940 年 10 月，西昌《宁远报》社聘请他担任该报经理，他自己也十分想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便辞

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前往西昌。

西昌的两年对魏建猷来说，不堪回首。生活虽然不成问题，但远离了学术界，对已过而立之年的魏建猷来说想必是十分痛苦的。《宁远报》经理是一个上校级的头衔，但仍不免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41年7月，因《宁远报》有进步倾向，遭到追查，魏建猷不得不辞去报社经理一职，降级调到宁属食粮增产督导委员会兼任的主任委员张笃伦的秘书。张笃伦是西昌行辕主任，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但这位主任的秘书发往内地友人的信件却常常被特务私拆，将有关内容转给张笃伦阅看，张还算关照，嘱以后"在信中少发牢骚"了事。现存魏建猷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唯一的文章就是《宁属经济建设问题》，刊登在《新宁远》月刊第一卷第10、11期合刊上。这篇论文根据宁远地区的地理、人文、矿藏、出产等情况，提出了以国防工业为中心、民需工业与农业相协调发展宁远经济的模式。

1942年夏，已经在重庆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并兼《文史杂志》主编的顾颉刚将魏建猷介绍给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俶傥，当时伍正大力扩大国文系，广招人马，便聘魏建猷为讲师。八年抗战，四年流离，魏建猷十分珍惜这次"回归"。收到聘书后，魏建猷即辞职离开西昌，来到重庆。9月开学时，师院国文系本身添办了四年级，有四个班级，其他各院的大一年级一律开设国文课程，教授文言文，又有几十个班级，每三个班级配备一位国文教师，因此，这个夏天伍俶傥一下子添聘了二十几名教师，一部分在沙坪坝上课，一部分在离市区几十里的柏溪分校上课，魏建猷、王仲荦、朱东润、罗根泽、魏兴南、吴组缃、卫仲璠、管雄等人都在柏溪任教。据朱东润回忆，中央大学的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当权派，一派是南京高等师院、东南大学来的基层派，系主任伍俶傥是朱家骅的连襟，主要依

靠学生作为他的斗士，对本系教师反而不太重视，因此国文系教师除上课之外，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魏建猷也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条件，每周九课时之外，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暑假到了，吴组缃回乡一月与家人团聚，写信来羡慕魏建猷还在学校"从容奋勉"，假期将尽，"晤面在即，快何如之"。即使在十年动乱的"交代"中，魏建猷还流露出对那段时光的怀念："在柏溪分校，我住在第五宿舍，王仲荦、吴组缃、陈行素、蒋礼鸿等住在第四宿舍，我和王、吴等有时在王的房间里，有时在吴的房间里，用菜油炉子烧茶，一同吃茶谈天。王、吴爱谈《红楼梦》，我对此不很熟悉。有时大家一同去田野散步。"在重庆，魏建猷又能够与顾颉刚经常会面了，顾颉刚聘魏建猷兼任《文史杂志》编辑，编辑部就设在柏溪，直到 1944 年 4 月编辑部迁至北碚，交通不便，魏建猷才离职。他有时也到郭沫若先生那里走走。1946 年，原任西昌行辕主任的张笃伦就任重庆市市长，他也没忘了魏建猷，先聘他担任市政府编审，后又任命他为重庆市图书馆馆长。但是，魏建猷十分珍视在中央大学的教职，坚决辞去了市图书馆馆长一职，时在 1946 年 5 月。此前，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介绍他到国防部任上校专员，也被他拒绝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个月之后，中央大学却解聘了魏建猷。原因很简单，1943 年 2 月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不堪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压迫而辞职，介绍魏建猷来国文系的顾颉刚与之"同进退"，已离开中央大学多年，加上抗战胜利，中央大学准备"还都"，既非"实权派"又非"基层派"且非"国文派"的魏建猷自然先在解聘之列。

在中央大学的四年，魏建猷虽然只发表了两篇文章，[10]但在他的学术道路上非常重要，这是他潜心钻研的时期。他充分利用了中央大学的图书资料，集中精力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中国近代货币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着手研究和撰写的。如果说，在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魏建猷的著译还有不少中国古代史、图书版本学方面内容的话，那么，在中央大学工作以后，魏建猷发表的论著几乎全部是中国近代史这一领域的。魏建猷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近代史、经济史有兴趣，并且帮助《文史杂志》出了中国近代史专号、中国经济史专号。

五、主编《东南日报·文史副刊》

1946年6月，中央大学复员"回京"，魏建猷举家随国文系教师一起坐船顺江东下。他还不知道国文系已内定解聘他。同船的好友罗根泽偷偷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希望他早作打算，这样魏建猷临时决定来上海。来到上海后，暂投岳母家，又添长女。

魏建猷这次是第四次来上海，第一、二次是东渡日本和回国路经上海，第三次是1937年2月何键到无锡国专参观，同来的秘书张博言约魏建猷同去上海游玩了两天，两位年轻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因志趣不同，终于后来在战乱之中失去了联系。这次来上海，虽非举目无亲，但难免落泊之感。

上海不愧为上海，机会实在太多。抗日

⑩《近代中国的银元制度》(载卫聚贤编《古今货币》,1944年);《近代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载《东方杂志》41卷第18期,1945年)。

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一部分避乱上海的师生，办起了国专沪校。沪校的规模很小，没有固定教师，教务长便是王蘧常。魏建猷找到了他，王老师答应下学期可以安排每周三小时的课，上中国通史。接着，他又遇到了在无锡熟识的老朋友，一位书店老板，这位朋友的邻居《东南日报》的总主笔钱谷风正在物色《东南日报·文史副刊》的责任编辑，经钱的介绍，魏建猷应聘成功。有了兼课和副刊编辑的职位，工作问题算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住房，当时上海的租房要付昂贵的“顶费”，魏建猷自然付不起，一时想不出办法。一天，路过京沪中学，看到该校广告上校长的名字是黄树滋，应是西昌的熟人，一见果然。黄校长便请他到京沪中学兼几小时历史课，可以教师的名义搬进学校的家属宿舍。这样，住房问题总算解决了。

《东南日报》的前身是《杭州民国日报》，于 1928 年创刊，1934 年改名，1937 年 11 月迁往金华，1942 年迁福建南平，抗战胜利以后，除出杭州版外，1946 年 6 月又出上海版。上海《东南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每期八至十个版面。在上海复刊的第二个月，7 月 4 日，由魏建猷负责的副刊《文史》便创刊了。《文史》系周刊，原为整版，后改为三分之二版，初定每周三版，以后改周四版、周日版等。到 1949 年 4 月初停刊，共出了一百三十二期，除最后几期由方诗铭代为编辑外，余均由魏建猷组稿编辑。魏建猷在《创刊词》中指出，“抗战八年间受战争影响，一般文化停滞不进，甚至低落，文史学者当然也不能例外，有成就的学者多因生活的重压和图书的缺乏而停止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优秀的新进学者自更不易养成。特别使我们惊心动魄的是文史教育的濒于破产，一般大中学生文史程度急剧低落……。”创办《文史》副刊，就是为了倡导文史研究的风气，振兴文史教育。[11] 在《文史》副刊一百期的《编后记》上，魏建猷又强调了办刊方针，“本刊园地公开，绝不稍

存门户之见”，并提出三点希望：作者多赐有学术价值而较易引起读者兴趣的论文；读者多提出改进意见、有关文史学的问题；新进学人踊跃投稿。⑫

在主编《文史》副刊期间，魏建猷在《东南日报》及其《文史》副刊上也发表了不少历史文章：《明清两代的田价与米价》（1946－7－11）、《中国新式海军的起源》（1946－7－18）、《记咸丰庚申英法联军入京两段史料》（1946－8－1）、《曾国藩创建湘军所受之挫折》（1946－8－22）、《林则徐与中国近代革新运动》（1946－8－29）、《辛亥革命的历史体验》（1946－10－10）、《清咸丰朝的纸币》（1946－12－5）、《太平天国的货币制度》（1946－12－26）、《清代治河官吏之豪奢》（1947－3－12）、《清季外国银圆的流入》（1947－3－19）、《清季流通的外国银圆》（1947－3－26）、《清季外国银圆流入的原因及其影响》（1947－4－2）、《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币制改革问题》（1947－9－24）、《圆明园的幸运与厄运》（1947－7－9、7－2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官绅的态度》（1948－2－18）、《从口赋的起源论管子的成书年代》（1948－9－1）、《清季之改铸铜元》（1948－12－30）、《清代处理旧钱伪钱

⑪《东南日报》1946年7月4日。

⑫《东南日报》1948年8月11日。

和外国钱的对策》(1949－1－23)等等。此外,还在《中央日报》发表《论清代的养廉金制度》。[13]这些文章几乎完全集中于中国近代史,而又以中国近代货币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文章居多,魏建猷在重庆中央大学四年的潜心研究开始逐渐进入了收获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学术地位。

通过《文史》副刊,魏建猷迅速地与上海及国内的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经常在副刊上发表文章和联系的作者有顾颉刚、吕思勉、方诗铭、王毓瑚、童书业、杨宽、罗根泽、罗尔纲、朱东润、刘子兴、姚薇元、顾廷龙、向培良、宋炎、刘永潜、丁山、王宜昌、吴静安、王蘧常、郭绍虞、陈乃乾、苏子涵、承名世、黄永年、钱基博、洪焕春等。1947年9月,由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山介绍,魏建猷被该校聘为副教授(次年停聘),担任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三门课;同时,由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介绍,聘为该校兼职教授,担任中国通史(近世史部分)和亚洲诸国史课程;郭绍虞还介绍他到同济大学担任了一部分国文课程。他热爱教师这个岗位,编报只是他为了求生的副业,但不得不在几所大学兼课,却是由于物价飞涨之下生活的重压。

与《东南日报》订约时,原定除主编《文史》副刊外,还须撰写有关教育文化和日本问题方面的社论。但后来发现社长胡健中是CC系的重要人物,魏建猷写了几篇以后便不再写了。但在他执笔的为数不多的几篇社论中,亦可看出他对时局的态度。如《端学风》一文,开宗明义指出学风关乎国运,然后尖锐地批评了战后教育界存在的钻营奔竞、营私舞弊、党同伐异、阴谋险诈的不良风气,最后笔锋一转,指出教育界的不良风气,"自系受政治上的不良影响",[14]曲折地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讲得清清楚楚,也交代了国民党的"国运"。当时有些人提出来仿行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来防止官员的腐败,魏建猷在《中央日报·

文史周刊》上发表了《论清代的养廉金制度》一文，以历史学家的身分分析了清代养廉制度推行的原因和经过，认为仅靠养廉银制度来防止官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合理地调整政府机构，禁止卖官鬻爵、供应上司和官员的生活奢侈，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是需要清政府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决心消灭此等现象？倘使仍旧承袭清代那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则其结果如何是不难断言的。"⑮在讲台上，他更是大胆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特殊角度批评时局和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苦难的百年和现状，澎湃于他的胸中；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又使他不能一吐为快。对青年学子来说，魏老师的这种以史喻今、以史寓情的上课风格，洪亮的声音与抑郁的情感起伏交织在一起，具有特殊的感染力。他开的中国史课程不仅本系学生爱听，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学生。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审左步青曾经回忆说：他当时在暨南大学学中文，就选了魏建猷开设的中国通史课。不少学子还在他的影响下或奔向解放区，或参加地下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⑬《中央日报》1947年2月4日。

⑭《东南日报》1947年4月3日。

⑮《中央日报》1947年2月4日。

他欢呼上海的解放，但他个人的境遇在鼎革前后却又陷入了困境。1948 年夏，长期在战乱中与魏建猷一起颠沛流离的妻子患伤寒症去世了。沉重的工作压力之外，平添了丧妻之痛和照料十岁的长子和二岁的长女，使魏建猷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直到第二年，由王蘧常主婚、顾颉刚证婚，续娶了肖善芗之后，生活才稳定下来。1950 年添次女，但当年 12 月魏建猷却因原患肺结核菌侵入肾脏，以肾结核症住院治疗，切除了左肾。肾脏的缺损不久又诱发了手的神经性颤抖、冠心病等疾病。1951 年光华大学并校后，兼任教授不再续聘，由上海航务学院聘他为副教授，担任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兼图书馆主任。1953 年初，上海航务学院并入大连海运学院，他单身随校前往大连。是年，幼子出生。从 1948 年到 1954 年的近五年时间，由于生活和疾病的困扰，工作的频繁调动，魏建猷无法进行他所钟爱的学术研究。

六、在上海师范大学

（一）最初十年

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上海师范专科学校。1954 年 7 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建校，魏建猷经多方联系，终于调入该校历史科任副教授，与家人重新团聚。这所学校在第二年漕河泾的新校舍落成以前，暂借西体育会路的原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为临时校舍。1956 年该校文理分科，文科另组建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在原闸北北郊中学旧址上扩建校舍。1958 年，两院又合并为上海师范学院，在漕河泾继续扩大规模。1984 年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校园旁边，是桂林公园，每逢中秋，桂花飘香。校园周围，则是一片田园风光。从建校之初开始，到魏建猷去

世，他在这所大学整整工作了三十四年。这所大学对魏建猷而言，无论是专业还是家庭，都是一种归宿。

就该校历史学科的变化而言，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时期设历史科，第一师院时期设历史系及专修科，均由历史学家程应镠任主任。1956年，程应镠介绍魏建猷加入民盟。1957年程应镠被错打成“右派”之后，由魏建猷、张家驹分别任主任和副主任。程应镠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张家驹[16]是治宋史的，三人领域各有不同，但相互敬重，志同道合，处得十分融洽。

从1954年7月到1964年，魏建猷在师院获得了他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安居乐业”的十年。无论科研工作、行政工作多么繁重，他坚持上课。在讲台上，他声音洪亮，内容丰富，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反映，“听魏老师的课，有血有肉，越听越爱听”。在科研方面，他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出版了《中国近代货币史》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以前的研究成果作一小结，二是开辟了会党史研究的新领域。

1955年，他的两本学术著作几乎同时出版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于3月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八万七千字，这

⑯ 张家驹(1914－1973)，著有《两宋经济重心之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是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

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学术专著,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完整、系统地论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及其影响。这本书刊行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其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把握的全面性、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的准确性仍为学术界所称道。中国大陆有关中国近代史教材在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内容方面,基本上采用了魏建猷这本书的观点和框架。如果我们了解作者在战乱年代生计窘迫、资料缺乏、建国初年工作生活还不稳定的情况,就不能不承认魏建猷的卓越史才和史识了。

《中国近代货币史》是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的,全书共十六万字。这部著作的准备时间要比《第二次鸦片战争》长。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就对清代经济史有所研究。后来到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科留学,又为他从事经济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期间,通货膨胀的加剧使他对近代货币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着手研究并撰写此书的各章节,若干内容已在《东南日报·文史副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过。1955年初,群联出版社前来索稿时,魏建猷即将现成的书稿交给付梓。中国近代货币史的研究,无论资料基础还是学术研究基础要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好得多,在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问世之前,重要的著作中国的有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西文的有肯爱德的《中国货币论》,但两书均详于近代各类货币的沿革和概况,而于货币与经济、政治之间的互相关系则有不足,而魏著则略于前者而详于后者,由此而显出了货币史家之货币史与历史学家之货币史的分野,魏著的学术价值即在于斯。

对于会党史的研究,魏建猷早已留意,此前除留意搜集资料、做好卡片之外,没有展开研究。五十年代以后,农民战争史研究十分热闹,

魏建猷则独辟蹊径地进行了会党史的专题研究。清代以来，下层民间树党结会之风盛行，出现了像天地会、哥老会、青帮这样势力庞大、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会党组织，弄清楚这些会党的起源、性质及其在历史上的活动，可以大大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而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有关论文有《试论“天地会”的性质》、[17]《龙华会和龙华会章程》、[18]《辛亥革命前夜的浙江会党活动》、[19]《共进会的成立及其特点》[20]等等，成为知名的中国会党史专家。

十年的生活虽然太平，但研究工作却屡受干扰。担任行政工作以后，他遇到的问题与程应镠差不多，青年教师积极性高，但文史功底不够。出于师长的关爱和领导的责任，魏建猷提倡青年教师要学习老教师之长，“开学馆”让他们读书进修，又安排老教师上讲台，收徒弟。这些老教师从旧社会过来，多少有些“历史问题”，这以后便成为了他“压制青年教师”而被揪斗的“罪状”。还有历史课程改革的问题，打破帝王将相王朝体系的历史，就要带着学生下工厂、到农村，搞调查，编厂史，虚耗精力，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所感叹的青年学生的文史水平低下的

⑰《文汇报》1960年12月20日。

⑱《文汇报》1961年10月5日。

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⑳《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

情况更加严重了。作为学者,他不能不痛心疾首;作为“主任”,他又不能不勉力为之。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又有所谓“以论带史”还是“以史带论”之争,他反对“放空炮”的“以论带史”,主张“不能以经典著作为结论”,也没有受到重视。今天的“学术浮躁”是为名为利,那时的“学术浮躁”是为了“主义”、“思想”,其实学术何尝浮躁,浮躁的是人。和平时期的“浮躁”有时比战争时期的“偏安”更折腾。

(二)动乱年代

1966 - 1976 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十年动乱”,其实在高校,“动乱”从 1964 年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高校大学生就组织下乡,帮助开展“四清”运动,课停了;文化学术界的“阶级斗争”也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了。如果说此前是折腾的话,那么这 1964 - 1965 年则是大折腾,大折腾之后才有“大动乱”,风起于青萍之末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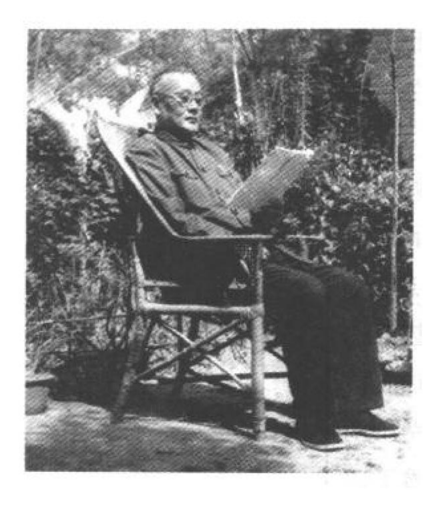
“急风暴雨”之始是姚文元的那篇于 1965 年 11 月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发表以后,根据当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人彭真的意见,要把《海瑞罢官》问题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根据这个精神,魏建猷发表了《海瑞一生果真是“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吗?》一文。[21]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魏建猷的老友,解放后还有联系。但他在 1959 年到 1961 年间发表的一些歌颂海瑞的文章以及编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而作,对海瑞的评价确有过当之处。魏建猷的文章在发表时标题和语气编辑有所改动,但意思是明确的,它肯定了吴晗对于海瑞与贪官污吏进行坚决斗争的史实,但不同意吴晗对于海瑞“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的评价,因为明皇室本身就是最大的贪污集团,海瑞是不敢反对的。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魏建猷不能对姚文元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针锋相对,但却指出了姚文中存在的四个“硬伤”,一下子把姚文元的“文史功

底”给暴露出来了。这种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文章，自然是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直接“罪证”。

魏建猷在这“急风暴雨”的年代所受到的折磨，与几乎所有大学教授们的命运一样，无须赘言。令他最为痛心的不是这“急风暴雨”吹走了他宁静的书斋、家庭、甚至他宁静的心境，而是吹走了他花了大量心血搜集的有关会党史的资料卡片。那卡片没用火烧、也没称斤两卖钱，而是用水泡透了还给你！到 1967 年，迫害又扩大到他的夫人，以至于 8 月间夫妻被迫出走。在北京以“上访”名义避难一个月后，程应镠告诉他“革命形势大好”，夫妻俩才返回上海。所谓“革命形势大好”是指军训团（军宣队）进驻上海师院，造反派为争宠而明争暗斗。回沪之后，便是长达两年的审查。本文关于魏建猷的生平，写到这里，几乎全部根据的是这个年代所留下的审查材料，那是用他那支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写下来的“交代”，几乎清一色的楷体字，其总量几乎与他的全部学术论著相等！这是一段令历史学家难以回首的历史。

1970 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开始组织历史学家们重新整理标点《二十四

㉑《学术月刊》1965 年 12 月号。



魏建猷在读书

史》。根据这个指示，1971 年春天，上海师范学院成立了二十四史标点小组，魏建猷调到该组参加工作。据当时的负责人裴汝诚回忆："1971年春至 1978 年重回历史系主持系务工作之前，先生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参与整理了《宋史》纪、志、表、传各一部分。《食货志》的标点工作，是与刘秉彝先生共同完成的，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此外，先生还校点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一部分，合作注释了《商君书》、《尉缭子》、《国语》、《荀子》等典籍。先生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但国学造诣深厚，对于版本目录学、诸子百家，多有涉猎，所以在人们遇到标点、校勘方面的'疑难杂症'之际，往往多借助先生之力解决。至于标点组内确定选题和校点体例等项工作时，先生更是以极高的责任心、谨严的治学态度，认真推敲，一丝不苟，多所贡献。"参加标点小组工作的还有程应镠、张家驹、马伯煌等先生。

动乱年代，魏建猷与过去的师友几乎完全断了联系，到了标点小组工作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顾颉刚先生。此后两人又通讯如常，顾颉刚对《宋史》的标点工作十分关心，1973 年 8 月 15 日来函："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彼此负标点二十四史之责。闻兄与张家驹兄同任宋史工作，此书卷帙既丰，抵牾必夥，应参考之碑版、文集、笔记数量尤巨，想参加劳动者必然不少，未知何日可以迄工？念。"信中提到的张家驹，不久即去世了。他是我国杰出的宋史专家，与魏建猷、程应镠私交甚好，《宋史》由上海师院负责标点，与他很有关系。这年春风吹绿江南

之时，他们三位还一起携夫人同游苏州，但秋风肃杀之后，张先生却已归道山。命运就是那样吝啬地不愿赐予他一点点晚年的安逸。第二年9月顾颉刚寄来的条幅，就抒发了这样一种对于宁静淡泊的渴望："老来无力展缥缃，闲倚空庭送夕阳。惭愧如今方识得，枣花淡胜桂花香。"急风暴雨过后，老人们希望的是一种激流勇进之后的闲逸，这种闲逸将随着夕阳西下而逝，因而更加值得珍视。那庭院中的枣花没有在急风暴雨中夭折，已经是她的大幸了。

（三）最后十年

风雨之后，1978年1月魏建猷回到上海师院任历史系主任，程应镠任第一副主任，恰逢魏建猷七十岁，程应镠赋诗祝寿："曾共艰难利断金，寿君真不忝生平。春归海日迟迟夜，目尽尧天衮衮情。变幻龙蛇松不老，倒颠庠序梦犹惊。寻常七十夸强健，雏凤声清胜晚晴。"经历了"变幻倒颠"的动乱，他们迎来了各自的"晚晴"。4月，上海师院恢复原有建制，魏建猷也在这个月晋升为教授。1984年上海师院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由吴成平担任，魏建猷为名誉系主任。

魏建猷在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后十年，一如既往地走得那么实在、进取。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使他感到非常振奋。1985年，魏建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开始于1933年留学日本期间，当时他到郭沫若先生家里，谈学术，也谈了留学生中的一些政治倾向。郭沫若曾十分清楚地向他谈过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学术研究。1937年秋天，魏建猷在长沙又与吕振羽、徐特立等共产党人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往来。在西昌担任《宁远报》经理期间，也曾介绍共产党人到该报工作，结果引起



魏建猷在工作

特务的注意。解放以后，他与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1964年9月以后，魏建猷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22]他拥护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对于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真诚，他也有切身体会。建国以后，由于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失误，他和他的师友们不断地受到不应有的怀疑、审查甚至打击迫害，但是曾经亲身经历过日本侵略、国民党腐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即使历经磨难，但仍然忠诚、热爱共产党，这是十年动乱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所难以理解的。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既是党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坚定地拥护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使然。魏建猷以七十六岁高龄加入共产党，是他根据所走过的漫长人生道路积累起来的信念而作出的一种抉择，也是一种归宿。

他最后十年，工作得非常充实而自信。在回到系主任岗位之后，他立即规划了全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恢复了他在1962年提出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做法，增加历史文选课、写作课，将本科生的基础课学习时间逐渐压缩到两年内，增加选修课的种类。在增加课程种类的同时，他主张压缩总课时，给学生以更多的自学时间。他鼓励教师和学生搞科研，与程应镠分别创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和宋史研究室，推荐本科生的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建

立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两个硕士点。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学、科研和梯队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繁荣时期。行政工作之外，他仍笔耕不辍。1981年，他与妻子肖善芗合作标点的刘基《郁离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2年，由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他还是《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主编之一。在这一年，魏建猷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入其门下者先后有邵雍、周育民。他还有两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一是深入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为此，他于1979年专门设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参加该项研究工作的有夏笠、季平子、胡世芸、徐先麟等人，并组织人员搜集、翻译大量国内外出版的史料。按照魏建猷的工作计划，这项研究分三个阶段，一是编出史料长编和大事年表，二是写出专题论文，最后撰写《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此项工作人事变动很多，基本上是由魏建猷指导，主要由夏笠、胡世芸等同志具体编写。最后的成书工作由夏笠进行。1998年3月，在魏建猷去世十年以后，夏笠也留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遗稿逝世了。[23]

㉒ 魏建猷是政协上海市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

㉓ 此书将由周育民整理完成。

魏建猷手迹

二是研究中国会党史。会党为社会下层组织，文献史料本来不多，搜集十分困难，数十年苦寻而来的资料被“付之一水”，劫后余生的魏建猷只能重砌炉灶。他先后发表的有关中国会党史的论文有《在拜上帝会与天地会关系问题的背后》、[24]《从〈常胜军案略〉看太平军在余姚的斗争》、[25]《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和会党的关系》、[26]《论李文炳》、[27]《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新发展》、[28]《黄德美与闽南小刀会起义》、[29]《要重视“会党”史研究》、[30]《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的新发现》、[31]《试论社团改进会》、[32]《辛亥革命时期的哥老会首领徐怀礼》[33]等。魏建猷认为，会党史研究工作必须依靠大家的努力，经上海史学会研究决定，由魏建猷发起于1984年10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全国性的“会党的性质、作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赞成成立中国会党史研究会，推魏建猷为会长。会前，魏建猷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主编了《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34]会后，又主编了会议的论文集《会党史研究》。[35]蔡少卿、赫治清、秦宝琦、胡珠生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会党史专家参加了研究会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会党史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比较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出版的论著、史料字数超过了前此一个多世纪的总和。

《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是部工具书，收录了1983年以前国内发

表的有关会党史的论文八百余篇、专著或资料七十余种，分为通论、天地会、哥老会、青帮、鸦片战争前后、太平天国时期、反洋教斗争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八类，以前四类为横坐标，后四类为纵坐标，清代会党史的纲目清晰了然，读者可由此而步入会党史研究的堂奥。1986年魏建猷主持申报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会党史研究》，最终成果为学生周育民、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36]其清代部分，就是循此框架而撰写的。

第一次会党史讨论会之后，魏建猷又与第一历史档案馆达成协议，联合编辑出版《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由夏笠、邵雍、胡世芸等人具体参加，于1986年完成，共近四十万字。[37]这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出版，魏建猷为之作序。之后，他又开始着手筹备第二次中国会党史学术讨论会。

这十年，他受够了疾病的折磨。十年动乱中，他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进而演变成脑血管硬化，经常心绞痛。1979年冬住院时，医生已经告诫他不能用脑，且须终身服药。他已经不能工作了，但他依然那样敬志、敬业、敬人、敬事。所有研究工作计划，

㉔《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㉕《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㉖《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㉗《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又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㉙刊在魏建猷主编的《近代中国史论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专辑，1984年）。

㉚《文汇报》1984年8月6日。

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㉜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㉝《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

㉞此书原由上海史学会内部印行，后由来新夏决定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

㉟此书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

㊱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㊲此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依然在他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抓紧进行，他还依然用他那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论文、写专著。他仍然那样诚挚待人，学生同事拜访他无须事先约定，来者必见。无论老幼，必起身相迎；病重卧床时，亦请家人扶起坐谈；无力坐起时，则深致歉意。平时见了工友，也必致意问候。他对晚辈依然那样关爱和提携。邵雍为入室弟子后，魏建猷为他专门写讲稿授课。周育民请求以中国近代经济史方向修硕士生课程，此方向原不在魏建猷的计划之中，魏建猷破例允准。他教导学生，如春风化雨，教做学问教做人。他常说，做学问要勤奋认真，做人要"行己有耻"。是啊，人生遭际或有不同，学术人品或有高下，但为学、为人如循此二则，方可不愧"学人"二字。

1986年以后，魏建猷的健康已越来越坏，心脏病频繁发作，多次急救送医院，不久又得胃癌，医院只能采取保守治疗。虽然他写字已越来越困难。但在他的脑海里，还是盘桓着一系列研究计划，从他这一时期留下的日记、给友人的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那永远不竭的学术追求：他对会党史的最终成果将是《中国会党通志》，已经编纂《中国会党起义文献录》，成书约四十万字，他撰写的《会党人物论》和《孙中山与会党的关系》等系列稿件，都是这部《中国会党通志》的一部分；他还打算将历年的旧作及未发表稿编成《会党史论文集》。1986年，黄山书社再版他的《中国近代货币史》，魏建猷在再版序言中说："颇思努力将全书改写，益求精进，并扩展下限至1949年，包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全时期。当奋勉为之，以期有成。"当然，他还期待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问世。但无情的病魔吞噬了他的这一切心愿。

1987年底的一天，他意识到来日无多，与妻子回顾他们共同走过的人生道路，然后口述了一首自挽联给妻子："数十年相依为命甘苦共尝那堪生离与死别；大半世同床话夜质疑问难愧称好友即良师。"魏建

猷从不作诗对联，这首与妻惜别之联竟成了他的绝对。

1988 年 1 月 19 日 18 时 25 分，魏建猷先生在中山医院去世。噩耗传出，学界震悼。与魏建猷相交六十多年的师友、已九十高龄的王蘧常先生悲痛地挥动长毫，写下了巨幅挽联："少小相从肝胆相照孰料愁城伤傲骨；书未尽刊才未尽展吾为宗国惜斯人！" 1 月 28 日，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隆重举行，上海各界暨亲友同事等五百余人莅会。10 月，第二次中国会党史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与会全体学者起立为魏建猷先生默哀。越十年，上海史学界五十余人假上海师范大学西部文苑楼聚会，追思魏建猷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又三年，上海史学会决定为魏建猷先生编传。斯人已去，人世坎坷，未容尽展其才，何其不幸！但先生所展现的学人风范与情操至今仍为学界所怀念、所景仰，先生又何其幸也。

魏建猷主要论著

1931年下半年－1933年上半年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发表《跋明翻刻宋本唐百家诗零本》(17期)、《跋明信郡王如松竹窗雅课稿本》(25期)、《高丽刊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跋尾》(27期)、《馆藏清代禁书题跋记》(30、32期)、《馆藏批点本礼记敬业质疑》(33期)、《跋墨香书屋丛书十一种稿本》(37、40期)、《书"蓼绥阁诗钞潞河词跋"》(43期)、《跋黄育楩〈破邪详辩〉》(44期)。

1933年9月－1936年6月

译山口察常的《孔子的思想》(《国光杂志》第6－7期)、武内义雄《宋学之由来及其特殊性》(刊《国光杂志》第9－12期)、后藤末雄《西洋人观察之中国》(刊《国光杂志》第14－16期)、《中国国家成立过程之一考察》(刊《文化批判》第三卷第一期)、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之变迁》(刊《禹贡》第五卷第十期)。著有《儒学与日本武士道之关系》(《国光杂志》第13期)。

1936年

发表《清雍正朝试行井田制的考察》(《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逸经》1936年第10期)。

1937年

发表《朱舜水思想概述》(《论学》1937年2月)、《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1937年4月)、《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国专月刊》第五卷第四期)。

1940年

发表《民族先贤朱舜水先生的思想》(《时代精神》第二卷第四期)。

1944年

发表《近代中国的银圆制度》(刊于卫聚贤编《古今货币》一书)。

1945年

发表《近代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圆》(《东方杂志》41卷第18期)。

1946-1949年

在《东南日报》副刊《文史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明清两代的田价与米价》(1946-7-11)、《中国新式海军的起源》(1946-7-18)、《记咸丰庚申英法联军入京两段史料》(1946-8-1)、《曾国藩创建湘军所受之挫折》(1946-8-22)、《林则徐与中国近代革新运动》(1946-8-29)、《辛亥革命的历史体验》(1946-10-10)、《旧问题与新希望》、《清咸丰朝的纸币》(1946-12-5)、《太平天国的货币制度》(1946-12-26)、《清代治河官吏之豪奢》(1947-3-12)、《清季外国银圆的流入》(1947-3-19)、《清季流通的外国银圆》(1947-3-26)、《清季外国银圆流入的原因及其影响》(1947-4-2)、《端学风》(1947-4-3)、《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币制改革问题》(1947-9-24)、《圆明园的幸运与厄运》(1947-7-9、7-2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官绅的态度》(1948-2-18)、《从口赋的起源论管子的成书年代》(1948-9-1)、《清季之改铸铜元》(1948-12-30)、《清代处理旧钱伪钱和外国钱的对策》(1949-1-23)。

1947年

发表《论清代的养廉金制度》(《中央日报》2月4日)。

1955年

《中国近代货币史》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8年

发表《五卅运动老人访问记》,载《近代史资料》。

1959年

发表《青浦事件》(《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1960年

发表《试论"天地会"的性质》(《文汇报》12 月 20 日)。

1961 年

发表《龙华会和龙华会章程》(《文汇报》10 月 5 日)、《辛亥革命前夜的浙江会党活动》(《学术月刊》第 10 期)。

1962 年

发表《共进会的成立及其特点》(《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1965 年

发表《海瑞一生果真是"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吗?》(《学术月刊》12 月号)。

1979 年

发表《在拜上帝会与天地会关系问题的背后》(《中华文史论丛》第 1 辑)、《从〈常胜军案略〉看太平军在余姚的斗争》(《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和会党的关系》(《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

1980 年

发表《论李文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1981 年

发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新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 3 期、《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与肖善芗合作标点的刘基《郁离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2 年

与肖善芗合作发表《刘伯温和他的〈郁离子〉》(《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中国近代史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任主编之一。同时任《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主编之一。

1982 年

发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爱国将领乐善》(《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

1984年

主编出版《近代中国史论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专辑），刊有所著《黄德美与闽南小刀会起义》。发表《要重视“会党”史研究》（《文汇报》8月6日）

1985年

主编《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

发表《论清代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学术界》第1期）、《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的新发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中国近代货币史》由黄山书社再版。

1987年

《会党史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载有所著《试论社团改进会》。

1990年

发表《辛亥革命时期的哥老会首领徐怀礼》（刊《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出版）。

1993年

主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附

录

上海市历史学会大事记

冯绍霆　王克梅
张　虹　王永进　编

1949年

12月11日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史学会)初步筹备会在上海番禺路209弄16号海光图书馆召开,会议主席周谷城(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报告召开会议经过,李亚农(时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就老解放区用社会发展史改造思想所产生的教育作用作了讲话。董每戡、李平心、吴泽、陈旭麓、姚绍华、金兆梓、胡厚宣、周予同、蔡尚思、姚舜钦、王伯祥、顾颉刚等出席会议。大会决定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上列出席者均为筹备委员,推定周谷城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南京、杭州方面推顾颉刚、李平心分别去信接洽。并暂定该

处为通讯处。

1950 年

3 月 5 日

史学会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周谷城、李平心、金兆梓、胡厚宣、周予同、姚舜钦、王伯祥、顾颉刚等出席会议。李平心、顾颉刚分别报告向杭州、南京方面接洽情形。会议通过入会资格两项:须不反动、须有译著。通过陈乐素、何天行、夏鼐、吴定良、谭其骧、徐德璘、伍蠡甫、王蘧常、陈守实、杨宽、吕思勉、柳翼谋、徐森玉、李旭、林举岱、史岩、苏继庼、卢文迪为会员;决议一月召开一次研究会,一月两次事务会。

3 月 19 日

史学会(筹)在海光图书馆举行第一次研究座谈会。会议决定成立干事会,推定李平心、顾颉刚、蔡尚思、胡厚宣、金兆梓、杨宽、吴泽、林举岱、王伯祥、姚舜钦、李亚农、周谷城组成干事会,推举周谷城为总干事。

4 月 8 日

史学会(筹)第一次干事会会议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周予同、蔡尚思、杨宽、周谷城、金兆梓、李平心、姚舜钦、顾颉刚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加添上海方面的周予同、董每戡、陈旭麓、姚绍华,南京方面的陈中凡,杭州方面的陈乐素为干事,通过陈衡哲、张荫桐、王国秀、黄颖先等为会员,入会者资格增加"暂以讲师以上而有著译者为限"一条。

4 月 23 日

史学会(筹)研究座谈会在四川北路 1844 号博物馆举行。与会者吕思勉等参观了商代生产工具及历代文物,并阅览汉代社会生活挂图。

5 月 14 日

史学会干事会会议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出席者有杨宽、周谷城、金兆梓、顾颉刚、周予同、胡厚宣、董每戡等。决定下次研究会由金兆梓作中国奴隶制的报告，胡厚宣作有关苏联史学界的报告。

5月21日

史学会(筹)研究座谈会于海光图书馆举行。针对1950年3月21日《光明日报》所刊载的郭沫若《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殷、周都是奴隶社会”的论点，金兆梓谈了夏殷界限难分、殷非全奴、奴隶制始于氏族、西周为原始氏族向奴隶制过渡、东周为奴隶制、秦汉为农奴型、封建译名不妥、发展五阶段不一定整齐等看法。(稍后以《中国社会发展史各阶段的假定》为题，发表于《新中华》13卷19期)胡厚宣认为郭沫若以众为奴不确，殷为奴隶制则人祭为不合理、殉葬更不合理，提出商周或为封建前期、有奴隶的想法。吕思勉认为东周有奴隶，吴楚兵器犀利、纳税者为农奴，汉为典型封建制被破坏期，中国史上奴隶生产事不多、主从关系多以收税方式出之。

6月11日

史学会干事会会议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决定下次研究会仍以中国社会发展史为主题，并以郭沫若文章为讨论对象。

7月16日

史学会(筹)研究座谈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会议以中国社会发展史为主题，并以郭沫若有关文章为讨论对象。金兆梓、顾颉刚、胡厚宣等发表不同意见。周谷城随即于7月21日《文汇报》发表《中国奴隶社会论》，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到西汉末，东汉方进入封建社会。

同日

召开干事会会议，周谷城、金兆梓、顾颉刚、胡厚宣、林举岱、姚舜钦、李平心、周予同、陈旭麓等出席。通过陈乃乾、陈恭禄等二十五人为正式会员，决定入会者资格再增加“须以研究史学为主要研究工作者”一条。

8 月 20 日

史学会(筹)研究座谈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蔡尚思报告北京政治学习情况及史学界情况。李平心报告出版新史学研究刊物计划。议决:推定胡厚宣草拟关于奴隶社会的论文;扩大座谈内容,包括史学界消息、专题、讨论史书编著情况;会员要向李平心所编、由中华书局代印的新史学研究刊物供稿。

10 月 15 日

史学会(筹)研究座谈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王遽常、周谷城、谭其骧、林举岱、周予同、金兆梓、胡厚宣、伍蠡甫、李梦瑛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与上海市高教会史学研究会合作成立中国近代史组;调查上海各大学近代史教授姓名与住址;联系上海公私图书馆调查有关近代史资料编成目录,由苏继庼(商务)、陈守实(复旦)、林举岱(约大)、姚绍华(中华)、蔡尚思(沪江)、陈旭麓(大夏)、姚舜钦(光华)负责这项工作。

本年度

史学会(筹)举行多次干事会、研究座谈会,商讨学会活动安排、会员入会条件等,并结合形势,举行抗美援朝报告会,由李平心、姚绍华起草抗美援朝专题研究目录,还多次与苏联历史学家座谈,组织会员撰写论文。

1951 年

1 月 21 日

史学会(筹)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座谈会,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会议讨论了太平天国的起因、经过及其结果。吕思勉、林举岱、王国秀、徐德璘、陈旭麓、姚舜钦、金兆梓等发言。胡厚宣报告史学界最近消息,姚绍华报告

计划编辑美帝侵华丛书经过。

3月18日

史学会(筹)座谈会于海光图书馆进行。会议讨论爱国主义与历史教育问题。李家骥、吕思勉、金兆梓、徐平羽、柳诒徵、伍蠡甫、苏乾英、姚舜钦、李旭等发言或提交书面文章。周予同报告参加北京高等教育会议经过。

同日

举行干事会会议。蔡尚思、陈旭麓、姚绍华、顾颉刚、林举岱、周予同、金兆梓、胡厚宣、姚舜钦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刘铭恕、罗尔纲、汤定宇、王淑盘等为会员。决议由陈旭麓草拟教育工会史学研究会工作计划。

4月1日

史学会(筹)干事会会议在南京路新雅酒家举行。林举岱、周予同、金兆梓、胡厚宣、姚绍华、苏乾英、姚舜钦、周谷城、杨宽出席会议。会议决定由苏乾英与教育工会史学研究会合作编著中国近代资料目录,顾颉刚、陈乃乾等对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目录提供意见、补充书目作为史学会意见寄北京。

6月3日

史学会(筹)干事会会议在海光图书馆举行。林举岱、周予同、金兆梓、胡厚宣、周谷城、杨宽、苏乾英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近代史资料目录编辑工作委员会,推定周予同、姚绍华、苏乾英负责进行。决定成立历史周刊委员会,胡厚宣负筹备及征集编辑稿件全责,周予同、周谷城负责向报馆接洽。刊名暂定为《历史周刊》,对外名义为《历史周刊社》。

6月17日

史学会(筹)座谈会在合众图书馆举行。讨论题目为“从武训谈到历史人物的批判”。林举岱、周予同、苏乾英、蔡尚思、姚舜钦、王国秀、金兆梓、顾颉刚、史守谟、李旭、徐德璘、杨宽等发言。

同日

举行干事会会议,蔡尚思、苏乾英、周予同、姚舜钦、杨宽、林举岱、顾颉刚、

金兆梓等参加。会议听取关于太平天国史料问题,《历史周刊》要重教材、重理论等的报告。

9 月 2 日

史学会(筹)在合众图书馆举行座谈会。姚舜钦报告北京总会工作,转述郭沫若六点意见:从唯心到唯物,从个人到集体,从名山到大众,从古代到近代,从肃清大汉族主义到尊重兄弟民族,从重视欧美到重视亚洲。

本年度

举行多次干事会会议,商议史学会成立的相关事宜。并决定每月出版一期《史学研究》,由李平心负责。胡厚宣、顾颉刚、姚绍华、姚舜钦、陈旭麓、周谷城、李平心、蔡尚思等经常出席。

1952 年

1 月 12 日

史学会(筹)干事会会议在海光图书馆举行。陈旭麓、杨宽、李平心、蔡尚思、林举岱、姚舜钦、周谷城等出席会议。决定召开史学会成立大会日期及大会的议程,拟定章程草案,修正理事提议名单等。

1 月 28 日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史学会)成立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周予同主持会议,周谷城报告筹备经过。来宾吕振羽讲话,预祝史学界团结奋斗,完成任务。大会通过了史学会简章。选举王国秀、李平心、李亚农、吴泽、邱汉生、金兆梓、周予同、周谷城、杨宽、林举岱、姚舜钦、胡厚宣、徐平羽、陈旭麓、陈乐素、蔡尚思、顾颉刚等十七人为理事。决议由理事会依照大会意见组织专门委员会,学习事宜由理事会筹备。

2 月 18 日

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海光图书馆举行。推定李亚农为理事会主席，周谷城为副主席，胡厚宣为理事会秘书，林举岱为理事会副秘书。修正并通过上海分会会章。决定每月至少开座谈、专项研究或讲演会一次，由顾颉刚主持编辑兄弟民族史料丛刊，由李平心负责出版不定期的史学丛刊，由陈旭麓负责联系历史教学提纲工作。通过史学会编辑的史学丛刊第一集《中国奴隶社会研究丛刊》。

9 月 21 日

史学会理事会在上海跑马场上海古物管理委员会举行会议，林举岱、胡厚宣、周谷城、顾颉刚、周予同、金兆梓、蔡尚思、陈旭麓、徐平羽等出席，决定吸收张厚载、魏建猷、吴杰为会员。

同日

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周谷城报告会务；林举岱报告编辑《中国奴隶社会研究丛刊》及英文《中国奴隶社会论战》一文情况；陈旭麓报告教学研究情况；顾颉刚报告史料编辑计划。会议讨论了支持吕思勉编写中国通史的问题，研究如何纠正因为害怕批评而缺乏史学稿件的问题。

11 月 30 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会议，分组讨论《中国通史概要》。林举岱、胡厚宣、周谷城、顾颉刚、周予同、金兆梓、蔡尚思、、陈旭麓、魏建猷、吴杰、俞巴林、朱东润、陈乃乾、马长寿、曹未风、苏乾英、黄颖先、王国秀、李亚农、姚舜钦等出席会议。

同日

举行理事会会议，通过张元济、田汝康、戴家祥、张国淦等为会员。

12 月 28 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座谈会，李亚农认为，历史研究工作应就其现有资料，而不能长期等待，只要抓住关键材料就可以了。他还认为：1. 殷代为

奴隶制开始而非奴隶社会;2. 青铜器为氏族社会而非奴隶社会生产工具;3. 周民族是氏族制;4. 赏赐土地又赏赐人口,可附属于土地当为封建社会;5. 周厉王时"国人"暴动,是剥削的结果,被剥削者当为农民;6. 周宣王以后中国社会转入封建社会;7. 行会基础在春秋时已具备;8. 田赋,从资料和发展规律看,为货币税收;9. 井田问题,除孟子说过外其前未发现;10. 从《诗经》中描写集体农耕,可见西周为奴隶社会。11. 徹,是实物地租。金兆梓作了审查《中国通史概要》的报告。

本年度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多次举行理事会、研究座谈会。交流中国科学院、复旦历史系和华东师大历史系情况,讨论戊戌变法丛书目录及史料整理等问题。

1953 年

1 月 18 日

史学会在南京路新雅酒家举行理事会会议,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顾颉刚、林举岱、王国秀、金兆梓、杨宽、陈旭麓出席会议。会议同意杭州成立分会,并报告总会,通过曹汉奇为会员。

1 月 25 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大会。沈志远介绍北京的学术组织情况,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对史学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史学研究应推进科学的规范,寻找规律,而不是罗列现象。周谷城报告会务:干事(理事)会先后召开二十三次,座谈会召开二十一次,对于自我提高起了一定作用;并审查了北京总会交下的各项史料书目、《中国历史概要》、《中国通史演义》和金兆梓、李亚农

等人著作。周予同谈教育改革情况。吴泽介绍华东师大历史教学的情况，希望总结吕思勉的工作。俞巴林介绍史料丛书的出版工作。蔡尚思和周谷城分别提出对中国史教学的建议。会议选举王国秀、李平心、李亚农、吕思勉、吴泽、邱汉生、金兆梓、周予同、周谷城、杨宽、林举岱、姚舜钦、胡厚宣、章丹枫（巽）、陈旭麓、蔡尚思、顾颉刚等十七人为理事。

3 月 7 日

史学会在愚园路新华园 37 号举行新一届理事会会议。周谷城等十一人出席。通过王造时为会员，商洽定会址于海光图书馆。

3 月 29 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座谈会，哀悼斯大林同志逝世。潘硌基、章丹枫、周予同、沈起炜、李平心分别就学习斯大林学说、苏联史学界最近情况、苏联史学界编制历史地图的经验、苏联中等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情况以及吸收苏联先进经验等问题作了发言。

5 月 31 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召开座谈会。李平心作《斯大林的历史学说》报告。胡厚宣、姚舜钦、杨宽、吴杰、顾颉刚等作为小组代表发言。

同日

举行理事会会议，胡厚宣、顾颉刚、林举岱、王国秀、姚舜钦、周谷城、吕思勉、杨宽、李平心出席。决议入会者资格增加为“凡具有优良成绩，并有二年以上工龄，经会员二人理事一人介绍者，予以考虑吸收为会员”。通过胡曲园等为会员。决议争取出版期刊，由李平心、胡厚宣、俞巴林、周谷城、顾颉刚拟定计划。

7 月 19 日

史学会在新华园 37 号举行理事会会议，周予同、金兆梓、胡厚宣、杨宽、王国秀、姚舜钦、林举岱、李亚农出席。通过朱伯康等为会员。李平心等计划刊物定名《历史研究丛刊》，一期三万到五万字，内容范围不限，由中国史学会

上海分会编辑，推定李平心、胡厚宣、顾颉刚、俞巴林、周谷城、陈旭麓、林举岱、周予同负责筹备有关事宜。

7 月 26 日

史学会在功德林素食处举行 1953 年度第二次年会。周谷城等三十余人出席。会务报告后，胡厚宣报告《最近中国考古情况》，介绍解放后考古学的成就。讨论修改会章。由于上海银行所办海光图书馆由文化局接管，文史哲书籍将停止借阅，会议决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接洽，希望维持原状。

9 月 25 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第 25 次座谈会。翦伯赞介绍北京史学会情况，并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工作情况，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历史系情况，以及中国历史阶段问题的讨论情况。

10 月 18 日

史学会在新华园 37 号举行理事会会议，胡厚宣、顾颉刚、林举岱、王国秀、周谷城、吕思勉、李平心、蔡尚思、周予同、王造时、陈旭麓等出席。决定本会出版工作与计划，由周谷城与自由出版社（后改与新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接洽。蔡尚思等介绍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情况，全国十三所大学有历史系，高教部以北大、人大为重点，其次为东北人大和山东大学。周予同认为此次会议体现重视语文、重视民族传统、重视老教师的精神。

11 月 29 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理事会会议，李亚农、顾颉刚、胡厚宣、周谷城、杨宽、姚舜钦、林举岱、金兆梓、王国秀、李平心、蔡尚思、周予同出席。会议通过梅公毅、耿淡如等为会员。接受华东人民出版社委托，编辑《怎样学习祖国历史》；确定《历史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金兆梓、顾颉刚、李平心、胡厚宣、吴泽、陈旭麓、李亚农、周谷城、林举岱、杨宽、伍蠡甫、陈守实、周予同、戴家祥、吕思勉、蔡尚思。召集人李亚农，胡厚宣、陈旭麓、金兆梓、顾颉

刚分别负责收集稿件。第一集争取1954年2月出版。同时决定今后座谈时应加强政治思想性和学术性，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日

史学会在海光图书馆举行座谈会，出席者有周谷城等二十人。会议以历史科学研究与教学及国家建设关系为题进行讨论。蔡尚思介绍北京高等教育情况，传达陈伯达、李达、范文澜、侯外庐等讲话；戴家祥、金兆梓、李平心、周谷城、李亚农、胡厚宣等发言。

12月27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理事会会议。周谷城等九人出席。会议讨论了理事会改选、成立近代史研究小组、编辑年鉴等问题。

同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胡厚宣等三十余人出席。主要讨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予同、谭其骧、戴家祥、胡厚宣、李平心、蔡尚思、吴杰等发表了各自意见。

1954年

1月24日

史学会在岳阳路320号举行理事会会议。杨宽、周谷城、李平心、蔡尚思、陈旭麓、李亚农、胡厚宣、顾颉刚、林举岱、王国秀出席会议。会议通过洪廷彦等为新会员。拟定李亚农、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顾颉刚、林举岱、杨宽、吕思勉、李平心、蔡尚思、陈旭麓、戴家祥、陈守实、金兆梓、王造时、吴泽、章丹枫、王国秀、姚舜钦等十九人为新理事候选人。会址拟利用博物馆或枫林路科学院。关于亚洲文会图书，由杨宽向文化局建议，不打乱原系统，保持其完整性，以便利用。

2 月24 日

史学会在人民广场博物馆举行年会。共有四十八人出席会议,李亚农主持,周谷城作会务报告,会员总数九十一人,除已故、迁移及杭州另行成立分会外,实有八十人。拟出版五到八万字的月刊《史学丛刊》。胡厚宣报告酝酿理事名单的原则,蔡尚思报告复旦历史教学情况,吴泽报告华东师大历史教学情况。提名的十九人均当选为理事。

3 月28 日

史学会在华东科学院举行理事会会议。会议推定新的理事会主席李亚农、副主席周谷城,通过陈仁炳、方诗铭等为会员。讨论编辑出版本会丛刊,拟由王著《中国行政区域沿革史》、张译关于苏联历史科学专著、周译法国革命阶级观、顾和金《尚书译文》、林译《Si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伍著《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等组成,并由周谷城与自由出版社联系,并转告出版主管部门。决定成立中国近代史小组,由陈旭麓、陈乃乾、胡绳武负责,并决定组员和工作计划。

4 月5 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座谈会,胡厚宣等三十余人出席。主题是历史科学怎样为国家总路线服务。吴泽作报告,内容涉及社会发展规律、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对国家总路线的历史科学的看法、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问题。陈旭麓、胡厚宣、梅公毅、王丹岑分别代表各自小组发言。李亚农作总结,认为史学工作者必须以培养青年爱国热情为己任,史学会必须成为提高大家政治、学术水准的工具,须多讨论史学问题,须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5 月24 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座谈会。杨宽等近三十人出席,马长寿报告蒙古草原原始公社制、奴隶制、游牧封建制。

7 月20 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魏建猷等二十余人出席。胡厚宣报告参观东北高校和博物馆情况。顾颉刚谈来沪后经历，希望今后能安定下来，好好作研究。

8 月 29 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座谈会，周予同等二十余人出席。周予同报告教育部、高教部联合召开会议情况，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学部。智建忠介绍东北史学界情况。顾廷龙介绍北京图书馆和东北图书馆情况。

10 月 31 日

史学会于上海博物馆举行理事会会议，周予同等十人出席。通过戴介民、程应镠、杨志信等为会员。同意与市教育局合作，为中学教师作历史讲演，中国古代史由胡厚宣、杨宽负责，中国近代史由李平心负责，世界近代史由王造时负责。

同日

举行座谈会，陈守实等三十余人出席。周谷城谈对于翦伯赞著作意见，认为缺乏思想性和唯物主义。金兆梓认为奴隶社会开始于战国，封建社会始于东汉而完成于唐。束世澂认为宋代为资本主义开始时期。

11 月 28 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理事会会议，杨宽等十人出席。通过陈懋恒、赵泉澄为会员。决定理事职务延长一年。

11 月 28 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胡厚宣等三十余人出席会议，主要评论尚钺著作。吴杰认为优点在于讲爱国主义、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作用，缺点在于经济方面不够。李旭、谭其骧、程应镠等也发表了意见。

12 月 26 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会议，杨宽等九人出席，决定年会在新雅饭店举行，并进行理事会改选。

12 月 26 日

举行座谈会，杨宽等二十余人出席。彭信威报告中国货币史写作经过，会议参加者进行了讨论。酝酿下届理事名单，建议图书馆方面及中等学校各增加一人。会议还批判了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周予同、姚舜钦、梅公毅等发言。

1955年

1月30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1954年年会。王遽常等二十余人出席。周予同主持会议，周谷城作会务报告。理事由于顾颉刚调北京，吕思勉回常州，推选顾廷龙、洪廷彦递补。为彻底批判胡适派思想，上海文教界成立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历史学组召集人为周谷城、蔡尚思、吴泽，组员共十九人。

2月27日

史学会在博物馆举行座谈会，周谷城等二十余人出席。吴泽作报告批判胡适思想，认为胡适的历史观点、态度、方法，完全用生物进化论做他的伪装。周谷城、姚舜钦、马荫良、戴介民、苏渊雷、周予同、王造时、杨宽、马伯煌、洪廷彦、李家骥等发言。

3月27日

史学会在博物馆举行座谈会，黄颖先等近三十人出席，讨论成立经济史、文化史、科学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人物评介及历史地理等专门史小组。

同日

举行理事会会议。周谷城、周予同、顾廷龙、陈守实、王国秀、林举岱、洪廷彦、胡厚宣、蔡尚思等出席会议。决定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新知识出版社交涉，会员作品可冠本会丛刊字样，史学会代为组织稿件，经济由出版社负责，由出版社最后决定选用。

9 月 25 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理事会会议，周予同等参加。决定下阶段学术讨论选题。

9 月 25 日

召开座谈会，顾廷龙等三十人参加。舒新城报告搜集帝国主义侵华史料缘起，提出藏书楼资料很多，上海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整理这些史料。

1956 年

3 月 3 日

史学会召开十二年规划的史学筹备小组会议，吴泽主持。与会者初步提出了上海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些中心问题，如：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中国经济史、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人运动等。海关、工厂等都有特殊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会议将参加人员分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组，李亚农、蔡尚思、周予同、吴泽、章巽、陈守实、胡厚宣、徐森玉、杨宽，蔡尚思为召集人；中国近代史及现代史组，李平心、陈旭麓、胡绳武，陈旭麓为召集人；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组，周谷城、耿淡如，周谷城为召集人；世界近代及现代史组，林举岱、程应镠，林举岱为召集人。各组将对长远研究课题提出要求。

3 月 4 日

史学会在新雅酒家举行座谈会。周谷城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党政推动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情况。吴泽谈史学的工作成就。李平心谈赴北京参加各种会议情况。周予同谈学会存在的问题、远景及团结史学工作者问题。

5 月 20 日

史学会在科学院招待所举行理事会会议，周谷城等参加。讨论今后分组活

动安排：中国史方面，中心问题由陈守实、吴泽负责，通史断代史由胡厚宣、程应镠负责，专史由周予同负责，资料由杨宽、顾廷龙负责。近现代史方面，中心问题由陈旭麓负责，通史、专史由陈旭麓、蔡尚思负责，资料由陈旭麓负责。

同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周谷城等十一人参加。吴泽报告制定规划情况后，分小组讨论。

8 月 26 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理事会会议，周予同等十二人出席。会议确定了编委会委员初步名单：李亚农、金兆梓、蔡尚思、吴泽、杨宽、程应镠、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陈旭麓等。吸收舒新城、苏渊雷、叶玉华、徐崙、年子敏、桂琼英为会员。

同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苏乾英等三十余人出席。周谷城传达 8 月 1 日沈志远召集上海市有关学会负责人会议情况，该次会议明确各学会暂由学术委员会筹委会领导。史学会是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要争取当地党政的领导。学会今后的工作是组织史学工作者，传达党政对史学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学术活动。上海已决定先创办综合性学术刊物。周予同传达高教部召开的高校校长、教务长会议精神。陈旭麓传达教育部讨论文史哲教学大纲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百家争鸣方针与今后工作，朱鸿达、胡厚宣、顾廷龙、林举岱、周予同、胡厚宣、周谷城、杨宽等发言。

10 月 21 日

史学会在博物馆举行理事会会议。李平心、周谷城、陈守实、杨宽、王造时、章丹枫、周予同、王国秀、顾廷龙、林举岱、洪廷彦、吴泽参加会议。列席的有石啸冲、尚丁。会议决定在助教中发展会员，活跃学会工作，并组织会员向《学术月刊》积极投稿。

11 月 11 日

史学会在博物馆举行理事会会议，到会有阳同等六人，列席徐崙、年子敏等。与会者认为上海历史研究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为重点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应强调研究与资料工作的结合，资料工作应有专职高级人员的指导，研究所应与其他方面加强交流。

12 月 30 日

史学会在博物馆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束世澂的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形态初论》，顾廷龙等二十余人参加。束世澂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说并不恰当，从秦到鸦片战争前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周予同、李家骥、王丹岑、吴泽、杨宽、苏渊雷等发言。

1957 年

年初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会议，杨宽等十二人出席，讨论改选理事、《学术月刊》约稿及批准新会员等事项。

2 月 22 日

史学会在高安路 12 弄 3 号举行新理事就职会议，李家骥、周谷城、张玫、徐崙、束世澂、王国秀、戴家祥、林举岱、陈旭麓、吴泽、杨宽、顾廷龙、洪廷彦、阳同、陈守实、谭其骧等出席。会议讨论章程修改问题，初步协商决定由李平心、吴泽、束世澂、周予同、周谷城、顾廷龙、李亚农、杨宽、徐崙、李家骥、谭其骧、林举岱、程天赋组成常务委员会。常务主席周谷城，副主席吴泽、李平心，秘书杨宽、程天赋。理事会主席李亚农，副主席周谷城。

3 月 8 日

史学会在博物馆举行常务理事会会议。程应镠等十人出席，讨论年会议程。

3 月 10 日

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年会。周予同主持会议。周谷城报告会务工作并作修改学会章程的说明。史学会当时有会员一百五十名,其中上海地区一百人。市委负责人魏文伯到会讲话,希望尽量发挥个人专长,个人的钻研与集体智慧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分析史料,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后辈要尊重前辈,不要不懂装懂,各党派并存,共同奋斗,努力创造新的辉煌。法学会、国际关系学会代表也在会上讲话。下午,与会者就《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谈学习体会。

4 月 28 日

史学会召开理事会会议暨座谈会,程应镠、陈守实、杨宽、徐崙、周谷城、顾廷龙、周予同、姚舜钦、吴泽、束世澂、戴家祥、张玫、李家骥、洪廷彦、王国秀等出席。会议通过新会员二十六人,决定每月最后一周召开一次座谈会,学术活动分组举行,由常委会领导。分组情况及各组负责人:中国古代中代组,程应镠、束世澂、陈守实;中国现代近代组,陈旭麓、胡绳武、魏建猷;世界古代中代组,耿淡如、陈祖源、韩亦琦;世界现代近代组,林举岱、朱延辉、靳文翰;亚洲史作为后备组,田汝康、张荫桐。各组名列第一位者为第一召集人。

5 月 12 日

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常务理事与召集人会议,周谷城主持,讨论上述各组工作计划。

5 月 15 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讨论如何在史学领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上许多人提出历史学科不被重视,特别是不重视世界史,并认为必须赶快改变这种情况。

5 月 22 日

史学会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联合举办《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之后每月一

次，共举行八次。

6月以后，全国开展反右斗争，史学会在上海社联领导下，也对王造时等人进行了批判。

1958年

1月16日

陆定一、舒文主持举行了历史学座谈会，出席的有石西民、陈其五、舒文、程天赋、奚原、蔡尚思、徐常太、胡绳武、金冲及、陈旭麓、陈云露、沈以行、徐平羽、方行、罗竹风、刘振海、朱明远、赵宗颇、徐崙。

1月19日

史学会扩大理事会在博物馆举行，金兆梓等十七人出席。会议检查了1957年学会没有很好地开展活动的原因，研究会员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并对百家争鸣方针开展讨论，研究了学会的活动及规划。

2月16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会议，吴泽等十余人出席。讨论规划问题及纪念吕思勉逝世事。

2月28日

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周谷城为史学会会长，副会长奚原、蔡尚思。经统计，史学会有会员一百四十人，其中党员十八人。

4月20日

史学会召开会员扩大会议，讨论"厚今薄古"问题。到会者有上海各高校、历史研究所及一些中学的老师共六十八人，林举岱、谭其骧、魏建猷、洪廷彦、汤志钧、舒新城、蔡尚思、吴泽、周谷城等十四人发言。

同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会议，周谷城等十余人出席会议，同意尹石公、伍蠡甫退会，同意吸收顾玉良、刘力行等三十五人入会。

4 月30 日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同意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提出的史学会分党组名单，书记奚原，组员程天赋、徐崙、蔡尚思、吴泽、沈以行、陆志仁。

5 月8 日

史学会分党组第一次会议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吴泽、沈以行、徐崙、陆志仁、蔡尚思、奚原参加会议。会议传达社联党组在五月份讨论两类矛盾的意义，讨论批判修正主义问题，关于“厚今薄古”的争论与上两项有联系，要继续引导到把握其精神实质上去。并讨论近期学会活动开展的问题、理事会改选的问题。

5 月11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继续座谈“厚今薄古”问题，周予同、徐崙、汤志钧、吴泽、李亚农等十二人发言。

5 月12 日

史学会在博物馆举行会议，讨论各组工作计划。

5 月18 日

史学会分党组扩大会议在上海历史研究所举行，蔡尚思、陆志仁、徐崙、傅道慧、胡绳武、奚原、刘力行、任建树、洪廷彦出席会议。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拟在5 月下旬组织大组讨论。

6 月1 、12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接连举行学习两类矛盾学说座谈会，周谷城、吴泽分别主持两次会议，共有一百三十余人次参加。在会上发言的有胡绳武、夏东元、王国秀、束世澂、曹漫之、方诗铭、徐崙、陈旭麓、金兆梓、沈以行、任建树、郭圣铭、奚原等。座谈会围绕“人民”的概念、阶级社会中两类矛盾的关

系、运用两类矛盾的学说研究历史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6月16日

史学会分党组扩大会议在董斯康公寓12楼举行，徐崙、沈以行、陆志仁、陈旭麓、吴泽、徐常太、林德明、顾玉良、石岚出席，会议讨论了上海市历史科学五年规划草案及协作问题。

6月18、20日

史学会分党组、理事会分别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吴泽、姚舜钦、刘忠宝、程天赋、徐常太、沈以行、陈旭麓、郭太和、奚原、徐崙、王音长、洪廷彦、曹漫之等出席会议。讨论上海历史科学工作五年规划草案；通过方行、林德明等为会员；筹备召开史学界大跃进会议。

6月22日

史学会上海市历史科学工作跃进大会在科学会堂召开，约四百五十人参加。吴泽代表史学会报告上海历史科学工作五年规划，金冲及等十六人发言，报告各单位跃进规划。曹漫之作总结发言。

6月27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会议，沈以行、吴泽、奚原、陈旭麓、徐崙、蔡尚思出席。会议讨论了在教学革新、教材编写等方面开展协作的问题。

7月25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曹漫之、吴泽、陈旭麓、沈以行、陆志仁、程天赋、王亚夫、蔡尚思、徐常太出席。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委宣传部、市农委办公室、市委工业部办公室、市委财贸部办公室、团市委、市计委等人员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主要讨论了为迎接建国十周年、总结上海十年来历史经验的征文活动。

7月26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声讨美英帝国主义入侵黎巴嫩、约旦。朱

延辉、王国秀、刘惠吾、夏东元、林举岱等出席。

8 月 16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历史研究所举行会议。洪秉奇、蔡尚思、赵宗颐、吴泽、徐崙、奚原、洪廷彦等出席,会议讨论了总结十年工作经验,下乡下厂编写家史厂史和适当时机建立协作组织等问题。

8 月 24 日

史学会在高安路 63 号举行讨论会,讨论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问题。

9 月 7 日

史学会分党组举行会议,徐崙、奚原、沈以行、蔡尚思出席,曹漫之、洪廷彦、陈旭麓等列席,讨论贯彻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计划。曹漫之传达领导同志在宣传部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出版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有跃进指标。

9 月 10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宋心伟、徐崙、洪廷彦、石岚、沈以行、陈旭麓等参加会议。曹漫之传达市委报告精神,提出要搞上海史、工厂史、对资本主义改造史。

9 月 14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史学界跃进规划。

9 月 21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党组扩大会,吴泽等三十余人出席。讨论贯彻社联党组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和研究开展学习与宣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出历史科学大跃进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包括: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计划;开展学术批判的写作计划;各单位在历史科学大跃进中放卫星的计划;进行协作配合的问题。

9 月 25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扩大会，抗议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拥护陈毅外长声明。周谷城主持会议，周谷城、王国秀等十九人发言。

11月23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会议，奚原、徐崙、沈以行、吴泽出席，宋心伟、朱永嘉等列席。会议研究了开展学术批判问题、纪念国庆十周年放卫星的课题。

11月30日

史学会编写工厂史经验交流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奚原等九十人出席。吴泽主持会议，史惠康、孙云棣、施振南、上海农业药械厂代表等介绍情况。沈以行作总结。

1959年

1月4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奚原等十五人出席。会议内容：讨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活动，1959年史学界的出版规划，研究召开公社史编写经验交流会，讨论上海史、上海志的编写问题等。

1月11日

史学会编写公社史经验交流会在陕西北路186号经济研究所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奚原等五十五人。周谷城主持会议，李振荣、孙伯言、任建树等十一人发言。

3月1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召开理事扩大会，讨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草拟的中国通史的提纲。束世澂等二十七人出席，杨宽、周予同、周谷城、朱永嘉、谭其骧、陈守实等发言。

3 月 2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会议，沈以行等十三人出席，讨论 1959 年史学会工作跃进规划，讨论出版《五四运动史料》和论文集及国庆 10 周年纪念集。

4 月 10 日

史学会编制 1959 年工作计划，提出当年史学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实际情况，从而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用以鼓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应当充分利用近现代史的档案和资料，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坚持聚集人才分工协作的方针，提倡互助协作。基本任务是：1. 由全市各单位协作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的各项工作；2. 各单位配合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委会征集文物、调查访问和整理研究等项工作；3. 编写历史教材和教学参考工具书；4. 展开对《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讨论；5. 完成 1919 – 1926 年的大事长编，以及上海党史资料、人民革命史料、工运史料等专题汇编；6. 继续进行工厂史公社史的调查研究；7. 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发表论文和有关上海解放十周年的调查研究资料；8. 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研究队伍，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学会。

4 月 30 日

史学会在社联举行会议，讨论五四运动在上海资料汇编问题。

5 月 4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座谈会，近五十人参加。李培南、徐崙、郭绍虞、周予同、沈以行、漆琪生、吴斐丹、董问樵、叶以群等发言。

同日

史学会邀请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复旦大学、上海历史研究所及中华书局等单位代表四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就郭沫若、翦伯赞"替曹操翻案"的观点进行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一）曹操的功过评价；（二）要不要为曹操翻

案;(三)曹操与黄巾起义等。

5 月 13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六人出席,传达市委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导的会议精神,研究在五六月份内开展以下工作:1. 展开关于曹操的讨论,解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2. 展开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讨论;3. 提高编写工厂史、公社史的质量;4. 加强党内史学工作者的一盘棋思想。

5 月、6 月

史学会举行两次会议,讨论曹操评价问题。会议由周予同等主持,束世澂、谢天佑、郭圣铭、徐德璘、李旭、金兆梓、谭其骧、陈守实、徐崙、沈以行、姚震襄、朱永嘉等人出席并发言。

7 月 12 日

史学会在社联举行分党组扩大会议,奚原等九人出席。会议主要讨论:开展学术讨论,迎接国庆十周年论文写作;会员中右派的处理;组织会员活动等。

同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会会议,十九人出席,周谷城主持会议。吸收王汉明等三十八人入会。此前会员有二百零二人。会议还讨论了下半年工作计划。

8 月 15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会议,沈以行等七人出席。研究国庆论文的题目和分工,组织开展对梁启超等近代人物的讨论。

8 月 20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周谷城主持。蔡尚思介绍了北京史学界情况:有些人对史料处理不严肃;历史人物评价与百家争鸣问题;通史与专史的关系与编写等。王伯祥、周予同、金兆梓等就国庆论文问题发

言。

9 月 12 日

经统计，史学会当时有会员二百四十一人。其中男二百十三人、女二十八人，党员九十七人、团员十五人、民主党派五十三人、无党派七十六人。教授六十六人、研究员七人、讲师三十五人、助教三十九人、研究生六人、局处长以上干部二十四人、科长二十人、一般干部六人、党团干校教员二十一人、编辑十三人、中小学教员四人、无业四人、其他六人。

10 月 10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会议，徐崙、陆志仁、吴泽、程天赋、陈希崙、姚震寰、胡少鸣、曹漫之、朱永嘉出席。胡少鸣传达陈其五在《文汇报》座谈会上的指示，提出要保卫总路线。

10 月 18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扩大会议，大会主席周谷城。会议讨论史学界如何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研究 1959 年年会的准备工作。李平心书面发言谈保卫总路线问题，提出组织专题论文、组织报告会、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等建议。

11 月 21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奚原等十人参加，研究召开年会。

11 月 25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周谷城主持，十四人参加会议。周谷城、周予同、张玫、吴泽、奚原等围绕年会的基本精神是贯彻总路线和百家争鸣展开讨论。

12 月 1 日、8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两次扩大会议，奚原等十人出席，讨论年会报告内容。

12 月 18 日

史学会在浦东大楼举行1959年年会第一次大会，到会会员一百十三人，列席一百四十一人，周谷城主持会议。市委陈其五作必须保卫总路线贯彻总路线的政治报告。会务工作报告指出，两年来，史学界在改造思想和端正方向方面进行了下列活动：1. 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2. 组织"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大辩论；3. 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4. 加强了理论联系实际，许多史学工作者深入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实际；5. 展开学术讨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两年来的成绩：1. 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2. 开展了调查、编写工厂史和公社史的工作；3. 实现历史教学大革新；4. 以历史科学为武器，直接参加当前政治斗争；5. 培养了新生力量。提出今后的任务是：1. 继续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2.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编写教材、编写中国历史丛书、编辑上海工人运动史料汇编、五卅运动史料汇编，以及辞海、历史地图、现代史大事志、工厂史、公社史等；3. 有计划、有组织地整理上海历史资料；4. 进一步开展学术讨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5. 在市委领导下推动史学工作的开展，团结上海史学界做好各项工作。吴泽、胡绳武、李学广、沈以行分别介绍了《史学工作者必须坚决保卫总路线贯彻总路线》、《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关于编写解放人民公社史的几点体会》、《史学界的新园地——工厂史》等重点论文。

12月18、19日

分党组举行两次扩大会议，研究年会情况。

12月20日

史学会在浦东举行1959年年会第二次大会，经选举，丁景唐、方行、王国秀、束世澂、刘维寅、吴泽、李亚农、李平心、李启华、沈以行、车载、周谷城、周予同、林举岱、林德明、金兆梓、姚舜钦、姚震寰、胡绳武、洪廷彦、陈希禽、陈守实、陈旭麓、徐崙、奚原、陆志仁、章巽、张玫、程天赋、程博洪、杨宽、蔡尚思、鲍文希、魏建猷、谭其骧、顾廷龙当选理事。在年会讨论会上，中国近代史组（组长徐崙、魏建猷、金冲及）、中国现代史第一小组（组长刘振海、刘宏

谊、杨波洲）、中国现代史第二小组（组长林远、韩明盛、张有年）、中国古代史组（组长吴泽、谭其骧、杨宽）、世界史组（组长田汝康、林举岱、陈崇武）分别就有关专业论文进行讨论，讨论的论文有：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陈守实《东汉后期的农民战争》、《曹操与天师道》，李平心《郭沫若与甲骨文研究》，金兆梓《补后汉书食货志》，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方诗铭《试论上海小刀会的组成》，夏东元《论天朝田亩制度的两重性》、陈宝琦、夏笠《目前中学历史教学中联系现实的几个问题》，历史所《虹桥人民怎样走上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史亦群《党史教学工作必须为保卫总路线而斗争》，黄美真《上海日丰纱厂二月大罢工》，赵清、黄美真《中国近代工人运动史的分期问题》，周谷城《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陶松云《13－14 世纪英国的农村和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苏松柏《论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田汝康《关于东南亚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资产阶级性质问题》。这些论文后编集出版《上海历史学会 1959 年年会论文集》。

当天大会通过《上海历史学会简章》，正式定名上海历史学会。

12 月 24 日

中共上海市委同意周谷城为史学会会长，奚原、李平心、沈以行、吴泽为副会长。

1960 年

1 月 17 日

史学会分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九人出席。会议听取石西民报告的传达，石在报告中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保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党的领导权。

1 月 24 日

分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九人出席，讨论学会 1960 年工作。

1 月 31 日

史学会在社联举行理事会会。推选周谷城为会长，奚原、李平心、沈以行、吴泽为副会长。程天赋、胡绳武、陈希嵩、洪廷彦为秘书。通过新会员五十人，讨论了 1960 年工作规划的要点。

2 月 18 日

分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九人出席，会议讨论了 1960 年工作计划及第一季度的工作安排。

2 月 23 日

史学会组织理事及古代史组部分成员，参观马桥古文化遗址。并于 3 月 6 日举行讨论会，讨论马桥文化的性质与发现意义。

2 月 26 日

史学会学术组举行成立会，程天赋、张启承、时进、赵宗颇、吴成平、朱永嘉出席。会议讨论了学术组的任务、有关尚钺问题讨论及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等问题。于 2 月 28 日、4 月 15 日，组织批判尚钺《踏实钻研与坚持真理》等文论点，撰写了批判文章。分党组还专门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对尚钺错误思想的批判。

2 月 27 日

史学会在社联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抗议美帝国主义劫夺我在台湾珍贵文物的罪行。会上，历史研究所、华东师大等单位的同志宣读了抗议书。

3 月 9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九人出席。曹漫之传达杨永直指示精神：社联学会是哲学社会科学团结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方，主要是展开学术讨论，坚决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不要戴帽子，要以理服人。

3 月20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九人出席。会议传达杨永直关于上海学术界要放开来的意见。并研究了对尚鉞、李平心、周谷城等人开展学术批评的问题。

3 月21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开展学术活动等问题，通过了新会员五人。会议决定成立学术组，在理事会领导下负责学术活动的具体组织工作，成员包括程天赋、胡绳武、陈希嵛、刘振海、时进、赵宗颇、鲍文希、张启承、谢天佑、吴成平。为便于开展学术活动，决定按会员专长分编为五个组，各组召集人为：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组，吴泽、谭其骧、杨宽；中国近代史，徐嵛、魏建猷、胡绳武、夏东元；中国现代革命史组，刘振海、林远、张有年、刘宏谊、甄宝亭、韩明盛；世界史组，林举岱、靳文翰、陈崇武；亚非史组，田汝康、吴成平、艾周昌。

3 月27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讨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与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共二百余人参加。至4 月上旬，史学会就此共组织了三次讨论会，后一问题主要集中在讨论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参加者超过三百余人次。

4 月3 日

史学会分党组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九人出席，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讨论问题。

4 月7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会议，陆志仁等十二人出席，研究开展学术讨论问题，朱永嘉介绍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情况。

4 月10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召开扩大会议，陆志仁等二十二人出席，讨论如

何组建史学理论队伍问题，谢天佑介绍农民战争与宗教问题讨论情况。

4月15日

史学会在社联召开会议，讨论批判尚钺的文章。

同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学术讨论等情况。

4月16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举行召集人扩大会议，研究现代史组开展学术活动问题。

4月23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九人出席，汇报和研究史学界的主要问题，吴泽介绍历史学陈寅恪、王国维、古史辨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各学派情况。

4月24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会议，交流各单位的教学和科研情况。

5月3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二十一人出席。曹漫之传达石西民召集各学会分党组书记会议情况，提出当前理论工作是"破中立"，"立"要写出书来。学术思想批判，主要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国内不是主要的，目前主要是搞学术讨论。徐崙介绍参加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座谈会的情况。

5月7日

史学会学术组举行会议，程天赋、姚震寰、胡绳武、陈希嵛、殷作伟出席，安排5－7月份工作。

5月13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九人出席，研究学会第二季度工作。

5 月 15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讨论陈象月、刘明义《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一文。

5 月 26 日

史学会理事会举行扩大会议，近二十人出席，徐崙传达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座谈会的精神与任务。会议还研究了五、六、七月份工作，发展新会员五十四人。

5 月 28 日

史学会举行纪念五卅运动三十五周年报告会，出席四百人。会议由周谷城主持，徐崙就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作了发言，国棉二厂党委书记张妙根介绍了五卅运动中工人反帝斗争的事迹，李华兴、马博庵也发了言。沈以行作了总结。

6 月 5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举行讨论会，林远等五十余人参加，讨论郑粲辉等撰《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一文。

6 月 21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研究纪念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发表两周年。

6 月 24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反对美帝侵略、坚决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座谈会，周谷城等九十余人参加。

6 月 26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刘振海等四十人出席，讨论王爱铃等撰《学习毛泽东思想、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 月 8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九人出席，研究第三季

度工作。

7 月 10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两个讨论会，分别讨论项立岑撰《两类矛盾学说与历史科学》，黄澄河撰《两类矛盾学说是历史教学改革的指针》。

7 月 22 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沈以行等七人出席，座谈中学历史教学革新问题。

7 月 24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举行讨论会，讨论韩明盛撰《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文。

7 月 31 日

史学会古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杨宽等一百余人出席，讨论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问题。

同日

史学会理事会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汇报上半年工作，讨论下半年工作安排。

8 月 6 日

史学会部分中学历史教师四十余人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讨论革新中学历史课本的体系与内容。

8 月 11 日

史学会学术组举行会议，程天赋等六人出席，讨论年会论文问题。

8 月 23 日

史学会举行太平军进军上海百周年的报告会，沈以行等一百三十余人出席，由徐崙主讲《太平军进军上海及其历史意义》。

9 月 4 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革命史组举行召集人扩大会议，刘振海等十四人出席，研究为迎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出版撰写论文问题。

9 月 17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和亚非史组召集人集会，研究开展学术讨论问题。

9 月 20 日

经统计，当时史学会有会员四百三十五人，其中党员二百二十一人。按工作单位分布，大专学校三百零九人、中小学六人、科研单位七十人、实际业务部门四十七人、社会人士三人。

9 月 25 日

史学会近代史组举行座谈会，近四十人出席，李振荣介绍在山东举行的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讨论会情况。

10 月 28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八人出席。曹漫之传达杨永直指示，主要还是学术思想上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有自己的队伍，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学术问题不能不注意策略，有时紧，有时松，社联及学会的同志必须学会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会议据此研究了学术讨论问题。

11 月 13 日

史学会理事会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工作，研究开展学术讨论及准备召开年会问题。

11 月 26 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中世纪组举行讨论会，杨宽等六十四人出席，讨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问题，争论重点是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

11 月 27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召开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十六人出席，讨论各专业组学术活动计划，研究学术讨论中贯彻双百方针、掌握领导问题。

12 月 1 日

史学会学术组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二十九人出席。奚原介绍毛选四

卷，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

12 月 4 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组举行讨论会，讨论夏东元《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与吴乾兑《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为什么忽战忽和》两文。同日，中国现代革命史组举行讨论会，讨论重庆谈判问题。18 日继续举行。共一百四十余人次出席。

12 月 8 日

史学会学术组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四十余人出席，奚原作“运用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科学”报告。

12 月 17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和亚非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会议，周谷城等十五人出席，座谈世界史、亚非史的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情况。

12 月 24 日

史学会近代史组举行讨论会，讨论刘恢祖等撰《1842 年上海抗英战争》与魏建猷《试论“天地会”的性质》两文。同日，史学会世界史组和亚非史组联合举行讨论会，周谷城等十五人出席，漫谈印度国大党政府的性质，田汝康、王国秀重点介绍。

12 月 25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举行报告会，一百余人出席，沈以行介绍全国工人运动史座谈会情况。

12 月 28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召开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六人出席，研究 1960 年年会的安排。

12 月 31 日

史学会理事会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举行 1960 年年会问题。

1961 年

1 月 4 日

社联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社联委员会和各学会理事会任期改为两年。史学会拟增刘振海、张铁毅、戴介民为理事。

1 月 10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会会议，十五人出席。沈以行传达社联主席团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研究安排 1960 年年会活动。

1 月 11 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百十周年纪念会。

1 月 11 日 -2 月 8 日

史学会举行 1960 年年会。会议采取各专业组分别活动的形式，共举行报告会十五次、讨论会七次，出席一千八百三十六人次，提出论文二十余篇，显示百家争鸣盛况。报告有：程博洪《古巴革命问题》、陈守实《论中国封建土地关系问题》、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章巽《古代中央亚细亚一带的地域区分》、周予同《中国经学中的学派问题》、谭其骧《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水运问题》、陆志仁《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体会》、李亚农（杨宽代）《中国的封建领主制与地主制》和《周伐商汤新证》、束世澂《西周封建制探索》、李旭《试论中国古史分期的几个问题》、王国秀《美英帝国主义经济魔爪在印度》、田汝康《论印度国大党》、沈以行《工人运动史内容方面几个问题的探讨》、徐连达《关于元末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孙道天《论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陈苏文《关于罗马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形成问题》、伍贻康《美德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陶樾《〈列宁主义万岁〉对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的指导意义》、黄宣佩《上海马桥古文化

遗址第一次发掘记述》等。各专业组举行了讨论会，讨论专题有：关于中国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百家争鸣问题；西周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政权问题；太平天国史研究问题；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等。

2 月 8 日

史学会 1960 年年会至今天结束。在科学会堂举行会员大会，出席一百六十余人，由周谷城作会务报告，李平心等十二人发言。改选后的理事会由丁景唐、方行、王国秀、束世澂、刘维寅、吴泽、李亚农、李平心、李启华、沈以行、车载、周谷城、周予同、林举岱、金兆梓、林德明、姚舜钦、姚震寰、胡绳武、洪廷彦、陈希崙、陈守实、陈旭麓、徐崙、奚原、陆志仁、章巽、张玫、程天赋、程博洪、杨宽、蔡尚思、鲍文希、魏建猷、谭其骧、顾廷龙、刘振海、张铁毅、戴介民组成。

3 月 3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八人出席，研究 1961 年工作。

3 月 8 日

史学会理事会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推举周予同为副会长，增选刘振海为秘书，推定各专业组召集人：中国古代史组，吴泽、谭其骧、杨宽；中国近代史组，徐崙、魏建猷、胡绳武、陈旭麓、夏东元；中国现代史组，刘振海、张铁毅、林远、李茹辛、郑维淑、韩明盛、甄宝亭；世界古代史组，耿淡如、郭圣铭；世界现代史组，林举岱、田汝康、靳文翰、冯纪宪、吴成平。会议还讨论了 1961 年史学会的工作。

3 月 18 日

史学会举行集会，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九十周年，二百多人参加。由会长周谷城主持，林举岱、刘文英等发了言。与会者热情歌颂巴黎公社的不朽原则和它对世界无产阶级所做出的贡献。

4 月 13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十人出席，研究《中国历史》讨论会筹备事项。新的党组由奚原、陆志仁、沈以行、徐崙、程天赋、吴泽、陈旭麓、姚震寰、蔡尚思等九人组成。

4 月 15 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讨论中国民主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的发展道路问题，近七十人出席。

4 月 22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林举岱等五十人出席，王国秀作《英美帝国主义经济魔爪在印度》的报告。

5 月 4 日

周谷城主持召开《中国历史》初稿的讨论会预备会，由尹达介绍《中国历史》初稿编写情况。与会者达二百三十余人。

5 月 5 日 –5 月 7 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分别组织讨论会，讨论《中国历史》初稿有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部分。

5 月 9 日

史学会党内理论队伍在科学会堂举行会议，三十六人出席，听取尹达谈学术界情况的报告。

5 月 15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十三人出席，总结《中国历史》初稿讨论会。

5 月 28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孙超作《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中最全面最丰富的理论》的报告。约二百人出席了会议。

6 月 13 日

史学会古代史组六十人参观青浦崧泽文化遗址。

6 月 19 日

史学会举行为期四天的中国历史学术讨论会，约二百余人参加，会议着重就中国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封建社会中的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封建田制、历史人物评价、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近代史的洋务运动、群众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7 月 1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吴成平等六十余人出席，梅公毅作《关于老挝历史情况》的报告。

7 月 22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十人出席，讨论下半年工作，研究理论队伍状况。

7 月 23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一百人在科学会堂举行会议，刘振海介绍编写中共党史读本中的若干问题。

7 月下旬

学会近代史组五十余人参观豫园小刀会起义史迹。

8 月 16－17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座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问题。

8 月 18 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四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张琼作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报告。

8 月中旬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七十余人参观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8 月 31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十二人出席，讨论中国

古代史组、中国近代史组、中国现代革命史组下半年学术活动计划。

9月7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与国际关系学会的部分会员座谈开展对印度的研究情况，金仲华、周谷城等十一人出席。

9月15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吴泽作关于历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五百名中学历史教师出席报告会。

9月17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组二十二人举行讨论会，讨论金冲及、胡绳武撰《武昌起义告诉了我们什么?》与陈旭麓撰《论宋教仁》两篇文章。

10月6日

史学会近代史组、现代史组联合在科学会堂召开报告会，包括中学历史教师在内的四百余人出席，陈旭麓作《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斗争》的报告。

10月8日

史学会近代史、现代史组联合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胡绳武作《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改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的报告，包括中学历史教师在内的二百五十人出席。

10月14日

史学会古代史组举行报告会，束世澂作《范晔与后汉书》的报告。

10月24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沈以行等五人出席，研究1961年年会问题，确定年会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注意提倡严肃认真的学风。并于12月10日、16日、30日举行会议，继续研究年会工作。

10月28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周谷城等五十人出席，讨论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11月21日，周谷城等四十余人继续在科学会堂进行

讨论。

11 月 4 日

史学会古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周予同、汤志钧作《修订 < 辞海 > 时涉及的中国经学史诸问题》等报告。

11 月 8 日

史学会学术组由沈以行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年会会务报告内容，确定由各单位分工整理上海史学界一年来学术活动情况。

11 月 9 日

史学会召开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酝酿 1961 年年会的活动内容与时间。周谷城提议，由于会员已达五百二十人，有必要增加理事。

11 月 11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会会议。徐崙传达武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的情况。

11 月 14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蔡尚思作《章炳麟思想的阶级性》的报告。二百余人出席了报告会。

11 月 21 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和世界史组举行讨论会。会议讨论史学史的对象、任务与史学史编写原则等问题。主要涉及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的关系、史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如何处理史学家和史学流派观、学术、政治三者的关系，及对史学遗产如何批判继承等。

12 月 2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讨论周子东等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一文。

12 月 5 日

史学会近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徐崙、夏东元介绍辛亥革命五十

周年讨论会的情况，王明枫介绍《略论“二次革命”在上海》、赵宗颇介绍《略论宋教仁被刺案的原因和性质》两文要点。

12 月 12 日

史学会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蔡尚思作《中国现代思想流派》的报告。三百余人出席了报告会。

本年度

史学会举行多次活动，主要有：交流教学经验；探讨教材编写；围绕会员学术论文如郭绪印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项立岭撰《论党成立前陈独秀的错误观点》展开讨论。

1962 年

1 月 3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会长会议，周谷城等六人出席，研究 1961 年年会工作。

1 月 4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约五百人出席，吴强介绍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

1 月 6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会会议，讨论 1961 年年会工作，并协商下届理事候选人名单。

1 月 13－14 日及 20－21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 1961 年年会，按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世界史四个组，分别举行讨论会和报告会，参加会员共一千人次，此外还有南

京、杭州、苏州等地史学界的同志也来参加会议。

中国古代史组的报告有：李平心《关于史学史的几个问题》，束世澂作《孔子〈春秋〉》，吴泽《魏源的变异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张家驹《论康熙之治河》，朱永嘉《关于清初历史和明末社会问题》，李旭《论康熙在历史上的作用》，陈守实《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徐连达《李密的失败与阶级关系》，谭其骧《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张若玫作《论宋江起义与梁山泊》，刘伯涵《农民战争中农民军的组织形式问题》，谢天佑《西汉农民起义中的皇权思想》。

中国近代史组的报告有：夏东元《论包世臣的货币主张》，王明枫《关于中国买办商人的一些问题》，魏建猷《海盐与镇江抗英战争》，胡绳武、金冲及《论黄兴》。

中国现代史组的报告有：周子东《关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项立岭《从陈独秀早期的言论探讨其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顾歧山《“非基督教运动”简述》，郭绪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沈以行《中共成立前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工人中的活动》的报告，胡刚、徐国华《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基本思想》。

世界史组的报告有：郭圣铭《论世界史的体系问题》，朱延辉《关于世界史体系的一些问题》，周谷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国际地位》，黄瑞章《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形成与内部矛盾》，耿淡如《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史学》，郭圣铭《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曹增寿《试论外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志》，李季谷《大月支人与贵霜帝国问题底探讨》，韩亦琦《张骞、班超通西域的时间、路线与中亚诸国之关系》，林举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爱尔兰民族起义》。

讨论会的议题有：中国史学史编纂中的若干问题、章炳麟的评价问题、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清初反满斗争的性质与康熙评价问题，外国史学史编纂中的若干问题，张骞评价问题，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中的几

个问题。

21日下午举行会员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丁景唐、方行、王国秀、刘振海、刘维寅、朱永嘉、沈以行、束世澂、李亚农、李平心、李启华、车载、时进、吴成平、吴泽、陆志仁、陈希崙、陈守实、陈旭麓、林举岱、林德明、周谷城、周予同、金兆梓、洪廷彦、胡绳武、姚舜钦、姚震寰、耿淡如、顾廷龙、徐崙、奚原、章巽、张玫、张家驹、张铁毅、程天赋、程博洪、杨宽、蔡尚思、鲍文希、戴介民、魏建猷、谭其骧。

1月24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成员五十人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流动展览。

2月26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十二人出席，研究1962年工作计划。

3月2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在科学会堂联合举办报告会，齐思和应邀作《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的报告，一百人出席。

3月3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会议。会议推举周谷城为会长，周予同、奚原、李平心、沈以行、吴泽为副会长，程天赋、刘振海、胡绳武、陈希崙、姚震寰、洪廷彦为秘书。各组召集人：中国古代史组，吴泽、谭其骧、杨宽。中国近代史组，徐崙、魏建猷、胡绳武、陈旭麓、夏东元。中国现代史组，蔡尚思、刘振海、张铁毅、林远、郑灿辉、刘宏谊、韩明盛、甄宝亭、张有年。世界古代史组，耿淡如、郭圣铭、韩亦琦。世界现代史组，林举岱、田汝康、靳文翰、冯纪宪、吴成平。会议安排了1962年学术活动。

3月6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办报告会，郑天挺应邀作《天津、北京史学界学术讨论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3 月 7 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组、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黎澍应邀作《历史科学的客观规律问题》的报告。

3 月 15 日

史学会部分会员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吴泽、李平心、陈守实、蔡尚思、周予同、徐崙、洪廷彦、顾廷龙、金兆梓、柴德赓、杜裕根、谭其骧等十五人出席，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编写问题。

3 月 31 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举行报告会，陈守实作《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略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的报告。

4 月 21 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举行报告会，翦伯赞应邀作《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的报告，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倾向。会员五百余人出席。

4 月 26 日

史学会由吴泽主持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周年。

4 月、5 月

史学会举办多场报告会，主要有：顾廷龙作《目录版本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报告，陈旭麓作《谈谈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报告，何肇发作《亚洲史研究近况》报告。

5 月 25 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就孔子的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孔子“仁”的核心、孔子学说与后世儒家阐述孔子的差别等问题交换了意见。6 月 30 日，中国古代史组举行孔子问题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有《孔子思想核心的剖视》等八篇，哲学学会、教育学会和政法学会的部分会员也参加了会议。

6 月 7 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七十五人出席，讨论我国过渡时期社会性质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我国在解放后有没有存在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

6 月 16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十二人出席，研究史学界动态及下半年工作。

6 月 20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召开小型座谈会，奚原等八人出席，讨论《中国史稿》第六册。

7 月

史学会举办的报告会主要有：王仲荦《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与皇朝》、翦伯赞《关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8 月 29 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近代史组联合举办报告会，邀请傅衣凌作《有关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8 月 31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会会议，十八人出席，会议研究了加强学术活动的问题，商讨下半年工作。

9 月 20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座谈如何加强世界史的学术活动、商讨下半年工作及交流世界史图书资料情况。

9 月 27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举办报告会，郭圣铭作《批判汤因比的反动史观》的报告。

10 月 6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七人出席，研究 1962 年

年会工作，研究参加山东孔子讨论会事宜。

10月18日

史学会和国际关系学会联合在科学会堂举办报告会，林举岱作《关于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10月30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举行孔子问题的座谈会。

11月3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组和现代史组联合在科学会堂举办报告会，陶菊隐作《北洋军阀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的报告。11月17日、12月1日继续举行，每次均有三四百人出席。

11月6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讨论五四运动是否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问题。11月21日、12月27日继续举行，各有数十人出席。

11月16－18日

程天赋、陈旭麓、雷仲平代表史学会去杭州，参加浙江历史学会年会表示祝贺。

11月20日

学会世界古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报告会，陈序经作《东南亚古史研究情况》的报告。

12月9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和专业组召集人联席会议，三十六人出席，传达社联主席团扩大会议精神，讨论1962年年会的问题，介绍了孔子问题讨论会和浙江历史学会年会情况。

12月16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组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讨论中国史稿第四册（近代史部分）。

同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十二人出席，吴泽介绍外地学术界情况后，会议讨论了1962年年会工作。

1963年

1月8日

史学会党内理论队伍三十五人在社联举行会议，吴泽介绍孔子讨论会和王船山思想讨论会情况。

1月10日

史学会中国古代史组举行报告会，邀请吴晗、尹达、韩儒林谈中国古史方面的一些问题，交流京、宁、沪学术界情况。一百二十人出席。

同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举行讨论会，座谈如何研究和讲授《新民主主义论》，一百人出席。

1月12日

史学会学术组程天赋等人在科学会堂召开会议，研究年会工作。

1月22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刘振海等七十人出席，宋心伟、洪廷彦等谈中国现代史中的若干问题。

2月2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姚震寰等十一人出席，座谈中学历史教学情况。

2月10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十人出席。会议讨论了

1962 年报告，并研究年会工作。

2 月 16 日

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举行报告会，陶菊隐作《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的报告，四百余人出席。

3 月 3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出席，研究 1962 年年会工作。

3 月 23 – 31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 1962 年年会，年会期间，共举行大会一次、报告会五次、讨论会二十三次、出席者共二千零六十五人。23 日上午的会员大会上，周谷城作会务报告，吴泽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开展历史科学研究》的报告。江浙地区也有代表参加年会。年会期间，各专业组分别举行报告会和讨论会：

中国古代史组的报告会有：束世澂《论古代东方的所有制及阶级社会的形成》，郭庆昌《关于忽必烈汉化问题的分析》，胡道静《我国古代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最近发现的古农学资料概述》，刘炳福《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吴泽、黄丽镛《魏源〈海国图志〉研究》，袁英光《徐鼒正统主义史学思想》，朱永嘉《谈历史科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程应镠《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朱维铮《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解决》，刘精诚《拓跋族早期的社会发展与均田制的产生》，李旭《论八旗制度》，樊树志《宋代役法简论》，李德清《金代的赋役制度》，张家驹《南宋的赖文政起义》，谢天佑《论朱元璋转化及其建立政权的性质》，汪槐龄《论蔡牵部海上武装的性质》，陈守实《历史科学的新任务》，朱永嘉《顺康间清政府与江南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姚舜钦《刘邦与孔子》，徐德璘《论唐代前期新旧派斗争中土地所有制问题》，杨宽《"贽见礼"新探》，郭若愚《从几件有关蔡侯的新资料论寿县蔡墓蔡器的年代》，章权才的《礼的起源和本质》。

中国近代史组的报告会有：魏建猷《关于共进会修改同盟会纲领问题》，蔡尚思《康有为的社会政治理论——大同思想》，夏东元《李鸿章"和局"观》，陈匡时《陈天华思想发展的道路》，陈旭麓的《论"史论"》。

中国现代史组的报告会有：张锡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拉拢自由主义者的阴谋及破产》，叶枝感、叶锦涛《从五四时期的阶级动态看五四运动的性质》，李星和肖国风分别作《试论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的报告，杨九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季平子的《越界筑路和会审公廨两问题的由来及其与五卅运动的关系》，徐同甫《八一三抗战中上海工人反对国民党压制抗日群众运动的斗争》，项立岭《论"中美棉麦借款"》，刘宏谊《目前中共党史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几个问题》，马洪林《试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历史教训》，陆志仁《关于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问题》。

世界史组的报告会有：周谷城《世界历史重点转移论》，李风《谈谈当前研究非洲史的重要意义》，王国秀《英东印度公司掠夺印度百余年的罪恶活动》，庄锡昌《谈谈布勒斯特和约》，吴成平《马克思论民族革命》，郭圣铭《启蒙时期欧洲的史学》，陶松云《十九世纪俄国的欧洲史学家》，王养冲《评价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综合派》，李季谷《哌哒大帝国的发展》，陈祖源《论中世纪基督教异端与农民起义》，冯纪宪《论(美)亨利·克莱对拉丁美洲政策》。

中学历史教学组戴介民作《历史教学中的史论结合》报告。

5 月 5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举行报告会，邀请林志纯作《雅典国家的起源》的报告。

5 月 9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奚原等出席，研究 1963 年度学会活动内容。

5 月 14 日

史学会世界古代史组的部分会员举行座谈会，对世界通史课本的上古部分、中古部分两册提出修改意见。

5月20日

史学会召开会议，吴泽、程天赋、朱永嘉、裴汝成、徐鼎新、曹伯言、黄丽镛等出席，研究组织关于孔子问题的文章。

6月2日

史学会举行现代史组召集人会议，研究和安排本年度学术活动。

6月12日

史学会中学教学组在科学会堂举行会议，姚震寰等人出席，研究中学历史教学情况。

6月16日

史学会召开会议，胡少鸣、陆志仁、沈以行、徐崙、程天赋、许惠君等出席，研究召开理论队伍会议问题。

6月23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召开党内座谈会，陆志仁等三十五人出席，座谈学术界形势，并研究开展学术活动问题。

6月23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组举行讨论会，座谈余先鼎的《苏报案的革命斗争》、钱昌明的《试论杜文秀》、徐崙的《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

7月11日

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组举行讨论会，讨论中学历史教学如何贯彻阶级教育问题。10月11日再次举行讨论会，讨论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及贯彻阶级教育问题。近七十人次出席。

7月14日

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核心小组举行讨论会，交流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心得体会。

8月15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座谈会，翁独健作主要发言，座谈民族史研究中的

一些问题，周谷城等出席。

8 月 31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十三人出席，会议研究了对刘节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进行批判的问题，并研究了下半年的工作。

10 月 10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十三人出席，会议研究了学会的工作。

10 月 15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理事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如何为政治服务、在历史科学领域中如何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

10 月 17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召开党内座谈会，沈以行等三十多人出席，座谈学术界形势。

10 月 20 日

史学会在社联举行讨论会，胡少鸣、沈以行、徐崙、陈旭麓、金冲及、许惠君等讨论《论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政治服务》一文。

10 月 21 日

史学会在社联举行讨论会，吴泽等十多人出席，讨论《礼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吗?》、《论仁的阶级性》、《是阶级分析还是超阶级分析》三篇文稿。

11 月 24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陆志仁等十七人出席。会议传达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扩大会议精神，在学部会议上周扬作《哲学社会科学战斗的任务》的报告，谈学术如何配合政治斗争。会议还研究了上海史学界的工作。

12 月 6 日

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组举行讨论会，姚震寰等六十多人出席，讨论中学历

史教学如何提高质量问题。

12 月 14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研究蔡尚思介绍历史学中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的发言，并安排传达学部会议精神的其他工作。

12 月 20 日

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组举行报告会，一百余人出席，胡凤纶作《中学历史教材是怎样编写的?》的报告。

1964 年

1 月 4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十五人出席，会议研究社联传达学部会议精神期间历史组的活动内容。

1 月 25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社联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八人出席，检查研究学会工作。

1 月 28 日

有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上海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的史学界代表举行领导小组会议，沈以行、吴泽、金冲及、刘振海、陈象月、雷仲平出席，会议研究了贯彻双百方针及队伍革命化问题。1 月 29 日、2 月 1 日，继续举行领导小组会议，提出首先是抓总结，并制订历史学的规划。朱永嘉提出写文章谈古为今用问题，认为史学都是为政治服务，史学应为社会主义服务。

2 月 2 日

召开社联扩大会议历史组党员会议，沈以行等三十八人出席。沈以行提出这次会议实际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要求统一思想、发现人才、明确任

务、制订规划。社联扩大会议历史组有六十七人。

3 月 12 日

《上海史学战线三年来工作情况和今后规划要点》(草稿提纲)形成。16 日,《上海史学战线三年来工作的初步总结》(草稿)形成。

4 月 17－18 日

社联扩大会议历史组召开会议,研究反修文章的撰写问题,沈以行等近六十人出席。

6 月 13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科学会堂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十一人出席,蔡尚思、金冲及汇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近代史学术会议情况,会议研究了学会下半年活动。

6 月 20 日

史学会世界史组在科学会堂召开会议,周谷城等近六十人出席,林举岱传达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史研究工作会议筹备会情况。

6 月 23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举行讨论会,吴泽等十四人出席,讨论杨宽等撰《评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中有关中国农民起义问题》一文。

7 月 4 日

史学会在科学会堂召开会议,沈以行等一百四十余人出席,蔡尚思传达在北京召开的近代史学术会议情况。

7 月 25 日

史学会在教育学院举行座谈会,吴泽等十四人出席,座谈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问题。

7 月 28 日

史学会分党组在市委党校举行扩大会议,沈以行等七人出席,会议研究了组织李秀成评价讨论等问题。

7 月 31 日

史学会在上海教育学院召开会议，徐嵩等五十余人出席，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8 月 8 日、8 月 21 日、9 月 15 日分别在教育学院、文艺会堂和科学会堂继续讨论，均有五十余人出席。

8 月 12 日

史学会召开学术组会议，沈以行等五人出席，研究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及五卅运动的讨论问题。

8 月 17 日

史学会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沈以行、金冲及、项立岭、曾演新出席，研究组织李秀成评价的讨论。

1965 年

11 月 25 日

上海社联及所属史学会，就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举行座谈，杨宽、丘日庆、赵景深、严北溟、吴泽、束世澂、程应镠、沈起炜等社会科学界人士五十余人参加。在座谈会上，对姚文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姚文是从政治出发的，批判过头，《海罢》戏并不是毒草，讨论中还涉及历史人物和农民战争评价等问题。

1966 －1977 年

因“文化大革命”，史学会会长和大部分理事及会员在各所在单位被批判、

斗争、打倒。与其他各学会一样，史学会不得不停止活动

1978 年

1 月 31 日

市委宣传部召开文联和社联扩大会议，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和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到会。彭冲在会上宣读了市委关于恢复上海文联和社联活动的决定。

2 月 21 日

上海社联举行委员扩大会议，由社联副主席李培南主持。筹备恢复社联活动的负责人兰英、哲学学会冯契、经济学会姚耐、历史学会蔡尚思、语文学会草婴等发言。这次会议标志上海社联及其学会正式恢复活动。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车文仪出席并讲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江岚、吴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蔡尚思、陆志仁和吴泽等同志为上海市历史学会召集人。

11 月

史学会召开学会恢复活动以来的第一次理事会，商讨进一步开展学会活动的打算。确定：1、抓紧时间，筹备在今冬明春召开年会。2、围绕揭批林彪、"四人帮"，继续讨论实践标准、民主与法制等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把搞好当前活动与准备年会论文结合起来。3、抓紧做好修改学会章程草案、改选理事、吸收新会员等准备工作，通过年会，把学会的组织进一步恢复、健全起来。

11 月 24 日

史学会就史学研究如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举行座谈会。周谷城主持会议，吴泽、陈旭麓、徐嵩、李华兴、郑灿辉、庄锡昌、沈以行等发言。许多同志认为历史不可能重演，史学研究就是要实事求是，以当地当

时广大人民的社会实践为依据，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

1979 年

5 月 23 -25 日

史学会举行 1979 年年会。会长周谷城作会务报告，指出上海史学界为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史学工作者必须肃清流毒，面对真理，打破禁区，敢说真话，在四个坚持的原则下，鼓励各种学派各种学说的自由讨论。在史学园地中，所有的人都应以平等精神对待学术，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学术问题不允许搞"集中制"，应废除由领导机关或自命权威的人士为学术论争作结论的错误做法。

年会分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等专业进行了学术交流。陆志仁传达了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精神，李华兴传达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吴泽、蔡尚思、沈之瑜分别作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大教联的进步活动》、《关于外国博物馆工作》的报告。沈以行汇报了筹备年会和协商增补理事人选的经过。会议一致通过经过修改的《上海市历史学会章程》，选举了下列人员组成的新理事会（依笔画顺序）：丁景唐、干城、方行、方诗铭、叶书宗、任武雄、刘振海、刘维寅、刘惠吾、朱延辉、汤志钧、吴应寿、吴成平、吴泽、吴贵芳、张志康、张玫、张铁毅、时进、李启华、李法茂、沈之瑜、沈以行、沈起炜、陆志仁、陈匡时、陈旭麓、陈希崙、陈俊愉、陈崇武、周予同、周谷城、林远、林举岱、林德明、郑灿辉、郑维淑、金重远、施守全、赵宗颇、唐振常、夏东元、徐崙、徐连达、徐尚炯、桂遵义、郭圣铭、郭绪印、顾廷龙、章巽、黄世华、程应镠、程博洪、谢天佑、甄宝亭、鲍文希、翟作君、蔡尚思、谭其骧、魏建猷。

5 月

史学会组织有关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讨论会，就农民战争的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

9 月 4 日

史学会世界古代、近现代史组举行座谈会。程纯、郭圣铭、金重远、李春元、陶樾、叶书宗等出席会议。决定下一步讨论重点是苏联在 1929 - 1933 年间实现全盘集体化等问题。

10 月 24 日

史学会首次举行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研讨会。潘人杰介绍了 7 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问题讨论会的情况。与会者就二次大战的起源、性质和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等问题展开了初步讨论。

1980 年

7 月

由史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起，本市部分史学工作者及有关人士就如何开展上海史研究的问题举行座谈。与会者认为，研究上海史，对了解和剖析中国近代和现代史是十分重要的。决定成立上海史研究筹备组，唐振常为召集人。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江道闻、陶菊隐、徐铸成、陆诒等参加了座谈会。

12 月 26 - 27 日

史学会举行 1980 年年会。26 日各专业组分别进行学术活动。中国古代史组讨论《中国专制封建主义》，中国近代史组讨论《辛亥革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史与党史组分《毛泽东思想理论问题》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转变》两个专题进行讨论。世界史现代史组就布哈林再评价

问题进行了讨论，世界近代史组和世界古代史组分别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土地立法问题和苏格拉底的评价及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特权问题进行了讨论。

27日举行了年会大会，陆志仁主持。洪荣华在会上讲了话。沈起炜代表理事会作会务报告。专业组代表在大会上介绍分组讨论情况。吴泽作《国内外重要史学活动介绍》的发言。蔡尚思《历史科学研究中应有大突破》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陆志仁宣布拟成立上海地方史研究会筹备组，介绍筹备工作的进行情况。

本年度

史学会连续为中学历史教师举办多场史学动态和专题报告会。作报告的是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的同志。这些报告深受教师们的欢迎。

1981年

1月10日

史学会世界史专业组召开会议。金重远传达去年11月初在杭州召开的巴黎公社学术讨论会情况。会议决定举行以巴黎公社的性质及其原则为中心议题的学术讨论会。

7月

史学会邀请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正平作学术报告，探讨中西封建君主专制形成的共同历史条件。

9月4日

史学会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组织讨论会。1980年《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引起上海史学界关注。讨论会上，大家认为中国的封建化过程比欧洲完成得早，发展得相当充分。与会同志还从土地所有制的历史、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等角度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9 月 21 日

史学会举行《辛亥革命在上海》学术讨论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本市六十余名教研人员参加会议。与会者就上海革命党人、工农群众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种宣传组织活动及其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

10 月 14 日、11 月 10 日

史学会、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举行"托洛茨基评价讨论会"。与会同志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和苏联的革命历史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弄清托洛茨基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是有价值的。与会同志肯定了对托洛茨基分段评价的方法。认为这改变了过去对历史人物或则全盘肯定，或则全面否定的绝对化做法，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反映托洛茨基的全貌，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关于如何评价托洛茨基，会上提出了一些探讨性的意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1982 年

3 月 15－31 日

史学会举行 1981 年年会。会议分专业组进行学术讨论。中国古代史组和世界古代史组联合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组讨论"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世界近代史组讨论"英国圈地运动的评价"，世界现代史组讨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1929 年前后苏联的反右倾斗争问题"。参加上述讨论的还有来自北京、杭州和江苏的十多位同志。

会议期间，李新作《论造反、革命与改良》的学术报告，沈以行作《六十年前工运高潮在上海》的报告。31 日在市科学会堂举行会员大会。周谷城、陆志仁、吴泽、沈以行及洪荣华等参加了大会。沈以行主持大会，沈起炜作会务报告。谢天佑、夏东元、叶书宗分别汇报各专业组专题讨论情况。大会决定将理事增加到六十人，计增补十二位新理事。

5 月 30 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扩大会，讨论历史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吴泽作中心发言，强调了史学工作者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责任，历史教学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的问题。

6 月 17 日

史学会近代史组组织近代史上的传教士问题专题讨论会，五十多名教研工作者参加会议。顾长声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传教士问题”的中心发言。

6 月 21 日

史学会召开秘书长、专业组召集人会议，讨论和落实社联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活动方案。

1983 年

6 月

会长周谷城在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12 月 24 日

史学会举行座谈会，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谭其骧主持会议。沈以行作《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的中国化》，蔡尚思作《学习 < 邓小平文选 > 体会》，沈起炜作《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研究》，姜义华作《毛泽东同志对文化

遗产批判继承的贡献》等专题发言。此前，史学会与上海市党史学会联合举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等专题讲座。

1984年

1月18日

史学会与《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举办“历史传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讨论会。与会者认为，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流毒，正确地对待历史上的精神文明。在会上，涉及较多的是如何对待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道德，特别是“孝道”问题。

3月25日

史学会举行“中国近代会党问题”报告会。魏建猷、方诗铭等分别就会党研究的意义和现状，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研究，关于会党与辛亥革命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4月7日

史学会邀请黄美真作题为《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几个问题》的报告。

4月21日

史学会邀请东北师大历史系朱寰作“关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4月28日－5月21日

史学会举行1983年年会。年会期间，各专业组分别举行了学术讨论和学术报告活动。邀请在沪讲学的北京师院历史系宁可作《历史与现实》的史学理论报告。5月5日，在科学会堂举行了会员大会。谭其骧主持会议。罗竹风出席会议并讲话。沈起炜作会务报告。沈以行对当选本会第十届理

事的原则作了补充发言。会上还进行了学术交流，吴泽作《关于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的发言，姜义华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出高质量的‘中国文化丛书’》的发言，李巨廉作《对开拓我国二次大战史研究新局面之浅见》的发言，魏建猷代表近代会党史学术讨论会筹备组汇报筹备工作情况。

10 月 13 日

史学会中古史组就金观涛著《在历史现象的背后》一书举行座谈会。方诗铭主持会议。与会者认为，金观涛大胆采用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虽然很多具体结论值得商榷，但对史学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应当积极支持。

10 月 27 日

史学会邀请王斯德作《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报告。

11 月

史学会邀请南京师大历史系蔡少卿作关于《近代会党发展史论》的学术报告。他认为，会党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社会形态变化密切相联，而会党的变化又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12 月

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史学会将对近代爱国主义问题进行的探讨所取得的一些成果编辑成《近代爱国主义论文集》。

1985 年

2 月 14 日

史学会邀请在沪讲学的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作关于中日近代化对比研究的学术报告。依田熹家在报告中就中日近代化的前提、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自由民权运动”、中国为什么未能建立绝对主义国家、如何看待中日近

代化过程中人民战争的作用、中日经济差距的直接原因等问题作了论述。

3 月 30 日

史学会与市党史学会、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联合召开“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小型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开拓抗日战争新领域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4 月

史学会编印《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社会经济论集)》。收入论文二十篇,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具体解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

4 月 29 日

史学会举行“历史学如何改革与创新”的座谈会。三十几位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如何评价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状况、史学研究如何更新和突破、怎样对待青年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7 月

史学会与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政治学会联合举行“斯大林模式”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特征及其评价,展开热烈讨论。

1986 年

10 月 13 日

史学会邀请本市青年史学工作者近六十人举行学术座谈会,围绕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评价问题展开讨论。王家范、马小鹤、叶茂强、王颋、刘昶等分别发言。发言内容涉及关于中央集权制历史作用问题讨论的几点思考、中央集权和吏胥专政——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两面观、中央集权制利弊之关

键、汉唐两种模式的比较、宏观问题的微观考察——对传统观点的几个疑问等方面。

11 月24 日 -12 月1 日

由史学会和复旦大学、上海历史研究所,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九单位联合主办的首次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对象、它的上下限、分期等问题,还就抗日战争起止时间、抗日战争开始是否存在两个战场、近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谁、近代中国有无“三洋海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1 月26 日

上海社联开展青年学术周活动,历史组以“历史观的思考”为题展开讨论会。与会者围绕“史学概论”、史学的社会价值、历史研究的时间范围的延伸、历史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对“史学危机”问题涉及较多。

1987 年

7 月22 日

史学会邀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学者马丁·布里安作了《关于上海帮会及西方对于帮会研究的动态》的学术报告。唐振常主持报告会。马丁介绍了二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上海帮会研究的概况。他认为,要认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在社会变动中的发展过程,必须将社会学与政治学综合起来考察,研究青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口。

10 月3 日

史学会邀请日本大阪大学教授黑田俊雄作《日本中世纪的宗教和东亚世界》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谭其骧主持。黑田是从中世纪“汉字文化圈”

(或称“儒教文化圈”)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历史。黑田还就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的神道等作了论述。

10 月 15～18 日

史学会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长江下游古文化研讨会在浙江新昌县举行,八十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问题,良渚文化成为讨论最为热烈的课题。会议还就有关吴越文化的概念、渊源和越国建立的时间进行了探讨。关于长江下游古文化资源开发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与会者认为古文化研究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1988 年

4 月 8 日

史学会举行 1988 年年会。谭其骧代会长主持会议,陈匡时作会务报告。姜义华就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史学发展作了专题发言。萧功秦作《关于开展清末现代化研究的若干设想》的发言,熊月之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租界史研究》的发言。郑祖安介绍上海史研究的新进展;冯绍霆就大家颇为关心的汪精卫日记真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黄宣佩以本市福泉山考古发掘的实物、现场照片说明上海地区也有一个完整的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直至唐宋各时期文化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大会选举了由下列同志组成的新的理事会:丁凤麟、于为刚、孔繁刚、方诗铭、王芝芬、王界云、王家范、冯绍霆、李华兴、李伟国、李培栋、吴云溥、吴贵芳、吴修艺、吴应寿、吴乾兑、姜义华、苏智良、杨立强、汤志钧、陈匡时、陈旭麓、邹逸麟、林丙义、武克全、施宣园、郭绪印、夏笠、夏东元、徐连达、桂遵义、唐振常、萧功秦、黄美真、黄宣佩、谢天佑、简修玮、熊月之、潘松鹤等。推举周谷城为名誉会长,

聘请谭其骧、沈以行、沈起炜、吴泽、蔡尚思为顾问。会议决定，新理事会不设会长，实行执行主席制，由常务理事轮流主持学会工作。

4 月 15 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大会。会议推举常务理事五人，他们是：姜义华、谢天佑、吴乾兑、萧功秦、潘松鹤，潘松鹤兼任秘书长，葛剑雄、熊月之任副秘书长，专职干事王克梅。会议商定学会工作由常务理事轮流主持，首先是姜义华主持学会工作。会议还就新形势下如何发挥老学会的社会功能充分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工作设想。

5 月 6 日

史学会举行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会议由委员会主任汤志钧主持。谭其骧致开幕词。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筹备组代表赵建民报告专业委员会筹备事项。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代表汪向荣在会上讲话，理事会代表杨立强发言。中外学者作了学术报告。

7 月 4－7 日

史学会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一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研究租界的意义、租界与近代中国的关系、租界与城市近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还讨论了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租界的原因、上海租界对中国乃至对亚洲的影响等问题，并围绕民族感情与社会进步、各地租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8 月 26 日

史学会召开理事会议。会议根据上海社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并制定了工作计划：（一）围绕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二）发挥本市史学界的特有优势，继续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为学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三）弘扬上海史学界开风气之先和敢于坚持正确观点的可贵传统，积极参加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与交流。

11 月 21 日

史学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史学评估"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显示了史学研究喜人前景。与会者也谈到了存在的一些不足,并就"史学危机"问题作了探讨。

12 月 16 日

史学会召开陈旭麓学术思想研讨会,对陈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道德品格进行了初步评价。与会者认为,陈旭麓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以新陈代谢为趣旨,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独家体系。

1989 年

1 月 3 日

史学会举行由王元化、陈虞孙、谭其骧、唐振常四位学者发起和组织的黎澍学术思想座谈会,上海学术界、新闻界六十多人参加。唐振常、王元化、谭其骧、沈渭滨、李华兴、柯灵、黄安国等发言,对于黎澍的学术思想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界的地位给予高度的肯定。大家尤其敬佩黎澍作为一个思想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9 月 7 日

史学会召开全体理事大会。姜义华主持会议,二十六人参加会议。会议座谈近十年史学研究状况。秘书长潘松鹤汇报工作。会上各位理事提出下阶段学会活动设想,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学会工作计划。

1990 年

1 月 9 日

史学会召开纪念周谷城先生《中国通史》出版五十周年座谈会。与会者指出，它经历了五十年风风雨雨，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一部有价值的系统参考书。

1月10日

史学会太平天国史专业委员会就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未来和走向，召开了部分学者座谈会。与会者认为，近年太平天国学研究见于低谷，但其研究已具有较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典型史实考信有成绩，因此九十年代将可有更多的开拓，它须从文化和哲学作更深层分析、认识，从理性思辨释说，并从社会科学的有关学科扩展和采用各种方法解析太平天国诸问题。

1月25日

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举办"回顾与展望"迎春座谈会，并邀请北京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会常务总干事王晓秋谈协作交流问题。

5月17日

史学会、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市方志办、上海师大和上海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国与上海"研讨会在上海师大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关于建立太平天国学、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影响、洋枪队与中国军事近代化等问题。

6月2日

为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史学会举行"鸦片战争与民族觉醒"学术讨论会。四十余位学者围绕民族觉醒的标志、内涵、过程，鸦片战争与中国人民的自强意识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10月27日

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毅先生作《从政治方面看日本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的学术报告，并与会员进行讨论交流。

1991年

1月4日

史学会中日关系专业委员会邀请日本明治大学横山宏章教授作《东亚国际环境变迁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讲演，并与本市有关的研究者进行了座谈。

1月5日

史学会召开全体理事大会，筹备召开年会及计划1991年工作。会议总结了去年的工作，讨论决定1991年的学会活动围绕纪念性活动、书评会、结合《学术争鸣大系·史学卷》举办“中国史学四十年述评”等展开。决定在一月下旬召开1990年年会。会议确定了许纪霖等参加首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的上海代表名单。

1月24日

史学会举行89－90年年会。会议由姜义华主持，秘书长潘松鹤做会务报告。萧功秦、葛剑雄、郭绪印、武克全、黄宣佩、李伟国、黄美真等作学术信息报告。

3月21日

史学会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举行“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研讨会，纪念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百四十周年。与会学者就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4月9日

史学会举行“王韬研究与《王韬评传》”专题学术讨论会。姜义华主持会议。作者忻平介绍了写作的过程和立意等，与会学者围绕王韬研究和《王韬评传》一书展开了热烈讨论。

4月23日

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邀请国际著名文化史专家、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石田一良作《日本文化的特点及其国际性》的报告，并同与会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5 月 17 日

史学会邀请戴逸作《当前史学界的情况》的学术报告。他认为四十年来我国史学工作最大的成绩，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而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根本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戴逸还对历史科学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

6 月 18 日

上海社联、史学会及教育学会召开座谈会，学习和落实江泽民总书记致李铁映、何东昌同志信中提出的在青少年中开展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精神。尹继佐、陈步君以及本市教育界、历史学界三十多人出席会议。姜义华主持座谈会。与会学者就如何加强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当前在青少年中加强国情教育必须注重的几个方面。

8 月 16 日

史学会中日关系专业委员会邀请在联合国工作的邵子平谈在海外收集、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情况，并放映录像。

9 月 21 日

史学会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联合召开“辛亥革命与近代国情——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意识、会党作用、清末新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姜义华、刘学照、李华兴、丁凤麟、沈渭滨、邵雍、何泽福等分别在会上发言。

10 月 7 日

史学会太平天国史专业委员会就华强新作《太平天国地理志》召开书评会。与会者对历史地理学和太平天国史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地理学在近代中国和太平天国全史中的地位、近代农民和太平天国将士的地理观等问题展开

讨论。

10 月 23－26 日

史学会主办《秦汉思想文化和华夏民族传统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香港、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我国历史、哲学、宗教、科技史、文化艺术、文物考古和民俗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秦汉思想文化为依托，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变化与趋向，总结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脉络机制和外来文化碰撞、融合的经验教训。

10 月 26－30 日

史学会和上海市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共同举办“辛亥革命时期青年运动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山东、江苏、安徽、广西、上海等地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辛亥革命时期青年运动、青年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其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1 月 19－21 日

史学会等十五个单位联合发起的“时代与史学——上海市首届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崇明举行。与会者就史学的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史学发展与社会变革、近代以来中外史学的冲突与交融等问题各抒己见。与会学者还就今后史学理论和发展作了探讨。

12 月 11 日

史学会召开书评会，围绕姜鸣新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一书展开讨论。

1992 年

1 月 14 日

史学会和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一·二八抗战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影响等专题展开讨论。

4月15日

史学会举行全体理事大会。会议由姜义华主持，潘松鹤汇报工作，武克全在会上谈了1992年的学术形势。

6月6日

史学会举行报告会，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作了《古代文明瓦解的比较》学术报告。

8月

史学会就王立诚的《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召开书评会。本市学者二十七人出席会议。与会学者就此书的成败以及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0月26日

史学会举行全体理事大会。姜义华主持会议，潘松鹤汇报工作。会议决定召开会员大会，并改选理事会。

11月25日

史学会组织会员参观历史文化名镇嘉定县城。

12月15日

史学会召开会员大会。黄宣佩、熊月之、姜义华、林炳义、许纪霖等分别作了《上海地区博物馆概况》、《上海史研究新动态》、《<中华文化通志>编纂介绍》、《中学历史新教材编写介绍》、《二十世纪现代化思潮讨论会》介绍等报告；会议经过选举，成立了由下列同志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依笔画顺序）：丁凤麟、孔繁刚、王界云、王家范、王克梅、冯绍霆、孙继林、李华兴、李伟国、李培栋、李天纲、许纪霖、吴云溥、任余白、吴修艺、吴乾兑、苏智良、忻平、张元隆、张济顺、杨立强、汤志钧、陈匡时、邹逸麟、严耀中、林丙义、罗苏文、武克全、姜义华、施宣园、周振鹤、易惠莉、郭绪印、俞乐滨、徐连达、桂

遵义、郭青生、萧功秦、黄美真、黄宣佩、谢维扬、葛剑雄、简修玮、熊月之、潘松鹤。随后举行的理事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学会领导班子，姜义华任会长，许纪霖任秘书长。王家范、熊月之、葛剑雄、萧功秦、潘松鹤任常务理事。

本年度

史学会为配合发达地区版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课本的使用，开设面向本市中学教师的辅导讲座。从9月至12月，共举行八讲。

1993年

2月10日

史学会举行常务理事会。会议由许纪霖主持。萧功秦、葛剑雄、潘松鹤、熊月之参加了会议。会议拟定了下一步的活动计划。

2月11日

史学会结合本市中学使用历史新教材，开办对中学历史教师进行的系列辅导讲座。

2月23日

史学会同有关单位共同举行集会，祝贺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八十华诞，本市八十多位文化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出席。市委副书记陈至立送来鲜花祝贺。

2月25日

史学会举行谭其骧先生诞辰八十二周年纪念会。谭先生生前友好、同事、学生及家属四十余人汇聚一堂，缅怀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奉献了一生的崇高精神。

4月24日

史学会召开讨论会，围绕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研究、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发育、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现状、市民社会理论及各国市民社会比较研究等学术问题作了探讨。

5 月 28 日

史学会与上海社联科研处、《文汇报》理论部联合召开"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座谈会，与会者总结了以往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教训，并对当前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内容以笔记形式连续三次刊于《文汇报》。

6 月 12 日

史学会等联合发起的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一百四十周年暨"小刀会起义与近代上海"学术讨论会在豫园绮藻堂举行。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区域文化、地方习性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关系、小刀会起义的性质和小刀会起义对上海产生的深远影响展开了讨论。

8 月 19 日

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杂志社联合主办为期二天的"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与会者围绕"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社会中间组织的变迁"、"国家、社会与法治"、"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和"市民社会的比较研究"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8 月 23－25 日

史学会、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会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帮会与近代上海"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和日本学者五十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对帮会在近代上海崛起的原因、作用和性质作了全面的探寻。学者们集中对旧上海青帮大亨崛起的原因、杜月笙风云上海之谜、蒋介石与帮会的关系等课题作了探讨。

11 月 16 日

史学会和浙江上虞市政府联合举办为期二天的纪念杜亚泉一百二十周年暨学术讨论会。王元化、蔡尚思、姜义华、苏渊雷、汤一介、庞朴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和家属代表聚会在杜先生的家乡上虞，围绕杜亚泉的思想及与此相关的重大文化问题展开讨论。

12 月 29 日

史学会召开《中国帮会史》（作者周育民、邵雍）书评会，与会者就这部由两位中青年学者纂述的中国第一部较全面反映中国帮会历史的专著进行了评价。

1994 年

2 月 2 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大会。姜义华主持会议。许纪霖汇报学会工作。葛剑雄汇报 1993 年 11 月中国史学会大会情况，武克全作社联情况介绍。会议讨论了 1994 年准备开展的学术活动。

7 月 23 日

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和市日本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共同举办“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围绕“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抹杀侵略中国历史方面的若干新动向”、“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地统治及所谓‘台湾人的悲哀’”、“如何缔造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

10 月 8 日

史学会召开“都市流行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就上海流行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目前现状、流行文化与都市消费群体及文化亚群体的分化组合、流行文化与后工业文化及大众传媒、流行文化现代社会多元价值体系和流行文

化的发展历史及古典、先锋艺术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交流。

10 月 22 日

史学会、《上海画报》社、《社会科学报》和市谱牒研究会，联合举行了“上海发展与姓氏文化”研讨会。二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姓氏角度，研究上海的移民与上海发展等问题交流了各自的看法。与会学者指出应当重视谱牒研究。

10 月 28－29 日

史学会主办由上海社联、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所共同发起的“移民历史与上海”学术讨论会，会议围绕“中国移民史的规律”、“上海移民历史”、“移民对上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展开探讨。

12 月 9 日

史学会邀请新加坡大学高级讲师邵东方与本市有关学者座谈，交流了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心得和成果。

1995 年

2 月 22 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姜义华主持会议。许纪霖汇报 1994 年学会工作，葛剑雄提出学会要注重发展新会员，要尽量结合实际。武克全介绍社联 1995 年总体规划。会议决定在 11 月召开年会。

3 月 25 日

史学会召开“晚清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学术座谈会，十余名专家就对“新政”的界定、“新政”的社会效果及历史影响、“新政”效果不大的原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6 月 29 日

史学会召开马关条约签订一百周年理论研讨会。

10 月 5 日

史学会召开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暨《新青年》创刊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本市部分中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12 月 6 日

史学会举行常务理事会。葛剑雄、熊月之、许纪霖、萧功秦、王家范参加会议。会议由许纪霖主持，确定 1996 年工作计划，讨论了设立历史学会奖的问题。决定从 1996 年开始主要在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史学者中进行评选，每两年评一次。

12 月 12 日

史学会举行学术讲座，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中国学研究专家、名著《摆脱困境》的作者墨子刻教授作《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主题演讲，并就这一专题进行学术讨论。

1996 年

1 月 4 日

史学会举行 1995 年年会。会议由姜义华主持。许纪霖作会务报告。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决定成立古代史、近代史、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为葛剑雄、王家范，近代史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为姜义华、熊月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为萧功秦、许纪霖。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上海博物馆。

3 月 29 日

史学会举行全体理事大会。会议由许纪霖主持，姜义华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今年学会工作。三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拟定今年活动安排，学会还

将配合及参加社联的一系列重大活动,特别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文化和社区文化、宗教、区域文化等如何通过文化建设来解决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将展开大型研讨。

5 月6－7 日

史学会、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黄炎培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浦东川沙镇举行,全国百余名专家参加会议。与会者认为,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其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信念和对光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黄炎培的家属也就黄炎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作了生动翔实的介绍。

6 月12 日

史学会举行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来自复旦、华师大、上师大和社科院历史所的二十位史学工作者围绕茅海建的专著《天朝的崩溃》,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了争鸣。

6 月19 日

史学会举行"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专题讨论会,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以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有关学者参加。

7 月2 日

史学会与美国著名中国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柯文举行学术座谈会。

1997 年

1 月30 日

史学会举行1996 年年会。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会代表参观了上海博

物馆。

2 月 8 日

史学会举行首届历史学会奖评审工作。评审组由姜义华、王家范、熊月之、葛剑雄、潘松鹤、许纪霖组成。经过认真评选，共评出了五本著作，三篇论文。他们是：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著作）；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著作）；周武：《中国遗书精选》（著作）；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著作）；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著作）；李福长：《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论文）；张荣华：《文明本质及其发展的探索与构造》；李向平：《中国佛教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意义二题》获首届上海市历史学会奖。

6 月 27－28 日

史学会、市房产经济学会和市地方史志学会联合举行"近代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学术讨论会。本市学者近五十人参加会议。姜义华、桑荣林、唐振常分别主持会议。与会学者就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客籍商帮这一社会团体及其对上海社会生活的影响、近代上海是西学的传播中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10 月 16 日

史学会参与组织了由上海社联和复旦大学联合举行的"周谷城学术思想讨论会"。本市专家六十余人出席研讨。会议由武克全主持。姜义华、顾晓鸣分别作了题为《'斗争哲学'重围中的孤军之战——周谷城六十年代历史哲学辩论重评》和《论周谷城先生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现代性》的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在讨论中认为，周先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重要拓荒者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上海社联同时出版了《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编入附录的有周先生自述《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和《周谷城先生学术著述系年表》。

10 月 26 日

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起召开的吕思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吕思勉遗文集》首发式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王元化、姜义华等上海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三十余人出席会议。与会者就吕思勉史学思想、学术遗产以及如何开创中国史学的新局面进行了讨论。

1998 年

1 月 19 日

史学会 1997 年年会在上海图书馆新馆召开。会议由会长姜义华主持。许纪霖作 1997 年度工作报告。学会按各专业委员会举行分组讨论。古代史组就中国古代通史的研究的回顾和思考专题,近代史组就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专题,专门史组就中国社会史的范围、史料和方法的思考专题分别进行了讨论。在大会发言中,谢维扬介绍了《王国维全集》的编校情况;苏智良介绍了近年来备受国际关注的"慰安妇"研究动态;石源华介绍了复旦韩国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周武介绍了近期台湾史学界的研究情况。王鹤鸣介绍了作为上海文化标志建筑之一的上海图书馆新馆概况,并邀请与会代表参观了上图新馆。稍后,理事会商定王家范、熊月之、葛剑雄、王鹤鸣、许纪霖为副会长。

3 月 13 日

史学会举行"关于现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讨论会,与会者就五四以来中国民粹主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地位进行了认真探讨。

5 月 8 日

史学会举行"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知识分子与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思潮,清末

以来知识分子各种团体、流派、社团和杂志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约有四十余名中青年学者专家出席会议。

9 月 10 日

史学会与《社会科学报》联合召开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戊戌变法的历史功绩、意义及对当代的启示作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10 月 24 日

史学会参与了由上海社联和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20 世纪的世界——回顾与思辨”学术讨论会，会议围绕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民族主义与世界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世界体系三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2 月 4 日

史学会举行理事会，会议由姜义华主持，筹备学会换届选举及组织第二届历史学会奖评选等。

1999 年

1 月 16 日

史学会举行 1999 年年会暨换届大会。会议由姜义华主持，许纪霖作学会工作报告，熊月之作关于换届工作的说明。会议投票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并向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理事的老同志表示衷心感谢。会上，邹逸麟、葛剑雄、熊月之、苏智良分别作“中国史学会‘六大’的情况”、“关于长江水灾的历史背景”、“上海通史写作概况”、“关于最近的中日关系”的交流报告。本届理事会成员是：丁凤麟、孔繁刚、王界云、王家范、王鹤鸣、王克梅、石源华、田兆元、冯绍霆、孙继林、李华兴、李伟国、李培栋、李天刚、李学昌、李向

平、李潮远、许纪霖、刘其奎、刘修明、朱金元、任余白、吴修艺、吴乾兑、吴景平、苏智良、忻平、芮传明、张元隆、张济顺、张晓鸣、杨立强、陈达凯、邹逸麟、严耀中、林丙义、罗苏文、武克全、金良年、周振鹤、易惠莉、姜义华、施伟达、施宣园、郭绪印、余乐滨、殷一璀、徐连达、钱君端、章义和、萧功秦、黄美真、黄宣佩、谢维扬、葛剑雄、熊月之、潘君祥、潘松鹤等五十八人。

同日

史学会召开新一届理事会全体会议。经投票选举，姜义华任会长，王家范、王鹤鸣、许纪霖、葛剑雄、熊月之任副会长，许纪霖兼秘书长。并商定由王克梅、姚大力任副秘书长。

会议讨论安排了本年度学会活动，确定学会的团体会员单位十九个，它们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华东师大历史系、上海师大历史系、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远东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3 月

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举行"陈旭麓先生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学术研讨会"。上海和外地学者及陈先生弟子、亲属七十余人出席会议。大家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先生是"史德、史识、史才"兼具的旷世大家；作为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其崇高的师德和培养学生的理论方法是应继续发扬和光大的传统；作为一名学者和思想家，其独立的思考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是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企及的高峰。

4 月 26 日

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在宋庆龄陵园联合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陈祥元、任建树、刘学照、朱义禄、郭绪印和朱华等在会上发言。与会者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体

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与会者指出五四运动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突出的问题是改造国民性。五四先贤们提出的偶像破坏论、自我权威的提倡和独立人格的塑造，构成了精神解放的主要内容。与会者认为人权思想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会后与会者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与五四运动”图片展。

5 月21 日

史学会、上海市档案馆、解放日报之友联谊会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共同召开“《上海解放(续编)》首发式暨纪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关学者熊月之、郭绪印、冯绍霆、苏智良、邵雍等四十多人出席。

2000 年

1 月28 日

史学会召开 1999 年年会暨第二届历史学会奖颁奖大会。会长姜义华主持会议，秘书长许纪霖报告会务工作。获得学会奖的有：著作，李天纲、戴鞍钢；论文，陈勇、金光耀、侯杨方、徐有威、张剑、黄纯艳。

2 月

史学会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举行《光明之城》研讨会。就《光明之城》的真伪，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热烈争论。龚方震、芮传明、王家范、程念祺在会上发言。研讨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3 月9 日

史学会召开理事会，商讨并安排 2000 年学会工作。会议决定增补李伟国为学会副会长。

4 月

史学会参加了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历史研究》编

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朝鲜、韩国、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的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到会，与会学者就"慰安妇"的称谓问题、"慰安妇"制度的源流、"日军施虐心理分析"、日本政府的责任问题、"慰安妇"问题研究的意义等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

4月25日

史学会、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召开"上海史学界庆贺《中国历史大辞典》出版座谈会"。史学界、教育界、出版界近五十名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由姜义华主持。李伟国、巢峰、吴泽、邹逸麟、沈起炜、熊月之分别在会上发言。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问世是我国强盛与兴旺的又一标志。

5月28日

史学会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等举行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出版书评会。唐振常、姜义华、王家范、熊月之、许纪霖、苏智良等出席。与会者对这部传记予以充分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实事求是地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经历的传记著作，以一个人的经历，呈现了一个时代与一代人。

6月14日

史学会举行学术座谈会，邀请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斐宜理和香港近代史学会会长李金强来本会与会员座谈。

10月20日

史学会、党史学会和世界史学会联合召开小型研讨会，围绕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个如何认识"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者结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这两种制度认识的发展过程，从多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还指出，研究"四个如何认识"问题，不仅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也是理论工作者重大的理论课题。只有理论上真正科学地解决好"四个如何认识"问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有针对性、

有说服力和有影响力的效果。

10 月 27 日

史学会与黄浦区文化局在文庙举行“1900 年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就义和团运动、东南互保与近代社会思潮演变、庚子事变与清末新政、1900 年的上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沈祖炜与熊月之、王家范、沈渭滨、杨国强、李天纲、刘学照、顾卫民等先后在会上发言。

12 月 25 日

史学会组织会员参观松江广富林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工地,并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展开座谈。

本年度

在上海社联召开的学会工作会议上,史学会被宣布获(1997 - 1999)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学会称号。

2001 年

1 月 16 日

史学会召开 2000 年年会,姜义华主持会议,许纪霖汇报会务工作。王家范、金光耀、黄宣佩、承载等做学术信息报告。会后,会员们参观了虹口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2 月 16 日

史学会召开理事会议,姜义华主持。会议主要内容:讨论并确定学会工作安排;筹备纪念史学会五十周年活动;筹备召开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4 月 20 日

史学会太平天国史专业委员会等联合举行“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学术讨

论会。会议围绕太平天国研究的方法和走向、太平天国时期的江南社会、太平天国与上海近代化等展开讨论。王家范、郭豫明、沈渭滨、华强等五十多人参加研讨会。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茅家琦等也专程来沪参加会议。

4 月 29 日

史学会与上海社联联合召开《中国历史通论》书评会。作者王家范积四十年治史心得、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而撰写的这部著作,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6 月 8 日

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召开会议,与美国默士达学院日本及东亚学部主任,兼任美国明州双城五大院校联合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谭汝谦座谈,主题是海外中日关系史研究现状。

6 月 26 日

史学会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瞿秋白与上海"学术讨论会。

10 月 24 – 26 日

史学会与上海社联、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师大历史系、上海地方史志学会等联合召开"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重点讨论辛亥革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影响。来自本市、江浙地区、日本和韩国的专家学者约七十人参加会议。

12 月 20 日

史学会与上海师大联合召开"历史人物与历史——纪念程应镠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深切回忆程先生的道德文章,同时认为,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应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题目,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是史学研究今后的任务之一。

编后说明：

本大事记根据上海档案馆所藏上海历史学会档案、《文汇报》、《社联通讯》、《社联年鉴》等资料汇编而成。为体现历史真实，基本保留原件原貌，未作加工修改。大事记由姜义华、王家范和许纪霖审阅。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简章

(1952年1月28日大会通过,1953年7月26日大会修正)

一、本会以团结史学工作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事于历史研究及史学的建设工作为宗旨。

二、凡以研究历史为重心,有译述或著作,地位相当于高等学校讲师以上,在政治上无问题者,经会员二人介绍,理事会通过,得为本会会员。

如有思想进步,史学工作成绩优良,并有二年以上工龄,经会员二人及理事一人负责介绍者,亦得予以特别考虑,吸收为会员。

三、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大会,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理事会互推正副主席各一人,秘书二人。理事任期为一年,但连选得连任。

四、会员大会每年二次:会期定在一月及七月,遇必要时得开临时会。

五、本会因各种工作需要设各种委员会。

六、本会经费由下列各项充之:

入会金每人人民币壹万元;

常年会费每年每人壹万元;

自由捐助;

请求补贴。

七、本会须经常与中国史学会总会联系,并向总会报告工作。

八、本简章经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出席大会会员三分之二以上人数之通过,得修改之。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简章（修正草案）

（1957年3月10日大会修正）

一、本会以团结史学工作者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事于历史研究及史学的建设工作为宗旨。

二、凡以研究历史为重心，有译述或著作，地位相当于高等学校讲师以上，在政治上无问题者，经会员二人介绍，理事会通过，得为本会会员。

如有思想进步，史学工作成绩优良，并有二年以上工龄，经会员二人及理事一人负责介绍者，亦得以特别考虑，吸收为会员。

三、本会会议为会员大会，理事会等。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理事会互推常务理事若干人，正主席一人，副主席、秘书各若干人。理事任期为一年，但连选得连任。

四、会员大会每年一次：会期定在一月，遇必要时得开临时会。

五、本会因各种工作需要设各种委员会。

六、本会经费由下列各项充之：

入会金每人人民币壹元；

常年会费每年每人壹元；

自由捐助；

请求补贴。

七、本会须经常与中国史学会总会联系，并向总会报告工作。

八、本简章经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出席大会会员三分之二以上人数之通过，得修改之。

上海历史学会简章

(1961年2月8日大会修正)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上海历史学会。

第二条 本会宗旨是团结和推动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厚今薄古"、"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史学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讨论,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加强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三条 凡赞成本会宗旨,在上海专业从事史学工作或业余进行史学研究而具有一定水平者,由所属单位组织或会员二人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均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审查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工作方针和计划,讨论会务,修改会章,并选举理事。

第五条 本会设理事会,由理事三十人至四十人组成。理事会为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的执行机构,理事会全体会议互选会长一人、副会长三至五人,秘书若干人,主持日常工作。理事任期一年,连选得以连任。

第六条 理事会每2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可由会长决定召集临时会议。理事会可根据需要,组织学术讨论、座谈、报告会、经验交流会,成立专业、专题小组,进行各项协作事宜。

第七条 本会会员有下列权利与义务:

有选举和被选举、参加本会的各种学习研究活动、以及对本会提出批评与建议的权利；有遵守会章、缴纳会费及担任本会各项工作的义务。

第八条　本会经费以下列方法筹集之：

1. 会员每人每年缴纳会费壹元，一次交纳；

2. 不足部分，申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补助。

第九条　本会章经会员大会通过并报请主管部门备案后生效，修改亦同。

上海历史学会简章

（1962年1月21日大会修正）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上海历史学会。

第二条　本会宗旨是团结和推动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厚今薄古、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讨论，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加强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三条　赞成本会宗旨，在上海专业从事史学工作或业余进行史学研究而具有一定水平者，由所属单位组织或会员二人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均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审查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工作方针和计划，讨论会务，修改会章，并选举理事。

第五条　本会设理事会，由理事三十五人至四十五人组成。理事会为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会务的执行机构。理事会全体会议互选会长一人，副会长三至五人，秘书若干人，主持日常工作。理事任期二年，连选得以连任。

第六条　理事会每一季度至少开会一次，必要时可由会长决定召集临时会议。理事会可根据需要，组织学术讨论、座谈、报告会、经验交流会，成立专家、专题小组，进行各项协作事宜。

第七条　本会会员有下列权利与义务：

有选举和被选举、参加本会各项学习研究活动、以及对本会提出

批评与建议的权利；有遵守会章、缴纳会费以及担任本会各项工作的义务。

第八条　本会经费以下列方法筹集之：

1．会员每人每年缴纳会费壹元，一次交纳；

2．不足部分，申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补助。

第九条　本会章经会员大会通过并报请主管部门备案后生效，修改亦同。

上海市历史学会章程

（1979年5月23日大会通过）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上海市历史学会。本会是由从事历史专业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及其他具有历史专长的史学工作者组成的学术性群众团体。

第二条　本会宗旨是团结和推动全市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发扬学术民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讨论，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第三条　凡赞成本会宗旨，在本市从事史学专业或业余史学研究而且有一定水平者均可提出申请，由所属单位组织或本会会员二人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方能成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参加本会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索阅本会印发的有关资料；

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对本会会务提出建议和批评；

四、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的各项决议，承担本会各项工作；

五、按期缴纳会费，每人每年壹元，一次交纳。

第五条　本会设理事会，由理事四十四至五十五人组成。理事由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为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理事会互选会长一人，副会长五至七人，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人，主持日常工作。理事任期二年，连选得以连任。

第六条　理事会每季度至少开会一次，必要时可由会长决定召集临时会议。理事会可根据需要，组织学术讨论、座谈、报告会、经验交流会。成立专业、专题小组或研究会，进行各项学术活动。

第七条　本学会为推动全市中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提高师资的业务水平，将不定期为中等学校教师举行学术报告会。

第八条　本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讨论、总结一年来历史学科研究的成绩。提出下一年活动规划，推荐和表彰一年来的优秀成果，审议会务，选举理事会。

第九条　本会章程自会员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修改权属于本会会员大会。

上海市历史学会

一九七九年四月修订

上海市历史学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名称

本会定名为上海市历史学会。

第二条　性质

本会是本市各高校、科研部门和有关单位史学工作者所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本会接受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社团管理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是上海社联的团体会员。

第三条　宗旨

本会严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组织和协调本市对中国历史及相关领域研究和交流，促进学科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第四条　主要任务

1. 制定和组织课题研究，交流学术成果；
2. 组织和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
3. 编辑出版学术论著；
4. 宣传普及史学知识；
5. 评选优秀论文和专著，并给以表彰。

业务范围

组织研讨、编纂论著、举办讲座、表彰优秀。

第二章　会员及分支机构

第五条　会员

本会有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两类。

凡从事史学及相关工作者，具有中级职称以上者，有一定学术水平，承认本会章程，自愿申请，由本会会员介绍，经理事会讨论批准，可成为本会会员。

凡赞同本会章程，愿为实现本会宗旨而努力的单位和社会团体，经申请，由理事会讨论批准，可成为本会单位会员。

第六条　分支机构

凡承认本会章程，根据学术活动需要，可设立专业委员会，经本会批准成为本会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不另立章程，可制定工作条例，不设理事会，设主任。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活动受学会理事会领导。

第七条　会员的权利

1. 在本会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参加本会组织的学术活动，获得本会编印的有关资料；
3. 参加本会组织的学术成果评奖活动；
4. 对本会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5. 退出本会的自由。

第八条　会员的义务

1. 遵守本会章程，维护本会荣誉；
2. 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3. 积极支持和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4. 向本会提供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

5. 缴纳会费。

第九条　退会

会员退出本会需提交书面通知。会员连续两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条　除名

会员若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三章　组织机构和会员大会

第十一条　会员大会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遇特殊情况可提前或延期，但延期不能超过一年。

第十二条　会员大会的职权

1. 制订和修改本会章程；

2. 选举和罢免理事；

3. 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4. 决定终止事宜；

5. 讨论并决定本会重大事项。

第十三条　理事会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会的全部工作。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理事会成员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

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由理事会推举产生。

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最长不得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

第十四条　理事会的职权

1. 执行会员大会决议，并向其报告工作；
2. 协商产生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3. 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4. 决定分支机构的设置和撤销，领导分支机构的工作；
5. 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6. 讨论决定学术研究活动规划；
7. 讨论决定本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常务理事会

本团体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担任，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职权，负责学会各项日常工作。每年至少召开二次会议。

第十六条　学会办公室

学会办公室为本会的办事机构，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处理日常事务。办公机构设在上海社联。

第四章　经　　费

第十七条　经费来源

1. 上海社联拨款；
2. 个人和单位会员缴纳的会费；

3. 社会各界赞助；

4. 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八条　经费用途

本会经费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章程的修改

本章程经1999年1月16日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自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第二十条　组织的终止

本会因故终止，须由理事会在召开会员大会前15天，将终止本会的提议以书面形式通知会员，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即为生效。在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处理善后事宜，按《上海市社会团体组织通则》原则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二十一条　解释权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理事会。

史
魂
上海十大史学家


ISBN 7-5326-0936-7
9 787532 609369 >
定 价：26.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史魂 上海十大史学家
SS号=10887429